



世纪前沿

Trust and Rule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Charles Tilly

胡位钧 译

信任与统治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信任与统治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胡位钧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与统治 / (美) 蒂利著; 胡位钧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前沿)

ISBN 978-7-208-09201-3

I. ①信… II. ①蒂… ②胡… III. ①民主-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4958 号

责任编辑 王舒娟
特约编辑 张笑天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信任与统治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胡位钧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4
字 数 207,000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01-3/D·1709
定 价 30.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前 言

这事儿得怪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西德尼·塔罗(Sid* Tarrow)。那是1995年,在出人意料的阿姆斯特丹聚会的前夕:道格、西德尼、罗恩·阿米扎德(Ron Aminzade)秘密策划并惟妙惟肖地上演了一幕滑稽戏——他们装扮成无套裤汉的模样唱起了“rap”,以此对我的作品进行了生动的演绎。在阿姆斯特丹聚会前的两年里,麦克亚当和塔罗一直在抱怨社会运动的研究与其他门类的大众政治(popular politics)研究之间缺乏联系。譬如,在他们看来,我对革命、国家转型、斗争剧目(contentious repertoires)和大众动员所作的研究,就未能与社会运动的一般分析(current analyses)很好地衔接起来。

在阿姆斯特丹的聚会上,麦克亚当、塔罗和我达成了和解:我们一致同意共同致力于新的斗争政治的研究路径,特别是要提出某种主张以使动员和斗争的各类研究得以兼容并蓄。经鲍勃·斯科特(Bob Scott)提议,并得到了哈丽雅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的支持,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同意资助“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开办极具包容性的3年期“索耶研讨会”(Sawyer Seminar),开展工作坊、研究会(fellowships)和学术访

* “Sid”是Sidney的昵称。为了方便中文阅读,Sid和Sidney均译为“西德尼”。——译者注

问。这个学术团体最终吸纳了 15 名研究生、7 名教师和数量日益庞大的临时参与者。^[1]

西德尼、道格和我一同在“中心”奋战了一年，我们撰写了若干纲领性的论文，其中一篇以《民主、非民主与斗争》(“Democracy, Undemocracy, and Contention”)为题，提交给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1997 年的年会。幸好这篇论文没有公开发表，并被人们及时地忘却了：它是我们三个人——在社会运动的形成、社会运动与不同类型的政权(尤其是民主和非民主的政权)的关系、民主化进程中社会运动的转型以及如何形成斗争政治的一般理论等问题上——三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的简单叠加。7 年后重读这篇论文，预示着要走的路还很长。

其中一条路是我们必须穿越的：即在“斗争政治的形式”和“政权体系的性质”的相互作用问题上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在西德尼、道格和我的三重唱中，我们不断调整各自的分工，但总体上我更多地承担了政权和民主化问题的研究。不过，在我们的主要合作成果《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中，所有有关政权的论述都未被收录其中，由此可见我对他俩的影响着实微乎其微。不过，《斗争的动力》收录了有关瑞士和墨西哥民主化的比较研究，该研究阐明了民主化的两个步骤：一是公共政治与国民类别的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相隔绝，二是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相融合。

我回顾了其他学者有关信任的论述，其所反复呈现的两种取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表明相关研究——至少对于解释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是不充分的。这两种取向是：第一，几乎所有人都将信任描绘

为一种态度、一种个人倾向，即若要巩固民主便要设法使之包含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第二，大多数分析者都认为随着民主的敌人日益萎缩，这种态度的范围也正由窄变宽。上述两种取向相互搀杂，共同构建了如下假设——民主化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具有广泛信任关系的公共空间。

在我看来，这些学者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对内含于信任的社会过程作出准确定位。我认为：

- 信任是人际关系中的一项资产，人们就此彼此承担着失败和背叛的风险；
- 同一个人可以同时与其他不同的人保持不同的关系，从深深猜忌到深信不疑；
- 与其他公民、政治领导人或政府官员的关系亦复如是；
- 因此，对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所作的任何解释都必须详细阐明：相对信任的关系是如何扩大到公共政治领域的。

大量长期而有风险的集体行为——如生育、同居、抚养子女、农业生产合作、长途旅行、维护礼制(ritual solidarities)等——与民主政权无关，但是这些行为显然包含着广泛的信任关系。因此，在我看来，信任之神秘处在于：非政治化的信任关系网络是如何使自身政治化的，是如何与政治网络建立联系的，或是如何被政治关系网络取代的。

鉴于其他地方的其他人也思索过同样的问题，因此，我广泛阅读，向朋友们讨教，通过电子邮件组发出一系列调查，并借助电子邮件进行

了广泛而充满活力的讨论。^[2]答案是肯定的：我身边的许多人都认为信任关系既重要又令人迷惑，大多数人都将信任视为一种态度而非一种关系，并将信任的起因和功效归结为争取承认。没有人一以贯之地对信任网络的变迁、对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变化作出解释，不过，范围广泛而门类繁多的历史研究与这些问题直接有涉。

我的研究愈是深入，上述问题就愈显紧迫。不久前我完成了《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这部著作重点阐释了信任网络和民主化问题，对我在《斗争的动力》一书中的观点进行了提炼、修正和扩展。当《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日趋成形之时，我日益意识到在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的变迁问题上，已有的解释和论证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考虑到叠加新的解释或增加新的论证可能使一部原本就不轻松的书更显笨拙，因此，我勉强搁置此事以待时日。如今，这一天到来了。眼下的这部著作就是其结果，并由您——我的读者——判断是否实现了预期。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四位直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赐予了我极大的帮助，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手稿提出意见：阿莱娜·莱丁内瓦(Alena Ledeneva)帮助我对有关俄罗斯人际网络与信任的观点和素材进行了整理；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既是信任问题专家，又是“剑桥比较政治研究丛书”**的主编，她以双重身份帮助我对一个又一个含混之处进行了澄清；雷纳尔多·奥尔特加(Reynaldo Ortega)放下手头有关西班牙和墨西哥民主化的调研工作，对我在上述两国民主化的论述中出

* 该书中译本已于2008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 《信任与统治》(英文版)是“剑桥比较政治研究丛书”(Cambrid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出版的第81部著作。——译者注

现的重要经验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审核和修正；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帮助我平衡观点，使我所擅长的政治过程研究和她所擅长的经济过程研究得以兼容并蓄。此外，珍妮弗·凯里(Jennifer Carey)细致入微地梳理了整部书稿；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听众(当时PPT出了故障，多亏西德尼·塔罗冒充主持人开了一阵子玩笑)和密歇根大学的听众，让我明白了哪些观点是可理解和可靠的，哪些观点有待改进。

经授权，我从拙文《变化政治中的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ies in Changing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70, 2003, 1301—1315)、《信任与统治》(“Trust and Rule”, *Theory and Society* 33, 2004, 1—30)和拙著《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援引了若干资料，特此说明。

注释：

[1] 实际上，这个项目最终延续了5年。除了感谢道格和西德尼之外，我还要感谢罗恩·阿米扎德(Ron Aminzade)、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小威廉·斯韦尔(William H. Swell, Jr.)，感谢他们必不可少的协作。有关该项目之详情，请参阅麦克亚当、塔罗和我合著的《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的前言部分，以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主编的《国家、政党和社会运动》(*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的序言部分。

[2] 感谢大家对于问题的解答和在线讨论，感谢罗恩·阿米扎德、萨姆·鲍尔斯(Sam Bowles)、杰夫·布罗德本特(Jeff Broadbent)、胡安·科尔(Juan Cole)、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杰克·戈德斯通、汤姆斯·海尔克(Thomas Heilke)、米米·凯克(Mimi Keck)、戴维·莱文(David Levine)、斯科特·麦克纳尔(Scott McNall)、杰里·玛维尔(Jerry Marwell)、彼得·穆尔曼(Peter Murmann)、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埃莉奥诺拉·帕索替(Eleonora Pasotti)、玛丽察·波罗斯(Maritsa Poros)、埃里克·塞尔宾(Eric Selbin)、杰斯珀·西格森(Jesper Sigurdsson)、马克·斯坦伯格(Marc Steinberg)、路易丝·蒂利(Louise Tilly)、弗洛伦西亚·托舍(Florencia Torche)、凯瑟琳·维德里(Katherine Verdery)、巴里·韦尔曼(Barry Wellman)、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埃莉斯·沃特沙夫特(Elise Wirtschafter)、王国斌(Bin Wong)以及一位草草落款“贾马尔”(Jamal)的网友。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章 信任与不信任之关联 / 1

第二章 信任网络如何和为何运作 / 35

第三章 信任网络的转型 / 60

第四章 信任网络对掠夺者的抵抗 / 94

第五章 从隔绝到整合 / 119

第六章 信任与民主化 / 149

第七章 未来的信任网络 / 182

参考文献 / 196

第一章

信任与不信任之关联

在 1367—1393 年间，圣芳济会(Franciscan)修士弗朗索瓦·博雷尔(François Borrel)——时任多菲内省* 上阿尔卑斯(high Alpine)昂布兰(Embrun)主教教区的宗教裁判官——对其辖区内的瓦勒度派教徒**进行了严厉打击。在天主教会看来，这些堪称异端的原始基督徒们罪该万死：他们拒绝立誓、反对死刑、否认炼狱、抵制教皇的权威——包括否认教皇有追封圣徒的权利，甚至宣称由未脱原罪的神父主持的圣礼压根儿无效。仅就小范围而言，上多菲内省瓦鲁伊斯山谷(Valley of Vallouise)保存完整的 1379—1386 年档案表明，该教区 3 年内至少将 300 名瓦勒度派教徒送进了宗教裁判所。这些异端分子一旦被教会捕获，便被投入宗教裁判所严刑审讯，并照例被判有罪。

随后，教会将这些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移送世俗当局，由后者将其烧死或绞死，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尽管部分瓦勒度派教徒从瓦鲁伊斯越过边境逃到了皮埃蒙特***，但也是尽失其所有。在宗教裁判所大行其道的 3 年里，仅瓦鲁伊斯一地没收的财产就高达 5 000 弗罗林——相当于风调雨顺的 1343 年整个多菲内省 40% 的王室税(Paravy 1993:II, 965)。

* 多菲内省(Dauphiné)：法国旧地名，相当于现在的伊泽尔省(Isère)、德龙省(Drôme)和上阿尔卑斯省(Hautes-Alpes)。——译者注

** 瓦勒度派(Waldensians)：亦译为“韦尔多派”或“瓦灯派”，是 12 世纪后期兴起于法国南部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被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廷视为异端，现被公认为宗教改革的先声。——译者注

*** 皮埃蒙特(Piedmont)：现为意大利西北部大区，与法国、瑞士相邻，首府都灵。——译者注

实际上，在宗教改革发端之前，瓦勒度派教徒从未自称是瓦勒度派，这个称号拜其敌人所赐；不过，他们自己所用的称号也不尽相同：兄弟会、基督穷人派、里昂穷人派等(Audisio 1999:3)。瓦勒度派这个不甚恭敬的称号，源于其公认的教派创始人——瓦勒度(Vaudès, Valdès)：此公生于里昂的富裕商人家庭，1170年前后皈依基督教并捐出了自己的所有财产，从此在里昂市的穷人中传播福音。多明我会(Dominican)修士波旁的斯蒂芬(Stephen of Bourbon)以一种轻蔑的口吻描绘了瓦勒度的活动：

他在大街小巷宣扬福音，也宣扬他的个人感悟，吸引了一批与他大同小异的男男女女，并让这些人从福音书中汲取力量。他还让那些从事最下贱职业的人到临近村庄布道，其中有男有女、大字不识、蒙昧无知，他们在村庄里转悠：或是挨家挨户上门布道，或是在空地上甚至教堂里布道，劝诱人们像他们那样行事。(Kaelber 1998:135)

与同一时期朗格多克(Languedoc)和比利牛斯(Pyrenees)的清洁教派(Cathar Perfects)——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对之有过生动的描绘——以及15世纪早期捷克的胡斯教派(Czech Hussites)一样，“里昂穷人派”致力于恢复早期基督教的质朴本质。(瓦勒度派自称自基督立教以来一直延续至今，这种说法掩盖了它起源于12世纪的事实。)1182年，里昂市的当权教会将瓦勒度派逐出该市；1184年，教皇卢修斯三世(Lucius III)又将他们逐出天主教会。就整个13世纪而言，尽管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治者只是针对瓦勒度派颁布了一些惩戒性的政令，但

*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29—)：法国历史学家，当代“来自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和“微观史学”(microhistory)的领军人物，其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已由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10月汉译出版。——译者注

瓦勒度派自此——被逐出里昂市之后——便开始转入地下。里昂派从里昂消失了，他们退隐到了阿尔卑斯山谷，出于日常隐蔽之需，仅通过被称为“巴比”(barbes)的传教士与多菲内省和皮德蒙特交界处的信众保持联系。这个时候，瓦勒度派的牧师已清一色地由男性组成。

瓦勒度派从欧洲腹地延伸至欧洲其他地区。他们不时派人远赴波河平原、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勃艮第、普罗旺斯、奥地利、波希米亚和莱茵兰*定居，而这些离散社群又进一步分离出诸如“伦巴第穷人派”(Poor Lombards)等新的宗教派别，还衍生出了独树一帜的波希米亚禁欲主义(Kaelber 1998:147—151)。瓦勒度派的延伸范围如此之广，甚至胡斯教派的部分著作也被译成了普罗旺斯语(MacCullonch 2003:38)。在经历了四个世纪的地下生存状态之后，瓦勒度派又再次主要集中到了上阿尔卑斯地区。

宗教改革发端不久，一位名为乔治斯·莫雷尔(Georges Morel)的“巴比”给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新教领袖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自己的牧师群体及其所秉持的穷人德性：

我们的人几乎全都来自畜牧业和农业，年龄在25—30岁之间，都没有受过教育。我们让他们在群体中接受3—4年的考验，其中包括2—3个冬季……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教他们写字和阅读，教他们用心灵领悟《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的部分章节以及《保罗书》的重要篇章……经受住考验的人会被安排到一个特定的地点，在那里居住着一些保持着处子之身的妇女，

* 波河平原(Po Valley): 意大利北部冲积平原，西起阿尔卑斯山脉、东至亚得里亚海，绵延600公里，米兰、都灵、威尼斯等城市均坐落于此。阿普利亚(Apulia): 现为意大利南部大区，东邻亚得里亚海、南临奥特朗托海峡和塔兰托湾。卡拉布里亚(Calabria): 现为意大利南部大区，北邻巴斯利卡塔大区、西南临近西西里自治区、西起第勒尼安海、东至爱奥尼亚海。勃艮第(Burgundy): 现为法国中部大区，下辖科多尔省、涅夫勒省、索恩—卢瓦尔省和约讷省。普罗旺斯(Provence): 位于法国东南部，现属于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毗邻地中海、与意大利接壤。波希米亚(Bohemia): 中欧古地名，现位于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地区。莱茵兰(Rhineland): 德国西部莱茵河两岸地区，原为普鲁士莱茵省，现含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两个州。——译者注

她们是我们的姐妹。他们在那里呆上 1—2 年,大部分时间用于田间劳作。规训期满后,信徒们接受圣餐和圣礼的洗礼,然后被批准成为传教和布道的牧师。他们被两人一组地外派传播福音,其中一号被授予荣耀、尊贵和权威,成为二号同伴的师傅……我们决不结婚,因为即便是为真理作见证,也很难保证一生处处洁净。我们的衣与食都来自信众的施舍。(Paravy 1993:II, 1034)

由于处于官方迫害之下,无论传教士还是信众都长期面临被人告发的威胁——只需一个变节分子就可令其生命和财产化为乌有;因此,为了应对这种风险,瓦勒度派建构起了强大的信任网络——信任网络愈是强大,信仰愈是持久。与此同时,被瓦勒度派信任和不被瓦勒度派信任的人,其间的分野也愈加尖锐了。

在经历了早年的里昂遭遇之后,“巴比”们为了免遭迫害理所当然地不再公开布道,而是戒备地、秘密地、挨家挨户和个别访谈式地劝人改宗。年轻的二号传教士皮埃尔·格里奥(Pierre Griot)承担了大量工作。1532年,他不幸落入宗教裁判所之手,并被提交给了普罗旺斯多明我会裁判官罗马的吉恩(Jean of Roma)。以下是当时的一段审讯记录:

问他,他们为什么不敢公开传播教义。

——他说,他相信是因为恐惧。

问他,他们的教义是善是恶。

——他说,他们相信是善的。

问他,既然他们认为是善的,为什么不在公开场合布道。

——他说,是因为恐惧。(Audisio 1999:88)

随着 16 世纪新教教义在民众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大多数瓦勒度派教徒都融入了新兴的宗教改革运动并转化为其中的某个分支,从

而使其两个世纪的秘密活动和独特经历化为历史。例如，加尔文的日内瓦*曾在16世纪派出传教士，渐次将阿尔卑斯附近的许多瓦勒度派信众转入新教教会。

从17世纪中叶起，萨伏依公爵**对其辖区内的瓦勒度派教徒进行了驱逐和屠杀，以此显示其反对新教的决心。一部分瓦勒度派教徒为逃避萨伏依的迫害，流亡到了相对宽容的荷兰殖民地斯塔腾岛***——纽约(MacCulloch 2003:672)。尽管迫害依然不断，但是，一个得以正式组织化(并被正式命名为瓦勒度派)的瓦勒度教会开始成为皮埃蒙特的新教中心。该教会一直延续至今，人数不多却活力非凡，信众遍布整个西方世界。不过，作为一种独特的、秘密的、编制严谨的信任网络的“里昂穷人派”，却在16世纪和17世纪渐渐瓦解了。

凝聚瓦勒度派的不只是人际网络，而且，还应当称其为信任网络：因为其成员关系是将重大而长期的集体性事业(collective enterprises)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malfeasance)、失误(mistakes)或失败(failures)的风险之中。就瓦勒度派而言，该网络承担着生命、财产和信仰上的成败风险，仅仅一个奸细、叛徒或宗教裁判所刑具下的软骨头，都有可能让瓦勒度派的网络遭到灭顶之灾。至于那些由血缘关系、长途贸易或工匠之间的互帮互助所形成的信任网络，尽管不太可能面临——对瓦勒度的信徒们已是家常便饭的——死亡和放逐的威胁，但是，由于网络所涉及的事务及其运作状况事关重大，因此，信任网络迥然不同于一般的交往和贸易网络。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所面对或身处的就是一个信任网络呢? 首

* 1541年，流亡在外的新教改革领袖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年)应邀重返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和市政工作，日内瓦自此被改造成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新教的罗马”，加尔文亦被后世讥讽为“日内瓦的教皇”。——译者注

** 萨伏依公爵(Dukes of Savoy)：萨伏依王室的统治者，17世纪中叶卡洛·埃曼努埃莱二世(1638—1675年)和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1675—1720年)相继执政。萨伏依王室是欧洲著名宗室，1416年被封为神圣罗马帝国公爵，1861—1946年间一度统治意大利。——译者注

*** 斯塔腾岛(Staten Island)：现为纽约市下属5个次级行政区中地域最遥远、人口最稀疏、开发程度最低的地区。——译者注

先，信任网络意味着由共同的纽带——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群，他们组成了一个网络。其次，信任网络意味着由于存在这样的纽带，因而网络成员的重大诉求得到了关注、网络成员之间彼此扶助，而网络也正是由若干诸如此类的强大纽带构成的。再次，信任网络意味着网络成员共同承担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事业，如生育、长途贸易、工匠互助、地下宗教活动等。最后，信任网络意味着网络纽带之构成(configuration)，源于将共同的事业置于其个体成员的失信、失误和失败的风险之中。

瓦勒度派教徒维系着一个庞大的信任网络，其网络成员常常为了其他成员而甘遭迫害和放逐。它独特而动荡的历史生动地演绎了政权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general problem)：政权的公共政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的基本信任网络(basic trust networks)与统治者的统治策略(strategies of rule)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就此意义而言，公共政治包含了所有显而易见地存在于所涉之政治角色和政府代理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无须纠缠于术语，这里所说的“统治者”(rulers)是指人格化的国家权威；“政府代理人”(governmental agents)是指替统治者说话或办事的人；“政府”(governments)是指政府代理人所运作的组织；“政治角色”(political actors)是指享有某类名号并与既定政府相对应的非政府实体；“政权”(regime)是指统治者、政府和政治角色之间的常态关系；“公共政治”(public politics)是指统治者、政府和政治角色之间的外在交互行为。

公共政治中的斗争政治*，涵盖了所涉之政治角色——包括政府代理人 and 统治者——的一切非连续和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活动(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无论信任网络、信任网络的各个部分还是信任

* 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亦有译为“抗争政治”。“抗争”的中文词义含有自下而上、依法或据理力争之意，而斗争政治或社会运动并非天然正义(如反犹或反天主教的社会运动)，亦不乏政府或其他权威自上而下组织的社会运动(如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和意大利)，故仍译为“斗争政治”。——译者注

网络的成员，都有可能作为诉求伸张者、诉求对象或诉求伸张活动的第三方卷入斗争政治。例如，尽管16世纪瓦勒度派已尽其所能地远离政治，但是，因其遭受迫害，他们还是被列为教会和政府的主要诉求对象。他们极不情愿地、常常是悲惨地被裹挟到公共政治之中，猝然面对我们称之为斗争政治的群体性诉求和反诉求。

无论如何，非斗争形态的政治构成了政治交互行为的大部分内容，包括税收、户政、征兵、政治信息传播、政府的利益协调活动、所涉之政治角色的内部组织化行为，以及大多数情况下与非连续的、公开的群体性诉求伸张活动无关的政治过程。就此而言，信任网络及其各个部分更为通常——也更为必然地——是与非斗争形态的政治打交道，而非裹挟于斗争政治之中。在瓦勒度派被逐出里昂的四个世纪里，教徒们通过转入地下尽其可能地置身于公共政治之外——无论斗争形态还是非斗争形态的政治概不例外。他们能够生存下来，更多是源于信任网络的有效运作以及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有效隔绝。

网络涉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Watts 2003, 2004)。社会网络包含了三个以上的社会要素(social sites)所构成的任何一组社会联系，这些联系包含彼此交往、相互承认、共同参与、提供商品或服务、疾病传播以及其他一些间接的交往形式。网络可以由个体组成，也可以由组织、地区或社会地位构成。正是人与人的联系网络——既不为人所知也不为彼此所知——每天早晨给你送来了晨报，而另一些网络则传播着政治信息，还有一些正以其无形的结构运转着资金、传播着疾病、演化着语言的革新。

这些网络中，有些可能与信任网络重叠，有些甚至构成了信任网络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们在整体上尚不足以被称为信任网络。原因就在于，这些网络的参与者并未将重大的集体性事业置于网络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说得更精确些，这些网络的成员彼此并不信任。与之相反，信任网络中绝大部分乃至全体成员都将重大的集体性事业——如捍卫信仰、安置子女、赡养老人、保守私人秘密等——置

于彼此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就此而言，信任网络是所有社会网络中绝无仅有的一个狭小子集。

数千年来，普通民众将自己最主要的精力和最宝贵的资源献给了信任网络：不只是秘密教派，而且，还必定包含了较公开的宗教会社、宗族、贸易离散社群、庇护链、信贷关系、互助社、同龄圈(age grades)及某种地方社群。值得注意的是，信任网络常常与统治者争夺资源——如金钱、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统治者往往对根植于信任网络中的资源垂涎三尺，并将这些网络视为实施有效统治的障碍。但是，统治者从未成功地彻底消灭网络，所能做到的只是不断地适应和调节，以便生产足够的资源用于维系政权。瓦勒度派的信任网络向我们展现了其成员在极其不利的境况下维持关系达数个世纪之久，而一连串迫害也向我们展现了统治者运用资源瓦解秘密的信任网络，并攫取根植于其中的各种资源。

我们身处血缘关系及其他信任网络之中，往往视之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信任网络有许多重要的未解之谜：当信任网络的成员在一个有着各种机会和许诺的世界不断向外扩展时，信任网络是如何保持其凝聚力、控制力和信任度的？这个问题似乎容易解答：似乎是与世隔绝的受限状态、封闭结构和宗教氛围维护了信任网络的持久监控、互助互惠、彼此信任和难以退出。但是，在地理上分布很广的信任网络也常常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若没有强烈的情感支撑，即便是封闭的社群又何至于此呢？显然，在“我们”和“他们”之间保持界线，对于信任网络的持久运转至关重要(Tilly 2004c, 2005)。仅此事实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绝大多数信任网络的参与者，都尽其可能地避免暴露于统治者和公共政治之中。

就某些时期的政权而言，公民们事实上是奢侈地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置于不良的政治行为的风险之中。人们接受法定货币、购买政府债券、缴纳税款、信赖政府的养老金、服兵役、信赖司法、献身公益，并依赖公开认定的政治角色伸张冤屈或诉求。至少在这些方面，他们是

将自己的信任网络融入公共政治之中；至少在这些方面，掌控政府的人——统治者——获得了历史上一度隐匿于信任网络之中的、被严加看管以免为统治者所利用的宝贵资源。统治者就此获得了现成的财富、信用、劳力、信息，甚至还包括忠诚。

信任网络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主要有直接整合和间接整合两种形式。间接整合是指信任网络向地方组织、教会、工会以及其他与政治有涉的角色延伸，并因此能够在彼此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就其作为政治中介的成本和收益讨价还价。直接整合是指信任网络扩展至政府本身，如宗族集团将其子弟送去参军、国家教会建立并垄断政治参与，或是政府创立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将工人的未来生活与政府的绩效以及政府提供服务的可靠性衔接在一起。当然，在直接整合和间接整合之间还有许多中间状态，如享有特权的社群或弱势社群与政府机构保持联系以获得保护的不同形式。

走进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Adam Smith)从未采用“信任网络”这一术语，但他确实有过这样的论述：信任网络所呈现出的这种团结，是在长期的亲密关系中培育而成的同情之情的产物，它在家庭内部造就了超越血缘或邻里的、更加强大的融合。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初版于1759年。这部著作将大多数政治环境中人们相互团结的动力，描绘为全然是出于一种需要：

在(狩猎、游牧与农耕等人民生活大体上自给自足的)乡村国家里，以及在所有法律权威单独不足以使每一位国民享有充分安全的国家里，同一家族中所有不同的支系通常选择住在彼此邻近的地方。他们的联合，经常是他们共同的安全防卫所必要的。他

们每一个人,从地位最高贵的到地位最卑下的,对于彼此都或多或少有些重要性。他们的和谐相好,会使他们必要的联合更加坚强;他们的倾轧不和,总是会减弱甚至也许会摧毁这必要的联合。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比他们和任何其他部族成员的交往更为密切。同一部族中,即使是关系最远的成员们,也仍可主张他们彼此有某些关联;因此,在其他一切情况都相同时,他们有理由期望获得比那些不敢有这种主张的人更为显著的特殊照顾。距今不远的年代里,在苏格兰高地地区,宗族的首领向来认为他那一族里最穷的人是他的堂(表)兄弟或亲戚。鞑靼人、阿拉伯人、土库曼人,据说也有同样广泛关照亲属的情形。我相信,其他民族对于亲属的关照,如果他们的社会状态接近苏格兰高地族在大约是本(18)世纪初的那种状态,也应该会有类似的情形。* (Smith 2000: 326—327)

斯密认为,日常的同情之情与集体的自我保护两者交叠,共同造就了大多数政治环境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团结。唯有当政治系统能够确保个人安全时,上述必需才成为不必要的。

在这部 1759 年的著作中,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下、如何以及为什么人们为了重大的事业而依赖于自身的血缘关系? 对此问题,斯密未予解答,但该问题却为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延续。后者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答案:尽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公司是比家族贸易更加有效的替代者,但是,在合同无法确保履行及信息成本极高的情况下,自然生成的信任网络还是比非人格化的经济交往形式更加有效。珍妮特·泰·兰达(Janet Tai Landa)认为:

* 此处译文采用谢宗林译本,参见[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0 页。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西部的橡胶业小农交易活动中活跃着一批华裔中间商,1969年对其所做的问卷和访谈调查表明:(1)这里的橡胶业小农交易活动——尽管其纵向结构还可分层——为一个中间商团体所掌控,它是由福建人及其后裔组成的结构紧密的宗族集团;(2)他们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扶助,并以此作为彼此开展各项业务的基础;(3)他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而非中国血统的其他人则使用现金交易,以此降低交易的风险。(Landa 1994:101)

根据兰达的论述,这个网络通过一种“低成本的俱乐部式制度”履行着无形的伦理法则,从而既降低了履行合同的成本,又降低了信息成本(Landa 1994:102)。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样,兰达着力强调社会制度(social arrangements)的重要性: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稳定了经济产出,是对公司和市场的补充甚至替代(Haber, Razo, and Maurer 2003, North 1990, 1997)。

阿维拉·格雷夫(Avner Greif)也谈到同样的问题。通过对马格里布*两类商人——“个人主义”的热那亚商人和“集体主义”的犹太商人——的比较研究,格雷夫提出了一个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的比较议题:在何种情况下,委托商把重要的事务和货物委托给远方的代理商?在个人主义模式下,委托商为预防欺诈——即代理商通过欺诈一次性牟利而非基于长期的诚信获取应得的利益——通常给予代理商充分的代理权,并支付丰厚的佣金;而集体主义模式则与之相反,委托商依赖网络关系可以确保欺诈者为所有的网络成员所拒斥:

不难想象,例如,每一个马格里布人都认为其他人也以同样

* 马格里布(maghreb):泛指地中海沿岸的阿特拉斯山地以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沿海平原地带。——译者注

的态度,将代理关系中的欺诈行为视为某种“不合规矩”和应予惩罚的行为。这类惩罚是自我实施的,与之同理,代理关系中的集体惩罚也是自我实施的;此外,这类惩罚还因为这里存在广泛的信息传播网络而更加切实可行。(Greif 1994:936)

根据格雷夫的论述,集体主义社会中的风俗习惯、口耳相传的传统以及诸如此类的非正式机制,不仅造就了何为“不合规矩的行为”的共识,而且,还形成了惩罚反常行为——无论其发生于网络何处——的共同意志。

总之,这些论述很好、很充分,但仍有待完善。首先,亚当·斯密的论述以及新斯密主义的阐释并没有对彼此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的远亲,何以强调彼此之间的关联作出解释;也就是说,斯密所说的“同一个部族中最偏远的成员都宣称彼此之间存在关联”以及基于这种“关联”而行使的权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而将每一种诸如此类的关联都归结为集体主义社会所致——那里的风俗习惯和口耳相传的传统造就了彼此的关系、共同的利益和惩罚(违反共同规范的)反常行为的共同意志,如此论断是否过于牵强了呢? 其次,斯密主义的理论未予解释的另一点是:那些并不依赖于血缘关系而主要依赖于宗教、政治信义或贸易关联的团体(groups),是如何获得和保持家族式团结的? 在此问题上,兰达和格雷夫都将这种团结假定为先验存在的。再次,斯密主义低估了统治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信任网络的掠夺。最后,他们亦未对如下过程作出解释,即被斯密称作“商业国家”的信任网络是如何被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的?

亚当·斯密认为,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关系必将随着文明的演进而日趋式微(Smith 2000:327—328)。但是,对当代富裕资本主义国家所作的研究却不断表明,社会活动的大部分内容仍主要由血缘关系所构成(DiMaggio and Louch 1998, Lye 1996, Stark 1995, Yinger 1985)。就此而言,对于斯密及其衣钵的继承者所提出的下述双重阐释性问题——(1)漫长历

史中信任网络所具有的独立性和重要性，(2)世界“商业国家”中信任网络所面临的转型和可能发生的凋敝——我们在认同之余，还应当有所超越。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信任网络的政治整合呢？结合我们所处的时代，表 1.1 对这种整合的大致脉络进行了勾勒：从非直接的整合(形成以信任网络为基础或包含了信任网络的政治性协会)到非常直接的整合(促使信任网络成员投身于政府工作)。在以往的漫长历史中，极少有信任网络是为公共政治承担义务的。即便是今天的这些民主国家，这类整合也要等到大约 20 世纪才得以普遍化。这种整合既对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产生了影响，同时又极大地提升了网络成员在相应的公共政治行为中的分量。

表 1.1 信任网络被公共政治整合的基本迹象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权体系中，当存在大量下列行为时，即意味着信任网络已为公共政治所整合：

- 创建公众认可的协会、互助社、政党、联盟、宗教团体和社群，或是为已秘密存在的类似组织寻求公众的认可
 - 在这类组织中寻求友谊、亲密的关系、共同的信念、安全以及高风险的事业
 - 允许家庭成员参加军队或警队
 - 促进家庭成员在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关——中获得职业发展
 - 请求(或至少容忍)政府对出生、死亡、结婚等人口事项的调查和登记，并采用官方登记使法定交易生效
 - 通过人口普查、调查和申请向公共组织和政府提供个人信息
 - 愿意将私人合同交付政府机构强制执行
 - 求助政府机构预防或惩戒家族、宗教团体或经济网络成员的不负责任行为
 - 采用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进行交易和储蓄
 - 花钱(如婚姻登记费)向政府购买安全，使之承担维持正常人际关系的责任
 - 在人生重大事项和长期安全方面依赖政治角色和(或)政府机构
-

上述行为是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呢？在信任网络与统治体系的漫长的历史互动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五个突出的问题：

(1) 面对政治掠夺者和贪婪的统治者，人们在何种条件下以及是如

何维持信任网络的？

(2) 在统治者掠夺成风的背景下，信任网络在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为统治体系——直接或间接地——所整合的？

(3) 统治者与信任网络的关系是如何影响统治稳定的？

(4) 在何种条件下、如何以及伴随着何种政治后果，信任网络与统治者在整合中相互受益，或无法在整合中相互收益？

(5) 当整合发生时，它何以具有不同的变化，又是什么主导了这些变化的形成？

本书将揭开这五个谜团。尽管本书在瓦勒度派等历史事例上泼墨颇多，但其最终呈现的是问题而非思古幽情。这些问题包括：民主的未来取决于信任网络与政权体系的关系，倘若信任网络广泛地脱离了公共政治，那么，其发生之日便是民主受损之时；此外，社会保障或医疗保健的私营化、社会精英或少数群体不再进入公立学校、电子通讯取代了政治行为人的面对面沟通，凡此种种均潜在地导致了当今民主制度下既有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破坏性分离，并进而败坏了民主。^[1]当然，在通往上述观点的途中，本书对公共政治与信任网络之间的联系——以及非联系(disconnections)——进行了广泛探寻。

回答上述五个问题，需要打破惯常的思维。“信任”一词，通常被人理解为个人对他人或制度所持的态度。然而，就本书而言，我们应当明白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信任网络，是与信任相伴相生的。此外，政治分析家们经常将信任视为某种基础、某种催生或抑制了特定政治现象的现象，但不认为信任本身就是政治的一个部分。为了阐释信任与统治的结构性变化与变异，我们有必要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信任与非信任在此扮演着积极的政治角色——进行分析：一是信任网络与其他政治角色的关系，二是信任网络相互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将信任网络看作是活生生的、变化多端的政治角色，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信任、信任网络及其与统治者的关系

为了解答上述五个疑问，我们不妨将信任视为一种态度、一种当事人与相关实践活动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聚焦于关系的层面，为探寻何种态度可能激发、助长或源于信任关系开启认识之门。同宗同族、宗教信众(fellow believer)、行会同工(comembe of a craft)以及诸如此类的标签，为信任关系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不过，我们对信任关系的认识更多是源于信任者各方的相关行为：如果你信任我，就别说这样的话；我会对你孩子的教育负责；请把你毕生的积蓄借给我投资；请服用我开给你的药剂；请帮我为房子刷油漆，并假设我也会同样帮你。如果你不信任我，你是不会做这些事的。

信任是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而信任关系则意味着常规化地承担了这种风险。^[2]尽管有些信任关系仅为两人所有，但大部分的信任关系都是在更加庞大的信任关系网络中运作的。就此而言，信任网络由网状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由强大的关系纽带所凝聚，信任网络的成员将弥足珍贵、利害攸关的资源 and 长期的事业，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

我以风险定义信任，但人们并非因为偏爱风险关系而将重大的事业托付给信任网络，而是相反，当人们弥足珍贵的长期事业面临严峻的风险时，才转而寻求信任网络对其事业的支持。信任网络之迥异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就在于它构成了对失信的常规化控制、构成了对失误和失败的常规化预防。对于贸易离散社群、紧密结合的宗族集团以及地下宗教派系的成员来说，躲避、掩盖或拒绝形成彼此的互惠关系，将面临比日常社会网络中同类行为更加直接的威胁。信任网络中的强势人物常常对其成员实施暴政：向他们灌输闻所未闻的信仰、让他们经历痛苦的人会议式、迫使青少年从事他们不喜欢的活动、要求对微不足道

的长辈表示尊重、处死不服从性事或婚姻安排的妇女。信任网络的成员无须感到快乐，遑论自由。

当然，信任网络的成员也常常因其保持一致而获得补偿。忠心耿耿的成员往往颇受关注，获得对其个人困难的帮助、长期的互利互惠以及协助其抵御可能的疾病或残疾——总之，给予他们别处得不到的好处。正如新斯密主义分析家们所假设的，信任网络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契约的安全性。保持一致成为获得这种社会保障的代价。信任网络控制其成员，同时也为其成员提供回报——这使被集体拒斥得不偿失。

绝大多数社会网络都缺乏信任，甚至毫无信任可言。我们似乎可以将社会网络的某些方面称为信任圈(trust-connected cliques)，但这些社会网络——传播艾滋病的吸毒、卖血和性交易网络，传播日常政治信息的网络及由志愿者组织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大多尚不足以被视为信任网络。一般说来，单线构成的社会网络很少涵盖第三方，也很少能够维持亲密关系，从而很少或压根儿不宜被视为信任网络。

信任网络在其中作用非同小可的典型事业，主要包括同居、生育、养育、运输财物、与超自然力沟通、共同开发农业资源、长途贸易、抵御掠夺者、保持健康以及共同防治疾病。基于不同的环境及其特点，信任网络常常外化为宗教教派、宗教会社、宗族集团、贸易离散社群、庇护—代理链、信用网络、互助社、同龄圈以及地方社群等不同形式。

经历了数千年，信任网络到了 21 世纪依然枝繁叶茂。人们常常为诸如找工作、长途迁徙、大笔买卖、借贷、从事高风险的政治活动及寻找配偶等实际活动而依赖于这样的网络。^[3]

就此而言，亚当·斯密的观点应当予以改进。我们应当避免将信任网络看作是原始的礼俗社会所遗留的残渣，它们绝非仅现于传统的血缘组织，也绝非仅受制于传统社会，而是无论何时都在被创造或被恢复：大学同学构成持久的伙伴，消防队员组成生死与共的团队，移民的妇女建立轮转基金会(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新的宗教教派想方设法

地群体退出世俗社会。在网状的人际关系和强大的凝聚纽带内，成员将弥足珍贵、利害攸关的资源 and 长期的事业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至于信任网络外观上的传统或现代、保守或激进，都无碍于这样一个事实：信任网络不断推陈出新。

新的信任网络形式有时也会产生强大的历史影响。请看一份有关16世纪英格兰信用网络的研究。在这份颇为值得关注的研究中，克雷格·马尔德鲁(Craig Muldrew)对商业交往中的信用——随着英国对纺织业及与欧洲大陆贸易的依赖日益加深，商业信用在大约1540年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当时，法定的支付手段仅为金币和银币，但法定货币的周转远远地落后于商品生产和贸易流通，由此导致了某种类似于通货紧缩和资金周转加剧的状况。但与此同时，人们相互之间的信用交往——尤其是家族内部或家族式商业企业的信用交往——却不受上述状况的影响。请注意一些至关重要的变化：

随着信用网络变得日益复杂、日益突破常规，在签订合同之前努力评估他人的信用变得重要起来。合意双方在清偿债务、交付商品、履行义务等方面愈可靠，信用链就愈安全，获利的可能性、未来的物质保障以及所有相关人等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其后果便是，社会意义上的信用——即家族及其成员在公平和诚信方面的信誉等级——成了借贷之通货。信用……是指社会的信任量，同时还包含一套可信赖度的评估系统；家族的可信赖度就此被视为非同小可的公共品德，犹如对上帝的信任被视为首要的宗教义务。因此，自16世纪后期以来，对于大多数依赖市场赚取利润的家族来说，打造可信赖度便成为创造和保持财富的至为关键的因素。(Muldrew 1998:148;同时参见 Muldrew 1993)

尽管马尔德鲁未予细述，但不难想象新兴的信用网络不只是接

纳了可信赖者，更为值得关注和戏剧化的是，它还将不可信赖者排斥于信用网络之外并打上耻辱的烙印。它放大了可予信任者和不予信任者之间的界线。

就可予信任而言，一个家族的信用并不取决于它的物质财富或手头现金，而是取决于它与其他家族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是以——从他人手中——即刻筹集资金的能力衡量彼此的可信赖度的 (Muldrew 1998:148—172)。马尔德鲁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具有理性之表象、呈现出非人格化市场取向的危险的商业交往中，血缘、邻里、信众之间的关系纽带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他的分析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 16 世纪，正在崛起的商业阶级成员会对普罗大众日益频繁地加以谴责，指责他们缺乏远见、嗜酒成性、道德骑墙以及毫无信用可言。

马尔德鲁的分析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至少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基础之上的。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传播了个人责任的信条，它催生了资产阶级的世俗成就；而马尔德鲁的观点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创造了对商业生存能力至关重要的声誉。在异端盛行、罪案猖獗、放荡成风和掠夺成性的地区和阶级中，宗教的、政治的、家庭的、性别的、邻里的以及商业领域的无规则，造成的是在可信赖度上对任何个人、家族或社会群体的怀疑 (亦参见 Wrightson and Levine 1979, 1991)，并由此导致不信任甚嚣尘上、贻害无穷。

颇为有趣的是，马尔德鲁提供了一个反向的视角：不仅将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箭头调转了方向，而且，还强调市场的拓展更加依赖于密切的人际关系而非消解了既有的社会纽带。当前流行的做法是从民风民俗或合同的履行机制中追溯信任关系，而马尔德鲁与之不同，他认为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导致了新的态度和新的合同履行机制。

尽管马尔德鲁仍不免将信任视为一种态度或信心，但是，他也同时将信任视为社会关系的一个内在部分，通过暗示信任是将弥足珍贵的资源和后果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马尔德鲁推进了信

任的研究。他的分析告诉我们，面对如此严峻以致阻塞了现金交易的金银币短缺，16世纪的英国人设计出了新的能够缓解信用风险的信任网络。马尔德鲁坚持认为社会纽带是第一位的，这一立场与当前东欧经济史学家和分析家们大力鼓吹信任维持网络(trust-sustaining networks)对于市场和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重要性颇为一致。

民族国家政府最终通过建立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和规范商业交易行为，对信贷市场(credit-connected markets)进行了大规模干预。英格兰银行的创设(1694年)和议会主权原则的创立，共同衍生出了诸多重要的变化：发行了相对安全的国债，伦敦金融家们广泛地参与国债投资，公众广泛地参与政府有价证券的投资等(Armitage 1994, Muldrew 1998:328—329)。不过，根据马尔德鲁的论述，政府的上述干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要对家族之间联系网络的不稳定性进行干预。的确，正如马尔德鲁所论述的，信用的扩展最终导致了某种不确定性——已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无力承载。信用网络的超载，一方面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式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口实，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某种更加悲观的个人主义人性论的传播(Muldrew 1998:315—333；亦参见 Helleiner 2003:42—46, MaGowen 1999)。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以及相濡以沫的家族，也都对自身的信任确认机制(trust-confirming institutions)——如同宗同族、共同信仰、宣誓、债务公证等——进行了改革或改良。马尔德鲁论述道：

“板上钉钉”(to pay on the nail)一词源于布里斯托尔*。在这座城市的托尔泽(Tolzey)前矗立着四根铜柱：托尔泽是一处古老的有封顶的柱廊，供应商人们在此交易，柱廊的尽头与治安法庭相连，大部分债务官司就在那儿审理。“钉”(nails)是确实存在的：这

* 布里斯托尔(Bristol)：英格兰西南部港口城市，中世纪时是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些铜柱表面平坦,定金和现款由此交付——此举即被视为投资合意与信任的标志。最古老的那根“钉”源于何时,如今已不得而知;其他三根铜柱分别矗立于1594年、1625年和1631年,是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商业需要而作为礼物献给城市的。更有意思的是,铜柱上的铭文着力强调信任的宗教和社会属性,这是对在它之上所进行的各项交易的注解。有一句格言反复出现——“无人独自生存”,另一句格言宣称“上帝在人间的教堂,是真理的支柱和地基”。(Muldrew 1998:106—107)

宗教信仰及其实践进而促进了信誉政治(politics of reputation)的形成,但是,仅此不足以对1530年之后的巨变作出解释。

社会关系领域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将新的形式、新的行为、新的标志引入日常的主要事务之中。公开宣誓、相互监督、新的社会纽带崭露头角,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契约的扩展而扩展。此外,文学作品也扩大了人们对于信用和合同的关注,正如马尔德鲁所评述的:

莎士比亚常常运用隐喻和夸张的手法。例如,在《十四行诗集》第134首中,债务、担保、契约、抵押、控诉等字眼,被作者用来描绘一个男人与他的旧情妇以及旧情妇的新情人之间的关系。这在戏剧中也颇为常见,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通过宽恕之道与酌处之权对合同之盲目履行的抵制——表达的道德观念,菲利普·马辛杰*在《偿还旧债的新方法》中塑造的贪婪和挥霍的戏谑形象,以及韦伯斯特**在《恶魔的

* 菲利普·马辛杰(Philip Massinger, 1583—1640年):英国剧作家,《偿还旧债的新方法》(A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是其代表剧作。——译者注

** 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 1580—1634年):英国剧作家,主要剧作有悲剧《白魔》(The White Devil)、《马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以及喜剧《恶魔的官司》(The Devil's Law Case)。——译者注

官司》中讲述的严刑峻法的悲剧。(Muldrew 1998:315)

在诸如此类的一般性阐释的背后，是马尔德鲁对 16 世纪法庭数千个案件的系统分析。这些资以佐证的材料表明，无论信用之运用还是信用之滥用，都在 16 世纪显现出了深刻而迅猛的增长。

马尔德鲁对 16 世纪英格兰的分析，为信任网络与政权的研究提供了两点宝贵的看法：其一，马尔德鲁的分析表明，人们创建了新的、排他性的信任网络以应对不得人心的政府行为——如政府无力为商业发展提供所需的通货——而非依然固守于旧的宗教、血缘和社群的团结；其二，马尔德鲁描绘了这样一个过程，即正在形成的信任网络同时也在分解自身，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支持。这个过程表明，一些重要的信任网络已被部分整合于公共政治中。

被整合的信任网络

尽管初看起来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的分析路径与本书完全相反，但是，她着实对信任网络如何被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作出了重要的阐释。利瓦伊机智地选择了对征兵的抵制与顺从问题进行分析，即个体是否愿意承担利益不多享而付出无差别、或是利益全无而成本巨大的事务。服兵役并非完全出于利他的目的：鉴于利益自享的平民阶层构成了征兵的主要来源，因而兵役实际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过，即便是为了自己而服兵役，公民们还是将弥足珍贵的事业——在此指年轻的生命和未来的劳动力——置于政治上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鉴于在公民身份和爱国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兵役扮演了如此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因此，利瓦伊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公共政治与信任网络的整合问题的一般性阐释。^[4]

在一篇工作论文中，利瓦伊对她 1997 年一部著作的观点进行了

总结：

笔者考察了法国、美国、普鲁士等国政策变化的制度基础及其公民的征兵反应，并从中发现新的公平观的形成——这是民主化的结果——对制度变革的步骤和内容所产生的影响，而这又进一步揭示了规范的审议程序和合法的制度基础，对促成更加普遍的公民服从——遵守政府和管理机构的命令——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Levi 2003:8)

利瓦伊就此将她的研究定位为：揭示制度变革对公民的政治选择所产生的影响。

利瓦伊在主观上试图根据博弈论建构自己的理论(Levi 1997:7—8)。为此，她着力对社会行为的单个行为者进行分析——即对个体基于约束条件下的动机而作出的影响其他个体的决策行为进行解释。不过，在以下两个重要的方法层面，利瓦伊又游离于纯粹的理性人模型之外：其一，她认为，与其他人的关系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产生了重要约束；其二，她认为，这种约束是由制度的历史脉络——包括与他人的关系——所塑造的。其结果便是，利瓦伊超越了其模型的局限，进而对诸如连续博弈等交互行为过程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对同意或反对兵役的多重主体——包括被征募的士兵、政府代理人以及政府辖下的其他国民——的博弈状况进行了分析。

利瓦伊的“附条件的同意”(contingent consent)模型表明，公民个体更加倾向于根据以下条件，对是否愿意服从政府的命令——包括服兵役等代价高昂的事务——进行选择：

(1) 公民们认为政府是值得信赖的；

(2) 其他公民中服从者的比例上升(意味着“伦理互惠”的程度上升)；

(3) 公民们获得确证政府值得信赖的信息，并普遍接受“伦理互

惠”原则。(Levi 1997:21)

此外，利瓦伊还附带谈及了以下观点：当人们认为自己与政府代理人以及其他公民的关系可靠而公正时，他们倾向于同意承担繁重的义务；也就是说，事关公平与正义。^[5]至于究竟何种机制导致了上述结果，利瓦伊并未明示，而只是将这些作为经验事实的概括予以证实或证伪。不过，她暗示达成上述后果的机制是可认知的，即逐一对个体的服从或抵制行为进行计算。就“附条件的同意”而言，利瓦伊认为，“它不仅要求个体相信自己有义务服从，而且，还要求其他个体也相信或应当相信有义务服从”(Levi 1997:205)。与其他理性选择理论相仿，利瓦伊将她的阐释重心集中到了计算过程。

此外，利瓦伊也对若干相反的命题进行了反驳，包括(1)习惯式服从，(2)意识形态式认同，以及(3)机会主义式服从(Levi 1997:19)。上述每一项命题都为国民服从政府提供了一种认知模式。利瓦伊认为，习惯式服从的模式无力适应不同的、变化了的阐释场景，因而是不足取的；意识形态式认同的模式适用于为数不多的信徒，但不足以对大规模服兵役作出解释；至于机会主义式服从的模式，正如利瓦伊所指出的，它牵涉太多的动机——从暗中满足、局部利益、社会安全到群体压力，不一而足。实际上，在利瓦伊看来，机会主义式的服从往往隐藏着超出服从的更加隐秘的图谋。

利瓦伊的论据源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越南，她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战争性质以及不同人口结构条件下的兵役服从模式进行了考察。她所揭示的细微差异，一方面挑战了习惯式服从、意识形态式认同和机会主义式服从的既有论述，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她对“附条件的同意”的经验概括。总之，信任程度愈高，人们对兵役的服从愈是广泛。

在利瓦伊的分析中，制度、组织和社会关系都是作为背景变量而存在的：它们不是导致服从的直接原因，而是塑造认知和信息的模具——可令服从不证自明。在她看来，加拿大的英语族裔与法语族裔的严密

界分，既有助于解释何以人口中居于多数的英语族裔试图在全国强征兵役，又解释了何以人口中居于少数的法语族裔激烈地予以抵制(Levi 1997:163—164)。此外，利瓦伊认为，制度、组织和社会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为的路径和成本产生影响；例如，法国的历史——国家军事力量获得了长足发展而反战势力发育不良——就让法国的兵役抵制者，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兵役抵制者更加难有作为(Levi 1997:191—192)。

在分析即将结束之时，利瓦伊为社会过程留下了两点余论：其一，她认为，第三方的服从行为对其他人的相似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并随之有力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公平感(Levi 1997:213)；譬如，政府对拒服兵役者所实施的强制不仅对叛逆者产生影响，而且，还对那些跟风的人产生影响。利瓦伊的这一分析显现出了人际之间的义务网络，对社会行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大而直接的影响。其二，利瓦伊承认政府行为极大地影响着公民服从，并据此认为，倘若政府软弱无力或反复无常，便很难获得公民服从。利瓦伊的这一分析表明，交互过程又再度成为其分析的主要内容。无须赘述，利瓦伊实际上对个人之间的信任网络，在表现为兵役的公共政治中的运作状况进行了分析。

利瓦伊有关社会过程的两点余论，盖过了全篇宏论。例如，有证据表明，战争期间，当一国显示出战败迹象时，则工人的罢工活动趋于频繁，士兵们亦有可能大规模溜号(譬如参见 Lagrange 1989)。战争期间的背信与叛逆，往往导致战后出现下述情形：停战之际，也是罢工、叛乱和革命频发之时(Tilly 1992a, 1993)。

以利瓦伊的阐释路径解读上述现象，或可理解为：政府在实施严密的集权控制和募集巨额债务发动战争的同时，也相应地扩大了自己的义务范围——即应当对所有与之合作的派别负责。在战争期间，只要有迹象显示政府已丧失履行义务的能力，就将导致合作者们发起诉求、要求兑现其当下的利益以及/或是撤销他们的合作。战争结束后，政府大多没有能力真正地兑现其战时承诺，用利瓦伊的话说，政府的可信度下

降了。战争的损失越大，兑现的能力就越弱，政府的公信力也就越差（譬如参见 Schumpeter 1947:354）。面对如此怪圈，大失所望的政治债权人往往以与日俱增的诉求和 / 或撤销他们的顺从作为回应。

类似现象在较小的范围内也有发生——如军营。以美国内战期间的北卡罗来纳军队为例，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 1991)的研究表明，普通个体层面的行为特征不足以对逃兵倾向作出解释，但考察战斗集体的整体行为特征则有重大发现：战争初期，同乡构成的连队凝聚力较强，而非同乡的连队出现逃兵的比例较高；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上述状况发生逆转——在 1863 年夏后，同乡构成的连队开小差的比例更高。比尔曼评述道：“颇为讽刺的是，在 1863 年后，参军时间最长、团结性最强、训练最为有素的连队，其发生逃逸的比例也是最高的。”(Bearman 1991:337)

面对这一奇怪的逆转，比尔曼似是而非地将之解释为熟人效应(relational process)所致：通常在征兵时将同一地区的士兵编成一个连队，这些连队随后因为战斗减员和战术重组而变得地域混杂；在战争初期，地方性的认同和对兵役的服从造就了连队的整齐划一，同乡构成的连队因此显得更加众志成城；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大量的伤亡导致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的裂隙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与同一个地区的集体联系又导致了整个连队的集体乡愁和对国事——战争——的集体疏离。这些临阵脱逃的士兵就这样集体性地、从失去活力的国家权威那里收回了信任——即不再将自己的生命和家园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直白地说，他们不再信任那个曾经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政府。

利瓦伊偏重于认知取向(cognitive orientations)。然而，就人们转而服从于政府的命令而言，它不仅仅是心智活动，还切实包含了政权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变迁。利瓦伊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有待认真检视的结构性过程：(1)人际义务网络的变迁；(2)政府代理人与公民关系的变迁。尽管在信任网络这一术语的理解上，利瓦伊的研究与本书大相径庭，但

是，她的研究清晰地显现出：信任网络确实有时被部分地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并就此对公共政治产生了强烈影响。一个问题跃然纸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们必须解释什么？

在对瓦勒度派教徒、16世纪英国商业家族和兵役服从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三种迥然不同的信任网络与统治体系的关系类型：瓦勒度派教徒自从被逐出里昂市，就开始普遍而尽其可能地与统治者保持距离，直到16世纪和17世纪转入新教才改变这一立场；16世纪英国商业家族的信用分享者们所构成的网络，起初与王权的关系并不和谐，但最终转向民族国家政府寻求保护；人们对兵役的态度从坚决反对到顽固捍卫或视之为爱国义务的转变，整体上反映了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较高程度的整合。何以具有如此深刻的差异呢？如此巨大的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正是本书的目标所在。

为了使上述目标易于达成，我们不妨遵循以下基本思路：一方面，政权体系和信任网络都面临组织问题，而如何应对该问题则对其内部的运作和生存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政权体系和信任网络都依赖于新资源的持续流入，以便为其主要的活动以及使这些活动成为可能的组织结构的再生产提供支持。例如，一个在支配手段上无力推陈出新的政权，其最终下场不是瓦解于内部的分裂，就是崩溃于外来的征服；颇为相似的是，如果信任网络不再接纳新的成员，其团结与忠诚也就止于一代人而已。本书问题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政权体系还是信任网络都依赖于同样的资源——劳动力、金钱、信息、忠诚等。历史上大多数统治者都从信任网络中攫取了流淌其间的资源，或是在有能力掌控信任网络时将自己嵌入信任网络之中；当然，统治者自己

的信任网络或他们所仰仗的盟友的信任网络，又另当别论。统治者对资源的攫取破坏了信任网络，严重阻塞了信任网络的运作，也因此促使后者转而寻求其他相对仁慈的统治者的保护，或是导致信任网络遁入地下。

当然，促使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相融合的过程也正在发生，例如，信任网络可予支配的资源大幅度减少、信任网络的核心人际结构趋于瓦解、信任网络之外的人口数量倍增、信任网络的自主决策系统出现了对外协商化的趋向、有权有势的人被信任网络所吸收，以及统治者创建了有效的保护和/或福利体系。从瓦勒度派教徒到英国商业家族再到20世纪的兵役制度，其发展路径均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公民们转而寻求政府的保护和保障，并因此将自己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衔接起来。

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衔接之路，经历了巨大而意义非同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被视为两个端点之间的一连串序列——相关的细致阐释留待后文。在这个序列的一端，信任网络隐秘运作，以期与政府的监管和控制完全绝缘，瓦勒度教派的大部分历史都遵循着这个模式；在这个序列的另一端，信任网络被塑造成为政府的一个部分——譬如经过了正规军事组织规训的信任网络。至于两个端点之间，则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程度的分化或整合。在更加接近瓦勒度教派的一端，信任网络的生存依赖于拥有相对自治权的中间人的保护：譬如仰仗当地军阀的庇护；而在更加接近整合的一端，我们发现信任网络或是成为公共政治的参与者，或是与公共政治角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譬如，互助会向政府提出诉求或是组织严密的宗教组织参与政治选举。从历史上看，信任网络的存在方式涵盖了两个端点之间的所有领域，并不时地变换自己的位置，从而或多或少地被公共政治所整合。这一切如何发生、何以发生、何时发生，以及对公共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便成为本书将要讨论的主题。

倘若你喜爱辩驳型的书籍，你尽可想象本书余下的部分是站在互动论的信任观一边，对系统论和素因论的信任观进行了驳斥(Tilly 2005,

Chapters 1 and 2)。粗略说来，有关社会过程的一般性描述和阐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系统论(systemic)、素因论(dispositional)和互动论(transactional)。系统论预设一个自成一体和自给自足的实体，譬如，社会、世界经济、社区、组织、家族或(在其范围内)个人；根据活动在整个实体内的位置，对活动作出解释。对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系统论的优势是处理棘手的问题：譬如，如何在小范围社会过程与大范围社会过程之间实现衔接？不过，系统论也有两个令人烦恼的缺陷：一是难以对相关系统作出认定和限定；二是难以厘清系统中的因果关系。

同样，素因论也预设了自成一体的实体——通常是个体行为而非其他实体，通过分析行为人为行为时的性情倾向对其活动作出解释，或是通过性情倾向的比较研究揭示行为动机、决策逻辑、情绪以及文化模式。当素因论应用于个体有机体的层面时，其优势在于能够对神经科学、遗传学和进化论中的新发现作出清晰的阐释；但是，素因论无力应对从实体之间关系中涌现的新特性，对诸如群体密度、网络结构等具有集合特性的事物更是力不从心。

互动论将社会场景中的交互行为视为研究起点，将社会场景中的活动连同场景的持久特性一同视为交互行为之结果。由于互动论所集中关注的是各个特定的社会场景之间交互行为所具有的反复出现的特性，因此，互动论的分析也往往是对——互动论中另一个运用广泛的术语——关系性(relational)的分析。互动论或关系性描述与阐释的优势，是把交往和沟通行为——包括语言的运用——置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其劣势则是对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社会行为缺乏解释力，并因此无力对习俗性的道德动因——实体据此形成行为倾向并对其后果负责——作出解释。

系统论、素因论和互动论更应当被视为方法论，而不是能够被直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它们相互争夺本体论的阐释地位，各自宣称特定的现象类型、塑造和造就了社会过程。它们构成了三种彼此冲突的社

会过程阐释路径。从本质上看，长期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争往往是同一个本体论立场的内部竞争，而非不同的本体论立场的竞争，也就是说，此种系统论阐释与彼种系统论阐释之间的竞争。

信任的系统论阐释(譬如参见 Barber 1983)，是借助一个社会场景的整体组织结构以及特定社会场景与该组织结构的关系，对社会场景中信任的范围和性质作出解释。相比之下，信任的素因论阐释(譬如参见 Hardin 2002)关注的是个体行为者的性情倾向，尤其是促使一个个体信任其他特定个体的状况或过程。至于信任的互动论阐释，正如前文所说的，是将信任视为一种附条件的(contingent)、协商性的(negotiated)社会交互行为。在当前有关信任的政治学研究文献中，素因论的阐释居于主导地位。^[6]

我所采用的互动论视角，使本书的研究迥然不同于其他众多的有关信任及其网络的研究。目前最普遍的观点，是将信任视为一种信心或态度、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这类观点遵循的是素因论的阐释路径。按照这类说法，相信他人将善待自己的社会经验愈多，就愈是在各类合作事项中——包括民主政治——倾向于合作(譬如参见 Knight 2001)。正如前文在评述马尔德鲁和利瓦伊时所阐明的，我所采用的研究路径扭转了因果关系的箭头，不再将信任视为社会交互行为的原因，而是视其为社会交互行为的结果。对于这一点，本书随后的章节将作出更加细致的论证。

另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与本书观点大相径庭——是将信任网络视为一种同质化的现象(譬如参见 Scott 1991)。我们不妨将这种观点看作是互动论阐释的肤浅版。按照这类说法，信任网络是以近乎完全一致的方式传递信息及其影响的，而不论所传递的究竟为何物。无论信任网络如何变化——趋于集中还是分化、趋于松散还是紧凑——都享有很多共同点。针对这类说法，本书第二章将清晰地阐明：(1)在网络内部关系的组织和内容方面，信任网络迥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人际网络；(2)基于自身的权威组织和合作制度，信任网络创建了一种独特的组织

方式，它是人类组织重大的、长期的、高风险的事业的三种主要方式之一。

最后，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一般意义的网络和特定意义的信任网络都能够积聚或产生社会资本(譬如参见 Pretty 2003)。这类说法在互动论、系统论和素因论的分析中都有所体现，它在总体上将信任网络的活动界定为：一种为个体或群体参与风险性的集体事业提供支持的基础性结构。我们常常听说在承担集体项目方面，社会资本丰盈的国度远胜于社会资本匮乏的国家，而社会资本也就成为一种补充、一种前提，甚至成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特定替代品。我反对这种观点，反对将信任网络视为政治和经济交互行为的资源；相反，本书认为信任网络是政治和经济交互行为的能动性场景(active sites)。

不过，我写作本书既不是为了拷问这些彼此竞争的理论，也不是为了清理概念的残骸碎片。本书不是要一步一步地对系统论、素因论和互动论的阐释路径进行比较，而是相反——我简化了这项工作，只是锚定于互动论的阐释脉络，对导致信任增强或减损的社会过程作出解释；在这里，信任被视为人际关系的独特形式。我将表明，以这种方式理解信任将有助于阐释信任与统治关系的巨大变迁。

如果你喜爱论战风格的书籍，那么，本书随后的章节既处处为你展现一种作为交互行为现象的信任形象(即将重大的后果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和失败的风险之中)，也可能更加激发你对系统论或素因论之信任阐释的好感。当然，如果你对本书所提及的具体现象作出了更加合理以及/或是更加简明的阐释，也尽可以对我的方法论提出批评。不过，即便如此，我所作出的细致分析仍在以下两个独特方面对你有所助益：一是对信任与统治这一重大问题——该问题尚未被学界充分顾及——进行了论述，并因此促使你思考以形成自己的解答；二是将信任视为历史的产物，而不再是无须历史地考量其变化就能作出解释的现象。仅此两个方面的贡献，就不枉你费心一读。

证据何在？

我们面临一个重大难题——证据何在？当今时代国家的支配范围如此之广，实际上已不存在超然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信任网络。就此而言，在当前信任网络与国家权力的密切接触中比较两者究竟若即若离还是不即不离，不足以揭示在信任网络与政权体系的关系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迁。另一方面，就其内在属性而言，那些曾经超然于强大的国家势力范围之外的信任网络，又不可能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以待 21 世纪的分析家们复原其内在的动力。以美索不达米亚* 为例，尽管考古证据证明当地的稀有金属与矿石贸易，上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约公元前 7000 年)，但是，唯有在收集到的楔形文字残片(约公元前 3300 年)中，才能找到商业网络发展的记录。至于跨地域商业网络的发展，要到公元前 1900 年才有文字记录可循。

不过，在一度是亚述帝国首都的亚述尔(Assur)古城——即今伊拉克的谢尔卡特堡(Qalat Shergat)，那儿的商人们为我们留下了难得一见的书信。亚述尔的商人通常将家族的后代成员分派到诸如卡尼什(Kaneš)——即今土耳其的库尔特普(Kültepe)——的繁华地带经营分号(Roaf 1990:113—114)。公元前 1900 年后的数十年间，一名亚述尔商人给他在卡尼什的搭档，写了一封颇具代表意义的书信：

来信所囑之购买阿卡得(Akkadian)纺织品一事，实际情况是：

自君离开阿卡得后，这些货物一直未能流入亚述尔，原因是他们

* 美索不达米亚：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两河流域，曾萌蘖西亚最早的文明——两河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文明的中心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北部称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后为两河流域许多国家所用。——译者注

的国家突发叛乱。倘若入冬前能有货物流入，则买卖尚有可能，君亦有利可图；届时我们将代君购买，并先行垫付银两，君当勿忘随后支付。(Postgate 1992:213)

我们可以凭借不同时期的许多相似资料对商业网络的参与者加以了解，对他们之间的商业关系形成认识；但是，其私人影响是如何相互施展的？其相互利益是如何互惠均沾的？对此，这些网络往往秘而不宣；即便是那些与国家共存或从国家的庇护中直接获利的网络——譬如亚述尔的商人网络，也往往遮蔽自己的内部交易、使之免遭外界的审视。无独有偶，宗族集团、宗教派系亦同样如是抗拒着外界目光的审视。

尽管如此，我们大可不必陷于悲观失望或妄想臆测之中。倘若处理得当，有限的资料也能为信任网络的结构和过程提供证据。以西欧为例，国家和以国家为后盾的教会在向地方社区渗透的过程中，常常攫取既有的民众之间的沟通信息，并使之处于中央的监视与控制之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在致力于侦缉和消灭异端的同时，也往往为事实存在的地方性社会联系提供了证据。即便缺乏系统的调查，教区神职人员的耳闻目睹也为何人与何人联系以及如何联系，提供了令人瞠目的证据(Marsh 1998:1—3)。

例如，随着新教教会不断壮大，其监控社区的热忱亦屡屡超过天主教会。16世纪期间，当加尔文派统治者试图借助宗教法庭实施道德控制时，新教教会自然而然地嵌入地方事务之中。对此，菲利普·本尼迪克特(Philip Benedict)评论道：

1852年，拿骚—迪伦堡(Nassau-Dillenburg)的约翰六世试图贯彻宗教法庭的纪律规范，但由于这套规范被普遍认为是在扰民和不必要的，因此，他一度无法在乡村社区挑选出合乎规定的长老。在1590年的检查中，大部分村庄都未达到每20—30户配备1名

长老的指标：许多被指派的人拒绝任职，而愿意任职的又达不到所要求的道德标准：有几个没有参加教会活动，有一个闹出了私生子，还有一个——这事儿众所周知——喝醉了酒在饭桌下小便。勉强担任了这一角色的人抱怨道：他们被左邻右舍视为叛徒而饱受白眼。(Benedict 2002:457)

在这场抵制行动中，村民们生产着地方性的社会关系信息，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为信任网络的运作提供了素材。

在同一历史时期，西欧开始记载并保存了大量与信任网络间接相关的证据——主要是教区记录和个人遗嘱。临终遗嘱和财产清单无异于一张快照，投射出了死者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脉络。在纽卡斯尔(Newcastle)附近的惠克汉姆(Whickham)，富人的遗嘱记录的不仅仅是对礼俗的虔诚，还包括债务和债权。

詹妮特·梅里曼是……少数几个在立遗嘱时想到了邻里的人。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却好心肠地将衣物留给了四位女邻居，甚至包括伊丽莎白·哈里森：她得到了詹妮特的一顶帽子和一块第二好的方巾。与获赠遗物相比，邻居们更加热衷于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遗嘱里：就此或是成为履行遗嘱人意志的见证人，或是通过赫然位列债权和债务人名单而化为遗嘱人意志和财产的一部分。(Wrightson and Levine 1991:286)

“赫然位列债权和债务人名单”让人想起了马尔德鲁对16世纪英格兰信用发展所作的分析，让人想起了这种发展所暗含着信任网络的变迁；同样，这些资料也让历史学家们追踪到了教父教母(godparenthood)、婚姻见证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际网络。总之，尽管现有的资料不

甚可靠，但是，它们为探寻尚未遭受大规模国家干预的信任网络的结构和过程开辟了滩头阵地。我的考察将不可避免地混合着零碎的资料、偶有启发的直接观察以及大量的猜测；而这样做只是因为：信任网络与统治体系的关系关乎政治生活的品质，我甘愿为此承担风险。

本书随后对信任网络与统治体系之间的纠葛所作的分析，分为若干篇章：第二章侧重考察信任网络的一般组织和运作状况；第三章旨在解答信任网络的内部运作和外部联系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的；第四章探索了信任网络与各式各样的掠夺者——包括与之敌对的信任网络——的相互作用；第五章集中探讨了分化和整合过程——这对本书的论述至关重要；第六章将前几章的论述用于对民主化和去民主化过程中的信任网络进行分析；最后，第七章总结了上述内容，并思考了当今社会变迁对于未来的信任网络以及未来的政治可能性所具有的意义。

注释：

[1] Anderson, Fish, Hanson, and Roeder 2001, Anheier and Thoenig 2002, Bennett 2003, Bermeo 2003, Buck 1999, Deibert 2000, Diamond 1999, Dryzek 1996, Edwards, Foley, and Diani 2001, Fishman 2004, Forment 2003, Hoffmann 2003, Ortega Ortiz 2001, Rothstein 2004, Skocpol 2003, Tilly 2004a, 2004b, Chapters 5 and 6, Warren 1999.

[2] 有关信任维持(trust-sustaining)行为、关系和机制的研究，可参阅 Anthony and Horne 2003, Bates et al.1998, Besley 1995, Biggart 2001, Biggart and Castanias 2001, Burt and Knez 1995, Castrén and Lonkila 2004, Elster 1999, Elster, Offe and Preuss 1998, Feige 1997, Gambetta 1993, Gould 1999, 2003, Granovetter 1995, 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4, Heimer 1985, Hoffman, Postel-Vinay and Rosenthal 2000, Landa 1994, Ledeneva 1998, 2004, Levi 1997, Lonkila 1999a, Ostrom 1990, 1998, Paxton 1999, Postel-Vinay 1998, Rotberg 1999, Shapiro 1987, Solnick 1998, Stark 1995, Weber and Carter 2003, Wuthnow 2004,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

[3] Alapuro and Lonkila 2004, Auyero 2000, Bayat 1997, Bayon 1999, Clark 2004b, Cordero-Guzmán, Smith and Grosfoguel 2001, Diani 1995, Diani and McAdam 2003, DiMaggio and Louch 1998, Fernandez and McAdam 1988, Gould 1995, Grimson 1999, Havik 1998, MacLean 2004, Meisch 2002, Morawska 1985, 1996, 2003, Ohlemacher 1993, Opp and Gern 1993, Passy 1998, 2001, Pastor, Pascua, Rodríguez-López and Sánchez-León 2002, Piipponen 2004, Portes 1995, Singerman 1995, Tilly 1990, 2000, Tsai 2002, Wiktorowicz 2001, Zelizer 2002, 2005.

[4] Bradley 2002, Chambers 1987, Crépin and Boulanger 2001, Krebs 2004, Lynn 1984, Mjøset and Van Holde 2002, Tilly 1995, 1999a.

[5] Eliasoph 1998, Jasso 1999, Moore 1979, Shklar 1990, Vermunt and Steensma 1991, Young 1990.

[6] Barbalet 2001, Chapter 4, Cook 2001, Levi and Stoker 2000, Seligman 1997, Woolcock 1998.

第二章

信任网络如何和为何运作

对 14 世纪瓦勒度教派、16 世纪英国商业家族和 20 世纪征兵制度所作的生动对比，证实了在统治者与信任网络、公共政治与信任网络之间确实存在着关系上的变化和变异：对信任网络来说，它从极力免于遭受教会或政治权威的干预(如瓦勒度教派)发展到附条件地、意义非同寻常地被公共政治整合(如征兵制度)。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这种变化和变异作出更全面的思考。图 2.1 概括了这个一般性的阐释性问题(the general analytical problem)：即我们所要解释的是公共政治与信任网络关系中的何种变化。图中的纵轴大致标示了：(1)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相互隔绝；(2)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建立协商性联系(negotiated connections)；以及(3)信任网络被直接整合到统治体系之中。图中的横轴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联系手段区分为以下三种：强制(coercion)、资本(capital)和信义(commi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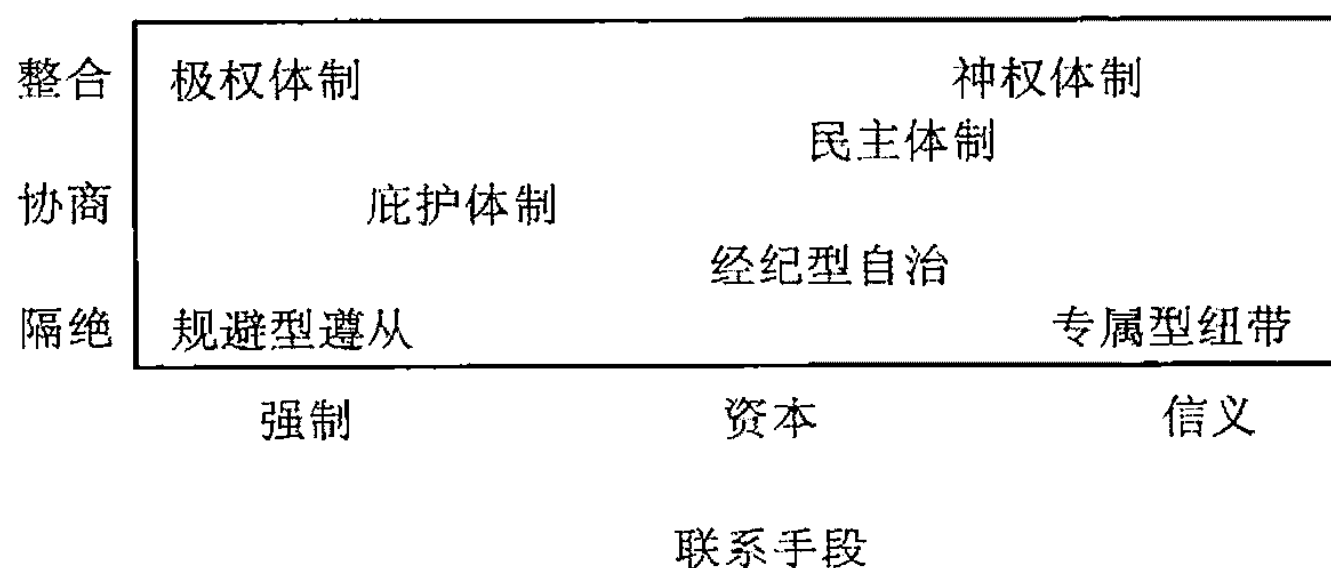


图 2.1 信任网络与政权中心关系图

强制，是指所有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是使稳定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的集中的行为手段(*concerted means*)，并突出地表现为武器、军队、监狱、信息破坏以及强行获取同意的组织套路(*organized routines*)。强制组织是政权性质的表达。在强制方面缺乏积累的政权，无一例外是脆弱的政权；而具有高水准的强制和集中手段的政权，则是令人敬畏的政权。

资本，既包括有形的和可予转换的资源——这部分资源基于人事可增进其使用价值，也包括对上述资源的可执行性权利主张。掌握了雄厚资本的政权，譬如统治者以强制为后盾直接控制自然资源并从中攫取资本，可在一定程度上以购买服从和其他资源的方式统治民众，而不必采取直接强制。

信义，是指促使社会单元(*social sites*，个人、组织、结构或情境)彼此顾念，相互无法割舍的关系。例如，共同的语言有力地凝聚着每一个个体而无须凭借强制和资本。地方层面的信义组织，其形式可谓多种多样——譬如共同的宗教或族群、贸易纽带、由劳动形成的团结、共同的品位圈等，其多样性与强制和资本的结构多样性不相上下。在联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方面，信义可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取代强制和资本的作用。

基于以上界定，图 2.1 将不同时空条件下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联系形式区分为以下七种典型类型：

- 极权体制：信任网络被广泛整合并被强行纳入体制内政治(*regime politics*)之中；例如，各种地方性团结(*local solidarities*)被纳入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体系中；
- 神权体制：信任网络被广泛整合并使之围绕信仰的共同体运转；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的伊朗*；
- 庇护体制：资本与强制(而且至少包含了最低限度的信义)相结合共同运作于庇护—代理链中，并因此在统治者和普通民众

* 指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的政教合一体制。——译者注

的信任网络之间形成协商性和中介性的联系；例如，19世纪拉丁美洲的考迪罗政权* (cacique regimes)；

- 民主体制：信任网络部分地(而非完全地)为偏重于信义的公共政治所整合，同时不排除对资本和强制的运用；例如，当代瑞士；
- 经纪型自治：信任网络的首领向统治者让渡资源和服从，以此换取信任网络内部的高度自治；例如，奥斯曼帝国的米利特制度**；
- 规避型遵从：信任网络成员最大限度地躲避统治者，仅在遭受强制时让渡资源和表面的服从；例如，蒙古帝国；
- 专属型纽带：由宗教、亲属关系或其他信义纽带构成的各类不同的信任网络，与统治者建立了直接而有差序的联系；例如，日本德川幕府与各类家臣(constituencies)之间形成的多样化联系。

上述分类并不严格，也绝非无懈可击：譬如，诸如美国的反政府民兵运动***、与世隔绝的宗教团体等引人注目的极端事例，就未被囊括其中；再如瓦勒度派教徒，在其成功地开展地下活动期间，他们始终将自己控制在图 2.1 最底端的区域——即无论如何不与统治者发生联系。就此而言，上述分类只是对公共政治与信任网络之间的联系的本质和重大变化进行的描绘。毫无疑问，是或否、对或错的简单两分不足以有效地提出阐释性问题，将所有的联系都置于一个从隔绝走向整合的单一连续体中，也着实行不通；因此，混合了强制、资本和信义的整合模型，才是根本可取的。

* 又称“考迪罗主义”或“考迪罗寡头统治制度”。考迪罗(Caudillo)源于西班牙语，原意为“地方军事首领”，后引申为“军事独裁者”。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国家大多形成了以暴力夺取和维系政权、权力与资本高度结合的军事独裁制度，该制度延续近百年，为20世纪拉美国家的民主转型留下了“军人干政”的政治传统和“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遗产。——译者注

** 米利特制度(millet system)：米利特源于奥斯曼土耳其语，泛指帝国境内合法的非穆斯林宗教自治团体。米利特的首领直接对苏丹负责，对内享有制定法律、征收税款等自治权。米利特制度被视为近代宗教多元化的典范。——译者注

*** 相关事件可参阅查尔斯·蒂利著：《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我们可以将问题形象化，使之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呈现出来(Tilly 1999b)。图 2.1 描绘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策略图：既包括统治者的不同手段——强制、资本和(或)信义；也包括统治者的不同选择——整合、协商或隔绝。自上而下地看，统治者面临的双重挑战是：如何获取当前深植于信任网络之中的核心资源，以及如何获得信任网络成员的合作和同意。

强制、资本和信义为统治者提供了应对挑战的不同手段：每一种手段都对统治者的政治行为及其与国民的关系产生了本质性的影响。在手段的运用方面孰轻孰重？在信任网络的整合方面是否直接？这些决定着政权的巨大差异。此外，对信任网络的整合也可进一步区分为是直接被纳入政府，还是被公共政治中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政治角色所整合。极权体制和神权体制的政权都偏向于直接整合，而民主体制的政权则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政治角色及其所从属的信任网络留下了更大的空间。自上而下的资源汲取策略和政治控制，正是据此而发生变化的。

自下而上地看，这个问题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普通民众所担心的是——就像保卫重要的资源免遭剥夺那样——如何确保自己的未来及其所依赖的关系免遭侵害。统治者对强制、资本和信义的运用，往往会对上述关系和资源造成威胁——譬如青年男子被拉去服漫长的兵役。由于人生的许多重大事项——有些无关统治者痛痒、有些与统治者利益相悖——都依赖于信任网络的维持，因此，普通民众或他们的庇护人(patrons)也就常常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网络与公共政治隔绝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为了使重要的网络保持隔绝，使之免遭审查、干涉、掠夺和征用，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此外，表 2.1 还列出了六种主要的例外情形，自下而上的信任网络保护策略正是据此而发生变化的。由于信任网络所采用的策略及其与政权的关系变动不居，因此，我们有必要细致地阐明：必须对信任网络运作中的哪些方面作出解释以及如何作出解释。特别需要阐明的是，

就一个既定的信任网络而言，是什么决定了它与统治者或其他主要政治角色的关系的性质和密度。毫无疑问，政权的整体形式——极权体制、神权体制或其他形式——是一回事，信任网络自身的构成和行为是另一回事；而在政权体系与信任网络的各种组合形式中，我们将发现信任网络的成员所采用的不同方法：或是据此与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政治角色建立联系，或是据此避免与之发生联系。略有保留地，我们将这些方法称为策略。

表 2.1 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保持隔绝的主要例外情形

-
- (1) 宗教教派、宗族集团或商业网络等信任网络，自行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统治体系；
 - (2) 一个政权征服了另一个由信任网络所运转的政权；
 - (3) 组成信任网络的政治角色(如宗教信徒)攫取了现政权的实际权力；
 - (4) 统治者掌握权力时：他们常常以王室联姻同盟和内部庇护体系等形式建立自己的信任网络；
 - (5) 实行极权和神权体制的政权极力将既有的信任网络广泛纳入——至少是暂时纳入——独裁统治体系中；
 - (6) 民主体制实现了公共政治对信任网络的部分整合。
-

自下而上的策略包括：

隐藏：避免被当局发觉和操纵；

掩饰：借助可资利用的公共身份佯装一致，但服从的程度、内部组织运作和资源的透明度均保持最低；

委托：获得中间权威的保护，由此降低服从程度和组织透明度，但代价往往很高；

掠夺：组织具有足够外部效力的武装力量攫取资源，同时抵抗他人的掠夺；

收编：主动地为现政权中适宜的小环境(niches)所整合；

讨价还价：在双方附条件同意的基础上与主要的政治角色建立联系；

解散：因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或通过集体议决而使既有的信任网络

解体。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将先验的、单一化的策略输入信任网络中，能够迅速地简化隔绝和整合过程。但是，在现实中，极少有信任网络能够建立迅速作出集体决策的中央决策机制。诸如收编和解散之类的“策略”，常常是渐进形成的，是与许多成员的意愿相背离的。不过，将信任网络自下而上地与公共政治发生交互行为的不同形式视为某种固有的策略，可以让我们的问题更加清晰。

自上而下的策略和自下而上的策略相互作用，造就了不同的统治体系。有效的极权体制能够成功地削弱大部分不与之合作的信任网络，但后者也常常就此转入地下。在这一点上，有一种观点确乎有点儿道理：即高度集权的政权常常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违禁的组织网络，以实现自上而下方针的切实贯彻。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位居中央的政策制定者从来不能预见各个地方的各种变化，而各级下属在执行过程中也掺杂着各自的考虑。^[1]譬如，集中营就有类似的情形：囚犯们的秘密网络被用来延续甚至维护集中营的既有体制(Narotzky and Moreno 2002)。基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信任网络与极权体制政权的关系存在着三种发展趋向：享有特权的信任网络被广泛地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违禁的信任网络艰难地与政权共存；以及地下信任网络极力进行隐藏和掩饰。

尽管高度集权的政权容易滋生庇护关系，但是，与完全形态的庇护体制相比，两者在运作方式上仍有相当大的差异。在军阀、地主、族长、族群首领或宗教权威能够自行运用强制、资本和(或)信义，以此对其下属实施广泛控制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统治者必须作出选择：是指派中间人，是回避他们，是消灭他们，还是承认他们在各自领地内的权力。历史上大多数稳定和持久的大规模统治体系，都与庇护关系中重要的庇护成分相互交织。与此同时，后者也衍生出自下而上的应对策略：庇护—代理关系依赖于持续的利益分配，并激励新的庇护人竞相发展自己的庇护链。

尽管在民主体制中也存在庇护关系，但是，民主体制的运作与严重依赖庇护关系的体制迥然不同。概而言之，民主体制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结合在了一起：其一，是将信任网络广泛地(而绝非完全地)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其二，统治者更加偏向于依靠信义而非强制和资本以获取政治顺从。倘若对信任网络实施完全彻底的整合，那么基于上述原因，公民们将丧失玛格丽特·利瓦伊所说的“附条件的同意”手段，因此，这样的超级整合无异于去民主化。在民主体制中，公共政治对信任网络的非完全整合，既可以是间接的也可以是直接的：这种整合可能意味着转而依靠政府的担保、保障和服务，以维持自己弥足珍贵的长期的资源和事业；也可能表现为加入工会、政党或其他超然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半独立自治组织。由此形成了一个问題：如果说历史上的信任网络通常与公共政治形同水火，那么两者的衔接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总体说来，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衔接是辩证形成的：一方面是信任网络的自身分化，或是丧失了为风险事业提供担保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普通民众及其庇护人或是制度的运作者与公共政治权威讨价还价并达成了附条件的同意。这种同意可能是渐进形成的，并不牵涉明确的民主步骤。但是，这种同意为民主实践和民主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信任网络与政权的兼容关系

我们应当避免这样一种错觉：即所有的信任网络看起来都一样，所有的信任网络运作起来都一样。没有人把贸易离散社群和秘密宗教组织混为一谈。信任网络分享和分担着弥足珍贵和具有高度风险性的长期活动。信任网络将其活动赫然置于网络成员的失信、失误和失败之中，置于排他性和竞争性的运作方式之中，置于高昂的加入和退出成本之中，置于强制和资本以外的对于信义的特别依赖之中。但是，除了

拥有上述共同的特性之外，在所承担的高风险的长期活动的种类方面，信任网络又各有不同。不妨以贵重品的生产和长途贸易为例，这些货物在尺寸、耐久性、所属区域、层级范围以及池塘资源* (pooled resources)的控制方式上都有所不同。特别需要关注的一点还在于，信任网络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差异和变化：一是个人与信任网络关系的利害值，二是信任网络中人际关系的品质度。

各式各样的信任网络与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之间的兼容性，正是据此而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根据信任网络关系的利害值和品质度而有所不同。所谓关系的利害值(stakes of relations)，是指在信任网络中，伙伴关系的终止对其成员的长期利益所造成的损害程度；长远地看，网络成员若被低利害值的关系驱逐，他所付出代价相对较低。所谓关系的品质度(quality of relations)，是指从相对非个人的关系(如信用)到非常亲密的关系(如同居)的关系序列中所处的位置。所谓关系的亲密度——更加精确地说——是指关系中的相互行为对个体化知识(particularized knowledge)的依赖程度，以及关系中至少一方对关系的专一程度；这种个体化的知识和专一是不延伸至第三方的。倘若关系中并未生成这种个体化的知识或专一性，那么这种关系可称为非个人的关系(Zelizer 2000)。

宽泛地说，关系的利害值和亲密度越高，关系中的信任程度也就越高，也就意味着大家心照不宣地将自己弥足珍贵的事业更多地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这不是定义，而是一个基本命题：即当自己的身家性命寄予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时，人们倾向于寻求高亲密度和高利害值的社会关系。

根据以上论述，与诸如血缘关系等高利害值和高亲密度的信任网络相比，低利害值和非个人的信任网络——譬如信用圈构成的信任网

* 又称“公共池塘资源”，是指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资源系统，它既不同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资源”，又有别于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俱乐部资源”。——译者注

络——更容易为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所整合。至于那些使犯罪资本得以流动或是使妓女和嫖客发生交易的网络，则是介于高利害值、高亲密度信任网络和低利害值、非个人信任网络之间。不过，两者的出发点恰恰相反：前者具有较高的利害值，而后者的亲密度则是暂时的和高风险的。这种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金融家们更乐意与政府而非金融世家打交道。亚当·斯密在论述血缘关系何以在“商业国家”丧失了其一以贯之的权力时，尽管在历史依据和因果关系方面存有偏差，但是他还是澄清了一些问题。实际上，除了统治阶级的家庭，庞大的血缘关系网络已严重地为集权的政治形式所整合。

颇为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的电脑黑客——即暗中侵入他人电脑并视之为高风险游戏的电脑专家——为信任网络与政权的兼容关系提供了佐证。阿莱纳·莱德涅瓦(Alena Ledeneva)指出，后苏联时代的电脑黑客采用了苏联时期广为人知的、被称为“拉关系”(blat)的共有经济形式。

“拉关系”是指在苏联时期无效的中央计划模式下，人们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和相关服务，而以技术上被认为是非法的方式开展的互惠活动。莱德瓦涅评论道：

在当今俄罗斯的地下电脑世界中，“拉关系”已居于核心地位。这并非简单地是因为电脑软件和其他产品已为朋友圈、关系圈或黑市所覆盖，而是在更广的层面上，构筑俄罗斯电脑世界的网络已规避了正式的制度规则和等级结构。拉法尔·洛赫辛斯基*认为，尽管俄罗斯电子虚拟世界的规模不大，或许尚不足一百万人，但是这个虚拟的世界已将其信徒与某种阴谋——即以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取代正式的规则和法典——捆绑在了一起。更有甚者，深植在俄罗斯电脑世界中的非正式规则，是按照社会生

* 拉法尔·洛赫辛斯基(Rafal Rohozinski)：加拿大电脑安全专家和国际公共安全活动家。——译者注

活中非正式的行为逻辑建构和发展起来的。就此而言，俄罗斯的电脑世界——根据专家们的说法——是苏联时期非正式的幽灵残存之地。洛赫辛斯基称其为“虚拟化拉关系”(cyberblat)，其规则和伦理与苏联时期的拉关系极其相似，尽管后者的需求和破坏要缓和得多。(Ledeneva 2000:164)

就此而言，俄罗斯的电脑黑客网络是以相对非个人的方式运作的，旨在获得相对较低的关系利害值——即侵入设有防火墙的电脑系统并以此获取声望。与宗族集团或歃血为盟的犯罪团伙相比，黑客网络更容易被俄罗斯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所整合。以专业安全人员为例，这批人在苏联刚刚解体的数年间大量涌现，随后便朝着服务于俄罗斯企业大亨和政府官员的方向迈进。以此类推，电脑黑客似乎也有可能分裂成两支：自我合法化的一支和完全从事犯罪活动的一支(Volkov 2002)。与高亲密度、高利害值的信任网络相比，非个人的、低利害值的信任网络更易于被统治体系所整合。

当然，也常常出现例外：譬如，高关系利害值、高亲密度的信任网络创立了独立自主的自上而下统治体系，统治者在创建王朝的同时建立了高利害值、高亲密度的信任网络，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情形。但是，更为一般的结论仍然是，与信用圈和商业网络相比，宗族或与之相似的信任网络对自上而下的整合更加抵制。历史上存续时间持久的信任网络，通常既拥有高亲密度又承担了相对较高的风险，这一现象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大多数信任网络都与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长久地保持着隔绝。

回到信任网络

所有群体都面临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难题：如果说每个个体都具有

强烈的利己动机、具有逃避集体协作的趋向，那么集体利益——譬如防备掠夺、维护环境、确保日后食物供给等——又将如何实现呢？面对这一难题，人类反反复复地运用着三种不同的集体利益创造机制：权威组织、合作机构以及信任网络。尽管上述分类并未获得政治学理论的广泛认可，但研究经济过程的学者们却频频采用着一种与之相似的分类法：即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组织方式，划分为科层式、市场式和网络式。^[2]

表 2.2 经济学与政治学对集体利益创造机制的分类

经 济	政 治
科 层	权威组织
市 场	合作机构
网 络	信任网络

传统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忽视或否认市场的制度基础，相比之下，制度主义取向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念更为持平。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商业网络中的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常常以私人关系干扰非个人化的有效竞争，从而败坏了市场。但是，制度主义观点却认为，市场(即合作机构)建立在共同的意义、规则、实践和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尽管常常看不见这个基础，但如果没有它，外在的非私人化的市场亦将随之解体(Landa 1994, North 1997, White 2002)。将上述经济领域的讨论延伸至政治领域，这一分类可以有力地澄清政治变化的过程。

需要明确一点：上述三种类型概括的是理想型的组织原则，而非彼此泾渭分明的具体的组织结构。以经济社会学家为例，他们所热衷展示的，正是信任网络——在公司商号或其他权威组织以及相互交叉的领域内——的形成过程及其后果。^[3]权威组织或多或少地与合作机构相混杂，而合作机构也显然包含了网络——合作者围绕着这些网络建立起了广泛的信任。在本书随后的篇章中，我们将一再见证亲属、移民

或贸易信任网络是如何在信任网络与公共生活的交叉点上建构权威组织的。

因此，这三种模型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诸如“某个权威组织作出某种行为”之类的陈述，也应当被理解为“某个具有权威组织特性的特定结构作出了某种行为”，或是“某个结合了权威组织原则和合作机构原则的特定结构作出了某种行为”。为使行文更加简洁，本书将这种理解视为当然。

权威组织将自上而下的对强制、资本和信义的控制，归属于旨在实现某种利益的集权化权威(concentrated authorities)。至少在跨国公司兴起并对国家构成步步紧逼之势之前，国家在各种权威组织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与它的任何竞争对手相比，国家对强制、资本和信义的控制更加广泛，亦可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行动、人口和资源进行协调利用。当然，公司商号、教会组织、基层政府(small-scale governments)甚至家族，有时也可能扮演起权威组织的角色。

不过，在集体利益问题上，权威组织的缺陷也日益明显：权威组织能够造就的集体福祉往往很少，但所需耗费的集体成本却越来越多；权威控制资源更多是造福了自己，他们通过控制资源维护了自己的权力，而丝毫没有顾及百姓的苦难和怨恨(Rotberg 2004)。不过，如果权威组织一切运转得当，也可借助自上而下的激励措施——强制、资本和信义——增进集体利益。

对于合作机构的成员来说，合作就是权威。在听命于权威方面，合作机构与权威组织差异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合作的权威只是临时的、小范围的甚至是对单个人的。合作机构与权威组织的区别，主要集中于一点——即前者认可彼此拥有退出的权利。在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问题上，人们可能形成某种合作机构。对于彼此具有一定关联的人们共同提取池塘资源——如鱼塘或牧地——的行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有着卓尔不凡的洞见。奥斯特罗姆指出，在下列条件下，池塘资源的共享者更有可能接受规则——合作机构——以增进

其共同的福利：

- (1) 大多数共享者拥有一个共同的判断，认为若不采用替代规则，他们将受到损害；
- (2) 所提出的规则变更对大多数共享者的影响大致相似；
- (3) 大多数共享者对继续利用公共池塘资源极其重视，换句话说，他们的贴现率较低；
- (4) 共享者面临相对较低的信息成本、变革成本和实施成本；
- (5) 大多数共享者彼此分享最基本的互惠和信任规范，这些规范成为初始的社会资本；
- (6) 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群体相对较小，也较为稳定。^[4]

倘若满足了上述条件，共享者们更有可能认为他们将从合作中获利，并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控制搭便车现象。奥斯特罗姆更加全面也更加令人信服地指出，持久的集体合作依赖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相互支持，并以此应对相反的自私倾向。这三个要素是：个人对他人所持有的信任，个人为赢得值得信任的好名声而付出的努力，以及互利互惠规范的适用(Ostrom 1998:12)。合作机构将上述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维护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信任网络是由网状的人际联系构成的，而人际联系又是由强大的纽带构成的，居于其间的人们将弥足珍贵的、重大的、长期的资源和事业置于其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信任网络与奥斯特罗姆的池塘合作制度不同，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第一，信任网络将其成员的重要活动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严重风险中，其程度是任何合作机构所不及的。第二，信任网络的运作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任何一个特定信任网络中的成员都只是所在人口中的一个小群体，也就是说，他们将大多数其他人排除在外，并与其他网络竞相争夺对资源的控制。第三，退出信任网络不仅困难重重，甚至完全没有可能；无论宗族集团还是秘密教派都不允许其成员轻易退出。第四，尽管信任网络常常运用强制和资本进行内部激励，但是它更加倚重社会

单位中小范围的信义关系，并以此促使彼此之间相互关照。第五，也是以上四点的必然结果，即被信任网络驱逐的代价相当高昂，失去这种伙伴关系将对个人福祉造成严重打击。

一般情况下，权威组织、合作机构和信任网络的区别大致如表 2.3 所示。它表明权威组织综合具有以下特点：退出难度是可变的(你无法轻易地出狱，但你可以辞掉大多数工作)，对池塘资源采取集权化控制，应对成员失信、失误或失败的能力适中，被组织驱逐的代价适中，以及从纵向纽带(等级制的)向横向纽带(相对平等的)转换的可能性较高。这些特点将权威组织与大多数信任网络区分开来。对于信任网络来说，退出是罕见而代价高昂的，对池塘资源的控制是可变的，应对失信、失误或失败的能力是脆弱的，纵向纽带向横向纽带转换的可能性是不定的：譬如，在某些信任网络中年长者拥有广泛的权威，而另一些网络则恰恰相反。与各自的特征相匹配，权威组织、合作机构和信任网络在运作程序和主要活动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表 2.3 合作的主要形式及其区别

特 征	权威组织	合作机构	信任网络
退出难度	可变的	自愿的、容易的	罕见的、代价高昂的
对池塘资源的控制	集权的	分权的、集体的	可变的
应对失信、失误或失败的能力	中	弱	强
驱逐的代价	中	中—高	高
纵向纽带向横向纽带转换之可能性	大	小	可变

尽管从信任网络中退出是罕见而且代价高昂的，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打算退出，也不意味着没有人被逐出，而是意味着自愿退出面临诸多障碍、退出者或被逐出者代价高昂。就自愿退出而言，它意味着牺牲了以往的扶持形式并令一切重头再来(Ebaugh 1988)；而对非自愿的被逐出者，也是同样如此。以明尼苏达州大波特奇(Grand Portage)契帕瓦族

印第安人保留地* (Chippewa reservation)事件为例：2003年，保留地理事会因醉酒、蓄意破坏和斗殴驱逐了一名成员，由此给这位母亲带了巨大的痛苦。

这位妇女——杰奎琳·杰克逊——如今住在她能找到的任何地方：有时她睡在德卢斯(Duluth)一位年长朋友简陋公寓的帆布小床上，其他时间则在一名亲戚的女朋友的阴暗地下室里搭起帐篷裹着毯子。杰克逊太太，现年43岁，她对自己在那个夏夜的骇人行为供认不讳。事发后的第二天早上，在德卢斯的凄冷晨光中，她承认自己喝得烂醉、举止暴力、行为失常。但是，她认为对她的惩罚过于严厉：她被剥夺了保留地复合津贴，失去了朋友，被遗弃在了清冷孤绝的境地以致失去了生活的方向。“那块土地也是属于我的，”杰克逊太太说，“在我生命中，我还不曾无家可归、从未无家可归，但我现在已是无家可归。”她时而狂躁：抱怨部落政治将她放逐，其他人犯了过错却因朋友或家人任职于部落理事会而未至于此；时而悲伤：大声惊问大波特奇发生了什么，她的朋友们在干什么，她留在屋里的烤架、微波炉和风扇怎样了。她极度恐惧和困惑，甚至不知道何去何从。“每天夜里我都因为想回家而哭泣，”她说，“我太想念那个地方了。”(Kershaw and Davey 2004:4)

在权威组织中丢了工作或是被合作机构开除了，同样是付出了代价。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被迫从信任网络中退出的代价更加高昂，因为被逐出信任网络损害的是弥足珍贵的重大事业、或是被逐出者赖以实现事业的途径。

* 印第安人保留地：即享有有限主权的印第安人部落自治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拥有部落成员和美国公民双重身份。——译者注

漫长的历史表明了信任网络中的典型事业包括：同居、生育、养育子女、不良嗜好、共享神秘的知识、接受异端信仰、实物交易、信贷、血亲复仇、远距离大宗贵重物品贸易、池塘水资源管理，以及照料病人、精神病患者和老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中有些事业同样可以被置于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权威之下，而政府也持续不断地对信用、长途贸易、水资源管理和血亲复仇进行控制，并努力将其转化为公共事务。

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说的：如果条件适宜，诸如水资源控制之类的集体行为有可能演化为合作机构；而诸如生育或不良嗜好之类的集体行为，则通常是既抵制自上而下的控制又与合作机构相抗衡(Zablocki 1980: Chapter 8)。不过，所有诸如此类的高风险行为都终将成为人际网络——这些网络部分或完全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囊中之物。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人都依赖于信任网络以谋求事业，并尽可能确保自己所信赖的网络免遭政府的干预。

网络与信任网络

绝大多数网络都不具有应有的信任容量，我们如何从中分辨出真正的信任网络呢？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堪称信任网络。除了拥有强大的关系纽带和对重大的集体性事业——这些事业无力应对其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协同一致之外，这种至少由三人所组成的关系，还应当满足以下标准：

- (1) 这种关系拥有成员共知的名称；
- (2) 参与此种关系可使所有成员分享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 (3) 参与者获得某种方式得以与其他成员交往，并可彼此代表对方；
- (4) 参与者划分和维护自己的边界，从而与外界相区分。

就此而言，信任网络是承载了相互义务的有名称、有边界、有内部交往的关系组合。上述四项标准合在一起，可将大部分网络排除在信任网络之外：譬如，由熟人关系、政治影响、同事关系构成的网络，由经济媒介、商品、服务、信息或疾病传播构成的网络，由同一个协会的成员构成的网络，以及由对公共运输或互联网等设施的共同使用构成的网络等。当恒常的人际关系既符合以上四项标准，又与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业相结合时，我们即可称之为信任网络。

总之，信任网络与其他网络的不同之处，可以表现在若干有趣的方面。尽管信任网络在关系的亲密度上互有差异，但与其他网络相比，信任网络的亲密度更高，也更加依赖于特定的知识和特定的关注点——这是第三方所无法获悉的。信任网络中的关系纽带往往比其他的关系纽带更持久，也更常见地演化为三角形的关系纽带：甲联系乙和丙，则乙和丙建立联系。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与其他的人际关系纽带相比，信任网络中的关系纽带更加紧密。

上述特性使信任网络的活动具有了某种刚性。与权威组织和合作机构相比，信任网络无法灵活而迅速地对其规模、组成、主要的活动以及组织策略进行调整，无法便捷地对其成员在网络中的地位进行变更，也无法向新进人员灌输共享的知识和经验。

然而，作为对其弱点的补偿，信任网络具有合作机构和权威组织无法企及的能力：譬如，无需连续不断地实施监控，便可将时间和空间上浩大的复杂活动进行到底，便可将大量的资源托付给个体，便可在成员中演绎出感人肺腑的奉献和牺牲，便可在名义上享有同等权利的成员中延续权利、特权和义务的极度不平等。此外，信任网络为忠实的成员所提供的互助和保障，也是权威组织和合作机构远远无法企及的。就此而言，信任网络的这些特性也使它与政府的对峙更加引人注目、充满冲突、意义深远。

信任网络作为一项实践活动，也使人们难以在范围过于庞杂的各类人际关系中对它作出准确界定，难以对人和场景中的所有关系作出

全方位的把握(Wasserman and Faust 1994)。一批研究者对人际关系所作的追踪研究表明：对权威组织——其中包括政府——的运作来说，人际关系的结构所发挥的影响非同寻常。[5]

想要界定哪些网络实际上包含了高比例的信任关系，就必须从关系或缺乏关系的简单探究中解脱出来。我们可以从网络的内在结构——尤其是形成三角纽带和联系紧密的小圈子的可能性——中获取最初的线索，接下来——此外别无选择——就是考察其实际的运作状况，即是否存在联系着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关系，这种关系是否拥有共同的名称，是否形成了与关系如影随形的权利、义务和标准化的交往方式，参与者是否划分和维护着网络的边界，以及网络成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将重大的事业置于网络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亲属关系——即通过生产和生活的高度结合而形成的拥有公认之纽带的团体——无疑为信任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最寻常的温床。当然，并非所有的亲属关系网络都构成了信任网络。实际上，双谱系家族(bilateral lineage systems)——正如在大多数西欧国家曾盛行的那样——就让任何一脉血缘关系网络都无法转化为信任网络，因为任何一脉都因父亲、母亲、子女或堂表兄妹而枝蔓横生。

此外，我们必须对宽泛的宗谱结构中的血亲嫡传关系和它所衍生的其他社会关系作出区分。例如，在许多家族系统中，都有通过收养或拟制亲缘而建立的有约束力的社会纽带。亲属关系可成其为信任网络，并不仅仅是同一血脉的简单集合，还需要实实在在的血脉关系之运作。凯瑟琳·维德里(Katherine Verdery)对后社会主义时期罗马尼亚乡村的私有化进程进行了卓越的民族志研究。她的研究追根溯源，从个体小农及其家庭的变迁中追溯了司法和行政制度的源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出现的资产相对私有化时期以来，罗马尼亚的小农经济形式已经历了数代人和多种耕作形式的变迁。

维德里认为，罗马尼亚政府在对集体财产进行分割和确认权利时，采用了一种整齐划一的和以宗谱为单位的土地权概念(genealogical

conception of rights in land), 而对社会主义时期哪些人曾经实际耕作了哪些土地、哪些人曾经照顾了年长的土地所有人或经营人等情况一概忽略不计。在政府看来, 在家族或宗族集团所伸张的私有化财产权中, 同一宗谱中具有同等身份的任何个人——如两兄弟、两堂表亲、两伯舅亲——享有同等权利。但是, 政府的形式逻辑却与地方性道德规范发生了碰撞。维德里认为:

然而, 村民们并不这样理解亲属关系。在他们看来, 家族是行动中的家族(it was performative)。成为一个家族意味着要如家族一般行事, 意味着参加共同的婚礼、洗礼和葬礼, 意味着相邻墓碑下同样的鲜花, 意味着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相互扶持, 意味着照料老人(甚至并非亲生父母)而得以继承其名下的土地。(Verdery 2003:165)

用维德里并未采用甚至反对采用的术语说, 由血缘而形成的关系——就其塑造信任网络模式的程度而言——堪称真正的亲属关系。

即使在所有的亲属关系网络中, 能够经受严格的检验而被称为信任网络的少之又少, 但是, 这些亲属关系网络又常常发挥着共同生活和生产的优势, 承担着诸如儿童安置之类的意义深远的集体性事业, 并常常投身于诸如为老弱病残提供服务等集体性的事业。在此过程中, 亲属关系网络积累了可以被自己集体掌控的资源。正如古老的针对土地、牲畜、金钱和劳动力的斗争所揭示的, 一个亲属关系网络所积累的资源, 此后又往往成为网络中各个部分竞相争夺的目标, 成为相互竞争的亲属关系网络竞相争夺的目标, 成为网络成员与攫取资源以自肥的权威组织竞相争夺的目标。

奥斯瓦尔多·拉乔(Oswaldo Raggio)为我们特别描绘了一幅地方信任网络与上层权威相互作用的生动图景。在1550年至1650年间的热那亚西部乡村, 有权势的家庭——准确地说是父系家族——往往围绕着三层

关系构建自己的生活：核心家庭圈、旁系家族圈以及范围更广的宗族集团圈。在经济活动、财产流动、政治生活以及婚姻战略中，影响至为深远的血缘关系(parentele)主导着乡村事务。一方面，不断延伸的宗族集团为了争夺优势明争暗斗。另一方面，上层权威(包括当时的热那亚共和国)又持续缺位，其结果便是宗族集团频繁陷于血亲复仇之中，他们相互袭击对方的人员和财产，冤冤相报、无穷无尽。

由于宗族集团的分裂生殖机制，可以从一个家族中衍生出拥有共同姓氏和祖先的不同脉络，因此，这个地区的血亲复仇的规模不断扩大，甚至达到了形成“同盟”以及由多个同盟组成派系的程度。大约16世纪中期，一位有身份的热那亚“船长”受命为基亚瓦里*的城镇及其附属政治辖区建立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并从当地人那里领取工资。1549年，这位安布罗西奥·里瓦络拉(Ambrosio Rivarola)“船长”鉴别出了两个最大的派系：其中一个派系统辖着七分之一的宗族集团，其中又分成了五个同盟；另一个派系统辖着二十个宗族集团，其中又分成了四个同盟；两个派系及其所属的各个同盟之间争斗不休(Raggio 1990:163—168)。尽管这些派系、同盟以及更小范围的宗族集团事实上形同最高权力名下的地区政府，但也同时为血腥的血亲复仇埋下了祸根。

如果没有外来干预，血亲复仇难有终结，而干预或是来自拥有权威的族长，或是来自热那亚政府。热那亚政府组建了一支调停代表团，并为代表团提供官方支持以便达成和平协议。该代表团是由未卷入血亲复仇的宗族集团家长选举产生的。拉乔认为，在血亲复仇及其处理过程中，宗族集团一方面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也发现自己在无意中与国家权威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他说：

与血亲复仇一样，化解世仇同样需要各方“首领”达成强烈的

* 基亚瓦里(chiavari)：现为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大区热那亚省的一个镇。——译者注

一致。热那亚官方通过调停向所有各方“发出声音”，确立了国家干预的合法性并连带地树立了君主的权威。但与此同时，一种显著而根深蒂固的地方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parentele(血缘关系)，也随之被合法化了。(Raggio 1990:247)

就这样，尽管采用了掩饰和委托的策略，热那亚的亲属信任网络还是依靠国家的支持并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资源，以此换来了国家对血腥冲突的干预。

实际上，恰恰出于自身结构上的原因，信任网络或是常常遭受外来的掠夺，或是成为外部发起的“分而治之”(divide-and-conquer)战略的牺牲品。由于信任网络控制着有形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譬如土地、劳动力或商业财富，因此，它们往往成为嫉妒和贪婪的目标。由此所导致的后果是，信任网络的首领常常反向实施“分而防之”(divide-and-defend)的战略，通过在统治者之间玩弄合纵连横的把戏，以防范跃跃欲试的掠夺者。

对此，13世纪西班牙西海岸的加利西亚(Galicia)为我们提供了令人惊异的佐证。加利西亚名义上的统治者莱昂王(León's King)根基不稳，致使拥有武力后盾的地方权贵尽其所能地强化对乡村社区的控制。这些乡村社区颇为典型地围绕着向外延伸的亲属关系构建而成。由于乡村社区不具有武装防御的能力，因此，农民的应对策略不是武力反抗，而是与当地有权有势的修道院达成交易——将世俗的封建管辖转变为教会的管辖：

爱与保护(amoremy defensa)的原则因此拥有了某种普遍的互惠结构，并在通常情况下通过有条件地给予“帮助和保护”或“庇护和保护”而得以体现。

农民们因此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保障，也就是说，修道院的“防卫”、“保护”和“爱”为他们提供了支持，使其得以抵制那些他们反对

或惧怕的社会力量。诸如此类的保障稳定了地方社会系统,同时,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形式(*mutual sociability*),该互惠机制因其所具有的对农民和地主一视同仁的客观公共性,而被双方公认为是不可或缺。(Pastor, Pascua, Rodríguez López, and Sánchez-León 2002:287)

由此或是产生了经纪型自治——即与统治者建立特殊的关系纽带,或是形成了庇护体制——即与统治者的关系取决于掠夺者和庇护人在协商过程中对信义、资本和强制的不同取舍。

在政府的集中控制无法企及的范围之外,亲属关系网络常常以相互协作的方式完成重大的集体性事业。例如,远距离的移民活动就借助于亲戚们的居中协调,而源源不断地向外延伸着移民链:甲移民带动乙移民、乙移民又带动丙移民,以此类推,直至链条末端的亲属关系点与另一条亲属关系的链条牢牢地挂上钩(Tilly 1990, 2000)。马塞洛·博奇斯(Marcelo Borges)为我们再现了这样一条移民链:它从葡萄牙最南端阿尔加维省*的一个小小亲属关系网,一直延伸到了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市和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艾利萨农业区(Villa Elisa)。20世纪20年代,葡萄牙人作为农业工人移民到了艾利萨。他们购买土地、经营花卉种植贸易,创建了这个自得其乐的经济小特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自己所在的群体中寻找配偶,这与通常情况相符合——亲属关系网络促进了同种族的婚姻。

博奇斯谈到了与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M.)的一次访谈。20世纪30年代初,弗朗西斯科从葡萄牙移民至此。在6年的时间里,弗朗西斯科买了地,作为一名独立的花卉种植经营者站稳了脚跟,并借此将自己的妻子儿女接到艾利萨农业区,同时着手帮助家族中的其他人开展移

* 阿尔加维(Algarve):葡萄牙最南端的一个历史省份。拉普拉塔(La Plata):阿根廷东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省会城市。——译者注

民。在他的生平中，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的：

首先，我把自己的妹妹接来了，她来时是单身。她后来的丈夫是我的朋友，当时也是单身。我跟他说随他选：我在葡萄牙还有两三个妹妹，选中谁就让谁来。事情就是这样的。他同意了。于是，我让这个妹妹寄来照片相亲，同时，我也让他寄去自己的照片。事情就是这样的。他很喜欢她、希望她能来……他也是葡萄牙人，来自阿尔加维的另一个村子。(Borges 2003:468—469)

成百上千个交易都是按照这样一种模式进行的，它们在当地建构起了立足于鲜花贸易的葡萄牙人共同体。通过这种朴实无华的、层层递增的交易，信任网络实现了意义重大的事业——即这个例子中移民共同体及其经济小特区的移植与重构。

非亲属网络有时也显示了相似的特性。在瓦勒度派教徒身上，我们看到秘密的宗教纽带在没有血缘关系支持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16世纪英格兰的商业家族身上，我们看到他们开创了自己的信用网络而几乎无需借助血缘关系；在其他地方，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年龄圈、宗教兄弟会、校友会、老战士俱乐部以及正在运转的信用圈，它们构成了具有相似的名称、边界和内部交往，并承载了相互义务的关系网络。不过，在移民、贸易、信贷、宗教和儿童的社会迁徙方面所运用的亲属网络，却更加精细地展现了信任网络的重要意义——实现重大的集体性事业而无需权威组织或合作机构。

当然，我们不要以为信任网络的运转是令人愉快的和仁慈的。它们常常对其桀骜不驯的成员施以暴政和剥削，而紧密联系的信任网络的形成，也往往既增进了内部的信任，又增加了外部的不信任，从而为跨网络的合作设置了障碍。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检视这些不同的合作机制之间的相互对峙，以及信任网络与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的对峙。

重提大问题

这让我们回到了一开始就面临的诸多大问题(big questions)。本章初步探索并就此尝试性地提出若干答案，本书随后的部分将适时予以论证。

(1) 面对政治掠夺者和贪婪的统治者，人们在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维系信任网络的？如果信任网络能够生产足够的资源以实现自我繁殖、能够为其较有权势的成员解决实际问题、能够有效地激励其成员捍卫网络边界，则信任网络能够生存。

(2) 在统治者掠夺成风的背景下，信任网络在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为统治体系所整合的？当既有的自治型信任网络土崩瓦解或无法继续满足其成员的利益时，当信任网络的领袖与统治者达成和解时，当外在于既有之信任网络的人口数量大幅攀升时，当信任网络缔造了自己的政权体系时，当统治者中的主要政治角色形成了自己的利益衍生网络时，上述过程即以不同的方式将信任网络整合于统治体系之中。

(3) 统治者与信任网络的关系是如何影响统治稳定的？对于信任网络的运作、繁衍和自我维系来说，统治者越是不可或缺，统治就越是稳定；与之相反，统治者的干预越是可有可无，则干预的可信度不断下降、统治就越是不稳定(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统治的稳定性，如地方或中央政权的竞争者手中的军事力量)。

(4) 在何种条件下、如何以及伴随着何种政治后果，信任网络与统治者在整合中相互受益，或无法在整合中相互收益？回答该问题需要对成本和受益进行细致地评估，但这一任务已非本章所能承载。一般说来，信任网络和统治者能否相互受益，取决于信任网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的服从开设价码，取决于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予轮换的，取决于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本身就是信任网络的成员；也就是说，取决

于民主的实现程度。上述条件中任何一项下滑，都将损害信任网络和统治者取得共赢。

(5) 当整合发生时，它何以具有不同的变化，又是什么主导了这些变化的形成？我们试图对诸如极权体制、神权体制、庇护体制、民主体制、经纪型自治等不同的统治体系中的变化作出解释。为此，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整合前信任网络的内部组织；二是统治者为推动整合而对强制、资本和信义的糅合运用；三是各类庇护人、头面人物以及诸如地方军阀之类的次级统治者(secondary rulers)居中协调的程度及其性质。

上述原则适用于不同的层面：从地方社群到世界范围的权力体系，不一而足。不过，为了使随后的研究不至于漫无边际，本书将聚焦国家——即在固有领土内控制了集中化的强制手段、并凌驾于所辖领土内一切组织的集权组织。这个定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统治者”有时只是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有时包含了范围庞杂的各类人、机构及其相关组织。民主政治倘若运转良好，可以通过选举、代议制政府、社会运动、公共舆论或其他言论渠道，将大部分国民整合于统治阶级之中。这一事实也让我们对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生出了特别的关切。

注释：

[1] Feige 1997, Fox 1996, Humphrey 1999, 2001, Ledeneva 1998, 2004, Lonkila 1999a, 1999b, Scoot 1998.

[2] Biggart and Beamish 2003, DiMaggio 2001, Powell 1990, Tilly and Tilly 1998, Williamson 1996, Zelizer 2004, 2005.

[3] 参见 Bandelj 2002, Darr 2003, Knorr-Cetina and Bruegger 2002, Morrill 1991, Saxenian 1994.

[4] Ostrom 1990:211; 此外，可参见：Adams, Brockington, Dyson, and Vira 2003, Dietz, Ostrom, and Stern 2003, Dlošak and Ostrom 2003, Ostrom, Dietz, Dlošak, Stern, Stonich, and Weber 2002, Pretty 2003.

[5] Bearman 1993, Braddick 2000, Broadbent 1998, Buck 1999, Diani 2003, Glete 2002, Ingram and Roberts 2000, Keck and Sikkink 1998, Knoke 1990, Laumann and Knoke 1987, Podolny and Page 1998, Powell and Smith-Doerr 1994, Riles 2000, Skocpol and Oser 2004, Uzzi 1997, Vertovec 2003, Watts 2003.

第三章

信任网络的转型

1891年，派拉普家的伊迪丝和萨拉姐妹从纽约的家中，给波兰雷平(Rypin)的乡下老家寄出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您可别以为这个国家和老家的村庄没什么两样。这里到处住着从雷平来的人——这也是萨拉姐姐想来这儿的原因。感谢上帝，我们能赶在逾越节前给爸爸寄一张船票，等爸爸来了之后，我们就能赶在入夏以前给亲爱的您和弟弟寄船票了。(Morawska 1996:29)

一条移民链拉扯着这些由亲属、族群和宗教凝聚着的人们，使他们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这些波兰村民在拥挤的纽约城里风风火火地适应着新的社会生活。

环环相扣的远距离移民链，为我们研究信任网络的转型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室。^[1]远距离移民面临相当严峻的风险：正是这些风险，使那些不具有移民所需的广泛人际关系的潜在移民，转而依靠自身所在的信任网络获取信息和帮助；正是这些风险，使那些没有信任网络为之周旋的潜在移民压根儿没法迈出这一步。借助环环相扣的链状通道，移民们源源不断地向为数不多的几个目的地聚拢，而非泛泛分布于多个目的地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来自同一个村庄的人大多移民到同一个城市或城镇，在迁徙数千英里后再作邻居。移民网络的运作过程大抵如

是——仅仅在结构和地理分布上有所变化而已。鉴于网络成员通常是依赖彼此之间强大的纽带关系以实现重大而长期的事业，鉴于这些事业被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和失败的风险之中，因此，这些网络通常可被视为信任网络。

移民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使信任网络发生改变，至少是改变了社会纽带中先前已存在的关系结构，对工作、婚姻、家庭结构以及网络的凝聚模式产生影响。小时候，我对母亲何以要我特别尊敬她那几个呆滞的老亲戚深感迷惑，直到有一天我获悉：在我母亲的家族从南威尔士令人沮丧的矿区移民到芝加哥的过程中，这些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移民链的最终命运是由不受移民控制的外部因素决定的，但也因此使移民链中的一系列内部过程得以展现出来，而这通常为其他的信任网络所刻意隐藏。在网络的延伸过程中，移民们经历着变化，并常常终身不忘。与其他类型的信任网络成员相比，移民链的参与者在事成之后，有可能吐露彼此之间的扶持及其成败的细节。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从不轻易示人的沉默中获取有关信任网络内部运作及其变化的证据，而移民链的故事中就承载着这样的信息。

此外，当新的移民抵达目的地后，信任网络的影响将告一段落。由信任网络所构筑的联系渠道，开始在目的地构建新的权利、义务和互助结构。爱娃·莫拉斯卡(Ewa Morawska)对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顿(Johnstown)的犹太人所作的丰富研究，就向我们展示了亲属、同一个移民链中较早的移民以及宗教会社的成员，是如何有条不紊地对新移民的职业生涯进行塑造的。约翰斯顿的大多数犹太移民都是借助移民链，从沙皇俄国的“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即后来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迁徙而来。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沙俄政府随即对宗教少数派——特别是犹太人——实施系统的迫害：譬如，1882年颁布的《五月法》(Laws of May)就禁止犹太人建立任何新的居民点，即便在“栅栏区”内也不行。政府支持的屠杀和驱

逐——即波格鲁姆*——已成家常便饭。1890年之后，犹太人从沙俄向美国的移民日趋加剧，约翰斯顿是美国东部诸多移民目的地中的一个。

纽约的犹太人给人的印象是大多从事制造业，而约翰斯顿的犹太人则更多集中于零售业。当然，做买卖需要原始资本和各种关系——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于信任网络。莫拉斯卡揭示了它的运作过程：

亚伯在约翰斯顿开了一家鞋店，用的是自己340美元的积蓄和借来的1000美元，这笔钱是从他的哥哥和两个已在当地经商的犹太人朋友那儿借来的，而这两个朋友同时又是罗德夫·沙龙社**的积极的负责人。雅各布一开始是给他堂兄作店员，业余时间捣腾自己的店铺，偶尔也外出做点小买卖。随后他攒了一点钱，“他的一个同胞因此从附近的一个小镇跑来劝他，建议他在爱本斯堡(Ebensburg)开一家男士服装店……理由是那儿还没有这样的店铺”。此外，还有一些“同情小本生意人”的批发商，他们通过提供当地商业信息或介绍第一笔买卖等方式帮助后者创业。例如，有一个人就告诉亚伯拉罕“去那儿(他原本的意愿)不如去这儿”。因为“这儿是个好去处”。说这话的是一个批发商，同时也是当地犹太教堂的负责人，平时很关照亚伯拉罕。(Morawska 1996:55)

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约翰斯顿的小商小贩们也在不断改写着东欧犹太人的信任网络在当地的分布格局。在此变化过程中，信任

* 波格鲁姆(pogrom)：俄语意为“大屠杀至灭绝程度”，特指19世纪末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杀戮、驱逐和群众性迫害。——译者注

** 罗德夫·沙龙社(Rodef Sholom Congregation)：相关资料参见<http://www.rodefsholom.org/>。——译者注

网络的成员一如既往地将其重大的事业——包括自己无法确保的生意和子子孙孙的未来——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

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信任网络的内部同样发生着转型。例如，成功的移民商人常常将子女送进大学深造，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他们的后代很少继承父业，而是出了校门就离开了约翰斯顿。再加上其他一些外部因素——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约翰斯顿丧失了钢铁业的龙头地位，也促使大批犹太人在战后不约而同地离开约翰斯顿，并由此导致当地犹太人口的急速萎缩和迅速老龄化。唯有20世纪90年代新的高科技行业兴起，以及由此吸引了各地犹太专业人才的回流，才让约翰斯顿的犹太社区免于解体(Morawska 1996:247—251)。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再次领略了信任网络的自我繁殖过程，明白了自我繁殖过程与最初的形成过程同样重要——使信任网络得以长期运作就如同使其得以形成同样至关重要。

信任网络如何变化

从个别成员的加入或退出到网络形式上的彻底变化，信任网络的转型可谓各式各样。这两种变化在约翰斯顿都有发生。在189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约翰斯顿的犹太人移民网络已从形同狭小的孤岛，发展到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这个城市的重大经济活动的发展与繁荣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此演进过程中，移民网络的内部结构也从一组相互叠加的庇护—代理链，过渡为一个由各种小圈子——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家族、公司和正式组织——所组成的复合体。约翰斯顿的犹太人移民网络或许没有产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的合作机构，但是，它着实衍生了一套表现为会社、理事会、协会、商号等形式的权威组织。

就约翰斯顿的犹太人共同体而言，其所有成员都无一例外地将同等重要的事业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由此不仅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和一致的网络，还不断繁衍增殖并发展成为由各种信任网络交织而成的网络。就外部关系而言，这些相互联系较为松散的信任网络又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别，而持续不断地将自己与其邻人分隔开来。例如，约翰斯顿的犹太人始终保有对不幸进行救援的集体意识和能力，而不论发生不幸的犹太人居于何处。

本书随后的篇章将集中论述信任网络与政权的遭遇与对抗。自上而下地看，我们可以看到统治者通过灵活地运用强制、资本和信义并施之于国民，而试图将信任网络纳入政权体系之中。这种纳入可以是直接的，即信任网络直接成为政府统治体系的一部分——譬如受到优待的宗教教派直接被整合成为政府组织。这种纳入也可以是间接的——譬如政党或工会通过创建或组建自己的互助网络而间接地承担相对独立的公共政治角色。

本书第二章曾经根据(1)强制、资本和信义的相互比例，以及(2)整合或分化的程度，对信任网络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的形式及其后果进行了粗略的分类。基于这些分类，又可进一步区分出极权体制、神权体制、庇护体制、民主体制、经纪型自治、规避型遵从以及专属型纽带。具体说来，20世纪和21世纪高度整合的政权通常都借助了福利资格、兵役制度、退伍军人权益、税收、学校、经审查批准的宗教会社、服务型政党以及工会等法定的合作机构，成功地将信任网络纳入自身的统治体系之中。

就整体而言，极权体制比民主体制更加直接地运用了上述手段，并以此实现政府行为对其国民的整合。而在民主体制中，信任网络更加经常地成为了拥有自治权利的政治角色，拥有向政府政策或政府官员表示同意或收回同意的权利。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极权体制中的信任网络更加经常地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被紧密地纳入公共政治之中的特权信任网络；二是与政权艰难共存的违禁信任网络；三是对政权阳奉阴违

或秘密反抗的地下信任网络。

我们应当从信任网络是如何被政权体系所整合的过程入手，对信任网络的变化和变异作出解释。本书随后的篇章将对下列不同的过程类型进行系统的考察。

(1) 既有的与政权相隔离的信任网络逐渐萎缩和分解，或是丧失了维系成员必要活动的的能力，致使网络的支持者转而寻求与公共政治建立联系。

(2) 在面对新的风险和风险行为时，既有的信任网络无力保护其成员。

(3) 信任网络以外的人口大幅攀升，信任网络唯有与公共政治建立联系才能运转。

(4) 统治者或主要政治角色摧毁了既有的信任网络，亦将导致上述结果。

(5) 统治者或主要政治角色将既有的信任网络有效地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

(6) 统治者或主要政治角色创建与公共政治相衔接的信任网络，并征募人员参与其中。

在讨论上述内容之前，我们首先分析处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之外的信任网络的内部转型，并以此为随后的讨论作准备。我们需要集中探讨一些过程，这些过程促成了信任网络的扩展或收缩、增加或降低了信任网络应对外部掠夺的能力、改变了信任网络对网络成员的控制、加剧或缓解了信任网络成员之间的分离。对本书所提出大问题来说，影响信任网络内部转型的至为根本的因素是：网络边界(boundaries)、外部联系(external connections)、网络维持(sustenance)和内部关系(internal relations)。尽管这四个方面的因素显然互为因果，但在分析其交互行为之前先逐一地予以辨析应当是有所裨益的。

网络边界：即信任网络成员如何尖锐以及如何严格地将自己与外部世界区分开？他们如何接纳新的成员、如何驱逐旧的成员？以约翰斯

顿为例，尽管本地人存在着多种语言和宗教传统，但是，犹太人最初的移民过程仍在外来的多语种犹太人和占支配地位的英语语种的天主教徒邻居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可鉴的边界。此后，随着犹太移民逐渐接受英语并忘记欧洲母语，随着他们的东正教信仰逐渐衰落以及与保守派和改革派宗教会社的相互融合，随着他们的后代跨越族群相互通婚，才最终模糊了约翰斯顿犹太人与其他居民之间的界线。

作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能够在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严格界定边界并加以维护和监控的信任网络，其运转往往比其他类型的网络更加有效(Tilly 2004c)；而不能成功地界定内部人和外部人、或是无法维护和监控网络边界的信任网络，则难逃萎缩或消亡的命运。模糊的网络边界也为网络成员的退出或骑墙创造了便利，增加了网络监控以及强制履行义务的难度，并相应地为网络成员追逐有损于网络整体利益的私利创造了机会和激励。

外部联系：即信任网络如何与那些对网络边界、网络维持和内部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结构因素发生交互作用。在莫拉斯卡的论述中，约翰斯顿的犹太商人大多来自东欧的小商人家庭，而来自东欧的天主教农民和工人在移民约翰斯顿后，却大多投身于重工业生产行业，两者的关系就如同是东欧盛行的犹太居民和天主教居民的关系的翻版，唯一的不同仅仅是这里的犹太人不用担心东欧犹太人所遭遇的大屠杀和政府迫害。莫拉斯卡暗示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斯顿的犹太人将逐渐演变成成为一个新的、随遇而安的宗教少数群体：他们之中略具奉献精神成员也仅仅是间或地参与约翰斯顿的公共生活，并将这种疏离看作是自身信仰的体现。作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网络的外部联系同时对网络边界的维护以及可持续资源的汲取产生强烈影响；正如信任网络的首脑们常常担心的那样，网络中的个别成员伙同一小撮有权势的网络外部人员所建立的牢固纽带，往往对信任网络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破坏。

网络维持：即信任网络从哪里获得资源以维系自己的集体行动、如

何获取这些资源以及具有怎样的后果？最初，零售业为约翰斯顿的犹太人信任网络提供了日常活动所需的人脉和资金，无论工作、住房、贷款、宗教活动还是移民活动本身都严重依赖于这些零售生意。但是，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各地犹太专业人员的到来，犹太人信任网络明显地开始转而依赖于自愿捐助性质的宗教认同组织 (religiously identified organizations)。

更加广泛地说，与断断续续地依赖于外部资源供给的信任网络相比，可自行汲取可持续资源的网络运转更加有效——至于其他方面则相差不大。信任网络若丧失了可持续资源的供给渠道——包括新的成员更新换代——将走向分解、萎缩或消亡(当然，那些积聚资源的因素也常常导致资源的坍塌，譬如约翰斯顿的钢铁厂在 1960 年之后纷纷倒闭)。此外，信任网络也常常透支资源：当网络的扩展速度超过了可持续资源的供给能力时，信任网络亦随之走向萎缩、消亡、成员流失或分裂。

内部关系：即信任网络的成员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资源转换、共同活动、集体控制以及劳力分配关系。莫拉斯卡的一般性描述颇为乐观，她没有向我们说明可能存在的冲突与强制。不过，有关最初的移民如何站稳脚跟的故事，还是清晰地展现了少数已站稳脚跟的犹太商人，在移民的最初阶段对这些进入经济小环境中的人所实施的巨大控制，以及这些先行者的家族在当地所构建的犹太人的权力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涌现出了多元化的权力中心并分散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集团，但是，这些变化不足以使犹太人的信任网络分崩离析。

对于信任网络中的内部关系，我们得出了哪些更具一般性的结论呢？人际联系中的某些特征极大地影响了网络的生存能力：信任网络成员共同拥有的强烈吸引力维系着网络团结，而吸引力的衰减则导致网络的削弱。另一方面，信任网络中联系紧密的排他性小圈子的形成，也容易造成信任网络的分裂。卓有成效的信任网络通常建立了如下机

制：或是杜绝联系紧密的排他性小圈子的形成，或是将这些小圈子全然阻隔于信任网络的运作范围之外。

此外，如何运用用于内部合作的资源，同样事关重大。若强制、资本或信义低于正常标准，则可用之于集体的强制、资本和(或)信义的不断衰减，将最终导致信任网络的萎缩或分解。若强制、资本或信义高于正常标准，则为信任网络所倚重的强制、资本和信义，又有可能成为引发分解或分裂的内部动机而产生强烈影响：也就是说，信任网络若过度依赖强制，它将招徕网络内部或外部的强制力量与之抗衡；信任网络若过度运用资本，它将面临“此一时、彼一时”以及/或者资本外部供给不断萎缩等的困扰；信任网络若过度偏重信义，它将陷入意识形态的路线纷争并分裂为不同的精神派系。从倚重信义转变为倚重强制和资本，再加上人际关系的日益不平等和形式化，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将信任网络转变为权威组织。

极端倚重信义的信任网络是与卡理斯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相伴生的。卡理斯玛型领袖往往能够造就更加有效的信任网络，但也同时付出了双重成本：(1)丧失了敢于表示反对的成员；(2)继承领袖地位时，分离或分裂的危险进一步增强。与信任网络所衍生的小圈子一样，卡理斯玛型领袖同样对信任网络的稳定造成了威胁。因此，一个持久而有效的信任网络更多是建立在成员之间持久的信义基础之上，并将集体的行为与形同孤岛的卡理斯玛和(或)小圈子隔离开。

表 3.1 汇集了信任网络内部变化的要目，以及这些变化对网络的整体运作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个表格提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保护和维系资源而言，网络的外部联系至关重要；就增加或降低信任网络的生存能力而言，内部关系的各种变化至为关键。在不考虑统治者和政权的条件下，信任网络的内部动力机制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同样能够导致信任网络的结构、行为和生存能力发生变化。有时候，信任网络确实是在统治者和政权未曾干预的情况下自行萎缩或崩溃的。

表 3.1 信任网络内部的主要变化

网络要素	变化类型	变化结果
边界	明确而严格	生存能力增强(若边界模糊,则生存能力减弱)
外部联系	与有权势的网络外成员联系密切	若边界遭到削弱,则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增加(实施内部集体控制,可缓解上述后果)
网络维持	隐匿资源	生存能力增强(若资源控制力下降,则生存能力减弱)
网络维持	强化资源供给	生存能力增强(若与资源的联系下降,则生存能力减弱)
网络维持	增加可利用的资源	生存能力增强(若资源减少,则生存能力减弱)
内部关系	网络吸引力增强	生存能力增强(若吸引力下降,则生存能力减弱)
内部关系	成员关系平等化	生存能力增强(若不平等增强,则生存能力减弱)
内部关系	形成小圈子	生存能力减弱,除非小圈子与网络的整体运作隔离
内部关系	形成卡理斯玛型权力中心	短期生存能力增强,长期不稳定性增加
内部关系	网络激励机制在强制、资本、信义之间转换	影响了信任网络应对与之抗衡的强制、变动不居的环境或外部资源萎缩、意识形态纷争等的的能力

就当今世界的跨国移民潮而言,移民是必定要与政府打交道的,但是,移民群体所呈现出的各种突出变化,主要还是由群体成员与成员之间、成员与前后不同环境之间的交互行为决定的。鉴于以往在东欧的遭遇,约翰斯顿的犹太人几乎无人重归故里,而 they 与故国的联系也主要是从那里招揽新的移民。不过,许许多多的跨国移民潮都呈现出了原初地与目的地之间双向流动的态势,这种双向流动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信任网络发生内部转型。

本章随后将澄清表格中未予确证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在部分或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信任网络也有可能发生各种重大变化。第二,信任网络各个要素——外部联系、网络边界、网络维

持和内部关系——的相互分离为理解上述变化提供了一个简化的框架。第三，对表 3.1 中广泛涉及的因果关系进一步予以阐释：譬如，强化信任网络的边界则网络生存能力随之增强，信任网络控制网络隐匿资源的能力下降则网络生存能力随之减弱，以及诸如此类的观点。本章有关移民链、贸易离散社群和理念村(intentional communities)的扩展研究，将为上述观点的论证提供支持。

移民与信任的故事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喧闹的一天，我和路易丝·蒂利(Louise Tilly)以及我们的孩子拜访皮埃蒙特山村，路易丝的父亲赫克托·奥迪诺(Hector Audino)就是从那儿移民到美国、在纽约的餐饮行业干了半辈子的。我们没有皮埃蒙特式的姓名，意大利语也说得磕磕巴巴，甚至完全不懂当地的皮埃蒙特语*。但是，当地的亲戚和教区牧师仍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就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他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我们到本村的墓地(campo santo)拜谒先祖——每一座墓前的墓碑上都刻着姓名并镶着一张椭圆形的照片，然后向我们介绍每一个人的生平及其撒手人寰的经过。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仪式把我们引入到一个以家族和地区为基础的信任网络之中。

我们很快就见到了我的岳父——当地的美国人(Americani)。他曾一贫如洗地远赴美国，在纽约的餐饮行业工作，挣下了数目可观的一笔钱，并在纽约购置了资产。如今，他退休了，回到故乡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这次会面勾起了我岳父对一些返乡移民的愤怒记忆：那些人背叛了信任网络，将用于支持纽约地方事业——包括我岳父一度拥护的

* 皮埃蒙特语：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地区的地方语，属于拉丁语的分支——罗曼语族。1981年被欧盟第4745号决议列为受到法律保护的少数人语种。——译者注

激进政治——的捐款卷走外逃。一条贯通皮埃蒙特山村居民和他们在纽约的意大利街坊之间的联系链，同时使链条两端的社群及其相互纽带发生着转型。

即使当移民链中的大多数移民都已抵达美国或加拿大之后，相同的情节仍在北美的历史中回荡：^[2]在移民的出发地，信任网络挑选个人和家庭远赴目的地；在移民途中，信任网络向他们提供信息和资金；在移民的目的地，信任网络为他们提供联系保障。与此同时，信任网络的自身结构也基于其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而发生了变化。

以 19 世纪早期信义宗* 移民从波美拉尼亚向当时还是美国边区的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 移民为例。1817 年后，随着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将信义宗教会和归正宗教会合并为一个联合的福音派教会(United Evangelical Church)，信义宗顽固分子便开始了那场最终为其赢得老信义宗(Old Lutheran)之名的抗争。一些老信义宗教徒提议，以移民作为对宗教专制的最好响应。1839 年，第一批有组织的移民团体离开汉堡前往北美，从那时起直到 1854 年，约有 5 000 名老信义宗教徒移民到了美国(Kamphoefner, Helbich, and Sommer 1991:301)。在 1839 年的一组移民中，有一位名叫约翰·卡尔·威廉·普里茨拉夫(Johan Carl Wilhelm Pritzlaff)的牧羊人，此人后来成长为密尔沃基的富裕商人——约翰·普里茨拉夫(John Pritzlaff)，并以昵称“卡尔”闻名故里。不过，直到 1842 年时，普里茨拉夫还在伊利运河和宾夕法尼亚州打短工，在挣足了车马费后乘船从伊利运河到布法罗、再经五大湖最后抵

* 信义宗(Lutheran)：又称“路德会”，源于 16 世纪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因宣扬路德学说和“因信称义”而得名。归正宗(Reformed)：又称“加尔文宗”，源于 16 世纪初瑞士神学家慈运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 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后将加尔文的宗教思想奉为圭臬。1529 年，慈运理和马丁·路德在德国马尔堡因圣餐礼等问题发生分歧，信义宗和归正宗自此分道扬镳。——译者注

** 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中欧旧地名，位于德国和波兰北部沿海地区，曾为波美拉尼亚公爵的采邑，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并入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1945 年后以奥德河为界分别归属德国和波兰两国。密尔沃基(Milwaukee)：威斯康星州最大城市，1846 年建市。威斯康星州：1783 年归属美国、1836 年设立边地、1848 年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第 30 个州。——译者注

达密尔沃基。

普里茨拉夫在密尔沃基扎下根来，他替农场打工、为汽船做饭，还受雇当过伐木工人。1843年，他在密尔沃基的一家五金商店谋得店员的职位，这份工作为他后半辈子的商业生涯打开了局面。那一年，普里茨拉夫给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家人写了一封信：

假使[弟弟和妹妹]海因里希和伊丽莎白也能来这儿，那我该有多高兴啊！对他们来说，即便移民与良心无关，毕竟能给他们一个好前程。如果说移民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这不是什么罪过，我们不应该感到害怕。既然大地归于主、是上帝对人的恩赐，那么，人就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我满心盼望亲爱的妈妈也能来这儿，但愿有这个可能！我相信自己有能力照顾她，这是作儿子的责任，亲爱的主会因此赐我恩典。如果明年夏天有人移民，而妈妈或海因里希和伊丽莎白也打算一同来，那么，我就请人贴补他们一些钱以便关照，我很乐意保证在这儿把钱还给他们——尤其是倘若凯德克和牧羊师傅旺格林能来。如果妈妈坚持不来，我请求她不要让她孩子回去，想想那曾套在我们脖子上的重轭，想想我们在这里享受的光辉自由吧！（Kamphoefner, Helbich, and Sommer 1991:301）

在那个时代，普里茨拉夫不必冒险向波美拉尼亚老家寄钱，相反，他凭借自己的良好声誉通过老家的关系筹措必要的资金。与阿根廷和约翰斯顿的例子相仿，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再次见证了行动中的移民链，同时也见证了信任网络中移民链的运作过程及其结构在运作过程中的变化。此外，我们还特别见识了成功的移民链所应当具有的某种结构——该结构使移民链得以更加便利地获得来自目的地的新资源的持续供给。从密尔沃基挣得的每一分钱，都加快了人们离开波美拉尼亚的

速度。在这个以及与之相似的许多例子中，目的地的薪酬和待遇被用来供养出发地的既有社会纽带，而这些纽带又进一步推动了此后的移民进程。外部联系、网络边界、网络维持和内部关系，就是像这样相互串联地发生着变化。

带有宗教色彩的信任网络同时对大西洋两岸产生影响，并深深地改变了作为移民出发地的欧洲的宗教信仰及其实践活动。从瑞典中部的赖特维克*教区到明尼苏达州乡村地区，罗伯特·奥斯特格林(Robert Ostergren)对其间的移民和交往活动所作的一丝不苟的追踪研究，证实了移民链的双向影响。在1865年至1885年间，一条移民链从赖特维克一直延伸到明尼苏达州中部的圣柯罗克斯(St. Croix)和朗姆河谷(Rum River Valley)地区，引领了大约1600名瑞典人进入明尼苏达州。赖特维克移民不仅包含了一个又一个核心家庭，而且还吸收了当地为数不多的几个家族网络——这与我们所预想的移民链的机制相吻合。

在相当高的程度上，明尼苏达州的移民家庭保持着原有的亲属关系，甚至将他们在瑞典的邻里方位也照搬了过来(Ostergren 1988:184—185)。在1885年后，尽管移民的速度明显放缓，但是，在赖特维克和它的明尼苏达分部之间，旅行和交往活动仍然一如既往。此外，由于在数十年间移民链两端的社区都保持着大致相同的农业形式，因此，两端的网络具有大致相同的外部联系、网络边界、网络维持及内部关系。

从民间宗教活动(popular religion)中，同样可以看出跨洋网络的影响。明尼苏达州的瑞典人大多恪守信义宗或浸信宗(Baptist)——尽管其中又分成了许多派别。19世纪80年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传教士开始在赖特维克的移民聚居区传教，他们争取到了大量皈依者，同时，一名移民美国的妇女退还了一片土地，赖特维克据此设立了基督复临安

* 赖特维克(Rättvik): 现为瑞典中部达拉纳省(Dalarna County)的一个自治市。——译者注

**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 1863年创立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基督教组织，其神学主张与福音派相近，以预言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日期而闻名。——译者注

息日会的分支机构(Ostergren 1988:306)。其他诸如此类的福音派宗教团体也同样对移民的故乡产生了影响：

在伊善提县*的雅典居民与厄沃—耶德舍村(övre Gärdsjö village)的布道团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强大联系。它最迷人的迹象表现为:在1910年后的若干年里,耶德舍村的布道团教堂与雅典镇区的信义宗教堂装饰着同样的圣坛壁画。这显然是移民社区跨越大西洋影响故乡社区所致。1909年前后,雅典的教堂普遍采用了一名美籍挪威裔画家、设计家兼教堂陈设经销商奥古斯特·克拉格斯塔德(August Klagstad)的圣坛壁画,而此人的作品曾大量出现在美国中西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教堂。这些作品给瑞典移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将此印象带回瑞典家乡,数年后耶德舍村的布道团教堂便有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壁画——尽管它们大多出自当地艺术家之手。这件事着实引人注目,它与其他许许多多迹象一同表明:在移民链所衔接的宗族集团之间,确实存在着思想和文化的交互影响,而这条平稳的大西洋上的交流之路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Ostergren 1988:306—307)

对于赖特维克及其明尼苏达州中部的移民定居点来说,奥斯特格林的卓越分析并未全面揭示构成这种相互影响的所有交互行为。不过,他无疑阐明了这种影响是双向运作的,它不因亲属纽带和邻里纽带的变化而轻易改变,不因移民速度的放缓而渐次幻灭,同时对大西洋两岸的日常行为产生影响。我们再一次见证了信任网络是如何自我繁衍的,是如何在自我繁衍的过程中自我改变的。

* 伊善提县(Isanti County):美国明尼苏达州东部的一个县。——译者注

今天的移民链

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对墨西哥乡村和纽约市之间的移民潮进行了长期而密切的研究,他向我们揭示了信任网络的变化是如何形成的。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普埃布拉州(Puebla)的提考尼(Ticuaní)开始出现流向纽约的移民潮,并在70年代时呈现出加速增长的势头。截至2000年,在土生土长的提考尼人中,大约有1800人留在原籍,而另外的2700人则移居到了纽约。不过,许多定居纽约——包括出生在纽约——的提考尼人仍然频繁地回到墨西哥,并在那里度过他们的大部分时光。纽约的微薄收入至少可以让在墨西哥的生活衣食无忧。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提考尼的纽约人开始承担建设家乡的义务——他们称之为家务事(*faenas*),其主要方式是通过强大的纽约提考尼移民委员会向墨西哥捐款:

在该镇饮用水工程所需的15万美元建设资金中,有超过10万美元是从居住在纽约的提考尼人中筹得的,这笔款项超过了墨西哥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拨款金额的总和。筹款工作由纽约的提考尼移民委员会承担:经委员会审核,被核定具有支付能力的每一户家庭都应当为这项工程支付300美元的“合作”款项——这被称为“税”。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的家庭,将被警告不为其开通提考尼的水源。几乎所有在纽约和提考尼的家庭都支付了这笔款项,包括那些超过30年没有回过提考尼的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提考尼却长在墨西哥其他地区的人。另外有28户家庭应当支付而未支付这笔款项,这些人属于当地精英,他们受一名 *cacique* 或曰政治老大(*political boss*)的指使,旨在以此对抗委

员会在捐款方面所享有的权威。(Smith 2000:212)

由此可见，纽约提考尼移民委员会正在销蚀旧的地方势力结构，并将移民所构筑的各种信任网络转变成为一个合作机构。

在纽约工作的提考尼人给家乡亲人汇款、在提考尼兴建度假屋、回到提考尼后参加当地的公共活动、移民(无论是否返乡)直接介入提考尼的政治生活、在提考尼形成了青年纽约“粉丝”帮，以及将纽约出生的孩子托付给墨西哥的祖母照看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实现社会结构——连接着普埃布拉州和纽约市——的转型。这些变化具有三个方面的后果：

- 深刻地改变了提考尼的权力和财富组织；
- 重塑了在纽约和提考尼两地的提考尼人的生活；
- 创立了新型的跨国信任网络。

倘若不是源源不断地从纽约的工作中获取了微薄收入，这个持续变化的系统就可能面临瓦解。而正是得益于这些收入资源、得益于双向流动的新一代移民，提考尼人和外人之间的边界得以维持，跨边界的外部联系得以在美国和墨西哥建立，网络中与纽约提考尼人的社群联系更为紧密的部分得以不断突显出来。从中期效果而言，这个可谓取得了部分成功的移民链，着实强化了信任网络核心部分的生存能力。

就其长期发展而言，我们可以推测墨西哥移民在纽约获得成功，将扩大既有信任网络的内部差异，将提高移民对竞争性项目的参与，将降低移民及其后代对提考尼事务的参与和奉献，并将最终危及信任网络本身。当然，他们也可能与不同的移民团体建立多重的外部联系，并逐步消除网络边界、降低对网络维持手段的集体控制、消解网络的内部关系。若能如此，则提考尼人的跨国信任网络或可保有其生命力。

贸易离散社群

与其他信任网络一样，贸易离散社群*也常常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信任网络的内部转型。“离散社群”一词源于希腊语，是指犹如种子一般散落四处之人。不过，这个隐喻一定程度上让人误解：似乎这些种子将基于所散落的土地状况而自生自灭。由宗教、语言、血缘和(或)乡亲所构筑的远距离贸易网络，它在贵重货物的运输方面已发挥突出作用达千年之久。贸易离散社群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是因为其成员能够超越漫长的地理空间彼此保持联系。他们更愿意借助先前已经建立的关系(或与第三方的关系)提供信贷、握手成交、收发贵重货物，以及针对不具有或很少具有正式组织形式的复杂事业开展合作。假如没有信任网络，他们将一事无成。

贸易离散社群大多分布在形同飞地的移民聚居区，甚至常常建构于最初的移民链网络之上。但是，就整体而言，与移民链网络相比，贸易离散社群的联系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各种联系的相互转换更加快捷，资源供给方式的转变更加便利，内部结构的短期变化也更加频繁。此外，还有一点为移民链所不及，即贸易离散社群大多与贸易沿途及其目的地的政府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离散社群与政权的关系具有以下若干典型形式：从获得地方掌权者的庇护，到对现政权实行规避型遵从，再到由政府直接提供许可和资助等，不一而足。就此而言，贸易离散社群的内部结构变化，足以与移民网络形成鲜明对照。

从城市和城邦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追溯种族或宗教的贸易离散

* 贸易离散社群(trade diasporas)：离散社群(diaspora)原指四处散居的犹太人，后来泛指“定居在远离先人故地的人群”，人类学家阿波纳·科恩(Abner Cohen)将其定义为“具有相互依赖的社会性，而在空间上彼此分离的民族(nation)”。离散社群是嵌入寄居地社会的临时性或永久性人际网络，他们拥有自我认同的文化，往往独立于所寄居的社会之外。因贸易关系而形成的此类人际网络被称为“贸易离散社群”。——译者注

社群的源头。例如，被考古学家称为 B2 代的土耳其哈奇纳比遗址 (Hacinebi Tepe)，便可向上追溯至公元前 3700 年至公元前 3300 年。该遗址位于安纳托利亚南部托鲁斯山脉* 的皮埃蒙特地区，毗邻幼发拉底河最北端的航道，与下游 700 英里处的乌鲁克城** 有水路联系。考古发现证实，B2 代时期有一定数量的乌鲁克贸易侨民移居于此。源于两河流域的陶器、建筑、邮戳、珠宝、工具以及柏油(沥青)，即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Stein 1999:139—145)。

乌鲁克商人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接收封装好的货物，然后将货物运抵安纳托利亚南部的铜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也可能将木材、黄金和宝石矿运回美索不达米亚(Stein 1999:157)。由于逆流航行花费的时间远远超出了顺流而下，因此，安纳托利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商人几乎总是将具有很高价值的大宗商品销往家乡。在哈奇纳比，在人口中居于多数的安纳托利亚人与居于少数的美索不达米亚侨居者毗邻而居，双方保持着相似的文化样式，这一状况至少延续了两个世纪(Stein 1999:166)。总之，有确切的证据证实，在约 6 000 年前就已存在了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分明确边界的贸易离散社群。

有关哈奇纳比贸易信任网络的证据，由于完全是由残留的物证构成的，因而无法揭示网络中动态的人际交往状况。但是，从那时起，尚无法获得国家军队保护的远距离贸易商人，就已开始以同一地区、同一种族或同一家乡作为认同标准，不间断地创建着贸易离散社群。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海南人(Hainanese)、福建人(Fukienese)、汕头人(Swatowese)、广东人(Cantonese)、古吉拉特人(Gujaratis)、泰米尔人(Tamils)、阿拉伯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黎巴嫩人，最终都构建了时

* 安纳托利亚(Anatolia)：又称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亚洲西南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半岛，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托鲁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边缘，东起埃伊尔迪尔湖，西抵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是土耳其中南部的主要山脉。——译者注

** 乌鲁克(Uruk)：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两河文明)时期苏美尔(Sumer)和巴比伦尼亚(Babylonia)的城邦，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和底格里斯河西岸，面积约 6 平方公里，是当时最大的城市。1849 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乌鲁克遗址。——译者注

间上延续数个世纪、空间上延伸至他们所知的每一个角落的庞大贸易信任网络(Chaliand and Rageau 1997, Mauro 1990)。诚如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所说的,

每一块大陆都能找到这样的商人贸易社群:它们生存于相互协作的侨民网络之中,它们起源于城市生活的开端。它们……是历时久远的人类制度中波及范围最广的制度之一,几乎涵盖了从农业起源到工业革命爆发之间的漫长人类历史。17世纪至19世纪非洲的贸易社群为其运作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此外,还有一些事例可以与腓尼基和希腊的贸易城镇链相媲美:例如,在从累范特*或爱琴海沿岸向西延伸出贸易城镇链之后大约两千年,从科隆至莱茵河沿岸、再向东延伸至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人们,建立了由独立的贸易城镇构成的汉莎同盟。(Curtin 1984:3)

总体说来,贸易离散社群是通过对涉及获取贵重货物的运输、通讯和信贷系统的联合控制,从而确立自己优势的。与链状的移民网络不同,贸易离散社群必须在自己的网络之外寻求有益的联系,在货物销售地尤其如此。约翰斯顿的犹太商人从一开始就将他们在东欧所形成的与天主教徒的关系移植到了工业化时代的美国。相比之下,贸易离散社群的商人同样通过语言的多样化和知识的多元化嵌入其他文化之中,并通过与自己未必喜欢的客户建立联系进而与整个世界相沟通。由此所导致的后果是,贸易离散社群的内部结构和地理分布格局不断地为应对新的商业机会而发生着变化。

柯廷向我们讲述了有关豪萨(Hausa, 即加纳)地区阿萨利(asali)的生

* 累范特(Levant):指安纳托利亚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地中海东岸、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区域,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阿拉伯商人将东方的货物运抵累范特,再由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转运至欧洲各地。——译者注

动事例。所谓阿萨利，是指由来自同一个(往往是遥远的)地区的、不与外界通婚的人群所组成的有边界的社群。豪萨兰*的阿萨利突出地展现了贸易信任网络所具有的适应性和持续性：

豪萨兰的阿萨利不一定是商业性质的，但是，其中三个商业导向的阿萨利控制了往返于沃尔塔盆地(Volta Basin)可乐树林沿线的贸易。这三个阿萨利都吸收了豪萨文化、成为了豪萨人，但是，其源头均可追溯至北方沙漠的尽头，这再次突显了萨赫勒**在非洲商业起源中的重要地位。阿萨利的名称也透露了它们的来源：其中一个名为“Kambarin Beriberi”，豪萨语的意思是“博尔诺的商人”，这个阿萨利实际上就来自博尔诺***；另一个名为“Tokarawa”，豪萨语的意思是“从沙漠边缘的图瓦雷克****社群向北迁徙的贱民”。第三个阿萨利名为“Agalawa”，同样源于所谓的图瓦雷克贱民，但名称中含有“南方人”之意——或许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图瓦雷克商业网络的南部边缘，这个阿萨利曾经是从北方沙漠向南迁徙至豪萨兰的图瓦雷克贸易离散社群的一支。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阿萨利都是“嵌入”豪萨兰的贸易离散社群，它们最初是豪萨兰的侨民，随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向外延伸的社群网点，成为了从豪萨兰向外拓展的新的贸易离散社群。与或许拥有同样机会的其他豪萨人相比，阿萨利的优势在于他们在远距离贸易中形同一家。(Curtin 1984:54)

* 豪萨兰(Hausaland)：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北非洲中部。公元12世纪后期，豪萨人在此建立了多个城邦或王国(史家有“豪萨七邦”之说)，它们拥有共同的语言——豪萨语，并逐渐接受了阿拉伯商人传入的伊斯兰教。——译者注

** 萨赫勒(sahel)：源于阿拉伯语，意为“边缘”。泛指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和非洲中部苏丹草原之间的半干旱草原地带，从大西洋至东部的非洲之角绵延约3800公里。——译者注

*** 博尔诺(Borno)：现为尼日利亚的一个州，首府迈杜古里(Maiduguri)。——译者注

**** 图瓦雷克(Tuareg)：指欧洲殖民之前主要分布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周边地带的一支游牧民族。——译者注

贸易离散社群常常建立广泛的信贷系统。与小规模的零星信贷不同，贸易离散社群的信贷活动通常采用多边往来的形式：商人甲可凭商人乙出具的赔付承诺书或结算账户，从商人丙处购得货物。多边信用体系免除了商人携带现金的风险和负担，同时，也使超越了一定时空限度的交易得以成为可能。例如，立足于穆斯林的“哈瓦拉”^{*}交易体系就不仅将整个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商人连成一体，而且，还极大地减轻了这些地区所输出的劳务工人向老家汇款的负担。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作为恐怖主义网络的基地组织也是利用其分布广泛的哈瓦拉体系筹措资金和开展活动的(Farah 2004:6, 113—120)。当然，除了恐怖主义网络之外，这一穆斯林信用网络着实便利和促进了亚洲、中东和非洲的贸易达数个世纪之久。

以国家武力为后盾的商业股份公司的兴起，最终削弱了远距离贸易离散社群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是，即便如此，贸易离散社群仍然活跃在我们这个时代。以佛得角为例，数个世纪以来有事业心的妇女们一直在非洲群岛和它往昔的宗主国葡萄牙之间经营着商业往来。由于这些妇女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购买货物，越过大海到岛上销售，因此，这个小型商人团体获得了克里奥尔人^{**}的称号：有能力克服障碍、开创新生活的人(rebidantes)。她们中的许多人在佛得角经营日常业务，与此同时，她们的海外关系也为这些生意提供着支持：

这位60岁妇女的情况是：她的亲戚居住在葡萄牙，而她则乐意呆在里斯本历史中心(Lisbon's historic centre)的公寓里。这栋公寓的主要住户，是一群在葡萄牙等地经营草根企业的佛得角妇女，她们享有特殊的身份，并因为不断地飞来飞去而获得了免费

* 哈瓦拉(hawala)：一种完全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商业交易和支付形式，仅凭支付凭证即可完成异地甚至跨国买卖，历史上曾盛行于中东、北非和南亚，并一直延续至今。——译者注

** 克里奥尔人(Creole)：最初特指在西非和佛得角出生的葡萄牙殖民者后代，后被用于泛指出生在殖民地的欧洲人后裔。——译者注

机票。不过,这位妇女可从没打算移民——尽管她的丈夫移民到了荷兰,而是将存款投资到佛得角圣文森特(São Vicente)岛的药房。在那儿他们享有踏实的好名声,生活也较富裕。为了满足年青人日益增长的、对人造珠宝和其他时尚商品的需要,这位妇女开始从事跨国贸易:她从塞内加尔和几内亚购买非洲的衣料和服装,从葡萄牙购买服装和珠宝,从巴西购买女性内衣,偶尔也难得地去趟荷兰——她姐姐住在那儿——购买化妆品。尽管她有美国签证,但她不急于去那儿。她所到访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佛得角小共同体的亲戚和熟人。她一直倾向于——只要有可能——保持自己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只有当她感到不自在(譬如不会说当地话或商业行话)时,才会倚重自己的关系。在美国无法获得这种关系,这是她迄今尚未赴美的唯一障碍。(Marques, Santos, and Araújo 2001:286)

在这些已历时五千余年的系列活动中,这位妇女及其同伴不约而同地创造、运用和改变了信任网络,这些信任网络是围绕着风险不凡而利润不俗的远距离贸易组织起来的。鉴于一些族群——譬如中国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的离散社群维系了数个世纪之久,尽管其商品和地理范围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贸易信任网络比移民信任网络更加短暂或更加特别。与移民链网络一样,只要能够控制集体的外部联系通道、能够控制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边界、能够保持各种手段以维系集体活动,以及能够遏制内部关系的广泛差异化,贸易信任网络就能够一直生存下去。倘若向权威组织或合作机构的方向转型,则信任网络的创造灵活性将日渐销蚀。

理念村

显然,信任网络或是构成或是包含了链状移民网络和贸易离散社

群，相比之下，基于某种理念而设立的分离主义社群则属于信任网络的极端形态：它们在空间上离群索居、在事业上逃避长期责任、在组织上以瑞典移民和豪萨商人闻所未闻的方式进行日常管理。瓦勒度派宗教共同体非常倚重训练有素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巡回牧师周期性地强化信念的工作，但是，即便是瓦勒度教派也不足以被称为理念村。由拥有共同理念的一群人组成的理念村，面对的是所有信任网络都要面对的问题——外部联系、网络边界、网络维持和内部关系。所不同的，只是它所面对的是问题的极端版本(Hechter 1987, Chapter 8)。

尽管长期的政治改革主张或追求某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有时也会促成理念村的形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理念村更多是由分离主义的宗教信仰激发而成的。例如，由贵格派信仰激发而成的理念村，就如是描绘了他们的组织——

这个理念村由相互协作的一群人[志愿]构成，他们共同致力于实现一种“大而全的生活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就此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以下特点：在空间上共同居住，在经济上相互扶持，在社会、文化、教育和精神上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一个理念村至少应由三户家庭或五个成年人构成。(Zablocki 1971:19)

这个理念村拥有共同的信义目标——被清晰地界定为“大而全的生活方式”。与链状移民网络的成员一样，理念村成员的独特经历也使其中的一些人——包括变节分子——愿意吐露他们的历史。

作为外人，我们常常困惑：理念村的成员如何能够忍受大家庭的氛围？理念村如何能够生存和延续？理念村基于何种条件以及通过怎样的过程得以一年又一年地自我繁衍？罗萨贝丝·坎特(Rosabeth Kanter)考察了1787年至1853年间美国的30个“公社”(communes)，并据此接受了上述问题提出的挑战。坎特认为，所谓“公社”是指在空间上离

群索居的志愿性小型社区，它具备以下特征：

- 被确定为一个整体，并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边界；
- 致力于实现它所宣称的价值；
- 建立在信义而非强制基础上的伙伴关系；
- 对成员实施集体控制；
- 主张自主(self-determination)；
- 资源与资金共享。(Kanter 1972:2)

基于坎特提出的上述特征，可见公社既不同于权威组织，又与合作机构存在(不甚清晰的)区别。我们有理由将它划为信任网络的极端形式，它在空间隔绝和日常监督方面与大多数信任网络不同。

在坎特考察的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公社中，有 9 个公社可谓成功，它们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譬如，创建于 1787 年的震教会(Shakers)就一直将公社纪律保持至今。另外的 21 个公社在延续 25 余年之后分崩离析或改弦更张：譬如，小溪农庄(Brook Farm)作为公社从 1841 年延续至 1847 年，随后转变为傅立叶主义的法郎吉*(Fourierist phalanx)，成了不再具有公社式的广泛控制的合作机构。根据坎特所提出的成败标准，震教会是成功的，而小溪农庄失败了。

与本章观点相一致的是，坎特十分强调信义机制——促进团结一致、消除彼此差异、共享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每一个公社都提出了自己的信义机制组合，而信义机制的组合状况与公社的生存机率之间又存在着密切联系。坎特将信义机制界定为个体对集体性事业的奉献，并据此认为以下六种奉献过程对集体的生存至关重要：(1)个体牺牲外部活动；(2)个体放弃外部关系；(3)个体投身内部建设；(4)个体与集

* 法郎吉：又称法伦斯泰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幻想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当时被视为“大脑患病的产物”。——译者注

体融为一体；(5)脱胎换骨(譬如，为了集体所赋予的新身份而放弃自己的旧身份)；(6)追求卓越，即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更强大的力量。信义机制驱动着上述过程的运转。

坎特研究了30个公社的历史，从中总结了大约40种不同的信义机制，经过归纳合并之后，又区分出六种主要的奉献过程。例如，脱胎换骨的过程就包含了思想汇报、相互批评、制裁、精神等级化(spiritual differentiation)以及去个人化(deindividuation)等项内容。根据坎特的分析，有些信义机制驱动着不止一种奉献过程。例如，她认为公社的统一机制既与放弃外部关系的过程有关，又是一项脱胎换骨的过程(Kanter 1972:92, 112)。坎特的论述总体上表明：各种信义机制的相互契合极大地影响了公社内部的生活品质，并最终促成了公社的萎缩、扩展或分裂。

从量化的角度看，信义机制与公社生存能力之间的关系就形同抛物线一般：在达到最高点之前，公社所确立的信义机制越多，其生存能力越强；在越过最高点之后，过多的信义机制更有可能毁掉公社。坎特认为：19世纪的成功公社——

采用了这些信义机制的大部分——但并非全部——内容。每一个团体都在所有可能的方法中进行挑选，并进而组合成一个“信义机制包”以驱动奉献过程。此外，也有一些信义机制是一些团体未采用的：例如，“阿玛纳”(Amana)公社就保留了家庭，而“佐儿”(Zoar)公社并不具有完善的意识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的大多数成功团体都保留了一定的私人空间。公社的所有成员都拥有足够的场地和屋舍，由此营造的是一种围绕公社运转的氛围，而不是紧紧地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尽管空间并不总是完全私人的，但私人可选择的余地较大。事实上，往往是不成功的——而不是成功的——团体热衷于打造

公社大家庭,让所有成员同居共处、生活在一起。当然,这只是不成功的团体在运用一种信义机制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状况,实际上,不成功的团体远远多于成功的团体。(Kanter 1972:132—133)

此外,坎特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悖论:就总体状况而言,与注重实用主义机制的公社相比,注重信念培育的公社在团体的卓越性和卡理斯玛型特质方面更加成功;而与此同时,等级制权威结构的形成以及/或者卡理斯玛型人物的推动,又将进一步强化这种信念。就大多数成功的公社而言,它们通常既设立分享式的民主机制,又将集体的日常活动与卡理斯玛型人物的微观管理(micromanagement)隔离开来(Kanter 1972:92, 116—118)。卡理斯玛似乎有助于提升公社的生存能力,但其前提必须是对它有所抑制。为了解开上述悖论,我们似乎应当区分以下两个过程:即将具有奉献精神的成员引入公社的过程(在此卡理斯玛至关重要),以及与确保公社能够日复一日地生存下去的过程(在此参与、责任和个人的能动性至关重要)。总之,能够成功地在集体活动和扩张性的卡理斯玛之间实现隔离的公社,其日常的运作状况更好。

表 3.2 为我们检视表 3.1 中的观点提供了素材。在表 3.1 中,能够提升信任网络生存能力的变量是:

- 严格边界;
- 隐匿资源;
- 强化资源供给;
- 增加可利用资源;
- 增强网络吸引力;
- 消除或隔离小圈子;
- 出现卡理斯玛型权力中心(短期内可增强生存能力,长期效果则相反)。

表 3.2 1787 年至 1853 年美国成功与不成功公社的信义机制分辨表

成功公社使用下列机制的频率至少是不成功公社的两倍：	
独身或自由恋爱	每日例会
禁欲	歌颂公社
禁止成员居于别处	成员通常不离开公社
上缴财产	与访客的交往有规定
公社向成员分配财产	性关系受到控制
公社配给衣物并安排个人角色	父母与子女隔开
义务劳动制	同一家庭并不同居一处
义务为公社服务	共同的种族背景
劳动成果属于公社所有	新老成员隔开
不向退出者返还财产	宣讲公社学说
不向退出者赔付劳动报酬	例行思想汇报，与会者自我剖析
针对外人制定特殊条款	对成员进行道德区分
视外部世界为邪恶和虚弱	向更高道德标准看齐的制度建构
统一穿戴	领导对群体进行监督
用外语交流	公开揭发反常者
讲俚语、行话和特定的术语	制裁：包括剥夺待遇和禁止参与公社活动
不看外界报纸	
每天 2/3 以上的时间用于与其他成员相处	

资料来源：Kanter 1972:80—112。

就表 3.2 列举的个体信义机制而言，坎特所谓的成功的公社运用它们的频率至少是不成功公社的两倍。例如，在坎特描绘的 9 个成功公社中，有 6 个(占 67%)运用了“公开揭发反常者”；而在她考察的 16 个不成功的公社中，仅有 3 个(占 19%)运用了这项措施。当然，诸如此类的单项比较有可能颠倒因果关系：例如，基于其他原因而延续了较长时间的公社，也都在其日后的发展中采用了揭发制度。此外，这些大多从事农耕活动的公社都隐匿了自己的资源，除所征募的新成员数量之外，其他方面的资源状况均无从获悉。因此，当我们试图进行横截面比较分析时，对于结论应当十分谨慎。

尽管存在各种差异，但信义机制列表却显现出了一个总体的方向。

在严格内外边界方面，成功的公社更加频繁地采用了某些机制，譬如最典型的机制包括：针对外人的特殊规定、有关外部世界邪恶的说法、统一服饰、用行话或外语交流、不看外界的报纸，以及将新老成员彼此隔开。在限制对外联系方面，相应的典型机制包括：禁止成员居于别处、财产上缴公社、公社配给义务和个人角色，以及限制与非公社人员的交往。在实施内部控制方面，相应的机制可以大致分为平等化、社会主义化、集体监控，以及防范小圈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坎特所说的“生存”(survival)理解为我们所说的“生存能力”(viability)，而坎特对19世纪美国公社的研究，实则证实了本书在论述信任网络的内部变化是如何影响其生存能力时所提出的观点。最大的疑惑源于卡理斯玛：它到底是美酒还是毒药？答案或许如坎特所言：任何一种取向都取决于环境。

本杰明·扎布洛茨基(Benjamin Zablocki)对20世纪的美国公社所作的两份研究，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地推动和完善由坎特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20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期间，扎布洛茨基参与或帮助建立了若干公社，随后他对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和纽约的三个公社联盟——Brudershof* 或兄弟社(Society of Brothers)——进行了颇为专业的民族志研究。1920年，第一个兄弟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喧嚣的德国成立，该社成员持激进的再洗礼派**信仰。

1931年，德国兄弟社与加拿大和美国的再洗礼派分支组织——胡特尔派(Hutterian)建立联系，并大量借鉴了后者的做法。1935年，随着德国兄弟社创始人埃伯哈德·阿诺尔德(Eberhard Arnold)的去世，一批兄弟社成员挥师英伦，而当纳粹在1937年取缔德国兄弟社时，流亡的成员便只能投身于设在英国的兄弟社了。1940年，随着战争的爆发

* Brudershof: 源于德语，意为“兄弟”。——译者注

** 再洗礼派(Anabaptist Christianity): 又称“重浸派”、“重洗派”或“极端改革运动”，是从瑞士神学家慈运理所领导的宗教改革中分离出的一个基督教派，被后世称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左翼”。——译者注

以及英国对德国人实施战时拘留，兄弟社开始着手在加拿大和美国另起炉灶；但是最终，他们来到了巴拉圭，那是唯一允许他们入境的国家。

在经历了巴拉圭的艰难岁月后，兄弟社与北美的胡特尔派断绝了关系(1950年)，随后建立了自己在北美的分支机构(1954年)。纽约的兄弟社——木冠公社(Woodcrest)——不仅从巴拉圭调来部分成员，而且，还从纽约州的许多公社中接收分离的新成员。后者中的一支为兄弟社带来了未来的主要收入来源——一个名为“康妙体”^{*}(Community Playthings)的玩具生产企业。与坎特所研究的19世纪农耕型公社不同，兄弟社拥有了商业性的可持续资源。

扎布洛茨基集中对木冠公社进行了研究。在扎布洛茨基开始研究的1965年，木冠公社中的大部分成员是社龄不到10年的皈依者。不过，木冠公社从20世纪20年代延续下来，且部分成员从那时起就一直归属于公社，仅这一点就很符合坎特的成功标准：成功的公社应至少生存25年以上。实际上，木冠公社实施的大部分信义维持机制都在坎特所列举的成功公社的机制范围之列：对外部联系实行集体控制，对边界进行划分和强化，平等化，社会化，全面监控，以及防范小圈子的形成并借此规范内部关系。扎布洛茨基论述道：在理论上，

人们可以在兄弟社过一辈子而无须花一分钱，除非他承担了一份需要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工作。衣、食、住以及所有的物质需求，都是由公社免费提供的。个人必须承担公社委派的任何工作。这就是兄弟社所有成年居民——成员、新成员甚至包括短期访客——的真实情况。但是，只有兄弟社的正式成员才向集体上缴个人的全部财产。当一个人受洗立誓之时，他就将自己的一

^{*} 公司名为译者音译。相关资料可参阅公司网站 <http://www.communityplaythings.com>。
——译者注

切永远地交给了集体。无论是自愿退出还是被开除,他都没有权利索回。哪怕是最细小的私人财产都不能留!但是,这一条款在兄弟社从未落实,与一些地方的僧侣不同,兄弟社的成员不必说“我们”的杯子、“我们”的牙刷。(Zablocki 1971:114)

此番描述无异于是对坎特所列举的信义机制的描摹。此外,它还特别提示了对反常行为的正式制裁。实际上,兄弟会强行采取分级排斥的方法——从警告、某种程度的禁闭到开除(Zablocki 1971, Chapter 5)——无疑明确而有效地控制了网络的外部联系、边界和内部关系。此外,借助“康妙体”玩具公司,兄弟会既确保了稳定的资源,又无须令其成员裹挟于危险的外部世界之中。

在第二份更加雄心勃勃的研究中,扎布洛茨基撷取了 120 个公社样本:范围涉及美国 12 个地区,每个地区 10 个样本,乡村和都市各占一半。这些公社都是 1975 年后成立的,其运作时间被设定为 1965 年至 1975 年间。这些公社中有 50 个一直延续至 1978 年,这也就意味着另外 70 个公社——38 个乡村公社和 32 个城市公社——未等研究结束即已解散。针对这 70 个失败的公社,表 3.3 将其成员所宣称的解散原因部分归纳如下:

表 3.3 公社成员视野中的失败原因

原 因	在乡村公社 中所占比例	在城市公社 中所占比例	在全部公社 中所占比例
外部因素			
法律和官方因素	10.5	3.1	7.1
公共功能/行为	10.5	0	5.7
环境、灾祸	5.3	3.1	4.3
组织发起者的政策	2.6	9.4	5.7
内部因素			
健康与安全	5.3	3.1	4.3
经济失灵	0	3.1	1.4

续表

原 因	在乡村公社 中所占比例	在城市公社 中所占比例	在全部公社 中所占比例
意识形态分裂、争论	7.9	9.4	8.6
丧失意识形态的明确性	10.5	21.9	15.7
领导与成员发生权力和影响力 之争	31.6	15.6	24.3
两性关系	10.5	12.5	11.4
个人兴趣	5.3	18.8	11.4
合计	100.0	100.0	99.9
N	38	32	70

资料来源：改编自 Zablocki 1980: 153。

尽管乡村公社的前成员们更多地将失败归咎为外部压力所致，但就实际情形而言，无论城市公社还是乡村公社，失败的原因都主要源于内部。公社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明确性，以及公社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些都是迈向失败的先声。显然，它们破坏了坎特所说的作为公社之基础的信义机制。扎布洛茨基的研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坎特。譬如，他认为，从较高的层次看，只要有新的成员不断加入，成员更替就不至于威胁公社的生存。成员更替的状况取决于组织的三个特性，扎布洛茨基称之为“决策理性度”(rationality in decision-making)、“对偶向心度”(dyadic cathexis)和“对偶离心度”(dyadic partiality)。

决策理性度：公共理性因地制宜地在集体决策中发挥作用。

对偶向心度或爱的密度：公社中由爱所凝聚的社会人际密度，也就是能够促使公社成员两两之间相互融合的积极效力。

对偶离心度：促使公社成员两两之间建立额外的特殊关系的效力。

与我们的直觉相反，决策理性度和对偶向心度都预示着伙伴关系的积极更替，而对偶离心度则指向了相反的方向(Zablocki 1980:155—162)。

我们不妨超出扎布洛茨基的陈述，大胆地作出如下判断：当公社形

成了一个爱的核心圈，并强力执行它所公示的规则时，处在核心关系圈以外的成员则趋于退出。我们不难想象他们的感受——圈内人利用专断的规则任意驱使着他们。倘若公社成员能够建立两两之间的特殊关系，则圈外成员更有可能留在公社内。卡理斯玛型领袖的出现是对上述效应的遏制，尤其是因为他呈现出高密度的爱，从而将成员更替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卡理斯玛通常给公社带来风险：一个有影响力的领袖容易与先前树立的道德规范发生碰撞，并由此而引发危机。倘若卡理斯玛不能卓有成效地消除公社所面临的新压力，则将失去人们对他的信任(Zablocki 1980:322—334)。

扎布洛茨基总结道：

无论是卡理斯玛型领袖还是公社的持久存在都能增加公社的稳定性。但即便如此，这种稳定仍无法以降低对偶向心度的方式获得。这与我们对历史上的公社——如福音对照会(Harmonists)、震教会、性自由会(Oneidans)和兄弟社——的了解相吻合。这些组织的成功应归于对偶向心度的畅达，而非它的衰退或消亡。(Zablocki 1980:165)

用我们在这一章中的话说，“对偶向心度的畅达”取决于对成员外部联系的控制、对我们与他们之间边界的强化，以及人际吸引力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相互平衡。更加精确地说，取决于对维系公社集体活动的各项资源的稳定控制。

请注意，本章在检视信任网络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与我们对物理上相邻关系的直觉认识相反，信任网络的生长与壮大是不受制于时空的。从失败的理念村中可以看出，有太多近在咫尺的人和事足以毁掉信任网络。沟通可促进团结，但沟通并不依赖于面对面的联系。移民们的信件跨越了遥远的时间和距离，却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彼此间的合作和亲密关系。就此而言，信任网络中人际关系的质量、结构和动

力才真正要紧。

移民链、贸易离散社群和理念村的相关资料已证实：信任网络的内部机制对其生存、转型和崩溃至为重要，对保持信任网络相对于统治者和政权的独立性至为重要。与此同时，资源汲取、外部联系以及与公共政治的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也能导致信任网络的运作方式发生转变，并随之关系到信任网络的生死存亡。当然，信任网络也能增强其内部的动力和活力，特别是建立各种机制强化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边界、维护隐匿资源的集体控制、实现网络中资源的再分配、提升网络成员的相互吸引力、限制小圈子之衍生，以及在集体活动与卡理斯玛的短期成效之间进行隔离。倘若上述机制疲软衰颓，信任网络亦难以为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进而直面信任网络与——包括政权在内的——外部掠夺者的对决了。

注释：

[1] Bodnar 1985, Borges 2003, Cordero-Guzmán, Smith and Grosfoguel 2001, Fussell and Massey 2004, Green 2002, Grimson 1999, Hagan and Ebaugh 2003, Hoerder and Moch 1996, Kamphoefner 1987, Massey et al. 1998, Moch 2003, Poros 2001, Portes and Rumbaut 2001, Roberts and Morris 2003, Sanders 2002, Smith 2000, 2005, Tilly 1990, 2000, Van Wey 2004.

[2] Anderson 1974, Bodnar 1985, Light and Bonacich 1988, Portes 1995, 1996, Portes and Rumbaut 1990, 2001, Reitz and Sklar 1997, Waldinger 1996, Waldinger and Bozorgmehr 1996.

第四章

信任网络对掠夺者的抵抗

大约 1682 年，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出生于威尔士的西哈弗福德镇(Haverford West)——搭乘一艘商船驶入爱尔兰海。到 1791 年时，他已是往返于大西洋上的一艘贩奴船的大副，那一年他 37 岁。就在同年 6 月，贩奴船上的威尔士船员伙同前任高级船员豪厄尔·戴维斯(Howell Davis)——此人已于 1718 年加入海盗——劫持了船只，罗伯茨随之入伙。戴维斯的这个团伙，包括罗伯茨在内，行走于黑白两道之间：当一年的海盗(即以劫掠商船、货物甚至船员的方式营利)和武装商船(即获得政府许可劫掠敌国船只为生)，再做一年正经买卖，如是交替循环。不过，戴维斯的花样最终弄巧成拙：普林西比*殖民地的葡萄牙民兵得到可靠情报，称戴维斯正计划绑架总督。于是，葡萄牙人精心设下埋伏并杀死了戴维斯。

海盗们群龙无首、无以为继，只好聚在一起喝酒抽烟，商量着由谁当老大。在 1724 年出版的那本有声有色的《海盗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中，丹尼尔·笛福**以一位海盗高级船员洛德·丹尼斯(Lord Dennis)的口吻，记载了如下一番话：

* 普林西比(Principé)：非洲中西部几内亚湾的一个岛屿，葡萄牙殖民者于 1472 年在此建立殖民地，利用奴隶使之成为非洲最重要的砂糖出口基地。1975 年独立后成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译者注

**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 年)：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以其代表作《鲁宾逊漂流记》闻名于世。——译者注

我们都听到过他的主张,说老大就应当随心所欲、随时随地打破常规。他怎么死了呢?他的死给继任者留下一个警告:任何形式的想当然都是致命的。不管怎么说,我的意见是,趁我们现在还冷静,我们要选定一个有勇气的人,一个航海的行家里手,他的决断和勇气足以保卫我们的共同财富,保护我们免遭危险和不稳定因素的困扰,使我们不至于陷入致命的无政府状态。在我看来,罗伯茨(Roberts)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真正的伙伴!我认为他值得大家尊敬和喜爱。(Defoe 1999:194—195;本书最初托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船长之名发表,鉴于书中驾轻就熟的海盗行话,学者们至今仍对真正的作者是笛福还是约翰逊存有争论,参见 Cordingly 1995:xix-xx)

残余的海盗正式推举罗伯茨掌管他们的公共财富。他们炮击了普林西比要塞,随后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上。

罗伯茨船长很快更名为巴塞洛缪(Bartholomew),并以其残酷无情获得了“黑男爵”的绰号。此外,他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时常身穿猩红色的缎子套装,三角帽上插着一根红色翎毛,脖子上的黄金项链吊着钻石镶嵌的十字架。在近三年的时间里,“黑男爵”极大地威胁着巴西至纽芬兰的海上贸易,还常常作出把马提尼克*的总督吊死在官船桅杆上之类的壮举。法国、英国及各个殖民地的政府都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以期彻底剿杀“黑男爵”。1722年2月10日,英国“吞噬”(Swallow)号军舰在返回西非途中,发现罗伯茨的海盗船抛锚于加蓬的利伯维尔(Cape Lopez)一带。海盗船试图在“电闪雷鸣和小型龙卷风”中逃逸,被“吞噬”号击中侧舷,罗伯茨当场身亡(Cordingly 1995:215)。

在罗伯茨统领这个海盗团伙期间,他推行了异常严格的帮规。

* 马提尼克(Martinique):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屿,1946年被列为法国的海外省,1982年成为法国的海外地区。——译者注

“黑男爵”大多时候喝茶，同时也极力要求其下属提高警惕。表 4.1 展示了他的这套帮规。显然，这套帮规混杂了等级制、平等化和纪律性，与本章的标题——信任网络对掠夺者的抵抗——相映成趣。就掠夺者而言，他们有时也会构建出某种类型的信任网络，而此类信任网络又会构建出联合团体，并以此对其他同类的网络进行掠夺。海盗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歹徒集团。武装商船之所以摇身一变能成海盗船，雇佣兵

表 4.1 巴塞洛缪·罗伯茨的海盗帮规(1719—1722 年)

-
1. 人人享有重大事务的平等表决权,对任何时候缴获的时鲜物资或烈酒均享有同等的分配份额,并可用之于个人享乐;若出现供应短缺,为保证公共之用途,经全体表决后可限制个人消费。
 2. 依名单安排每人轮流看管战利品,由于公共物品超出个人应得之份额,因此,看管人除换洗衣服外不得携带其余物件。若看管人欺瞒组织私吞一丝一毫之金银餐具、珠宝或钱财,则将遭流放孤岛之处罚。若有人抢夺同伴之财物,则将被割去耳鼻、驱逐于蛮荒之地并确保其饱受艰辛。
 3. 禁止进行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玩牌或掷骰子亦不例外。
 4. 晚间八点钟熄灭灯烛;此后亦不得饮酒,违禁者将被罚坐于露天甲板并不得照明。
 5. 人人都应保证手中的武器干净齐整,可随时待命。
 6. 未成年人和妇女不得入伙;若有人诱使异性并将她乔装带上船,则诱使者将被处死。
 7. 战斗中弃船逃命或擅离作战岗位者,将被处死或流放荒岛。
 8. 禁止在船上打架斗殴,个人争端应在陆地上以决斗方式解决。程序如下:决斗双方背向站立,待军需官发出命令时立即转身向对方射击。若有人未开火,则由军需官收缴其枪械;若双方均未命中目标,则可采用击剑的方式,最先刺中对方并见血者获胜。
 9. 在每人可分得 1 000 英镑之前,任何人不得对所从事的行当提出质疑。胳膊或腿部负伤致残者,可从公共账房领取 800 瑞尔*,轻伤者依此类推。
 10. 船长和军需官可分得双份战利品,火炮长和水手长可分得一又二分之一,其余高级船员可分得一又四分之一,普通船员人均一份。
 11. 安息日仅允许正当的娱乐活动,其余时间则各自随意。
-

资料来源:Konstam 2002:186—187。

* 瑞尔(pieces of eight): 近代西班牙银币单位。——译者注

之所以摇身一变能成绿林好汉，就是因为无论何种情况下，他们所面临的风险都要求他们最好采取信任网络的方式组织自身，从而当风险真正发生时能够保持内部的一致性和纪律性。不过，这样做也是有成本的：网络内外之间的不信任也随之增强。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信任网络具有哪些不同于一般人际网络的突出特性。信任网络将重大而长期的事业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它在三人或三人以上所组成的人群中建立了强大的关系纽带：

- 这种关系拥有成员共知的名称；
- 参与此种关系可使所有成员分享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 参与者获得某种方式得以与其他成员交往，并可彼此代表对方；
- 参与者划分和维护自己的边界，从而与外界相区分；
- 网络中的交互行为将其成员的重大活动，置于了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严峻风险之中；
- 信任网络的运作是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任何特定网络的成员都只是所在人口中的少数，信任网络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外，并与其他网络争相控制资源；
- 网络令退出障碍重重、成本高昂，甚至完全没有可能。

与某些商业网络或军事组织一样，海盗团伙同样以设定时限的方式确保最终原则的落实。正如罗伯茨的帮规及其个人传奇所展现的，海盗们并非一生都隶属于同一个帮派，而是在一个特定的航海阶段生活在由船长所制定的、全体成员共同贯彻的严明纪律之中。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关键点：尽管海盗组成了信任网络，但他们仍然掠夺其他信任网络——包括其他海盗团伙——的成员。

早在公元前 1220 年，历史文献中就出现了有关海盗的记载。有一

伙被埃及人称为“海人”(Sea Peoples)的海上侵略者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海域。他们由北方而来,所作所为犹如数个世纪后维京海盗的测试版:攻击、劫掠,甚至还常常占领某地。他们靠掠夺为生,而遭受掠夺的商业网络则在此区域建立商路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海人”与海盗相仿。

尽管我们在此对合法商人和不法歹徒有所区分,但是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土匪、海盗和官军的行为常常与合法的生意相互交织、难分彼此。就地中海的漫长历史而言,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和尼古拉斯·普赛尔(Nicholas Purcell)曾有这样的描绘:

雇佣军和其他流动团体(mobile groups)一同出现在了社会生态的历史中。海盗和土匪也同样是这样:作为地中海地区生产和再分配活动的常规表现形式,海盗活动被视为岸上贸易(cabotage)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不同的只是海盗做的是大买卖罢了。这是世界贯通过程中所衍生的次生现象(epiphenomenon of connectivity),该现象在地中海的历史上只是偶尔被强权国家打断。与其他有技能的劳动力一样,海盗们被雇用从事(作为武装商船)政治保卫工作,甚至以此作为他们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公元前1世纪,海盗活动——特别是来自奇里乞亚*地区的海盗——已远远超出了地方性的犯罪投机活动,不再具有偶然性,而是对罗马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了威胁。萨摩斯的古代精英对抢劫和敲诈勒索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同一时期,迪迪姆的阿波罗神谕也作出断言:海盗有权如是,因其父辈如是。(Horden and Purcell 2000:387)

* 奇里乞亚(Cilicia):土耳其东南部小亚细亚半岛的一片区域,是中东前往地中海的重要通道。萨摩斯(Samos):爱琴海东部岛屿,以萨摩斯海峡与小亚细亚相隔。迪迪姆(Didyma):现为土耳其艾登省苏克区55公里外的迪迪姆(Didim),公元前8世纪爱奥尼亚人曾在此建有庞大的阿波罗神庙。——译者注

人们将 18 世纪活跃于北非、马耳他以及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海盗称为 corsairs*，以此与 17 世纪的加勒比海盗(buccaneers)有所区分。(buccaneers 或 boucanier 源于加勒比地区的流氓们整只地烧烤动物之举，当时被称为 boucan，即此后颇为时髦的 barbecue——特指海边烧烤)。

豪厄尔·戴维斯(Howell Davis)交替进行着的私掠活动表明：无论 17 世纪的加勒比海盗、18 世纪的地中海海盗还是西方世界的其他海盗，都与国家长期保持着爱恨交加的关系。他们常常组成雇佣军为国王作战，常常在军饷发生延误时打家劫舍，常常在和平时期彻头彻尾地沦为盗贼(Thomson 1994, Tilly 1992b:80—84)。无论海盗还是雇佣军，他们都是统治者的军事后备队——为拥有足够的资本雇用他们而无力维持常备陆军和海军的统治者服务。随着商业不断发展、资本逐渐丰盈以及临时雇佣军日益难以控制，统治者们越来越多地转而建立常备军，通过短期的贷款和长期的税收维持常备军的财政开支。就此而言，以掠夺商人为生的海盗和雇佣军，自己却成了国家的掠夺对象。

实际上，直到 19 世纪，海盗活动才最终从地中海上消失。环地中海周边国家借助英国和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巩固了自身对于海上贸易的法律控制。(内陆地区的土匪苟延残喘的时间更长，并不时在地中海一带卷土重来)。不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部非洲水域，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海盗活动，又伴随着远距离贸易的兴起以及殖民地控制的衰落而持续升温(Konstam 2002:181—183)。

海盗问题向本章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问题。如果历史是掠夺者——包括作为掠夺者的统治者——的历史，那么，信任网络的成员是如何保卫自己和自己的资源使之免遭掠夺的呢？海盗和土匪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他们通过武装自己和掠夺他人实现自我保护，他们是在以毒攻毒。不过，更为常见的是，信任网络对三种策略——隐藏、委托和掩饰——进行组合，以此保护自己免遭掠夺——包括免遭统治者的掠

* corsairs:意思是“海盗”或“海盗船”。——译者注

夺。所谓隐藏策略，是指以保密和掩饰的方式强化信任网络的内外边界。譬如，瓦勒度教派就为这一策略提供了最为纯粹的例证。所谓委托策略，是指依赖于有权势者的恩宠以抵御其他潜在的掠夺者，并常常为此支付可观的报酬。譬如，武装商船的私掠行为便是如此。所谓掩饰策略，是指勉强遵从统治者的命令和规定，以使自己免遭监管和侵占。譬如，豪厄尔·戴维斯及其海盗同伙间歇性地伪装成合法的武装商船。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所有这些策略——掠夺、隐藏、委托和掩饰——都可能遭到失败，尤其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化国家形成之后，失败就更是难免。就定期实施掠夺的政权而言，它们或是有效地摧毁了自治的信任网络，或是令其为政权所用。而无论摧毁还是御用，政权都攫取了信任网络先前隐匿的宝贵资源。当然，到了这个时候，信任网络又会暗中筹划：是选择被收编、讨价还价，还是干脆解散。

掠夺是一项风险和成本居高不下的自我保护策略：无畏的黑男爵及其同伙猖狂不到三年便是明证！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有相当数量的试图躲避政府控制的信任网络，都尝试将隐藏、委托和掩饰的策略组合地加以运用。但是，随着无孔不入的国家不断扩大其监控范围、不断整合或消灭政治中间势力、不断强化对群体性行为的控制力度，上述策略的风险和成本也相应增大了。本章有幸借鉴了一些学者对信任网络及其掠夺者的研究成果，并将致力于对怎么样和为什么作出回答。

谁掠夺谁？

掠夺者依靠一定程度的有效强制从他人手中攫取资源。所谓强制，是指所有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是使稳定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的集中的行为手段，并突出地表现为武器、军队、监狱、信息破坏以及施加惩罚的组织套路。许多组织——包括家族和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内部强制手段：父母惩罚自己的孩子、老板扣罚员工的薪资、教师训

诫学生等。但是，其中大部分组织都不具有有效的对外掠夺手段。所谓施以强制的掠夺，针对的是外部的人员或组织。就此而言，信任网络更多的是被掠夺而不是掠夺。

不过，从历史上看，有些信任网络更倾向于掠夺其他信任网络。由于少数在掠夺中幸存下来的信任网络还会面临其他信任网络的觊觎，因此，它们必须维护自己的边界、保障自己的维持系统、稳定网络成员的对外联系，并强化内部控制以维持信义，从而使集体活动得以延续。在建构强制手段并将其组织化方面，在从非常规的掠夺中获取资源方面，这些信任网络迥然不同于其他的信任网络。

例如，卷入血亲复仇中的家族就常常雇军人行事，而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往往始于一次诱拐或偷窃行为——即一次掠夺。^[1]有时候，组织化的种族或宗教集团——这些组织常常将信任网络和权威组织合二为一——也彼此掠夺。^[2]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俄罗斯狂热的私有化和转型过程中，在歃血为盟的犯罪团伙和冒险家团队中孳生出了一批靠暴力起家的企业家，他们几乎是一边做着合法买卖，一边设法彼此干掉对方(Varese 2001, Volkov 2002)。在争夺相同资源的相邻网络之间，相互掠夺更是司空见惯。

不过，对大部分信任网络来说，由于它们缺乏有效的掠夺手段，因此，相互掠夺并不构成最严重的威胁。真正对非掠夺型信任网络构成杀伤力的，往往是那些外聘或内设了强制专家(specialists in coercion)的掠夺者(Tilly 2003b, Chapter 2)。尽管缺乏明确而一以贯之的界定标准，我们还是可以将强制专家分为反政府型、半政府型和政府型三种类型：

反政府型：土匪、海盗、黑帮、诈骗者；

半政府型：武装商船、雇佣军、民兵、私人武装、准军事组织；

政府型：陆军、海军、警察部队。

上述分类还需要进一步地细化。海盗、土匪和黑帮通常——至少是暂时地——采用信任网络的形式组织自身，而陆军、海军和警察部队则更多地采用了权威组织的形式。不过，就后者而言，其内设单位常

常包含了信任网络，它的战斗力也就取决于基层团队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团结(Lynn 2003)。至于其他类型的强制专家——譬如某些土匪和雇佣兵团体，则因其(1)行动相互约束、(2)利益彼此分享，以及(3)退出相对自由而与合作机构更为接近(Blok 2001)。

巴塞洛缪·罗伯茨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海盗船和武装商船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明确界线。也就是说，适用于武装商船的，也同样适用于合法编制下的海军(Thomson 1994)。并非只有警察才像警察，相同者可谓比比皆是。^[3]自1989年以来，苏联的政府安全部队、私人保安机构以及各类暴徒和歹徒之间呈现出了不同团体相互掺杂和彼此转换的疯狂现象，而强制专家则在这些不同的团体之间快速转换门庭(Derluguian 1999, Varese 2001, Volkov 2002)。政府代理人凭借所拥有的命令强制权，不断地对弱勢的信任网络成员进行掠夺。^[4]就此而言，无论何种类型的强制专家都有可能成为掠夺者。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信任网络构成最为持久和有效掠夺的掠夺者，恰恰就是那些一本正经的政府代理人，尽管统治者通常否认这一点(Tilly 1985)。在欧洲最近一千年的历史中，有组织的反犹运动无疑为此提供了最为生动的例证：驱逐和屠杀犹太人以便掠夺其财产，迫使犹太人的社群为了免遭驱逐或免于剥夺财产而缴纳巨额保护费，建立隔离居住带或迫使犹太人佩戴身份标志，利用犹太人的弱勢地位向其征收特别税。

13世纪至15世纪期间，随着天主教势力的扩张和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兴起，犹太人频频陷于天主教会的掠夺之中：1245年，罗马天主教廷要求其势力范围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头戴无檐圆帽(skullcap)以示区别；从1132年到1321年间，法国统治者四次发布禁绝犹太人的命令(但又随之撤销)；1290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驱逐出境；1391年，西班牙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在随后的1492年和1500年间，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犹太人和穆斯林进行了驱逐——由此达到了15世纪由国家策动的不宽容的顶峰。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针对犹太人的掠夺活动稍有

平息，但从未从欧洲消失。与此同时，穆斯林、新教徒和其他宗教少数派也时时感受到了政府掠夺的蚕食和鲸吞。

不过，无论欧洲还是其他地区，政府对信任网络的掠夺更多的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也就是说，并非刻意地实施宗教隔离。自五千年前作为实体的国家出现伊始，单纯的国家行为——如创建军事力量、抵御敌对国家、打击反对派以及建立自我维持的统治体系等——就不可避免地(除非疏忽大意)对地方信任网络造成了威胁。当然，自上而下地看，一些看起来还算合法的措施——如纳赋、征税、罚款、强行借贷、征兵及战时征用等——可能在地方上引发不愉快的后果，但这些措施毕竟提供了公共产品、保障了政府的主要活动。也正因为如此，统治者常常对公众抵制上述措施的行为大加谴责。

自下而上地看，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合法的措施拿走了准备结婚的财物、孩子们的未来、长期的商业利益、丧葬的费用或是对宗教义务的履行，并因此对信任网络造成了侵害。无论社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有理由担心：一旦政府夺走了他们的信任网络，夺走了深植于信任网络中的资源，他们建立在信任网络基础上的生存和保障之道，也将随之悲惨地一落千丈。

当然，政治理论家们可能对此提出质疑：是否可以将政府为募集公共产品而开展的征税、征兵和征用活动一并称为掠夺？政府的特权如何体现？同意如何构成？从本书的视角出发，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可将政府对信任网络的干预确定为掠夺：第一，政府以有效的外部强制实现顺从的行为，例如，将违抗政府命令的人送入监狱或课以罚款；第二，政府剥夺了信任网络赖以维系其日常关系和集体活动的资源。就更加宽泛的意义而言，政府的扩张对信任网络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的无政府主义者感受到了这股威胁，他们因而提出主张、要求变革。他们周而复始地阐述如下方案：废除中央政府，建立小型的、自治的、地方性、信任网络式的组织。在1840年的一篇有关“财产就是偷窃”的相当乐观的文章里，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如是总结了人类的历史：

因此，既定社会中人对于人的权威，与该社会所达到的理性程度成反比。权威的长期存在，源于广泛而普遍的对于真正的政府的渴求，而真正的政府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正如面对正义之追求，暴力和欺骗的法则终将让位并消解于平等之中，同样，意志的主权亦最终将让位于理智的主权并消解于科学社会主义之中。自世界起源以来，财产和王权就在不断地被摧毁中；人类寻求平等中的正义，社会则在无政府状态中寻求秩序。
(Proudhon 2003:245)

这位出身贫寒、几乎是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起先当过印刷工人，随后亦过着卖文为生的不安定生活。他在 1848 年革命期间担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不久又在路易·拿破仑——先是总统随后成了皇帝——的复辟中下了大狱。但是，所有这些遭遇都没有动摇他反对财产、反对建构权威的信念。蒲鲁东认为，人民基于自由意志相互协作地处理公共问题，这是自然的、可期许的和正当的。与此同时，他激烈地反对任何人将这种协作强加于人。就此而言，他是一位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

16 世纪的教区网络遭遇掠夺者

早在无政府主义产生之前，各种共同体就因面临不断扩张的国家的种种需要，而不断地与政府的掠夺相抗衡：它们有时采用掩饰或委托的策略以免陷入最坏的境地，但更为常见的后果，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组织支持和物质保障在政府的重压之下化为齑粉。对此，我们不妨回忆

一下亨利八世对德文郡的莫巴斯*村的所作所为。尽管自上而下地看，亨利八世有时显得像个英雄；但自下而上地看，他更像一个掠夺者。1521年，为了对付法国，亨利与哈布斯堡王朝结为同盟；他声称自己有权获得法国王位，并写了一本反对马丁·路德(Martin Luter)学说的小册子。基于亨利的这本小册子，罗马教皇授予他“信仰的守护者”(Defender of the Faith)的称号，由此引发了教士们的质疑，争议一直持续到1525年。这一年，亨利八世为应付与天主教法国的战争而向天主教会征收财产重税；当然，教会当局照例将新增的税负层层转嫁给各个教区和普通民众。

亨利试图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arine)离婚，然后迎娶安妮·博林(Anne Boleyn)，但教皇拖延着迟迟不予批准，为此，亨利撤销了沃尔西的教皇特使之职，并在多次努力无望之后，宣布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亨利与教皇的决裂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教会收入。1534年，亨利力促通过《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布他及其继承人是英国教会的唯一最高权威，同时规定不承认英王的宗教权威便是叛国，可判处极刑。《乌托邦》的作者、前任大法官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就是因为拒绝承认这一点而身首异处的。

1536年，在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协助下，亨利又捏造通奸罪名将安妮·博林斩首。此外，他强迫解散了修道院，出版了威廉·廷代尔(William Tindale)的英文版《圣经》，并平息了反对其宗教改革的多起叛乱。亨利八世战胜了对他的英国教会组织转型的广泛抵制，但在宗教教义方面，他并不打算走得太远。1539年，亨利八世颁布了《六信条法》(Six Articles)，除了以国王取代教皇之外，它所规定的信条和操守与天主教会的规定并无二致。

在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时期，亨利的手下从不放过任何一

* 德文郡(Devonshire): 英格兰西南部的非都市郡，下辖8个非都市区，面积约6564平方公里。莫巴斯(Morebath): 德文郡的一个村庄，它在16世纪时仅有33户人家。——译者注

个可以从教会及其成员手中榨取税款和钱财的机会。1547年，亨利八世驾崩，此后的英国民众不得不在倾心新教的爱德华六世、笃守天主教的玛丽、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之间颠沛流离。16世纪拖曳着普通英国民众走过了一个宗教信仰摇摆不定、政治认同扑朔迷离的迷宫。这个迷宫的所有出口都指向一个方向：一个覆盖宗教机构及其资源的强大王权。

埃蒙·达菲(Eamon Duffy)对16世纪莫巴斯村的教区生活进行了翔实、全面而生动的重构，从而揭示了亨利八世及其继任者自上而下引发的骚动，是如何深刻地撼动着当地的社会关系及其实践的。达菲对1527年至1596年间莫巴斯村教区执事的账目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地百姓的生活，同时，也多少对我们有关地方信任网络的论述提供了证据。在1527年至1573年间，长期担任教区牧师的克里斯托弗·特里崔爵士(Sir Christopher Trychay)誊写了整部教区账目，并将之汇编成一部有着205页对开纸的巨著——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地方事务的资料。

通过达菲的艰苦努力，我们了解到该教区用于地方事务的大部分资金源于两个来源：一是地方团体征集的资金，二是教区牧羊业创收的资金。这两项资金来源都有赖于信任网络：与前者密切相关的是当地的未婚青年行会，而后者则依托于教区居民——他们在自家羊圈养殖教区的羊，然后将所有的收益交付教会(Duffy 2001:26—27)。教区每年选举产生——无论贫富——两名教区执事，这标志着一个教区范围的信任网络的形成。教区执事不仅负责为教区募集资金(被戏称为“教会黄啤酒”)、对教区牧羊业进行规划和监管，而且还得轮流看管教会的物质财产——包括各种银器。莫巴斯教区仅有30个至40个家庭，其中有10个人供职于其他机构，因而每年有12个人轮流参与教区的宗教行政事务。

然而，好景不长。1537年，也就是亨利八世下令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后的第三年，教区开始分裂：一部分教区居民拒绝为教区牧师助

理支付任何费用。教区牧师没有了助理，许多重要的职责便难以履行(或是被拒绝履行)。以教区居民中一位名叫马克(Mark)的穷人为例，他的双胞胎孩子不幸夭折，由于孩子已经受洗，因而必须以成人之礼予以安葬。不过，当马克一行赶赴教堂打算做安魂弥撒时——特里崔(Trychay)牧师推断这一天是圣乔治日*——却发现教堂因为没有牧师助理而大门紧锁(Duffy 2001:60—61)。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两个婴儿，但是，正如达菲所说的——

这个事件凸显了共同体观念在莫巴斯村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凸显了宗教与世俗两方面的考虑是如何相互交织和相安无事的。它向我们表明，在一个小小的乡村社区，少数穷人的不合作之举可能导致整个教区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陷于瘫痪；也向我们表明，是舆论而非正式的规则构成了集体行动的真实根基。此外，这一事件还表明，尽管社区存在着经济分层，但经济因素并非主导社会组织或等级结构的根本原则。(Duffy 2001:63)

这样一个由各种信任网络编织而成的村庄，开始感受到王室掠夺之手的冰冷钳制。

特里崔爵士竭力保护他的天主教居民，竭力使他们不致在狂热的改革和顽固的抵制中横遭不测。掩饰与委托相混合的策略起了一阵子作用。但是，宗教与政治的主仆关系发生颠倒，相应的义务关系出现变化，这些最终还是榨干了地方教会，破坏了16世纪早期颇具特色的家庭在教区事务中所大致拥有的平等地位，并导致当地人与那些试图改变教区行政事务格局、试图从教区事务中牟利的外来者冲突不断。

例如，1547年，亨利八世的禁制令(Injunctions)对还愿和显圣活动进

* 圣乔治日(St. George's Day): 公元303年4月23日，圣·乔治阻止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而不幸罹难，后来每年的这一天便成为纪念日。——译者注

行了抨击，同时，对广受民众支持的弥撒捐款明令予以禁止。这两项措施旨在节省开支以应对与苏格兰的战争。对以牧羊为业的莫巴斯村来说，这项改革既破坏了宗教与血缘关系相互缠绕的行为结构，又因为逼迫教会出售羊只而使原本依赖于羊毛收入的地方事务难以为继。就此而言，禁制令在地方的实施对这个村庄的既有信任网络造成了严重破坏。

在大多数情况下，莫巴斯的村民是以弱者的武器进行着战斗(Scott 1985)。但在1549年，他们冒险送了五名当地人去埃克塞特*的叛军营地，后者随后发动了闻名遐迩的西部叛乱(Western Rebellion)。几乎与此同时，爱德华六世政权强制推行《祷告书》(Protestant Book of Common Prayer)，对羊和纺织品征收重税以维持与法国和苏格兰的连绵战火。1549年叛乱的核心目标是：要求将宗教生活大致恢复到亨利八世统治晚期的状态——即英格兰教会奉行天主教的信仰、操守和宗教特征。在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下，国王的军队镇压了叛乱并大肆屠杀。随着自上而下的压制与日俱增，再没有人对英格兰的宗教和政治立场评头论足。亨利八世及其继任者对其手下大肆掠夺着的地方信任网络漠不关心。政府行为的种种后果，证明莫巴斯村的村民和教区牧师是何等正确地要在自己的信任网络与王权之间保持隔离。

从莫巴斯村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本书所说的集体性事业的真正困难所在。尽管我不乏自信地将莫巴斯村的未婚青年行会、教区牧羊组织以及轮值的教区执事，看作是运作中的信任网络的一个明证；但是，无论达菲还是读者们都不清楚这些社会组织——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承载着信任网络。也就是说，个人之间的这种强大的社会纽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承载了重大而长期的集体性事业，并将这些事业置于网络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我们只知道这些网络支撑着地方的核心事务，而这些事务是教区中大部分

* 埃克塞特(Exeter)：德文郡的郡治。——译者注

甚至全部家庭所共同参与的。

此外，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哪些其他的重大而长期的事业，是参与者们通过这些信任网络而运行的。当然，我们可以大而化之地想象：这些信任网络支撑着教区的各项活动，并在恋爱、结婚、信贷、保健和农业合作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后，再借助推断和类比的方法——这对理论有益但在论证上存在风险——界定莫巴斯村的地方社会关系就是完整形态的信任网络。总之，我们回溯的时间越长，网络运作的证据就越脆弱。但是，为检验信任网络从完全隔绝到完全整合的全部过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立足于这些残存的历史证据开展工作。莫巴斯村的故事，是作为掠夺者的王权从地方信任网络中成功地掠夺资源的故事，而在此之前，这些信任网络大多通过委托和掩饰的策略生存了下来。

网络策略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与政权隔绝的信任网络用于自我维持和繁衍的五项策略：(1)掠夺网络之外的个人或组织；(2)隐藏；(3)委托；(4)掩饰；(5)上述四种策略的组合形式。海盗实施掠夺，陆地上的土匪和一些军事组织同样以此为生；只要始终存在牺牲品，掠夺就是唯一可以被长期运用的生存策略。海盗集中在主要航道沿线，土匪集中在商人或朝圣者的必经之地，军事组织集中在农业相对发达或食物贸易相对活跃的地区，一小撮俄罗斯流氓集中在零售市场施展恐吓。

不过，绝大多数隔绝型信任网络都无法以掠夺为生，倒是更为经常地采用隐藏、委托和掩饰的策略以自保。隐藏策略只要发挥作用，就能在保护网络内部资源、维护网络日常运作方面享有优势。但是，这项策略也有严重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是，只要有一个网络成员心存不满，整个网络就可能暴露在外。此外，隐藏策略在隐藏网络的日常运

作的同时，也使网络难以获得新的资源或人员，而一旦遭到暴露或遭遇掠夺，隐藏型的网络也会因为缺乏盟友而势单力孤。相比之下，委托策略没有上述缺陷，但是，它须承担向庇护人进贡的(有时是相当巨大的)成本。面对宪制政府(constituted governments)，信任网络采用掩饰策略常常最为有效，因为此项策略有助于信任网络与那些——既能破坏网络又能从网络的持续存在中获取实际利益的——外部势力达成妥协。

就隐藏、委托、掩饰、通过收编或讨价还价直接被公共政治整合的策略而言，天主教国家的宗教会社为上述策略的变化和转换提供了典型例证。^[5]就拿莫巴斯村的未婚青年行会来说吧，我们完全有理由——但未必确切地——作出如下预设：即这个行会包含了活跃的信任网络，或是立足于活跃的信任网络之上。尼古拉斯·特尔斯特拉(Nicholas Terpstra)描绘了在现代早期的意大利，一个宗教会社是如何逐渐脱离了相对平等和自治的状态的：

受到早期现代社会贵族化发展过程的影响，当时的宗教会社也呈现出了伙伴关系贵族化的趋势。随着旨在重整天主教的主教和修道会——如卡洛·博罗梅奥(Carlo Borromeo)和耶稣会(Jesuits)——建立了新的以阶级、职业和性别为基础的排他性宗教会社，以便将相应的社会团体纳入其重整计划之中，上述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教区或半岛内的宗教会社网络都是在牧师、主教或修道会的资助、保护和严密监控下形成的，与之同时形成的还有标准化的等级结构及其对社会、教育或宗教目标的具体限定。尽管这些措施未必总能如愿，但还是引起了进一步的反应。教区层面的自治宗教会社，因而在资源和行动上更加团结，并以此捍卫和争取他们的传统特权。(Terpstra 2000:7)

在天主教会的势力范围内，宗教会社在所有社团中享有特权：它们

表现出对信仰和宗教服务的倾心投入，以此获得教会一定程度上的保护。正是得益于这种保护，宗教会社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远非单纯的虔敬所能涵盖的社会单元：彼此互帮互助，重现社会结构(social display)，对外实施排斥，行使自治权利。宗教会社是财富和社会关系的汇集之所，因而也往往成为恐惧、嫉妒和贪婪的目标。一旦它们不能为当地统治者的各种企图所利用，统治者就会以拉拢或镇压的典型方式夺取它们的财富。与其他的信任网络一样，宗教会社在掠夺面前同样不堪一击。

以托斯卡纳的哈布斯堡大公利奥波多一世* (Habsburg Grand Duke Peter Leopold)为例，他曾命令在1785年3月之前所有的宗教会社必须解散。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佛罗伦萨的许多宗教社团都站到了天主教改革派一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宗教会社拥有的财富——在他看来——可以更好地直接服务于教会和国家。1783年，利奥波多一世授意进行的宗教会社普查活动不失时机地宣称，“宗教会社所做的大部分慈善工作……都是为了满足它们自身的利益，许多宗教会社的负责人和成员收取了特别的礼物(如胡椒粉、蜡烛、面包等特供品)并接受了若干无形的好处，而这同样也是为了满足他们自身的利益”(Eisenbichler 2000:274)。1784年，利奥波多一世制定了他的所谓“教会财产家长制”(Ecclesiastical Patrimonies)以管理教区的收入。第二年，他没收了被查封宗教会社的全部财产(Eisenbichler 2000:274)。

利奥波多一世在统治大公国期间，他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斐迪南三世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不乏对托斯卡纳宗教会社的指责：

他们在节假日聚集一处、朗诵日课，从教区和[天主教]机构中

* 托斯卡纳(Tuscany)：现为意大利中西部大区，首府佛罗伦萨。利奥波多一世(1747—1792年)：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0—1792年在位，称利奥波德二世)、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1765—1792年在位，称利奥波多一世)，他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译者注

拉扯闲人开展宗教活动，并不断地煽动异议、在权威问题上与教区牧师唱反调——他们认为自己超越了教会、仪式和过程。在乡村地区，他们打着宗教的幌子在节日混吃混喝。此外，佛罗伦萨还有许多夜间团队：他们聚集在一起整夜吃喝、就地入睡；若逢宗教节日，很早就做弥撒——往往天还没亮；至于一天中余下的时间，他们用来打猎、呆坐旅馆，或是到处闲逛。在神职款的分配问题上，他们极不正经，常常挥霍殆尽，而且数量相当庞大。(Eisenbichler 2000:277)

正如在这类旧的政权体制下经常发生的，利奥波多一世最终豁免了一部分实际从事公共服务的宗教会社，但也是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它们的权利。他的各项规范促成了宗教会社的转型：从独立自主的信任网络转而为统治者的权威组织——正儿八经的托斯卡纳政府——所整合。

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奇怪：即这些经审查核准的宗教会社“不再拉起兜帽和横幅(stendardi)，不再参与公共游行，不再在夜间或瞻礼日举行聚会，也不再向妇女赠送嫁妆”(Eisenbichler 2000:275)。利奥波多一世同启蒙时期的许多君主一样，认为与富裕、自满、过于独立的托斯卡纳宗教会社的成员相比，他老人家更懂得什么是公共福祉。因此，他以手中的权力取缔了它们，占有了它们的财富，并摧毁了先前使其得以自我维系的防御体系。

宗教团体遭遇法国大革命

毫无疑问，绝非所有的宗教会社都像佛罗伦萨人的那样富裕，也并非都会沦为启蒙运动推动者的猎物。在天主教统治欧洲的大部分时期，信任网络——以宗教会社作为其公开的组织形式——承担了大量的地方事务：不仅提供祈祷、弥撒和社会服务，而且还控制了婚庆市场、

丧葬业务和社会互助项目——特别是其中包含了丧葬保险业务。宗教庇护人为宗教会社抵御世俗权威提供了部分保护，此外，诸如虔敬游行、周日集会、圣徒纪念日庆典等活动也为大众集会创造了条件，而这是当时的世俗组织——遑论公民志愿团体——所无权获得的。此外，宗教会社还常常得到地方市政当局的庇护：当局指望从宗教会社的公共庆典活动中赚取威望和协助，因而愿意提供保护、使之免遭上级政府的劫掠。

就所开展的活动而言，具有正式组织形式的宗教会社是与其他非宗教的或半宗教的社会团体共同分享着教区事务的。后者包括守夜人会(night watches)、贸易同业工会(trade guilds)，以及与莫巴斯村的未婚青年行会类似的未婚青年组织——青年修道会(youth abbeys)。贸易同业工会和青年修道会常常通过羞辱性的仪式惩戒当地的道德败坏分子，其中最著名的仪式包括学驴叫(donkeying)、瞎胡闹(charivari)和喧闹小夜曲(Thompson 1991:467—538)。此外，他们还与相邻教区的同类团体——倘若胆敢染指他们的地盘或试图寻租——进行斗争，以此捍卫自己在当地的权利和尊严。对他们来说，委托和掩饰相结合的组合策略是其生存之道。

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有关18世纪普罗旺斯地区村镇的研究表明：宗教会社、青年修道会、民兵和诸如此类的组织是当地公共生活的主导力量。尽管人员构成相互掺杂，但这些团体都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行动、权利和义务——举行圣徒纪念日的游行、羞辱道德败坏之人、为游行提供军事保护、向与异族通婚的妇女征税，以及举行增添节日气氛的(真正的)篝火晚会。土伦市的“白衣苦修会”(White Penitents)报告称：

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前，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向穷人赠送礼物，也一直没有停止为被北非海盗释放在土伦的法国人提供回家的旅费。此外，他们还接管了一个由外人创建的船员基金，为葬身大海的船员遗孀和遗孤提供补助。至于“灰衣苦修会”，他们致力

于探监，向囚犯们赠送衣服和食物，并陪伴每一名死囚从牢房、绞架直至墓地。(Agulhon 1966: I, 209)

就 18 世纪的这一地区而言，宗教会在整体上呈现出从追求宗教信仰到实现世俗诉求的转变(Agulhon 1970:232)。

1751 年，德拉古尼昂*的青年修道会(*corps de la jeunesse*)申辩道，既然他们已不再征收 *pelote*(向嫁到外地的妇女征收的费用)以供圣礼会(Holy Sacrament)之需，市政当局就应当为当地的青少年球场支付维修费——这笔钱过去是由他们支付的(Agulhon 1966: I, 107)。与之相似的一件事也发生在德拉古尼昂，在 1783 年 7 月，

警务处得到消息，有人正借婚礼之机在一个市场上举行“瞎胡闹”：一大群农夫、居民和工匠聚集在一起，敲锣打鼓、吵闹非凡，还有人大喊大叫地模仿婚礼并借机丑化。当巡警试图阻止这场活动时，人群中响起了叫骂声，于是警察逮捕了一名年青人，并送进监狱关了一天。不过，尽管警务处的人大多为布尔乔亚，但是，在是否应当进行惩罚的问题上还是产生了分歧。当然，我们知道分歧所在：瞎胡闹并非违法乱纪，而是传统。(Agulhon 1966: I, 107)

在教区和村庄的层面，各种形式的公开的信任网络分担了绝大部分地方事务，特别是那些与地方居民密切相关而全国性的教会或政府无暇顾及的事务。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些信任网络一部分被整合，一部分被摧毁，还有一部分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将教会所认可的信任网络——包

* 德拉古尼昂(Draguignan)：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辖下瓦尔省的一个城市。土伦是瓦尔省的省会。——译者注

括宗教会社——扫出了公共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受控于政府的权威组织——包括各种爱国俱乐部(patriotic clubs)、国防联合会(National Guard units)、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ittees)和官方设立的市政权威机构。1791年9月，德拉古尼昂的“白衣苦修会”留下了最后一份会议纪要，不过，它所从事的殡葬事务仍然维持到了1792年11月(Agulhon 1966:II, 478)。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从事殡葬业务期间，“白衣苦修会”的成员仍然秘密地继续开展活动(Agulhon 1966:II, 479—502)。他们将自己的生存策略从委托和掩饰转变为隐藏。

从1793年开始，大权在握的雅各宾派竭尽所能地或是查封这些自治组织，或是将其纳入麾下——无论宗教团体还是政治社团，概莫能外。1793年，雅各宾派议会试图以政府性质的社会救助，取代私人性质的以及为其所憎恶的宗教性质的社会救助。不过，这项措施因战时财力拮据而不了了之。18世纪90年代，工人的宗教会社从法国的公共生活中消失了，直到拿破仑帝国时期才部分有所恢复(Woloch 1994:290—293)。此外，大众社团也在1799年的“五人执政”(Directory)时期暂时有所恢复，不过，随着拿破仑的卷土重来而再度丧失自治地位(Woloch 1970, 1994)。拿破仑法典规定：“禁止成立人数在20人以上、以每日聚会或定期聚会之形式从事宗教、文学、政治和其他活动的社团——政府授权的除外；凡违禁者，政府可对之采取相应措施。”(Agulhon 1977:21)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共济会作为政府的桥梁而一度繁荣，但随着1815年复辟的到来，也只是落得惨淡收场。

在旧政权复辟期间，尽管建立在教会基础上的组织有所恢复，但并未阻止这类社团形式陷于长期的衰败之中(Agulhon 1977:21)。整个19世纪，各类秘密政治团体令法国的当权者苦不堪言：工人互助团体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直到1884年才作为私法人而获得合法地位；与此同时，非政治性质的志愿团体也随着政权的更迭而起伏不定。但是，不管怎么说，宗教会社、青年修道会和诸如此类的教会授权成立的大众组织，再也没有恢复到18世纪的水平——那时它们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Tilly 1986:245—312)。到了19世纪,就法国的秘密政治活动而言,宗教性质的目标、活动和人事安排已成为其直接行动的最佳目标(参见 Beaubernard 1981:129—180)。

客观地看,法国大革命对于降低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的隔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此,它采取了以下三条常见的路径:一是摧毁一部分信任网络,二是将既有的信任网络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三是创建其成员与公共政治直接挂钩的新网络。尽管在雅各宾派的高压统治下,有一部分宗教会社隐藏了起来,但绝大多数教会授权成立的宗教会社都被强行解散了。

生存能力插图

倘若没有政府的强力整合或是缺乏庇护人的有效保护,信任网络是如何得以生存的呢?此前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否遭遇掠夺者,信任网络都有可能通过网络的内外部变化而发生变化。无论在边界的界定和控制方面,在与非掠夺者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在资源的维持和保障方面,以及在对成员的内部控制方面,所有这些内部因素的变化都对信任网络的生存能力构成影响。不过,信任网络遭遇掠夺者的后果更加严重,这是因为掠夺者犹如寄生虫,它们不只是简单地寄生,还要吞噬养分并摧毁主体。海盗的典型做法,就是一次性地解决那些牺牲品。

本章为信任网络与掠夺者的遭遇描绘了一份历史插图,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在信任网络所采用的通过与政府保持隔绝以实现自保的策略的有效性方面:第一,采用完全隐藏的策略与公共政治相隔绝,尽管这类信任网络留下了诸多有关秘密信仰或政治阴谋的壮举,但是其生存能力更多地依赖于与其他有组织的团体——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关系,而非取决于信任网络的内部状况。第二,随着国家

集权化权能的增长，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保持隔绝的可能性随之降低，而政府代理人作为信任网络的主要掠夺者的突出地位亦随之增强。

由此，我们可以形成以下三点洞见：

(1) 维持信任网络的四组机制——网络边界、网络维持、外部联系和内部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例如，除非隐匿于信任网络中的资源能够自我更新，否则，横亘在我们与你们之间的边界就会切断网络的资源来源，而这些资源正是维系伙伴关系和集体活动所必需的。

(2) 自下而上的策略——隐藏、掩饰、委托和掠夺——对上述四组机制的影响各有不同。例如，掠夺可在适宜的条件下提供生存所需的资源，但是，掠夺的欺诈性和不确定性又同时增加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影响网络生存的关键因素。

(3) 显然，各种自下而上的策略随着政权类型的变化而系统地发生着变化。对于那些依赖强制远胜于资本或信义的低宽容度政府来说，信任网络无论是采取收编的策略还是进行讨价还价，最终都难免陷于解散。对于那些重视资本和信义并以此争取合作的高宽容度政府来说，上述策略更加可取。相比之下，委托策略可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政权，不过，当有权势的庇护人(如同大多数低宽容度的国家)为信任网络提供保护以抵御其他掠夺者的强制行为时，该策略将对信任网络的内部运作造成完全不同的影响。尽管所有政权的掌权者都实施掠夺，但是，除非是信任网络自己掌权，否则，掠夺的策略仅适用于低宽容度国家的信任网络。

可以肯定的是，推动国家以外的掠夺者放弃掠夺的文明进程是多种多样的；海盗和土匪是否猖獗，取决于他们的牺牲品是否兴旺。就此而言，掠夺者与政府的关系具有某种微妙的辩证性：掠夺者的掠夺行为是否猖獗，部分地取决于政府是否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保证(Lane 1973, 197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非海岸地区——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盗活动随着内陆国家间贸易的发展而沉渣泛起，就展现了这种辩证性的另一面。当然，从对非政府发起的信任网络的广泛掠夺

到政府强行汲取信任网络的资源，其间经历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此而言，掠夺的策略在维护信任网络的自治性方面并不具有长期的有效性。隐藏、委托和掩饰的策略在防范掠夺方面也越来越不具有吸引力。倘若信任网络有能力恪守边界、有办法实现成员和资源的不断更新而无需暴露在外，隐藏的策略倒是可以天长地久地无限使用；而这一切在打猎、采集、田园牧歌、鲜有剩余的农耕世界更加可行，却无法适用于商业经济的世界。相比之下，委托策略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一些，但仅限于在庇护人有能力和有兴趣保持其政治自治的条件之下。在这个经济错综复杂、政府无所不在的世界里，掩饰的策略成了隔绝型信任网络的法宝。正如后苏维埃时期俄罗斯的“拉关系”生存法则所揭示的，掩饰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隔绝型信任网络的主导策略。

注释：

[1] Allcock 2000: 388—390, Boehm 1987, 1996, Gould 2003, Ikegami 1995: 244, Malcolm 1996: 18—21, Otterbein 1999, Ylikangas, Karonen, and Lehti 2001.

[2] Brass 1996, Brubaker and Laitin 1998, Ellis 2000, Horowitz 2001, Kakar 1996, Naimark 2001, Williams 2003.

[3] Brewer et al. 1988, Chalom and Léonard 2001, Chevigny 1999, Cunningham 2003, Deflem 2002, Huggins 1998, Kalmanowiecki 2000, Kraska and Kappeler 1997, Monjardet 1996.

[4] Bayart, Ellis, and Hibou 1999, Davis and Pereira 2003, Hochschild 1998, Romero 2003, Stanley 1996, Tishkov 2004.

[5] Black 2000, Muir 1997, Nada Patrone and Airakli 1986, Najemy 1981, Trexler 1981, Zink 1997.

第五章

从隔绝到整合

截至 1720 年，法兰西帝国的军队已在北美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尽管自 1700 年以来，有些地盘已陆续断送给了好斗的英国人，但法国仍宣称拥有后来被称作加拿大东部除哈得孙湾、阿卡迪亚和纽芬兰以外的区域，以及后来被称作美国的中西部以北区域，并分享着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魁北克、蒙特利尔、底特律、圣路易斯(St.Louis)、莫比尔(Mobile)和新奥尔良均以法国的城市或要塞的面目而存在。法国的商人、士兵和行政官员控制着连接美洲大陆与欧洲的航道。暴力、阴谋和贿赂相辅相成地共同作用于帝国的统治体系之中。伴随着西班牙、英国及其殖民定居者的持续竞争压力，法国保有这片土地直至 18 世纪 60 年代。在七年战争(1756—1763 年)中，法国被英国击败，前者的北美领地由此大幅缩水。不过，即便到了那时，法国仍对称雄于北美大陆心存希望。

法国在北美大陆一度如日中天，但是，面对自其登陆伊始就交道不断的印第安人，法国人却无法实现长期的支配，最多也不过是偶尔支配罢了。法国人一再尝试，但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把印第安人赶走，都促使印第安人在先前彼此不同的村庄、群落、部族和联盟中衍生出新的联合形式。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统治者常常用之于民众的三种手段：

强制，是指所有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是使稳定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的集中的行为手段。

资本，既包括有形的和可予转让的资源，也包括那些增进资源的使用价值、同时导致占有资源的诉求与日俱增的行为。

信义，是指促使社会单元彼此顾念的关系。

法国的统治者将上述三种手段综合地加以运用。与征服相伴随的是强制手段的大量运用，同时也以礼尚往来的方式收买印第安人，在印第安人和天主教传教士之间培植信义，并促使印第安人对双方通婚保持容忍态度。

法国人自上而下地施展强制、资本和信义，尽管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但并未将印第安人整齐划一地纳入法国的统治体系之中。在与法国征服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印第安人生成了隐藏、委托、掩饰和掠夺的技能。除了印第安人通常具有的对欧洲人统治的抵触之外，法国人发现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也在从中作祟，他们热衷于为困境中的印第安人提供支持、使其对抗法国。作为回应，法国人试图再以同样的方式将英国和西班牙的印第安支持者收买过来。

直至七年战争战败之前，法国人不断地试图降伏印第安人、试图将其整合到持久的庇护—代理关系之中、或是实现某种类似于次主权国家的经纪型自治。这些努力短期内有所成效，但就长期而言，这些措施所导致的往往不是整合，而是隐藏、掠夺以及(特别是)掩饰。其后果便是，法国的士兵、行政官员和商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用于与其领地上的印第安人协商共处。这种协商形成了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所说的认知和行为上的“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它将名义上享有主权的法国统治者和在其权限范围内的印第安人连接在了一起。以更为贴切的方式说，在人口稠密的法国人定居点和人口稠密的印第安人领地之间，转而形成了一个双方混杂相处的接触地带。到17世纪90年代时，这个中间地带已延伸至整个五大湖区。

在这个中间地带，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相爱、同居乃至结婚。譬如，1694年，既是杰出商人又是臭名昭著的浪荡公子的米歇尔·阿科(Michel Accault)，向伊利诺伊的卡斯卡斯基亚(Kaskaskia)部族首领的17

岁女儿阿米潘乔(Aremepinchieue)求婚。阿米潘乔是一个热忱的天主教徒，她在宗教上无视父亲的反对，在婚姻上她拒绝嫁给糟蹋教义的阿科。她得到了伊利诺伊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雅克·格拉维耶(Jacques Gravier)的支持，后者已与阿科的敌人结成了同盟。无论这场冲突剧情如何，主角们最终上演了令人惊讶的结局：在格拉维耶神父的支持下，阿米潘乔同意嫁给阿科，条件是新郎应当重拾天主教信仰，而她的父母也必须受洗。各方阵营均接受了上述条件。随着这件令人眩晕的事件的发生并伴随着法国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到1711年时卡斯卡斯基亚部族已几乎人人都是天主教徒了(White 1991:74)。

阿米潘乔并非“中间地带”的一起孤证。截至18世纪20年代，法国男子与印第安女子之间频频发生的同居现象——有时也结婚——已持续了70年。这个中间地带生活了三代人以及数量更多的混血儿。如果怀特(White)对中间地带的主要特征界定无误，那么，1694年阿米潘乔与阿科的婚礼就不仅生动地阐明了法国人与印第安人关系的某些具有开创性的特点，而且，也使三十年后印第安人得以顺理成章地对法国人之间的谋杀进行干预。1723年，一名法国士兵侮辱了一名法国仓库保管员佩里约(Perillaut)，后者以短剑报复并杀死了这名士兵。法国当局判处佩里约死刑，但是，与该犯交往密切的伊利诺伊的印第安人却要求刀下留人(作为仓库保管员，佩里约负责向印第安部落分发法国政府的礼物和军需物资)。首先，三名卡斯卡斯基亚部族首领在30名武士的簇拥下出场，接着是一支卡霍基亚人(Cahokias)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了备受尊敬的玛丽·罗姆潘乔(Marie Rompiechoue)：正如她的名字所暗示的，这位妇女很可能是阿米潘乔的女儿或近亲。

此时，卡斯卡斯基亚的首领们已同法国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奇克索人(Chickasaws)和福克斯人(Fox)。印第安人给法国人送去一只表示和睦的烟斗，后者很清楚这在印第安人传统中的意味，他们接受了烟斗，也接受了烟斗赠送者的请求。在一名印第安天主教徒发言人的带领下，卡斯卡斯基亚人提出了一个狡黠而有说服力的

观点：奇克索人和福克斯人可能将卡斯卡斯基亚人的朋友佩里约的死刑，看作是在为自己在与卡斯卡斯基亚人和法国人的战争中死难的同胞复仇。为同时维护印第安传统和天主教信仰，卡斯卡斯基亚人认为凶手向死者家属忏悔、赔偿及一个法国式的宽恕，可以使问题得到更加公正的处理。首领们进而提醒法国人，卡斯卡斯基亚人因替法国人复仇而牺牲了许多生命，但是，应法国人的请求，他们并未要求自己的敌人血债血还。

法国的指挥官布瓦布里昂(Boisbriant)心领神会，他——

坚称此事没有先例，但他同意向国王提出请求，要求赦免并释放佩里约，以求勿在“为法国人复仇而牺牲的”卡斯卡斯基亚人的尸骨上，“再加上现在正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尸体”。伊利诺伊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份由法国人审理的案件就此结束。同年五月，佩里约获释。(White 1991:92)

协商是在这样一个世界进行的：法国军队对敌对的印第安人肆意屠杀，而处于战争状态的印第安人则将被俘的敌人拷打、剥头皮、烧死甚至生吃。卡斯卡斯基亚人和法国人并未采用非暴力的一般策略，而是对统治的条件进行协商并达成共识。

我们对 17 世纪 90 年代至 18 世纪 20 年代印第安人的日常生活所知甚少，以致无法确定卡斯卡斯基亚人是否在整体上构成了具有单一联系的信任网络。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意味着它从未将卡斯卡斯基亚人或其他北美印第安人持久地整合到政权体系之中。不过，这一时期印第安人和法国人在五大湖区一带的交锋，也必定包含了信任网络与政权体系之间的反复摩擦，其所展示的是从信任网络的完全隔绝到信任网络的完全整合之间的中间地带。

自上而下地看，我们看到法国官员对强制、资本和信义的不同组合形式尝试地加以运用：他们间或地实现了庇护体制或经纪型自治，但从

未将印第安人的信任网络完整地整合到法国人的统治体系之中。自下而上地看，我们看到印第安人及其混血儿将隐藏、掠夺和掩饰的策略，与法国庇护人提供的有条件的庇护糅合在了一起。这是殖民控制的早期阶段。

不对等的相遇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从信任网络成员的视角观察信任网络。基于这一视角，我们看到了统治者运用强制、资本和信义等多种组合形式，以此控制被暴露的信任网络并从中汲取至关重要的资源；我们看到了信任网络与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掠夺者之间的反复摩擦；此外，我们还看到了信任网络的外部联系、网络边界、网络维持和内部关系的变化，是如何对信任网络的日常运作产生影响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遇到那些信任网络被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的重大过程：已有信任网络的分解，信任网络之外的人口数量大量攀升等。这些过程究竟是如何产生其政治后果的呢？以下方法将再次有助于我们的分析：即将这些过程划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部分，然后，再将两个部分糅合为一个整体机制。

“自下而上”的意思很简单，是指从信任网络的视角予以观察。本书第二章区分了自下而上策略的七种形式：

- (1) 隐藏：避免被当局发觉和操纵；
- (2) 掩饰：借助可资利用的公共身份佯装一致，但服从的程度、内部组织运作和资源的透明度均保持最低；
- (3) 委托：获得中间权威的保护，由此降低服从程度和组织透明度，但代价往往很高；
- (4) 掠夺：组织具有足够外部效力的武装力量攫取资源，同时抵抗他人的掠夺；

(5) 收编：主动地为现政权中适宜的小环境(niches)所整合；

(6) 讨价还价：在双方附条件同意的基础上与主要的政治角色建立联系；

(7) 解散：因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或通过集体议决而使既有的信任网络解体。

在信任网络与政治权威打交道的漫长历程中，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一条策略序列：例如，瓦莱达奥斯塔*的瓦勒度派就沿着隐藏—掩饰—委托—收编的整合路径，从一个秘密教派演变成为新教组织的一员。与之相反，收编—委托—掩饰—隐藏的策略序列所描绘的，则是法国大革命之前和革命期间诸多宗教会社的变化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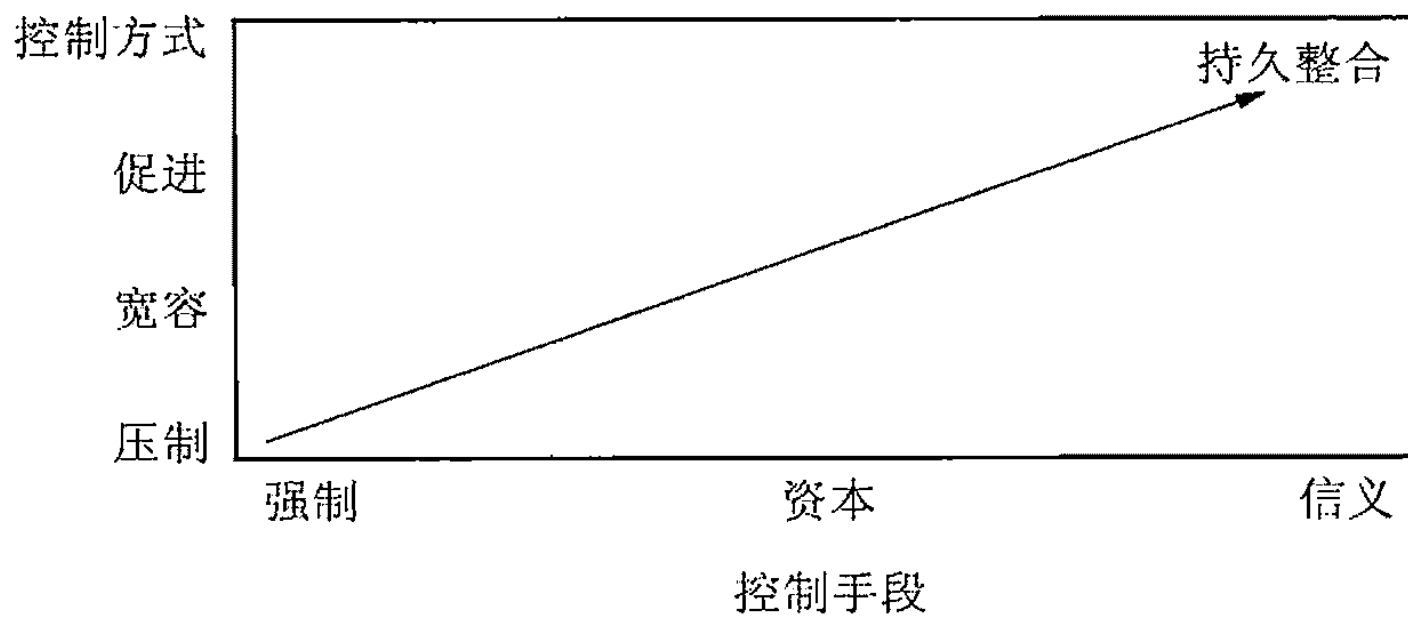


图 5.1 统治者自上而下整合信任网络的示意图

与信任网络自下而上的策略相反，政治权威运用自上而下的策略试图控制信任网络及其内部资源。图 5.1 概括了这一过程可能呈现的主要方向。首先，政治权威对控制手段(means of control)加以选择：强制、资本和信义的各种混合形式——从完全依靠强制(除了打击和摧毁之外别无他途)到完全依靠信义(除了诉诸沟通、团结等共享手段之外别无他途)。其次，政治权威还对控制方式(mode of control)加以选择：推动、容忍还是压制信任网络的运作。控制手段及其方式的某些组合形

* 瓦莱达奥斯塔 (Val d'Aosta)：现为意大利西北部大区，南邻皮埃蒙特大区，首府奥斯塔。——译者注

式——如强制手段的推动——乍看起来匪夷所思，其实际运作更是绝无仅有。但是，在某些时候，统治者恰恰就是以强制的手段进行推动的，如法国的统治者在北美消灭其印第安盟友的敌人。在图 5.1 中与之相对的角，以信义为手段的压制颇为常见：每每发生在天主教会将持不同教义的“异端”信任网络革出教门之际。图中的箭头概括了我的主要观点：统治体系对信任网络的持久整合取决于强制手段的控制的日益减少，以及对资本和信义手段的依赖的日益增加。这种转变具体表现为从压制到宽容和促进的演进。

显然，政治权威在手段和方式上的选择，是与信任网络为应对政治权威而采用的策略相互作用着的；尽管关系不对等，但是，双方都致力于应对对方的策略。面对掠夺型的信任网络——如海盗和土匪——政治权威通常如是作出选择：从强制手段的压制(直接予以打击)到资本手段的促进(征募为武装商船或雇佣军)。面对政治权威强制手段的压制，贸易离散社群通常如是作出选择：从资本手段的掩饰(行贿)到信义手段的委托(获得家族或教派的庇护)。就此而言，在信任网络、统治者和其他政治角色之间出现了持续的协商。

这种协商将不同的信任网络定位在了“关系—手段”图示*中的不同方位，它们被区分为规避型遵从、经纪型自治、专属型纽带、庇护体制、极权体制、民主体制和神权体制。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这种协商在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方面形成了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譬如，极权体制与神权体制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以信义——由共同信仰的伙伴关系所凝结——替代极权主义强制。经纪型自治与庇护体制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包含了对某个独特团体及其代表性的明确认可。规避型遵从与专属性纽带——相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以颇为相似的方式运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统治者与信任网络的纽带中保留了协商性和附条件性。与上述类型相比，民主体制颇为不同，

* 参见本书第二章之图 2.1 “信任网络与政权中心关系图”。——译者注

因为它所包含的三种纽带——信任网络与统治者、信任网络与中间人、统治者与中间人——都是以协商和附条件的方式运转的；这自然让我们想起了玛格丽特·利瓦伊的“附条件的同意” (Levi 1997:21)。在民主体制下，“附条件的同意”主要建立在物质激励和信义共享所共同构筑的基石之上。

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解释从高度整合到高度隔绝的变化过程。居于上端的整合层——极权体制、民主体制和神权体制——是一个直接统治的区域，中央政府代理人在此将其旨意有效地延伸至地方社群。位于中端的协商层——庇护体制和经纪型自治——是一个非直接统治的区域，有权势的中间人在此享有辖区内的高度自治权。处于底端的隔绝层——规避型遵从和专属型纽带——是一个政治控制薄弱的区域，既缺乏权力中心的有效支持，又无法获得强有力的自治型中间人的庇护。图 5.1 由此囊括了本章所提出的两个形影不离的问题：究竟是哪些过程将信任网络置于了图中的不同区域——特别是置于直接统治、间接统治和薄弱控制的区域？究竟是哪些过程将信任网络从一个区域转向另一个区域？

自下而上地观察所有区域，我们有何发现呢？在底端的隔离层，我们发现除了统治阶级的成员之外，很少有人依赖于政府机构以保护他们重大而长期的事业免遭风险，绝大多数人选择在自治的信任网络中组织上述事业，并尽其所能地保护网络免遭政府的干预。在中端的协商层，我们发现信任网络被部分地整合到统治体系之中，但与之相伴随的，常常是权势的中间人保护信任网络，使之免遭统治者的直接干预。在上端的整合层，我们发现既没有将自己的信任网络置于政府的直接干预之下，又没有与其他政治角色(如工会、政党和公司)相互合作的人们，为谋求自身发展转而依赖于政府的各种关系。唯有在上端的整合层，我们才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公民将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军、将自己的毕生积蓄用于购买政府债券，以及心甘情愿地对人口普查作出回应。那么，居于上端整合层的政权是如何以及何以存在的呢？

从底端的隔离层行至上端的整合层，我们发现对隔绝和整合的过程分析存在诸多颇具挑战性的难点。在经历了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变迁之后，很少有信任网络不在自身的组织结构和人员构成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在与入侵的法国人的交互运作中，印第安人的村庄和部落在组织形式、地理方位、外部联系甚至名称上都发生了持久变化。在北美，上述变化贯穿于——理查德·怀特所研究的——整个 17 和 18 世纪；即便在今天的美国和加拿大，尽管许多部落都宣称自己嫡传于——怀特所调查的——古老部落，但是，他们的组织已与过去的祖先鲜有关联。就此而言，我们不要奢望有某种一成不变观察结果，不要奢望“同一个”信任网络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地游历了所有阶段。

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在任何一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既有的信任网络向上或向下地在隔绝、协商性联系和整合之间游历，我们都能看到新的信任网络的诞生和旧的信任网络的分化，我们都能看到隔绝型信任网络随着政治关联型的信任网络的形成和扩展，而不断地分化或流失其成员的过程。尽管有些复杂，但将本章的任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无疑可令分析更为清晰：首先，对实际存在于不同层面——隔绝、协商和整合——的信任网络进行观察，了解其运作状况是否如我们的一般结论所示；其次，对信任网络的分化和新的诞生过程进行广泛观察；最后，检视既有信任网络之运作是如何与更加宏大的变迁过程相契合的。

隔绝型信任网络

现在我们从底端自下而上地进行探索。如图 5.1 的底端部分所示，统治者往往通过断断续续的强制或是某种特定的信义纽带对信任网络实施影响。这里只有薄弱的政治控制，而信任网络的成员则热衷于综合

运用隐藏、掩饰和掠夺策略。在向上移动的过程中，我们将穿越一条非直接统治的协商区域，到达统治者充分运用资本和信义建立直接统治的区域。在这个上端的整合区域，我们将看到信任网络采用了收编和讨价还价的策略，但也可能因为统治者——包括民主体制——鼓励信任网络向新的、整合的方向转型而选择解散。

接下来，我们将从每一种类型中抽取一个例证，描述自下而上从高度隔绝走向广泛整合的旅程。我们曾经细致考察了中世纪欧洲的与世隔绝的瓦勒度教派——当今世界亦不乏对这类隔绝型信任网络的披露。在这一点上，大多设立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网络为此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就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而言，其压制型的政权禁止任何正式组织——除了少数法定政党——开展政治结社和动员活动，并对胆敢公开发表政治诉求的权威组织予以取缔。其后果便是，普通民众对其生存和发挥影响的唯一渠道——非正式网络——的依赖随之增强(Singerman 1995, Chapter 3)。

同样贫乏的公共生活驱使激进主义转入地下。正如戴安娜·辛格曼(Diane Singerman)所观察到的：

君主、王室、军队和知识分子等各种力量相互勾结，扼制着整个地区数量庞大的中间团体和正式组织；无论这些团体和组织是专业学会、宗教小组、邻里或社区组织、政党、妇女团体、人权组织或青年团体，一概遭到封杀。苛刻的法律——禁止集会结社、限制资金募集、强行报刊审查以及过度的管制——削弱了社会权力和社会组织的多样性，而只给国家、家族和宗教机构留下固定的空间，然后返还一点点公民权、代表权、言论权或政治自由。激进主义面临许多风险和阻碍，更不必说宗教激进主义了。(Singerman 2004:148—149)

对诸如医疗门诊、学校、慈善机构、文化团体等不具有政治外观的

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政权无可奈何、只能予以容忍(并伴之以严密的监控)。在相对开放的约旦——

政权受命对各种宗教讨论予以控制，因而运用行政、压制和法律机制打造了一张大网，以限制持异议的伊斯兰组织；其后果便是，正式组织在对宗教权威的斗争中被捆住了手脚。另一方面，与政权关系密切的较温和的伊斯兰教徒，则被允许通过正式组织开展活动：条件是组织的行动必须与组织章程相一致，并不得挑战国家的伊斯兰教义。(Wiktorowicz 2001:83)

不仅如此，这些政权还要面对宗教极端组织的隐秘反抗：后者主张在已被世俗化——包括(或)为世俗化的西方国家所收买——的伊斯兰世界推行严格的宗教统治。尽管没有多少教徒真正卷入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之类的敌对组织，但有着与本·拉登相同信念的、主张建立纯净的宗教世界的教徒却大有人在。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宗教教徒将隐藏和掩饰两种策略组合地加以运用：将自己的组织网络隐匿于地下，同时向被允许公开存在的宗教组织渗透，在对后者实施影响的同时将有培养前途的信徒纳入自己的网络。例如，什叶派教徒(Shiites)对外宣称与政治权威保持一致——即塔基亚(taqiyya)* (Kepel 2002:38)。再如约旦的萨里菲派(Salafi)狂热分子从——宗教上虔信而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既有的穆斯林派系中招募到了大量的新成员(Wiktorowicz 2001:134—135)。

借助宗教学习团体打入合法组织是一条惯常的方法。在也门和其他地区，虔诚的妇女们常常参加《古兰经》学习小组——纳德瓦(nadwas)。在贾宁·克拉克(Janine Clark)看来，纳德瓦——

* 塔基亚(taqiyya)：伊斯兰教义，指在面临危险或遭到胁迫时可隐瞒甚至否认自己的信仰，但同时内心必须为信仰而舒畅。——译者注

是妇女非正式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古兰经学习小组为参与其中的妇女提供了宗教的慰藉和指导、识字和伊斯兰教教育,提供了一个情绪的宣泄口、一份家庭以外的社会生活以及团体的支持。与此同时,纳德瓦还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论坛:她们可以找到应对自身问题的各种建议,或是了解从何处(或向何人)寻得良方。此外,纳德瓦为传播知识和教育、以及教育从女性宗教学者向下一代的传播构建了重要的桥梁。当女孩子们在家学习伊斯兰教时,家庭纳德瓦中就将涌现出有志于更广博知识的妇女。(Clark 2004a:169)

这类学习小组典型地具有人员流动和缺乏正式组织结构特征;然而,它们在伊斯兰教徒的捐助、慈善和互助活动方面起到了相当突出的作用。纳德瓦无异于是“自由的空间”:政府因对宗教心存畏惧而不敢涉足于内,而离群索居的妇女们则能相会于此。^[1]出于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畏惧,也门当局也着实无法禁止这些中产阶级妇女们聚集一处、从事庄严的宗教社会活动。

纳德瓦本身并不足以成为信任网络,但是,它们为宗教信任网络的成员提供了通过安全渠道,使其得以提升自身信念并招募新成员的空间。纳德瓦所做的与其说是通过古兰经课程公开征募信徒,不如说是借机发现潜在的伙伴、邀请其加入另一个伊斯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纳德瓦(Clark 2004a:178)。一个由颠覆破坏分子所组成的网络,由此在规避型遵从的掩护下将隐藏和掩饰的策略结合在了一起。

宗教信任网络并非始终处于地下,也并非总是与所在地的政权相隔绝。例如,让反对伊朗王权的世俗改革家们倍感沮丧的是,以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为首的宗教派别最终夺取了伊朗政权,而世俗的反对派则分崩离析(Kepel 2002:36—42, 106—135, Parsa 2000:247—250)。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军事行动最终击溃了伊斯兰武装组织(Islamist Groupe Islamique Armé),但是,该组织在20世纪90

年代期间的狂热行径及其对平民的大肆屠杀仍然极大地动摇了政权 (Kalyvas 1999)。此外，宗教极端组织塔利班也是在穆斯林贸易网络——“哈瓦拉”^{*}——所运送的黄金的支持下夺取了阿富汗政权 (Farah 2004: 113)。就这些事例而言，真正让整个中东地区保守的穆斯林统治者害怕的，实则是世俗层面的东西——即曾经与世隔绝的信任网络正以军事手段追逐国家权力。在伊朗、苏丹及阿富汗，诸如此类的网络甚至成功地——至少是暂时的——构建了自己的神权体制。统治者在底端隔绝层所施展的薄弱控制、间断强制和特殊纽带，既没有给它带来深植于信任网络之中的资源，也未能抑制住其所时常遭遇的政治威胁。

协商性联系

为了达到剥削和抑制信任网络的目的，全世界的统治者都尽力——常常是以远远达不到完全整合的方式——将触角延伸至信任网络。统治者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与信任网络的庇护人达成交易：庇护体系和经纪型自治。就庇护体系而言，信任网络处于有权势的中间人的保护和控制之下，后者容忍信任网络的存在、从中汲取资源以尽其应对政权之职。诸如此类的庇护人往往不是信任网络的成员。例如，本书第二章向我们展示了 13 世纪的西班牙加利西亚的村民通过寻求当地有权势的修道院的庇护，以保护自己免遭莱昂王的索取。这些村庄成为庇护人的委托者，庇护人反过来使他们远离国王的统治。

经纪型自治同样包含了庇护的成分，但经纪型自治与庇护体制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就前者而言，信任网络获得了统治者的正式承认，拥有了某些特殊的权利，并直接将协商获得的好处回报政权。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贸易离散社群，都与重要的贸易中心的统治者建立了这样或那

* 参见本书第三章的“贸易离散社群”。——译者注

样的关系：或是仰仗地方权贵的庇护，或是正式获得许可以域外社群的身份从事贸易活动。

自上而下地看，信任网络获得庇护人的庇护从而免于遭受统治者的镇压，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几乎不能获得统治者的宽容和促进。与之相反，经纪型自治的受益者则能够得到统治者的宽容，并至少获得一点点促进。以信任网络的视角自下而上地看，无论经纪型自治还是庇护体制都是以委托为中心，而不是以隐藏、掩饰或掠夺为中心。信任网络的成员必须为庇护支付报酬，而领取报酬的一方则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信任网络的自治性。总体说来，经纪型自治为信任网络提供了更多的保证，使其成员得以维护他们的集体生活之道。

早在当代民族主义出现以前，欧洲人就已用“民族”(nations)一词称谓经纪型自治的受益者，其含义更多地是指本地人而非对某个民族国家的依附。在中世纪的欧洲，“民族”通常指来自同一个地理区域的社团组织，尽管有时也被用来指称某个特定区域的成员。在民族的许多定义中，《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列出的一例是：

指中世纪大学里隶属于某个特定的城区、乡村或乡村团体的一群学生，他们形成了多少带有独立性质的社群。这在格拉斯哥和阿伯丁的大学仍有保留，并常常与校长(Rector)选举有涉。
("nation", definition 1c)

在大学、城市及其他消费中心，这些民族常常选举自己的行政官员和代表、为自己提供保障、判决自己成员的过失，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负责自己的食物供给。在与地方当局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些具有共同起源的信任网络创建了自己的权威组织。正是这种特殊的结构，常常使政治权威获得相应的口实、找到相应的手段，在饥荒、疾病或战争期间将整个民族——包括以民族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宗教少数派——驱逐殆尽(Tilly: 1975:437—440)。

正如我们可能设想的那样，经纪型自治常常是由某些权威最初提供的庇护而构成的。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地方当权者常常招募隶属于自己的犹太社群以组织财政、促进贸易、从跨民族的交易中获利，以及征收税赋。鉴于犹太人的商业才能和各种关系，波兰的统治者对他们持欢迎的态度，王室的引进政策——引进犹太人进入波兰城市——促进了德系犹太人的大规模东进，使意第绪语(Yiddish，建立在德语基础上的方言)成为流行于欧洲东北部主要地区的语言。无独有偶，伊比利亚的许多犹太人向北非和奥斯曼帝国境内迁徙，那里的穆斯林主人为他们开放了一些小特区(源于伊比利亚的犹太人更多是讲被称为拉地诺语*的方言，而非意第绪语)。

还有大批犹太人移民到更加宽容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威尼斯为犹太人开放了一个新的定居区，后者在1516年定居于久德卡**——意思是犹太人区。人们称这个新的区域为“隔都”(Ghetto)；它是威尼斯人的“铸造车间”，先前已在此兴建了一些金属加工企业。随后，“隔都”一词被用于任何一个城市的犹太人聚居区。向波兰和地中海的两股迁移，使德系犹太人和西班牙系犹太人之间已有的区别进一步扩大了。

以的里雅斯特***的犹太社群为例，洛伊丝·迪宾(Lois Dubin)煞费苦心地对这个群体的经纪型自治状况进行了梳理。1382年，为了防备威尼斯人的掠夺，这个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北海岸的港口城市求助于哈布斯堡家族(哈布斯堡自此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世袭)。在威尼斯人称霸天下以及南方的奥斯曼帝国扩张的数个世纪里，的里雅斯特为维也纳与繁忙的亚得里亚海之间的联系留下了不多的一点余地。不过，到18世纪早期，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便开始在地中海一带建立自己的商业存在，包括将贸易延伸至当时依然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1719年至1769

* 拉地诺语(Ladino)：一种西班牙犹太人说的方言。——译者注

** 久德卡(Giudecca)：威尼斯南部潟湖中的一个岛屿。——译者注

*** 的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北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边境，是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 and 的里雅斯特省的首府；历史上曾是奥匈帝国的主要出海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入意大利。——译者注

年间，哈布斯堡王朝一步一个脚印地创建了这个向许多国家商人开放的免税港，并随之扩大了它。工夫不负有心人：的里雅斯特成为繁荣的城市，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重要海运中心。

早在 13 世纪，就有犹太人居住在的里雅斯特，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享有授权的公共银行，这一状况已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

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一些犹太人及其家庭定居到了的里雅斯特，如莱维斯 (Levis) 在 1556 年、文图拉·帕伦特 (Ventura Parente) 在 1624 年移居至此。他们享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赐予的特权，以在战争期间提供“物资和生命”作为回报。这些特权给予犹太人以政治保护和公平待遇、犹太教不受侵犯、犹太人享有在已有犹太人居住的任何城镇——包括维也纳——居住的权利、其经济活动不受限制——包括有权拥有不动产、无须佩戴特殊标记或缴纳特别税，以及有权拒缴天主教商人纳税范围之外的任何税。(Dubin 1999:18—19)

当时，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给予的里雅斯特的犹太人以普遍的特权。相比之下，在法国的城市梅斯 (Metz)，法国王室向犹太社群征收沉重的人头税和附加费，并课以供养和招待皇家军队的义务，却不为在法国境内旅行的犹太商人提供人身保障。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和的里雅斯特市政当局小心翼翼地给予宽容，同时大手笔地予以促进。政治权威们给予的里雅斯特的犹太人以保护，使之免遭经济盘剥、暴力侵害和反犹太主义的报复——诸如此类的掠夺在欧洲其他地区已是家常便饭。从的里雅斯特犹太人的视角看，被帝国的公共生活完全收编付出了尽管尚能承受、但毕竟过于高昂的代价——犹太人被迫同化并皈依天主教。就此而言，隐藏、掩饰或掠夺不是的里雅斯特犹太人的有效生存策略；为了获得庇护，他们付出的是委托的代价。

保护是有限度的。与法兰西的堂兄弟们相仿，哈布斯堡王朝同样试图控制帝国境内犹太人的数量。1697年，在与犹太社群领导人费了一番口舌之后，这个城市正式建立了一个“隔都”：内含三条街道，外设三座城门，坐落于波蒂娅—里贝罗(Portizza di Riborgo)街区。自由港的生活使犹太社群的财富大幅增加，激励了更多的犹太移民涌向的里雅斯特，并使获得特别许可、居住在“隔都”以外的犹太社区的数量与日俱增。的里雅斯特的大部分犹太居民一直居住于此，直至1785年“隔都”被正式废除。

然而，犹太社群的经纪型自治一直维持到了19世纪。的里雅斯特的犹太人不得成为公民，也不得担任公职，他们是这个城市被许可的各种 *nazioni** 中的一员(政权用一目了然的术语 *Università* 指称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犹太人维持了一种获得政治权威许可，但与政治权威相隔离的公社制度。犹太社群的成员被称为“的里雅斯特的希伯来人”(i *hebrei di trieste*)，他们开展宗教活动、维护犹太公墓、控制犹太移民，并对不守规矩的成员进行规训。但是，随着犹太社群的不断发展，它与政权的关系也日益形式化了。1746年，犹太社群提出了一份深思熟虑的提案，要求设立由所有履行纳税义务的家族头领组成的议事会，并可从中选举两名头领作为代表。这份提案得到了政府正式批准，从而使书吏、教士、拉比、祈祷文领诵、执事等职位得以制度化(Dubin 1999: 22—23)。在的里雅斯特的犹太人信任网络中，他们创造了一种权威化的组织，并且得到了政治权威的承认。

到1782年时，这个社群开办了自己的——同样得到了政权承认的——师范学校：犹太律法师范学校(*Scuola Pia Normale sive Talmud Torà*)。在“隔都”内，学校与其他社群机构、犹太教的洁食屠户(*kosher butcher*)以及犹太教会堂(*synagogue*)共用同一幢建筑(Dubin 1999:

* *nazioni*: 意大利语，意思是民族(nation); *Università*: 意大利语，意思是联合之整体(university)。——译者注

103)。1788年，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欧洲历史上首个征募犹太人参军的国家，尽管的里雅斯特的犹太社群领导人表示愿意合作，但还是被免除了兵役(Dubin 1999:148—152)。而与此同时，的里雅斯特的犹太人成功地抵制了哈布斯堡国家根据民法要求他们改用德语姓名，以及拟对犹太人婚姻习俗所做的管制。不过，不到半个世纪，这个正式的经纪型自治的残余形式便烟消云散了。

整合型网络

我们一直专注于信任网络与政权之间若即若离、断断续续的关系，而对信任网络的广泛整合则疏于交待。行文至此，应当有所论述。我们发现，这种整合发生于：

- 地方征募的军事组织为联邦军队所整合；
- 移民链所组成的社群与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共存共荣；
- 海盗船摇身一变而成武装商船；
- 教区和宗教会社(常常是勉为其难地)为欧洲的国家教会所整合。

除了移民社群之外，上述事例尚不足以呈现当代强有力的国家对信任网络的整合。在这方面，从俄罗斯的犯罪和暴力世界传来意想不到的信息。20世纪90年代中期，瓦季姆·沃尔科夫(Vadim Volkov)不顾个人安危打入暴力商业活动领域。在其著作中，他如是谈及这个主题：

本书源于我所看到的一副场景。1995年，我上班时习惯穿过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建筑——“西北区域反组织化犯罪理事会”

(Northwestern Regional Anti-Organized Crime Directorate) 总部大厦。每次我都看到同样的景象：一伙人全副武装，头发剃得极短，身穿皮夹克或黑色长大衣，他们走出总部、登上深色车窗的黑色汽车、分头驶向不同的方向；另有一些人则在此泊车，然后走进大厦。每次我都感到震惊，因为这些人的言谈、举止和所作所为与他们所要打击的组织化犯罪团伙——所谓黑帮——几乎如出一辙。(Volkov 2002:ix)

此番场景引发了沃尔科夫的奇异之旅——对苏联解体后的地下世界进行了考察。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苏联政府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国家安全部队，其中包括闻名西方世界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KGB)。不过，极权主义体系的缝隙中也隐藏着一小撮流氓和犯罪分子，他们往往孳生于摔跤、拳击、举重、武术等运动俱乐部。20世纪90年代，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使苏联的国家安全局势发生了四点主要变化：第一，政府大幅度削减专门的安全部队，致使大量的相关专业人员投身于私人劳动力市场；第二，政府亦由此放松了相关领域的监管，从而给予大大小小的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第三，从阿富汗的战争僵局中撤出苏联军队，致使成千上万杀气未泯的退伍军人涌入民用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中很少有合法的雇佣关系；第四，从地方市场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致使私营经济一路高歌猛进，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致使俄罗斯整个商业领域充斥着与日俱增的敲诈勒索和榨取保护费的行径。

自下而上地看，以一定价格出售保护业务的流氓们通常属于信任网络，如歃血为盟的犯罪团伙、赌博团伙、曾经秘密从事政府安全工作的前雇员群体，以及曾在阿富汗并肩作战的退伍军人们。据称，俄罗斯敲诈勒索事件的发生率在1989年至1992年间急遽猛增，随后持平并在1996年出现下滑趋向(Volkov 2002:2—3)。据沃尔科夫的一名被调查者揭露，在彼得堡的一个大市场——

1989年,德维娅特奇诺(Deviatkin)一地帮派林立、相互勾结。起初,坦波夫斯基(tambovskie)、马来谢夫斯基(malyshevskie)、卡赞斯基(Kazanskie)[帮派名称]等帮派尚未完全分家——那是以后的事儿。大家向不属于任何帮派的 *kommersanty*[意思是“店主和商人们”]征收 *poluchala*[意思是“进贡”],每个帮派都有相当大的地盘。此外,我们还设立了自己的 *kommersanty*,通过为他们提供营业网点和保护以收取保护费。这里的规矩只有一条,就是不许攻击或抢劫其他帮派的 *kommersanty*。(Volkov 2002:15)

此后,不论是圣彼得堡还是其他地方,帮派都开始为争夺更大的地盘、征收更多的保护费而自相残杀;与此同时,其内部的等级结构和分工体系也日益得以强化。

这些流氓不仅从事敲诈勒索和征收保护费的勾当,而且还涉足收债、违禁商品、色情行业,以及为商人提供的私人保镖业务。在人员分布上,他们大体呈现为三种成分:(1)传统形式的土匪、暴徒和盗贼;(2)地方上的敲诈勒索分子;(3)大城市和全国范围内的、组织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私营保安服务从业人员。沃尔科夫认为,第三个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地转向公开合法的商业领域,特别是在国家停止提供警务、保安、履行同等服务之际,私营保安人员以商业服务的形式取而代之。此外,他们还开始做起了合法买卖——无论买卖的手段是否合法。实际上,他们的首领绝大部分来自于退休的国家执法机构专业人员。就此而言,他们的成功更多地是源于运用自身的信任网络,创造出了令人生畏并逐渐获得承认的权威组织。

一些运动员也因信任网络而平步青云。沃尔科夫谈到了鲍里斯·伊万纽征科夫(Boris Ivaniuzhenkov),此人在1999年曾担任俄罗斯的体育部长——

他在四天之内接受了俄罗斯总理谢尔盖·斯捷帕申[此前为

内务部(MVD)和联邦安全局(FSB)的首脑]的邀请,担任了体育部的部长。伊万纽征科夫,在警察局的档案里被称为 Rotan,是波多利斯克犯罪集团头子——绰号 lutchok 的谢尔盖·拉拉琴(Sergei Lalakin)——的左膀右臂。伊万纽征科夫出生在毗邻莫斯科的波多利斯克*市郊的一个小镇,他过着双重职业生涯:既获得了摔跤运动硕士学位,同时又是当地一个敲诈团伙的小头目。他宣称:“波多利斯克是唯一没有任何恩怨的城镇,这里总是很稳定。”在其他方面,这个犯罪团伙与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同样经历了进化的过程。他们控制了当地的市场、贸易、买卖,在巩固当地的势力之余向外扩张。维护秩序和组织慈善活动的能力……使这个暴力商业团伙获得了公众的支持:拉拉琴获得了波多利斯克荣誉市民的称号,而伊万纽征科夫则在 1997 年当选进入莫斯科州立法机构。(Volkov 2002:187)

在其摔跤手兼黑帮成员的生涯中,我们看到的是先前的犯罪信任网络——波多利斯克黑帮——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

瓦季姆·沃尔科夫对与犯罪有染的信任网络的研究,揭示了一条通往俄罗斯公共政治的整合之路。正如玛格丽特·利瓦伊的征兵研究所表明的,同一类型的整合,其实现路径亦大多相似,包括政府为退伍军人设立福利保障、许可或形成互惠性公益社团、保护宗教会社、实现同业利益团体制度化、在政府服务提供者与公民委托人之间建立纽带、强化政党内部团结、促进志愿者组织公开活动,以及为艺术、体育或种族团体提供政治扶持。在上述整合路径的引导下,信任网络将摆脱底端区域的隐藏、掩饰、掠夺而由隔绝走向整合,或许有的将经历中端区域的委托,有的将对既有信任网络的解体作出回应。但无论如何,这些

* 波多利斯克(podol'sk): 莫斯科州重要的工业和文化中心,距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约 43 公里。——译者注

过程都包含了最大限度的收编和讨价还价，其程度超出了迄今我们已检视的大部分信任网络。

整合之萌蘖

我们暂且放下对个别信任网络的研究，转而对信任网络整合于公共政治的一般过程进行考察。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的，当这种整合发生时，我们预期将看到如下景象：人们创建了公开且获得政权许可的协会、互助会、政党、联盟、宗教会社和社群，或是为尚处于地下状态的类似组织寻求政权的许可；人们在上述组织中实现了自身对于伙伴关系、亲属关系、共同信仰、安全以及高风险事业的追求；以及出现了其他一整套变化将地方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长期的活动和人际纽带，与公共政治的反复无常联系在一起。为了获得对风险性事业及相关关系的支持而如此依赖于公共政治角色和政府代理人，这种可能在历史上极其罕见。

然而，在对历史的匆匆浏览中，我们看到在某些历史环境下确实存在这种罕见的现象：有时候，宗教教派、家族集团、商业网络等形式的信任网络会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例如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对日内瓦的宗教征服)；有时候，一个政权会征服另一个由信任网络所掌控的政权(例如加拿大或美国对不曾受干扰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的征服和吞并)；有时候，组织得犹如信任网络的政治角色会篡夺现有的国家权力(例如阿富汗的塔利班)。一旦掌握了政权，统治者常常借助王室通婚和内部的庇护体制等形式创建自己的信任网络(例如 19 世纪之前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

除此之外，高水准的整合也是实际存在的：无论极权体制还是神权体制，都极力将既有的信任网络广泛而紧密地——至少是暂时地——并入极权统治体系之中(例如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对尚未被摧毁的同业公会

所做的整合)。最后，民主体制实现了公共政治对信任网络的部分整合(例如，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退伍军人的福利不断扩大——不仅确认了个人权利，而且，还将退伍军人的组织与国家直接挂钩，参见 Skocpol 1998)。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现在退一步，我们做一次英勇的跳跃。在各式各样的历史环境中，是否存在并发生过某种共同的过程？其结果无疑应当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通过这些属性，政府和(或)与政府有常规关系的政治角色(例如，国家教会或者工会的与其内部的互惠性公益组织的关系)将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联系起来。通过这些属性(如图 5.1 所示)，统治者所做的推动与统治者——除强制和资本之外——对信义的依赖相结合，其后果是信任网络被相对稳定地整合到政权之中。

一般而言，这种罕见的历史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所有可能导致转型的过程中，最可靠的选项有以下几种：

(1) 既有的与政权相隔离的信任网络逐渐萎缩和分解，或是丧失了维系成员必要活动的的能力，致使网络的支持者转而寻求与公共政治建立联系。

(2) 在面对新的风险和风险行为时，既有的信任网络无力保护其成员。

(3) 信任网络以外的人口大幅攀升，信任网络唯有与公共政治建立联系才能运转。

(4) 统治者或主要政治角色摧毁了既有的信任网络，亦将导致上述结果。

(5) 统治者或主要政治角色将既有的信任网络有效地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

(6) 统治者或主要政治角色创建与公共政治相衔接的信任网络，并征募人员参与其中。

* 法语，意思是“向后退以便更好地跃进”。——译者注

我们已经见识了历史上的信任网络成员如何积极应对、竭力避免上述六个过程的发生，努力维护自己的组织网络并使之免遭政治干预。我们看到他们保卫自己的网络边界、稳定自己的网络资源、监控网络成员的外部联系，并对可能扰乱其集体活动的内部社会关系施以控制。

例外主要来自于统治阶级的成员。统治阶级不担心国家对它们的信任网络的干预可能损害统治阶级的最终利益，相反地，它们要让国家屈从于自己的最终利益。它们通常会试探性地加强与政府或其他主要政治角色的关系，常常依靠已与之建立信任关系的最初的联系人作为中间人，而这些中间人又往往是亲属、牧师、商业伙伴、地主和在全国范围内享有权势的地方权贵。在整合过程中，中间人充当着经纪人的角色。

马乔雷恩·特哈特(Marjolein 't Hart)指出，与欧洲的其他竞争者不同，新兴的荷兰国家早在17世纪就已拥有了卓越的信用体系。17世纪反抗西班牙人的斗争，引领着重商的荷兰政权建立了有序的公共财政。而一旦如此，荷兰市民便开始孜孜不倦地投资政府债券，从而将家庭的命运与政权的命运牢牢地拴在一起：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基于以下事实对荷兰的成功作出解释，即官员和官吏是主要的投资人；他们与地方上的委托管理人关系紧密，并由此订立借贷合同。有时候，他们还热切地呼吁自己的领导购买债券，以便鼓动其他的投资客。联邦制意味着地方拥有较强的政治控制力。此外，地产和房产债权也颇为常见，不过，直至1700年，投入政府债券的资金远远超出其他投资。（'t Hart 1993:178）

特哈特提醒我们，荷兰共和国相对分散的政权结构为经纪人——他们同时在省市和全国范围内握有权势——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从而

促成了荷兰共和国在整合精英信任网络方面的早熟(Adams 1994, 1994b, Davids and Lucassen 1995, Glete 2002)。直至两个世纪之后,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的民众才开始将大部分积蓄用于投资公债。

不过,无论迟早,它的发生都是广泛的。即使当可资利用的信任网络无法给予相应的保护时,普通民众仍需面对风险并从事极具风险的长期事业。在此情况下,政府或政治角色——它们或是有能力支持既有的信任网络,或是取而代之地创建了新的信任网络——就成了民众的贴心人(allies),其吸引力仅次于信任网络。正如荷兰的事例所揭示的,具有政治关联的信任网络对于大众的吸引力,也随着一些附带条件的出现而相应增强了:建立了政府信义的外部担保,例如,和平条约或征服者的政权对战败国的政府财政承担责任;可用于降低风险和(或)风险补偿的政府资源大幅增加,例如,商业的扩展带来了新的税收;政府的信义顺应人口结构的新变化而进行的显著调整——如非公民身份者不仅有权拥有公共福利,而且还能实际享受公共福利。

无产阶级的整合

在近五百年的西方历史中,有一个重大的过程淹没在其他众多的过程之中,而该过程推动了前述之转型过程的第1项至第3项,即既有信任网络的失败、新风险的出现,以及信任网络之外的人口大量增加。这个过程就是无产阶级化,也就是依靠劳动报酬为生的人口以及(或者)不拥有或很少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涨。欧洲的无产阶级人口在1500年后急速膨胀。我对1500年至1900年欧洲人口的无产阶级化进行了估算,并将其中最为精准的数据列于表5.1中;从中不难看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以及一个与之相伴的惊人事实,即早在19世纪出现城市无产阶级化之前,无产阶级化就已经在欧洲的小城镇和乡村地区蔚然成风。

表 5.1 欧洲人口的无产阶级化(1500—1900 年)

	百万人口		
	1500 年	1800 年	1900 年
总人口	56	150	285
其他阶级	39	50	85
城市无产阶级	1	10	75
农村无产阶级	16	90	125
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30.0	66.7	70.2

资料来源：Tilly 1984:36。

以下三项主要的因素集中导致了这种爆炸性的增长：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包括农用土地——的控制日益巩固；雇佣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大幅增加——农业、纺织业和(未来的)城市商品生产与服务；以及无产阶级的自然增长——一般说来，他们比小农和手艺人更早结婚，生育的子女也更多(Levine 1984, Tilly 1984)。

与大多数农民和工匠相比，依靠劳动报酬为生的无产阶级更易于遭受经济波动的侵害。若有地主或商人雇用他们，他们就多少能够生存；而一旦面临失业，就可能死路一条。当然，地主和商人也离不开他们。因是之故，贫穷开始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公共政策问题。指责穷人的批评家们——包括统治者——创造了一个有关流浪、乞讨、游手好闲者的神话：穷人因为不够审慎和缺乏自律而必须施以惩戒。与此同时，政府当局也在需要劳动力时对穷人进行规训、以备供给。正如凯瑟琳娜·利斯(Catharina Lis)和雨果·索利(Hugo Soly)所说的，总体而言——

对游手好闲者及其同类的批评以及对工作的赞美，成为了 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早期贯穿整个西欧——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世俗群体和神职人员、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思想主题。其影响尚不仅限于文字：在荷兰(1531 年)、法国(1534 年)、英国

(1531年,尤其是1536年)、苏格兰(1535年)和西班牙(1541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乞讨和(或)济贫的相关法令,并授权地方政府制定实施细则。1522年至1545年间,西欧62个城镇创建了公共救助协调体系:德国至少有30家,低地国家有15家或16家,法国有8家,瑞士有6家,意大利北部有2家。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奉行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严禁肢体健全的穷人——无论年龄或性别——乞讨,从而逼迫其不计报酬地参与劳动;二是将既有的基金集中于一个公共钱柜(common box),从而对“真正的需求者”进行选择和控制。(Lis and Soly 1984:168; 亦参见 Lis and Soly 1979)

将穷人划分为值得帮助的和不值得帮助的,其划分标准是根据就业所需而随时调整的,即当出现就业机会时,值得将多少穷人规训为低薪的工人以备雇佣。卫道士和政治权威们大肆鞭挞穷人的懒散和目光短浅,同声指责穷人们挥金如土、行为放荡。但是,至少地方政府承认,有必要对周期性——季节性或更长周期——的失业予以遏制。

哎,只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对无产阶级化、济贫和信任网络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过论证。马克·范·鲁文(Marco van Leeuwen)辛勤地研究了1800年至1850年阿姆斯特丹的济贫状况,从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他揭示了一个精致的济贫体系:分成天主教、加尔文教、犹太教和市政当局等若干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极度精细地保存了其服务对象的登记资料——这也使得范·鲁文有可能对之进行分析,每一部分都对成员资格、价值信仰及申请条件作出了严格规定:申请者是否对所在的教会社忠实不二?是否确实缺乏诚实创收的机会?是否隐瞒了财产积蓄?是否有其他人对其福利承担责任?

1809年,该体制为德系犹太人慈善会(Ashkenazi Charity)带来了1968名成年服务对象,其中三分之二是老人、病人、拖儿带女的寡妇和(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van Leeuwen 2000:107)。范·鲁文的研究表明,即

便在此济贫体制之下，对于穷人的救助也常常不过是提供日用品，而没有提供使其维生的资金。阿姆斯特丹的穷人着实依赖于当地的信任网络，而无论这种依赖是何等的脆弱。

由于阿姆斯特丹的贫穷犹太人主要集中于街头摊贩、服装缝纫、家政服务和其他一些低收入行当，因此，犹太人慈善团体的服务对象与其他的慈善组织不同，例如，码头工人就更多地是由市政当局或路德宗的慈善团体提供救助(van Leeuwen 2000:112)。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周而复始地在温暖季节蜂拥而至的经济活动和随之而来的冬季萧条之间穿梭。范·鲁文颇有说服力地指出，阿姆斯特丹政府采取了一项颇为含蓄的政策以稳定流动劳动力，即在每年的萧条期向码头工人和同类工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以供其度过时艰而不致移民。当然，这一体制也使当局得以实施道德监控。

不过，在阿姆斯特丹并非所有的工人都依赖于公共济贫机构：工匠通常依赖于同业公会，同业工会为患病、残疾、上了年纪的成员以及去世成员的遗孀及其子女提供远远高于公共济贫机构的福利保障。1811年，在阿姆斯特丹全市的大约20万人口中，就有大约14000人是同业公会的成员(van Leeuwen 2000:167)。随着19世纪的展开，志愿互助团体、病人福利社团、丧葬协会等组织日益普及，而到19世纪结束时，阿姆斯特丹已有40%的人口加入了这个或那个互助公益社团(van Leeuwen 2000:166)。但是，诸如此类的各式信任网络均须经过官方的正式批准，其运作亦被置于公共监察之下。尽管范·鲁文没有这样说，但他所描述的恰恰是公开的信任网络被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的过程。他描述了这个巨大转型的早期阶段，古老的隔绝被颠覆了。

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推进了范·鲁文的研究，并对之进行了极大的提炼和概括。基于对各国所做的考察，林德特揭示了常规的经济发展是如何引导再分配性社会支出实现转型的，特别是这种转型反映了普通工人的政治心声。他论述道，自18世纪以来——

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社会支出的增长,已成为政府成长的核心内容。对于近两个世纪以来作为 GDP 主要成分由政府税收和支出来说,其大部分增长都源于社会支出,而非国防、公共交通或国有企业。(Lindert 2004: I, 20)

然而,雇佣劳动力日益成为经济的核心要素,这一趋势最初显现于西方,随后扩展到了全世界。伴随着这一趋势,再分配性社会支出也大幅增长,而且大多是最近发生的。在 20 世纪以前,正如阿姆斯特丹的事例所揭示的,社会支出从未充裕到可以使穷人无所事事、可以使他们放弃受雇机会的地步。林德特的研究对所谓福利将消磨掉人的主动性的观点构成了挑战,尽管保守的批评家们可能不同意这一看法。

林德特得出如下结论:社会性支出有助于稳定劳动力,有助于增进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即使社会性支出所耗费的成本极其高昂,也不会对整个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管理者们先行一步,其策略最终吸引了全世界的资本家和政府。不过,资本家和政府并非只是简单地随波逐流。林德特接着说,政府采取何种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的组织结构。在 18 世纪 80 年代至 1834 年间,英国的济贫活动之所以领先于欧洲,是因为英国的大地主以此保住自己的农业劳动力;而当 1832 年改革法被注入工业资本家的声音时,福利开支便被极大地削减了(Lindert 2004: I, 67—86)。

然而,到 19 世纪的后半期,英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时提升了它的社会支出水平,并使之成为 20 世纪再分配事业的领头羊。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罗马天主教堂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地方,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教廷对公共事业的反对态度都对社会支出起到阻碍作用。随后,持反共态度的教会开始支持社会性支出,并以此将天主教民主重塑成竞争力的政治策略(Lindert 2004: I, 67—86)。

可以肯定的是,林德特从未使用信任网络一词,也从未向我们提供下述过程的细节,即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是如何在他所论述的重

大转型中增生扩散的。我们还是视之为似是而非的猜测吧：无产阶级化压制了当地的既有信任网络，与此同时，作为对主要政治角色和政府的回应，无产阶级化又创造了自己的信任网络，即建立了自己的内外边界，对成员的外部联系进行监控，维护资源以维持网络的集体性事业，并对可能干扰集体性事业的内部关系加以控制。

此外，林德特的分析还确定了另一条曾在过去的世纪里促使信任网络发生整合的强大力量：民主化。在他看来，普通民众所获得的政治言论权利促进了社会支出的增长，而公共教育开支、社会服务、收入保障以及许许多多获得政治支持的保障形式，又反过来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依赖形式——它取代了以往为缓冲风险而对家族、移民伙伴、宗教同宗和其他私人性质的信任网络的依赖。尽管下一章将把信任网络最低限度地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看成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但相反的关系也同样成立：当条件有利时，获得政治支持的信任网络是与民主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注释：

- [1] Evans and Boyte 1986, Polletta 1999, Singerman 1995, Tilly 2000, Wiktorowicz 2001.

第六章

信任与民主化

爱尔兰的历史演绎了一场肮脏的实验。英国军队和亲英派地主的开拓与剥削，将爱尔兰变成了两个殖民地：在这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广泛分享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遗传基因；在这里，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口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在这里，宗教上的分裂已成为政府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两个分裂地区的相互分离，令敌对的阵营与爱尔兰海彼岸的统治者长期对峙。在爱尔兰独立前的数个世纪里，新教占据主导地位的阿尔斯特*与爱尔兰全岛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势力之间的分歧，给爱尔兰的政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无论阿尔斯特还是其他地区，信任网络都主要在宗教隶属关系的脉络中形成。就阿尔斯特而言：过去，苏格兰殖民者在这里建立了基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后者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到了16世纪，英国征服者又在这里建立了爱尔兰教会——与英格兰国教会遥相呼应，并赋予其向全国征税的权利——犹如与之遥相呼应的英国国教会(为使行文简洁并强调其特殊立场，本文称此爱尔兰教会为“英国国教”)。然而，阿尔斯特和其他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口仍然效忠于罗马天主教廷。因此，自16世纪被英格兰征服伊始，彼此间的口诛笔伐和暴力活动就在爱尔兰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教派间展开。一方面，是新教徒被广泛地整合到统治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是天主教徒与公共政治的隔绝与

* 阿尔斯特(Ulster)：爱尔兰4个历史省份之一，位于爱尔兰岛东北部，其中6个郡现为北爱尔兰，其余3个郡属爱尔兰共和国。——译者注

日俱增。

1835年，托克维尔(Tocqueville)曾游历爱尔兰，他向卡洛*的天主教主教提出了一个托克维尔式的问题：如果英国政府同样给爱尔兰的天主教主教神职人员发放薪水，是否有助于提升生活标准并使政治矛盾得以缓和？问答双方都很清楚该问题的提出背景：爱尔兰的英国国教神职人员同时向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征收什一税，而天主教主教神职人员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则远远低于国教；与此同时，天主教活动人士正在煽动反抗英国国教什一税的斗争。这位主教的回答是：发放薪水无济于事——

天主教主教神职人员将因此丧失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怎样，但我毫不怀疑在爱尔兰，天主教主教神职人员将因为这种变化而遭受损害，天主教本身也将遭受损害。在这个国家，神职人员与普通民众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团结。(Tocqueville 1991:528)

五天后，也就是1835年7月25日，托克维尔又与持新教立场的律师和历史学家约翰·帕特里克·普兰德格斯特(John Patrick Prendergast)进行了交谈，并为此写下了《德格斯特访谈录》(Pointdergast)。这位法国游客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对方的回答同样是：

我认为不会。天主教主教神职人员无论在哪个国家——特别是在爱尔兰——都试图进行控制和支配。他们铁了心地驱逐新教徒，一手遮天地统治爱尔兰社会。无论我们怎么做，他们都不会放弃这样的野心。他们不仅不会放弃对金钱的追逐，相反，还会利用金钱去追逐更多的金钱。(Tocqueville 1991:548—549)

* 卡洛(Carlow)：爱尔兰岛东南部伦斯特省(Leinster)的一个郡。——译者注

双方都在夸大其词。天主教农民与苛刻的天主教统治集团不可同日而语，而天主教神职人员——尽管不断地争取——也并未在爱尔兰政治权力中谋得一席之地。不过，在1835年的访谈中，问答双方都清楚地看到在占优势的新教少数派和居劣势的天主教多数派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裂隙。在托克维尔的追问下，普兰德格斯特勉强承认新教将一部分富裕的天主教徒逐出国家精英的行列，而爱尔兰政府中也几乎完全充斥着新教徒(Tocqueville 1991:549)。通过排斥天主教精英人士，执掌政权的新教徒强化了宗教分歧，并迫使天主教徒纳入新教神职人员的掌控之中。

托克维尔无疑想起了法国贵族——他自己的家族隶属于其中——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命运，并据此对爱尔兰的两极分化进行了反思：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其贵族的所作所为与爱尔兰新教贵族相仿，那么——

你必将面临如此可怕的社会状况：在此社会中，贵族拥有压迫者所拥有的一切教条和缺陷，而民众则拥有奴隶所拥有的一切恶习和弱点；在此社会中，法律将摧毁法律所应当捍卫的，而暴行则为应当摧毁的提供保护；在此社会中，宗教从应当与之作战的冲动中获取力量，而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延续仇恨，并使人们远离宗教所应当祈盼的手足情谊。(Tocqueville 1991:556)

用托克维尔不曾使用的术语说，新教的信任网络与天主教的信任网络在裂隙两端遭遇，前者构筑于统治机器之中，而后者则以联系紧密并将规避性遵从视为上策的教会为后盾。不过，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这个两极分化带不知何故收缩成了北爱尔兰的冲突地区，而其他地区则或多或少建立了民主。爱尔兰发生了什么呢？

爱尔兰发生了一系列内战，并由内战导致权力的革命性转移。表6.1为爱尔兰近五百年来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提供了一份粗略的年表。在经历了早期盎格鲁—诺曼(Anglo-Norman)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同化之

后，爱尔兰数个世纪里一直笼罩着地方首领与国王的斗争。然而，从亨利八世开始，都铎王朝的入侵开辟了爱尔兰武装斗争的新篇章。在随后的将近五个世纪里，爱尔兰的一些权力集团常常与英国结盟，而更多的权力集团则联合起来反抗英国的统治。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70年代期间，天主教徒即便拥有财产也无权参与爱尔兰的公共政治。甚至到了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期间，天主教徒仍然忍受着严重的政治无力状态。从16世纪开始，爱尔兰就再未摆脱恶性和暴力的敌对状态。爱尔兰岛频繁地裹挟于内战中。

表 6.1 爱尔兰新教与天主教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1520—1603 年	遭受都铎王朝入侵，殖民，叛乱，内战，爱尔兰新教教会成立
1610—1640 年	遭受斯图亚特王朝盘剥，英格兰和苏格兰人定居爱尔兰并主要集中于阿尔斯特地区
1641—1650 年	英格兰和爱尔兰爆发叛乱和内战，并以克伦威尔野蛮征服爱尔兰而收场
1689—1691 年	英国光荣革命，爱尔兰内战，为威廉三世所征服，大肆剥夺天主教徒政治权利，大肆查封天主教徒财产——持续至1703年
1782—1783 年	部分恢复爱尔兰的政治自治，天主教徒有权拥有土地和从事教育(但是，爱尔兰议会仍然清一色地由新教徒组成)
1791—1795 年	“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主张自治，主要是天主教徒)和奥伦治修道会(Orange Order，主张君主制，新教徒)成立
1798 年	爱尔兰人联合会发动起义，内战，大屠杀，法国入侵，血腥镇压
1801 年	英国成为联合王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废除爱尔兰议会，100名爱尔兰议员并入英国下院
1813—1829 年	英格兰和爱尔兰围绕天主教解放而频繁爆发社会运动：爱尔兰爆发争取天主教解放的群众运动，英国爆发反对天主教解放的运动；最终英国议会通过议案扩大了(但未至完全平等)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提高了爱尔兰的公民权财产资格，解散了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天主教协会

* 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 1775—1847年)，19世纪早期爱尔兰政治活动家，毕生致力于天主教解放运动和爱尔兰自治，1823年创立社会运动组织——天主教协会(Catholic Association)，为天主教徒赢得了部分政治权利。——译者注

续表

19 世纪 30— 90 年代	反抗地主和什一税的活动层出不穷，争取爱尔兰自治的运动失败
1845—1850 年	爱尔兰大饥谨，引发大规模对外移民
1843 年起	贝尔法斯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1843 年、1857 年、1864 年、1872 年、1886 年、1893 年冲突尤为严重
1848 年	“青年爱尔兰”(Young Ireland)发动芒斯特(Munster)省起义
1858 年	“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 Brotherhood，即“芬尼亚会”)在都柏林和纽约成立
1867 年	“芬尼亚会”在爱尔兰发动起义，“盖尔人之家”(Clan na Gael)在纽约成立
1869 年	废除了爱尔兰教会(英国国教)的官方教会地位
1884 年	《选举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农村(以及几乎全体天主教徒)选民
1916 年	复活节(Easter Rising)起义，并获得德国的支持
1919—1923 年	内战，爱尔兰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和议会(1921 年)，随后，爱尔兰自由邦成立(1922 年)——北爱尔兰未包含在内
1923—2004 年	北爱尔兰的新教和天主教冲突时断时续，英国军队不断卷入，北爱尔兰政府时转时停
1949 年	爱尔兰共和国成立，北爱尔兰仍未包含在内

直到 19 世纪，爱尔兰才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就民主化的视角而言，我们或许应当选择将 1801 年、1829 年、1869 年、1884 年以及 1919 年至 1923 年期间作为关键的年份。1801 年，排他性地由新教徒组成的议会宣告解散，100 名爱尔兰新教议员被吸收进入英国议会，这是一个已经寡头政治化的政权所迈出的去民主化步伐，它破坏了爱尔兰天主教精英业已——与新教统治者逐步形成的——不对等的迁就关系，就连家族和宗教精英网络也丧失了与爱尔兰统治体系的联系。1829 年颁布的《天主教徒解放法》(Catholic Emancipation，与之接踵而至的是同年对不属于英国国教的新教徒所作出的类似的政治让步)扭转了上述隔绝

* 贝尔法斯特(Belfast)：爱尔兰东北沿海最大海港，1920 年成为北爱尔兰首府。——译者注

状态，它赋予爱尔兰较富裕的天主教徒以正式的代表权，并赋予其担任联合王国的大多数公职的权利。

然而，在整个 19 世纪期间，爱尔兰实行自治或独立的呼声日益甚嚣尘上。佃农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恶化，双方的公开武力炫耀也常常酿成北爱尔兰的街头暴力(Tilly 2003b:111—127)。1869 年，爱尔兰自治运动令爱尔兰教会曾一度享有的官方宗教地位被取缔。尽管最终获得了英国前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的支持，但是，英国议会最终未能通过爱尔兰自治议案。至于爱尔兰的新教徒，则联合抵制自治运动，并喊出了“爱尔兰自治就是罗马教廷统治”(Home rule is Rome rule)的口号(McCracken 2001:262)。1884 年《选举法》(Franchise Act)和英国同年通过的《改革法》(Third Reform Act)，将选举权延伸至绝大多数爱尔兰成年男性，并因此广泛地覆盖到了农村地区的天主教选民。不过，直至此时，爱尔兰的每一个主要政党依然将自己与单一的宗教派系挂钩，而持天主教立场的政党则毅然投身于爱尔兰的自治或独立。

在经历了此前 60 年的无数次反英起义之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是否应当为英国服兵役的问题再次将爱尔兰推向了严重分裂，而战时的分裂又引发了内战。根据 1922 年的和平条约，拥有广泛而不受侵犯之自治权的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其主权地位等同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与此同时，新教徒居多的北爱尔兰仍然属于英国——其宗教分裂更甚于以往。

这一年，在爱尔兰其他地区，爱尔兰共和军中奉行直接行动的组织持续不断地袭击新教徒和涉嫌与之合作的英国人(Hart 1998)。在 1922 年的爱尔兰自由邦大选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中，武装共和派接连败北。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生存了下来，并最终赢得了他们为之斗争的爱尔兰独立。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爱尔兰共和军不断地潜入北爱尔兰从事破坏活动(相关资料参见 Keogh 2001, White 1993)；爱尔兰北部并未实现稳定的民主，但是，爱尔兰自由邦最终在 1937 年获得了实质性的独立

(国名“爱尔兰”),并在1949年正式成立完全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自1922年签订和平条约以来,自治权日益增多的爱尔兰南部各级政权就多多少少以民主的方式运作着。

信任网络与爱尔兰的民主化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民主和民主化呢?仅有竞争性的选举是不够的:即便是竞争性的选举,仍然存在高压统治的极大可能性,遑论选举本身可能被操纵(Engelstad and Østerud 2004)。本书所说的民主,是指一个既定政府治下的国民——与政府代理人相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享有相对宽泛和平等的权利与义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政府的人事、政策和资源进行有拘束力的协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保护以免遭政府代理人专断行为之侵害(Tilly 2004a, Chapter 1)。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平等、宽泛、协商和保护。协商不仅涉及选举,还包括全民公决、游说议会、成立利益集团、发动社会运动,以及与政治人物直接商洽。

民主化是这样一场运动:它迈向更加宽泛和平等的权利,迈向更高层次的协商,迈向对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权利与义务的更加深入的保护。与之相反,去民主化走向了相反的道路。基于上述标准,可见19世纪肇始之时,爱尔兰尚未实现民主,而此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的民主化是与激烈、血腥的斗争相伴而生的(Tilly 2004a: 136—164)。

在此狂暴的历史中,信任网络的状况如何呢?我们缺乏有关爱尔兰信任网络的直接证据,但是,对于爱尔兰的家族集团、宗教会社、兄弟会、体育俱乐部、民族主义武装等组织的构成,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此外,有关爱尔兰地方冲突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上述组织被裹挟于公共政治之中的生动资料。^[1]例如,彼得·哈特(Peter

Hart)有关 1916 年至 1923 年间科克郡* 的深入考察,就向我们展现了爱尔兰共和军是如何糅合既有的青年网络,并进而利用后者的组织形式的:

爱尔兰共和军(I.R.A)是这个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自然延伸,是后者约定俗成的观念和关系形态的自然延伸。平凡小事和良善之举往往成为政治动员的载体,而诸如“闹草人”**之类的风俗也转而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爱尔兰共和军的大多数“军事行动”,与闹草仔的嬉闹举动存在着一目了然的亲缘关系:同样使用面具或涂抹黑色油彩,同样穿着“古怪的衣服”(queer clothes),同样是由年轻单身汉组成的规模相似的团体,同样在“船长”的指挥下匿名活动,同样摆出一副似是而非的军事姿态,同样是夜间奇袭和实施小规模胁迫。(Hart 1998:180)

我们不妨提出两点重要的假设:第一,信任网络存在于民众的日常联系形式之中;第二,信任网络与统治体系隔绝或融合的整体状况,表明了爱尔兰的信任与统治状况。

就上述假设而言,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譬如 1829 年、1869 年、1884 年及 1919—1923 年——都为天主教信任网络和政权创造了衔接彼此的新纽带,每一次转变都动摇了新教精英网络对政权的控制。无论是爱尔兰自由邦、爱尔兰(Eire),还是爱尔兰共和国,信任网络的整合大多都是通过中间组织——如政党、工会和宗教会社——进行的,而非政府代理人信任网络直接联系的结果。与新教斗士们最初所担心的

* 科克(Cork):爱尔兰岛南部芒斯特省(Munster)的一个郡,享有“造反郡”(The Rebel County)之称号。——译者注

** 闹草人(strawing):爱尔兰传统风俗,指在婚礼上年轻人身穿燕麦秆做成的大衣,头戴蒙面草帽,手拿各种乐器娱乐宾客,同时寻找机会“绑架”新娘并小小地“敲诈”一笔赎金。这些年轻人被称为“闹草仔”(Straw Boys),他们的首领被称为“船长”(captain)。——译者注

相反，在爱尔兰的土地上并未诞生什么神权国家。天主教会既从未与民族国家政府建立任何私密性的联系，也从未在爱尔兰的公共政治中获得任何支配性的地位。相反，教会高层和地方教士是通过信仰的权威向信众施加影响的。

毫无疑问，信仰的权威影响深远。爱尔兰政府小心翼翼，尽量不冒犯教会的权威和信众的宗教情感。教会高层与政府的唯一一次重大冲突发生在 1951 年，起因是高级教士们反对政府的新的母亲健康方案。政府随之更新方案，迅速平息了教会的怒火(Lynch 2001:285)。当然，教会影响力的另一个结果，是爱尔兰在诸如避孕、堕胎、离婚等含有宗教色彩的政策问题上发展的步伐落后于欧洲邻国。不过，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荷兰民族志学者马特·巴克斯(Mart Bax)对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爱尔兰的乡村地区进行了考察，他的卓越研究为公共政治以经纪型的方式整合地方信任网络提供了证据。在巴克斯生活的这个地区(没有地名)，政党不是明确地代表了哪个阶级或哪个部分的利益，而是勤勤恳恳地代表了地方的整体利益。无论是郡的立法者还是国家的立法者，都为自己的立场而战——即利用与政府的关系来为自己眼下或将来的选民谋求具体的好处。当然，他们也竭尽所能地削弱其他竞争者造福于民的能力。

在巴克斯看来，成功的爱尔兰政治家需要运用和创造各式各样的纽带——譬如朋友、家族、志愿者组织的纽带——与选民建立联系；与此同时，他(绝大多数政治家是男性)还需要保持一支地方经纪人的队伍，这些人大多源于同一个党派。政治学的学者们可以据此辨析庇护体制(patronage systems)的若干标准模式(参见 Auyero 2000, Fox 1994, Willerton 1992)。巴克斯认为，爱尔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许多重要联系，都是由这种庇护体制所提供的。只要一个政治家能够为当地的信任网络带来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他就有人追随。

在巴克斯有关关系的诸多故事中，有一则讲述的是帕克斯维尔

(Patrickstown)的经纪人泰格·奥沙利文(Tadgh O'Sullivan)。奥沙利文是一名鞋匠、电表抄表员和记者，他积极参与盖尔人运动协会(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的活动，成为爱尔兰共和党(Fianna Fail)地方组织的总书记，并帮助现任的议员赢得了选举。他的主要日常活动就是向政府官员施加个人影响以便为他人谋求好处。巴克斯写道：

一天晚上，附近镇上的一名商人突然拜访奥沙利文，这个人有了麻烦：一船进口商品在海关等候验关，而第二天能否拿到这批货对他至关重要。这名商人问奥沙利文能否帮忙，后者立即给住在海港附近的一名部长打电话，部长让奥沙利文带商人来自己的住所。于是，两人驾车前往部长官邸，商人向部长解释了事情的经过，而部长则告诉他将尽力而为。第二天晚上，商人给奥沙利文回话，说他很高兴事情已经解决了。(Bax 1976:96—97)

此后，这名商人设法以一半的折扣为奥沙利文买了一辆摩托车，并许诺为日后的选举提供支持。奥沙利文做的是“拉”的活儿——即传递政府的公共服务。在爱尔兰的体制中，如果一个政治家失去了拉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影响、失去了官职。不过，正是这种“拉”将建立在家族、朋友、日常活动和兄弟会基础上的信任网络，与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政府联系在了一起。

民主制中的信任

这种联系是如何影响民主的呢？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有关意大利和美国的研究，是将信任与民主的关系问题置于民主理论的固定框架中进行讨论的，而没有对信任与民主的因果关系作出明确的阐

释。他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 (*Making Democracy Work*)以意大利的一个地区为例,试图以翔实的资料证明政府的制度绩效与非政府公民团体的参与程度息息相关:公民参与愈广,制度绩效愈高。帕特南就此玩起了跷跷板:坐在政府制度绩效一边,帕特南倾向于强调越是有效的制度越是民主;坐在公民参与一边,帕特南又转而将组织网络、社会资本、互惠规范(*norms of reciprocity*)和信任结构看作是一个不可分解的硬块。帕特南游走于跷跷板的两端,并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建构社会资本并不容易,但是,它是民主得以运转之关键”(Putnam 1993: 185)。

无独有偶,在对美国的相关研究中,帕特南又转而从公民参与匆忙滑向民主:

现代社会为搭便车和机会主义提供了充裕的机会。民主不需要圣徒似的无私公民,但是,民主也着实以其恰如其分的制度形式提出了如下假定,即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将用于抵制欺诈之诱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愈是巩固,自我愈是广阔。民主制度的运行是以可测量的方式立足于社会资本之上的。(Putnam 2000:349)

我们最好是从帕特南的论述中,提炼一个更加审慎的结论:就已相对实现了民主的政权而言,人们越是热衷于参与公民团体(也可能仅仅是以此获取公共物品),也就越是倾向于履行自己的集体责任、渴望更加完善的政府行为,并且更加信任自己的同胞(Bermeo 2000)。相比之下,这个观点可能更站得住脚,但是它并未揭示民主与信任的因果关系。

* 帕特南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已于2001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汉译出版。——译者注

当前，民主理论家们对于信任与民主的关系持有以下四种主张：

(1) 正如玛格丽特·利瓦伊的“附条件的同意”所揭示的，人们在信义而非强制的基础上与政府合作，依赖于人们持有这样的预期，即其他人也将同等分担纳税、服兵役等公共负担。

(2) 与其他政权形式相比，民主体制下的政府被认为获得了更高程度的信任，这是因为自愿向代表和官员委托权力，唯有广泛的信任才能如此。

(3) 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样也依赖于信任，即没有掌权的相信自己今后可能掌权，或是至少相信掌权者将尊重自己的利益。

(4) 对大多数政治角色来说，民主体制——与其他政权形式相比——本质上更具风险性和条件性(contingent)，就此而言，政治角色唯有高度地信任民主政治的后果，才有可能完全与该体制相配合。

上述四项主张将一定程度的信任视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同时暗示：一旦信任严重衰退，将对民主造成威胁。不过，这些观点似乎也在表明：倘若缺乏足够的信任，则立足于极权或庇护的政权，比立足于民主的政权更具生存能力。

马克·沃伦(Mark Warren)通过揭示公共政治与信任之间的矛盾，将上述四项主张完整地衔接在了一起。在沃伦看来，政治是争夺物质利益、诉诸集体行动、形成有拘束力的集体决策三者结合的产物(Warren, 1999:311)。上述过程——争夺物质利益、诉诸集体行动以及形成有拘束力的集体决策——在民主政治中更加普遍，但是，这些过程着实对自然积累而成的信任构成了威胁：物质冲突导致纠纷，集体行动分割你我，有拘束力的集体决策衍生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差别。就此而言，与其他政权形式相比，民主需要更多的——至少是对政治斗争结果的——信任。或许，我们可以将沃伦的上述观点称为信任的民主两难(democratic dilemma of trust)。

沃伦在理论上将民主两难的解决之道归结为：新保守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协商理论。这三种理论彼此是竞争性的。首先，新保守主义观点认为，缓解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是使政治机构的集体决策的数量最小化，同时使既有的各类信任领域——譬如自然社群或市场——的容量最大化。上述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其次，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缓解两难困境的应对之策是使信任成为一种信念，即相信他人(个人或是机构)会对自身之福祉予以照顾，并进而形成相应的制度确保这一信念得以实现。上述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最后，协商理论主张通过民主协商和促进双向信任的方式，消除横亘在民主与信任之间的鸿沟，即通过审慎的商议促进信任，并通过已有的信任进一步推动商议。沃伦更加倾心于上述观点。总之，新保守主义理论认为民主与信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理性选择和协商理论则强调信任对于民主的不可或缺性。

我的观点是承认上述困境，但必须重新理解这一困境，并就此提出第四个解决之道。读者们伴我行进至此，对于如何重新理解困境和如何解决困境必当心领神会：

- 将信任理解为一种关系，其中至少有一方将弥足珍贵的事业置于其他各方的失信、失误和失败的风险之中；
- 这种关系根植于各种特定的组织网络之中，尤其是当事业的持续性和风险性增加时更是如此；
- 尽管历史上的大部分信任网络都生存于公共政治的领域之外，但是，有时它们也建构于政治角色(如工会)或政府(如退伍军人养老体制)之中；
- 不认为信任网络是民主参与的关键因素；
- 而是坚信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至关重要；
- 将两难困境重新理解为：在既不损害信任网络也不损害公

共政治的前提下,如何在重大的事业及其维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建立联系;

- 由此推论:这种联系唯有基于“附条件的同意”才是有益于信任网络成员的;
- 政府从倚重强制到倚重资本和信义的组合形式,这一转变推动了“附条件的同意”;
- 就此而言,民主化的发展轨迹基于信任网络与统治者先前所建立的关系——是极权体制、神权体制、庇护体制、经纪型自治、规避型遵从抑或专属型纽带——而呈现出了极大的不同。

例如,若脱胎于极权体制,则民主化的发展取决于政府摆脱强制的程度,以及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放松了对信任网络的控制。与之相反,若发端于庇护体制,则民主化的发展取决于庇护功能的衰退程度,以及信任网络在多大程度上被直接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

就前文所述之宽泛、平等、协商和保护而言,公共政治对信任网络的整合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协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的信任网络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就在多大程度上信赖政府的行为有助于维护这些网络。同时,人们还能借助网络的中介力量与政府建立联系,并据此获得——个体性的或群体性的——权力。人们由此建立了对政府行为的浓厚兴趣。“政治利害关系”(political stakes)尤为关键:纳税、购买政府债券、向政府公开个人信息、信赖和依赖政府福利、让自己人服兵役等,这些行为进一步巩固了对政府行为的兴趣,并推动人们为完成上述事务而积极地进行协商。

一般情况下,公民对政治的兴趣越高,就越有可能积极地参与选举、全民公决、利益集团、社会运动,以及与政客的直接接洽,也就是说,积极地参与协商。相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将自己的信任网络从公共政治中撤出的那部分人,他们对政府行为的兴趣将随之减弱,

他们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也将随之消泯。倘若富人和有权势的人能够以钱买官，能够令与之利益直接相关的政府部门言听计从，那么，他们就双倍地削弱了公共政治：即因为撤出自己的信任网络而削弱了公共政治，又因为糟蹋了普通公民的协商有效性而削弱了公共政治。

将信任网络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的三个基本过程是：隔绝型信任网络的瓦解，以往的隔绝型信任网络的整合，与政治存在联系的信任网络的形成。如今看来，这三点已颇为相似。我认为，它们足以被视为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倘若缺乏上述过程，则公民缺乏动力面对民主政治的逆境，容易当形势发展不利于己时易于从公共政治中抽身而退。在此，不妨借用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术语，即一个整合的信任网络让公民更愿意选择呼吁和忠诚，而不是退出(Hirschman 1970)。*

不过，公共政治对信任网络的整合并不是民主化的充分条件；毕竟，极权主义和神权主义的政权也同样像这样整合了信任网络。为了更加充分地理解民主化，我们还必须考虑另外两个过程因素：(1)将国民类别的不平等(如基于阶级、性别或种族的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相隔绝；(2)公共政治以下述方式实现转型：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平等，提高对政府的集体控制，抑制政治角色——包括政府代理人——对权力的专断行使(Tilly 2004a:15—23)。所有这些因素——公共政治的转型，国民类别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隔绝，信任网络的整合——加在一起，缔造出宽泛、平等、有拘束力的、具保护性的公民与政府关系，而这正是民主之特性。

19世纪20年代以来，爱尔兰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公共政治的转型：随着这个国家日益摆脱英国的严密监控，其政治参与一步一步地迈向了

* 赫希曼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已于2001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汉译出版。——译者注

宽泛和平等，有拘束力的公民协商戏剧性地得到了提升，公民保护亦随之显著地扩大了。此外，随着性别差异逐步消除、新教与天主教在政治权利和义务上日益平等，爱尔兰极大地提高了公共政治对国民类别不平等的隔绝。当然，这里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呈现出了哪些变化。就爱尔兰——通常不包括北爱尔兰——而言，我们看到一些信任网络随着老式的亲属和宗教关系(solidarities)的解体而解体，看到一些信任网络被深刻地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特别是天主教徒成长为有组织的政治角色，还看到随着20世纪爱尔兰广泛借鉴西方世界的社会保障措施，新的与政治相联系的信任网络亦随之诞生。

尽管手头证据不足以彻底说明问题，但是很显然，公共政治对信任网络的整合极大地推动了爱尔兰的民主发展。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框架是否有助于解释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的历史，即墨西哥的历史。

墨西哥的民主化

同爱尔兰一样，墨西哥也是通过持续的斗争、频繁的内战和许多的反复，而探寻并踏上相对的民主体制之路的(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290—302)。曾几何时，大众动员活动不断地挑战这个国家，使之唯有屈就于镇压与拉拢的邪恶复合体中。就墨西哥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发展历程而言，其复杂程度与爱尔兰不相上下，同时又展现出了自身的独特轨迹。非常有意思的是，不断更迭的墨西哥政权或是被罗马天主教廷驱逐，或是驱逐罗马天主教廷，或是仅仅容忍罗马天主教廷。伴随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天主教活动分子开始组建天主教工人社(Catholic Worker's Circles)，并最终成立了国家天主教党(National Catholic Party)。不过，1914年革命对教会进行了严厉打击，同时还剥

夺了教会财产(Bailey 1974:17—26)。

1924年，革命派将军普鲁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当选总统，尽管在随后的若干年里对天主教会有所迁就，但政府的反教权立场却不断增强，并最终将教会势力逐出国家的政治生活：

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后政权在农村扎下根来，它断绝了与教会的关系，并由此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和中部引发了狂暴的起义浪潮——农民和神职人员揭竿而起、要求得到土地并重新开放教会。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镇压。20世纪30年代初期，墨西哥政府完成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并重新开放了教会。但是，政府50年来的所作所为——从表面上看——就像教会压根儿不存在似的。教会也为自身打算，将其活动严格地限定于市民社会之中，避免因其投身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引发危机。教会安安稳稳地在深植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宗教活动中怡然世外。(Lehmann 1990:145)

此外，1910年至1919年的革命还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培育了大众动员，而这些动员活动最终也为卡列斯及其同盟所接纳。以韦拉克鲁斯*为例，1921年，搬运工和劳工运动的组织者拉斐尔·加西亚(Rafael García)就任这座城市的市长，佃农运动便随之蓬勃开展起来，佃农组织在这座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并一直持续到1924年卡列斯当选总统。卡列斯就职之后不久，联邦官员逮捕了佃农组织首领——无政府主义者赫伦·博洛尔(Heron Proal)，博洛尔的锒铛入狱让开始成为了结束(Wood 2001, Chapters 4—

* 韦拉克鲁斯(Veracruz)：墨西哥东南部韦拉克鲁斯州的重要港口城市，濒临墨西哥湾。——译者注

8)。尽管佃农、码头工人以及其他各类工人依然在城市政治领域内坚持斗争，但是，他们与国家层面的公共政治断绝了联系。任何有关墨西哥民主化的分析，都要严格地区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爱尔兰尤其如此。

就国家层面而言，墨西哥建立了若干常规化的民主机制，如合乎规范的竞争性选举、政党、男性公民选举权等，其发展步伐与许多欧洲国家相仿(Caramani 2000, 2004, Tilly 2004a:213—217)。在内战、叛乱、政变和威权政治的反复蹂躏下，国家层面的民主权利不断地遭到削弱。但是，扭转的步伐也来得出奇地迅猛，墨西哥随之迈向了民主化的复兴时期。再就地方或地区层面而言，至少在 20 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里，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都只是有选择性地被整合进了全国政治之中，更谈不上被整合到民主权利和义务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幸存的原住民——至 20 世纪末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仍然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

表 6.2 是一份年表，它罗列了 1848 年至 2000 年间影响墨西哥民主化历程的全国性事件。尽管并未列入每一场起义，小规模的内战也被忽略不计，但这份年表还是清晰地展现了一个半世纪的喧嚣政治。此举并不旨在对墨西哥的民主化和去民主化历程作出完整的描述或阐释，而是要探寻信任网络的隔绝与整合是否具有前文所说的因果关联？答案是：这种因果关联是存在的。1910 年革命爆发之前，墨西哥政权几乎完全是按照自上而下的庇护—代理链的形式运作的。在革命后的半个世纪里，尽管政府频频引发人民的反抗，但它毕竟成功地将庇护—代理纽带从公共政治中剔除出去。就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的截然分立而言，墨西哥的情况更甚于爱尔兰。其结果是，国家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更能显出权势。不过，在 20 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里，工人、农民和原住民开始摆脱庇护体制、经纪型自治和规避型遵从，转而直接投入国家层面的政治之中。

表 6.2 墨西哥的民主化与去民主化(1848—2000 年)

1848 年	作为停战协议的一部分,墨西哥将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以及犹他、内华达和科罗拉多的部分领土放弃给美国
1855—1861 年	“考迪罗”*胡安·阿尔瓦雷斯(Juan Alvarez)领导下的政府进行自由主义改革,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随后出任总统,男性公民获得普选权(1857 年),教会资产国有化,教权与政权分离
1861—1864 年	法国入侵并征服墨西哥,扶植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称帝,马克西米连战败并遭枪决
1884—1910 年	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实行独裁统治,经济实行自由化,驱逐印第安人并实行种族灭绝
1910—1919 年	反迪亚斯的起义演变为革命和内战,通过激进宪法(1917 年),普及初等教育,确认罢工权,归还农民土地,宣布石油国有
1926—1929 年	镇压克里斯特洛(Cristero)宗教起义,天主教会处于从属地位
1928—1929 年	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总统遇刺,爆发起义,与教会和劳工达成和解
1934—1940 年	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出任总统,没收土地,以集体所有的形式向农民分配土地,爆发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将美国和英国的石油企业收归国有,革命制度党(PRI)的前身——墨西哥革命党——成立
1946—1952 年	革命制度党巩固权力,镇压劳工和农民组织
1953 年	妇女获得普选权
1958—1959 年	全国范围的罢工遭镇压,劳工领袖遭监禁
1968 年	学生争取民主的示威活动遭到军队镇压,500 人遇难,1 500 人被捕,游击队的活动日益扩大
1976 年	索诺拉州(Sonora)失地农民获得土地,洛佩斯·波蒂略(López Portillo)总统批准为农民提供 25 万英亩的土地
1982 年	59 家墨西哥银行实行国有化
1988 年	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在质疑声中当选总统,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
1989 年	作为反对党的国家行动党(PAN,自由主义)和民主革命党(PRD,左翼)夺取地区选举胜利

* 考迪罗本义指中世纪时伊比利亚半岛上反抗穆斯林统治的武装团伙的首领。在 19 世纪的拉丁美洲,该词用来指在殖民统治瓦解之后很快用武力夺取了政权的领袖们。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5 页。——译者注

1992年	与加拿大和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 1994年1月实行)
1993年	萨帕塔民族解放组织(Zapatistas)夺取恰帕斯州(Chiapas)4座城镇, 并开展跨国运动
1994年	国家行动党再次在地区选举中获胜
1999年	埃内斯托·塞迪略总统(Ernesto Zedillo)废除总统提名制, 革命制度党首次举行总统候选人选举
2000年	国家行动党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克萨达(Vicente Fox Quesada)赢得总统选举, 但革命制度党仍控制国会

尽管相对较早确认了男性公民的选举权(1857年), 但是, 墨西哥革命前的国家政治生活充斥着军阀之间的争斗, 而军阀则以武力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权力, 并常常对选举程序加以操纵。1910年至1930年间, 在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推动下, 地方性的工人和农民组织——既有宗教背景的、也有反宗教背景的——不断联合, 但是, 都未能将其信任网络牢靠地整合于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之中。不过,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拉萨罗·卡德纳斯及其继任者奇迹般地将有选择的庇护—代理链, 囊括在了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全国性政党之中, 这个政党最初的名称是墨西哥革命党。在卡德纳斯的领导下, 政府开始了农业合作或村社(ejidos)土地所有制改革的漫长历程, 大地产被收归国有并被重新分配给了顺从的农民。至于墨西哥革命党, 则在战后的若干年里转变为著名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通过一种经纪型分配网络(brokered distributinal network), 赢得了大部分农民和有组织的工人的支持, 并据此赢得了选举胜利。从那时起直至20世纪60年代, 墨西哥政权——除最高层之外——都犹如一个庇护—代理系统那样运作。地方社群与这个政权的唯一联系, 只能是对统治者实施规避型遵从、与统治者建立专属型纽带, 或是(极其罕见地)向统治者要求经纪型自治。与此同时, 从革命制度党中分离出的部分、组织起来的学生、各类工人组织和农民团体, 也

时不时地试图挑战革命制度党在公共政治中的支配地位，但都没有取得成功。

墨西哥农民依赖于美国的就业机会，他们或是向北移民、流向大城市的边缘，或是通过庇护链获得一块农地(Sanderson 1984)。尽管1976年即将离任的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总统给予失地农民相当大的让步，使他们在墨西哥北部又重新获得了土地，但总体而言，政府对革命制度党的庇护链之外的公共诉求，大多以武力镇压作为回应。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茨(Enrique Krauze)曾经藏身于墨西哥城的一幢屋顶，亲眼见证了1971年的屠杀学生事件。他是这样评论的：

尽管那天遇难的人数比墨西哥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屠杀学生事件——1968年的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事件* (Tlatelolco)——还要多，但在很多方面，它是上一次事件的重复：政府血腥镇压学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总统现身当晚电视，许诺将对此事进行公开调查——“无论是谁，均绳之以法”。数天后，他将两名政府官员解职，所谓的调查则从未兑现。数年后，一份名为《真相》(Proceso)的新闻周刊披露了详情：策划这场屠杀的，正是路易斯·埃切维里亚先生本人。(Krauze 2004:A21)

直到2004年，在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比森特·福克斯总统的领导下，才针对前总统埃切维里亚提出了种族灭绝指控，并成立了一个真相委员会对革命制度党执政期间滥用权力的情况进行调查(Thompson 2004)。当然，革命制度党并不仅仅擅长于镇压，对于那些拥有足够的组织化力量以动摇其政党控制的反对派，革命制度党也懂得吸收和利用，而这恰恰是通过庇护—代理与政府镇压的完美结合而实现的。

* 相关事件参见查尔斯·蒂利著《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总之，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削弱了革命制度党的支配地位。日益繁茂的石油出口促进了经济发展，独立的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大量的移民涌向城市，专家治国的呼声甚嚣尘上。那些移居美国的农民通过汇款、传递信息和组织移民开展政治活动，在既有的庇护链之外开创了机会，并建立了新的联系。此外，墨西哥日益深入地加入到国际经济活动之中，不仅加速推动了上述过程，同时也推进了国内的民主自由化、增进了国际社会对选举政治的监督和反馈，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 1994年)的签订则进一步增强了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回应挑战的传统方式——拉拢和压制——已变得越来越行不通了。20世纪80年代，左翼反对党和右翼反对党同时对革命制度党发起了强大攻势。到2000年时，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行动党最终赢得了墨西哥的总统选举，尽管未能取得议会多数。

墨西哥的信任网络

在1848年至2000年间墨西哥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持有多少证据？答案是：没多少！尽管如此，卡洛斯·福曼特(Carlos Forment)还是建立了一份囊括2291个有名称可循的志愿团体的目录，这些团体活跃于19世纪的不同时期，致力于社会进步、兄弟会、互助会、爱国会、工匠行会、种族保护、教育、文学和科学发展、行业特权、慈善与福利事业、宗教(既有天主教的也有非正统的)、休闲项目、业余爱好、假日活动、信贷和储蓄等各类名目。福曼特的研究展现了19世纪墨西哥城镇生机勃勃的公民生活，为数众多的团体积极地投身于地方政治，有的甚至掌握了市政一级政权。不过，福曼特也特别强调：这些团体驻足于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之外。1846年，墨西哥城的一位活动家曼纽尔·雷穹(Manuel Rejón)曾经表示：

我们的公共生活被集中在了一个区域,我们的主权权利也被强行固定于这个区域,而不允许公民们将之运用于方方面面……这导致了国家的冷漠和迟钝,并陷入一种完全瘫痪的状态。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既吸引我们的兴趣、又不耗散我们的精力。在此情况下,行政管理者们被派来管理他们不感兴趣的地方事务——我们的事务。这就是这个国家到处爆发叛乱的原因所在。当前,政府在公民的眼里,就如同一个外国政权。(Forment 2003:163)

福曼特认为,这些 19 世纪的活动家创造了地方性的民主,同时尽可能地使之免遭国家的干预。用这个观点评价迈入 20 世纪的墨西哥,也是基本适用的。与政权保持隔绝的不仅有公民团体,也包括信任网络,而所谓整合,仅仅是政治大人物的庇护链的有选择的整合。再就墨西哥的联邦系统而言,上述模式又在区域和地方层面自我复制:军阀让位于政治大佬(political bosses),庇护—代理的政治模式在大部分州和市政一级大行其道(Cornelius 2001)。

不过,20 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里,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参与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的变化:

- 承担市场经济的成本而未能分享其果实的人口持续增加;
- 革命制度党支持的地方政治大佬,他们稳定上述人口的能力持续下降;
- 政府旨在拉拢新动员人口的政策,在持续运转数十年之后已无力整合所有的对象,却为形成新的组织创造了基础;
- 镶嵌在农民合作组织和本地社群中的信任网络,它们与地区甚至国家层面的政治角色的联系持续增加,而这些政治角色是外在于既有的庇护—代理链网络、外在于革命制度党的。

在对墨西哥粮食政策及其政治后果的细致研究中，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为我们提供了格雷罗州(Guerrero)——墨西哥城以南毗邻太平洋的一个州——的蒙大拿(Montaña)地区的相关例证。蒙大拿地区多为丘陵，原住民居住其间。1980年提出的一项全国粮食分配计划，将这个地区与历时数十年、势力深入至市政一级政治的农民运动(部分是由激进的教师带领的)联系在一起。到1984年时，地方粮食理事会的头头脑脑们组建了一个生产咨询委员会(Production Consultation Committee)，将其在地方的活动整合到大约三分之一的地区社群中(Fox 1992:188)。在所承担的各项事务中，有一项是通过自己的地方粮店将政府配发的玉米分发到各家各户，并因此将国家层面的政治措施贯彻到了地方。

这种动员和组织活动甚至延伸到了邻近瓦哈卡州*的山谷中部。在那里，古老的地方信任网络为有效的组织运作提供了基础：

在地方自治的传统防御姿态背后，隐藏着一个包含了各种共产主义机制的复杂网络。例如，在这里依然大行其道的义务劳动制(tequio)——即为公社劳动而没有报酬——就常常被用来为集体兴建乡村商店。诸如乡村粮食委员会、商店管理员之类的公共角色，往往与被称作“卡狗”(cargos)的传统村舍——宗教管理机构——管理用水、耕地、家长与教师协会、宗教庆典等重大乡村事务——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卡狗”体制与正规的市政管理体制并行不悖，后者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地方争端，并对外代表社群。(Fox 1992:1999;更加全面的论述参见 Fox 1994)

1984年，瓦哈卡粮食理事会的统筹委员会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农民区域自治组织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Autonomous Regional Peasant

* 瓦哈卡(Oaxaca)：墨西哥南部濒临太平洋的一个州，位于格雷罗州以南。——译者注

Organizations)的全国会议，并就此借助这样一个新兴的全国性政治角色将自己整合到了公共政治之中。全国粮食分配计划为地方政治骨干(political entrepreneurs)进入国家层面的政治提供了途径和动力，而这是此项计划的始作俑者——革命制度党——所始料不及的。

就瓦哈卡的其他地区而言，杰弗里·鲁宾(Jeffrey Rubin)的研究证明，胡奇坦市(Juchitán)——绝大多数人口为萨巴特克人(Zapotec)——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1989年，主要由原住民构成的“墨西哥地峡工人、农民、学生联合会”(COCEI)掌握了这座城市的政权。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历了工人和农民的大规模反抗之后，革命制度党试图利用政治大佬马里奥·巴斯蒂略(Mario Bustillo)重新控制胡奇坦市。颇为独特的是，反对巴斯蒂略的动员活动没有肇始于胡奇坦市，而是由墨西哥城的胡奇坦学生协会率先发动的。在该协会中，来自胡奇坦市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拥有号召力，他们提出了若干促进萨巴特克人民族认同和集体进步的方案，要求以此取代他们的前任——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协会成员——所主张的个人的发展和融和。1973年，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赢得了协会选举。同年年底，学生协会与胡奇坦市的地方活动分子联合行动，驱逐了一名医院主管并创建了全新的保健方案(Rubin 1997: 105—107)。“墨西哥地峡工人、农民、学生联合会”就此在全市范围的动员活动中脱颖而出。

联合会(参与者这样称呼它)通常是择机而动：将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农民或工人们组织起来，为其昭雪和赔偿的诉求提供支持。尽管在诉求的伸张方式上，联合会常常骑墙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但它还是赢得了当地温和主义者的支持：

鉴于以往改革的失败下场，更为重要的是，鉴于联合会发端于本土并深植于萨巴特克人的语言和文化之中，因此，联合会的咄咄逼人及其偶尔为之的非法手段，实际上已为胡奇坦市的温和主义者所默认。在公众的视野中，联合会是对萨巴特克人所遭

受的经济和政治剥削的真正回应,这种剥削是温和主义者亦无从幸免的。其结果便是,面对一个与其信念相冲突的本土组织,温和主义者疑惑并重新思考了他们在诸如民主、反抗、暴力等基本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当大部分中产阶级和胡奇坦市的精英人士们对激进政治大加鞭挞、对正在发生的镇压行径默然表示支持时,温和主义者对激进的草根运动的发自内心的支持,不管在联合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巩固了联合会,甚至还从墨西哥城的一些官员那儿为它争取到了选票、争取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和支持。(Rubin 1997:110)

在胡奇坦市,我们看到本地的农民和工人团体摆脱了庇护体制、经纪型自治和规避型遵从,借助于与高校学生和地方温和主义者不经意达成的联盟而走向民主。我们看到,本地层面的信任网络与国家层面的公共政治之间正在形成持久的联系。

信任与去民主化

如果说公共政治对信任网络的整合推动了民主化,那么,信任网络从公共政治中撤出则将削弱民主,而这种撤出既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所谓自愿撤出,是指公民团体以自己的服务系统取代政府的服务系统,或是以私人领域的监管取代政府的部分监管职能,并以此切断与公共政治的联系;前者如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在美国民权时期创建私立学校系统,后者如限制性产业(regulated industry)对其监管机构的制约。所谓非自愿撤出,是指先前与公共政治存在联系的团体遭受到了无条件的排斥(categorical exclusion),或是先前将他们与政权挂上钩的制度渠道遭到了终止;前者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遭受的命运,后者如20世纪90年代福利的大规模收缩政策可能对美国低收入

家庭产生的影响。

去民主化的频繁发生远远超出了民主理论家们的想象。在大多数民主理论看来，民主难以实现，但一旦实现便难以倒退。南希·博美奥(Nancy Bermeo)通过分析去民主化历程中普通民众的角色，同时对下述两个方面进行了揭示：第一，精英背离民主体制远甚于普通民众背离民主体制；第二，西方的历史充斥着许许多多的民主大倒退。她集中对威权政治取代民主体制的事例进行了论述，并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民主“变故”(casualties)陈列如下：

1922年：意大利	1923年：保加利亚
1926年：立陶宛、波兰、葡萄牙	1929年：南斯拉夫
1933年：奥地利、德国	1934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1936年：希腊、西班牙	1938年：罗马尼亚

此外，博美奥有关威权统治取代民主制度的研究，还囊括了1939年至1940年间苏联和德国占领下的芬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当然，延伸如此之广，亦使其分析的重心有所偏移。

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拉丁美洲，博美奥就历数了如下重大的民主倒退：阿根廷(1976年)、巴西(1964年)、智利(1973年)和乌拉圭(1973年)(Bermeo 2003:68)。至于1939年至1940年间的纳粹统治，更是导致欧洲和拉丁美洲大陆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民主出现了17次灾难性崩溃。

与博美奥相比，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及其合作者的民主标准不那么苛刻，但也同样发现民主的倒退惊人地频繁。这个研究小组对1950年至1990年间世界135个国家的民主状况——生存和倒退——进行了逐年分析。在他们看来，民主是以选举的方式“使反对者有机会通过选举胜出并执掌权力的政权形式”(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and Limongi 1997:295)。在被纳入研究的41年中，上述135个国家发生了50次从非民主向民主的转型(一些国家不止发生一次转型)，而从民主向非民主的转型也达到了40次。我们有必要了解，在诸如此类

的转型中，不信任与去民主化呈现出了——如果有的话——怎样的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我们试图从民主倒退的研究中获得什么？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获得如下认识：(1)信任网络——以主要政治角色或公民团体为主体——自愿撤出公共政治的过程，不仅先于去民主化的过程，而且还推动了去民主化的过程；(2)信任网络非自愿地撤出公共政治的过程，或是与去民主化的过程相伴而生，或是紧随其后，但都最终进一步强化了去民主化这一结果。

无论是博美奥、普泽沃斯基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对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进行细致的研究以证实或证伪我的观点。不过，博美奥的诸多案例之一——西班牙——倒是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西班牙无异于一个自然的实验室：政府反复游走于威权与民主之间，而地方在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问题上亦变动频繁(Ortega Ortiz 2000)。罗伯特·菲什曼(Robert Fishman)曾经谈及如下事例：20世纪90年代初西班牙社会党(Spanish socialist party)执政、西班牙共产党作为反对党期间，劳工领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社会党内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而未对全球视野产生影响；相反，这种关系在共产党内则有所不同，它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视野的形成。菲什曼就此认为，对作为反对党的共产党来说，他们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为世界及其未来的交往方式带来了变革：

上述发现清晰地表明，外在于国家权力的政治(或社会)力量对体制内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吸引，激起了后者的热情，焕发了后者的希望。与此同时，诸如我们所检视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的联系纽带，也采用了对话的方式，而这种纽带让公共言路(public rhetoric)发生了深刻的变革。(Fishman 2004:166)

当然，菲什曼的研究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西班牙民主和去民主的早期阶段，信任网络在整合和隔绝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不过，至少它

说明了一点，即人际网络的变化构筑了今天的政治方向。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后期，西班牙蔚为壮观地反复游走于民主化和去民主化之间。表 6.3 提供的大事年表清晰地展现了与西班牙

表 6.3 西班牙的民主化与去民主化(1917—1981 年)

1917 年	立宪君主制时期，军人政权剥夺宪法权利，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煽动地方自治，工人举行总罢工
1923 年	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发动军事政变，君主制遭削弱
1925 年	德·里维拉担任首相实行独裁统治，部分恢复公民权利，但君主制有名无实、军人专政依然如故
1930 年	德·里维拉辞职、去世，达马索·贝伦格尔(Damaso Berenguer)领导过渡政府
1931 年	共和派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西班牙国王未宣布退位，但流亡国外，临时政府宣布实行共和制，23 周岁以上的男性公民获得普选权
1932 年	镇压军队叛乱，加泰罗尼亚获准实行自治
1933 年	选举产生中右翼政府，妇女获得普选权
1934 年	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激进分子发动起义，斯图里亚斯(Asturias)矿工发动起义，均遭到镇压
1936 年	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在全国大选中获胜，掀起罢工浪潮并占领农业和工业生产部门，西班牙政府授权巴斯克(Basque)地区实行地方自治，摩洛哥军人叛乱殃及西班牙，西班牙爆发内战，叛军宣布佛朗哥为国家元首，德国和意大利为其提供援助
1939 年	佛朗哥派赢得内战，建立威权主义国家
1969 年	佛朗哥指定胡安·卡洛斯·德·波旁(Juan Carlos de Borbón)为国家元首继承人
1975 年	佛朗哥辞世，胡安·卡洛斯国王登基
1976—1978 年	阿道夫·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担任首相期间，西班牙开始民主改革，选举产生新议会，通过民主宪法，普选年龄降低至 21 周岁，后又降至 18 周岁
1979 年	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实行自治
1981 年	挫败军事政变，新的区域自治，开始了持久的(同时也是喧嚣的)民主政治

的民主化历程相关的三个方面：第一，至少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西班牙的民主之花都是脆弱不堪的，民主倒退时有发生；第二，正如 1917 年以前的历史所呈现的，军人干政在西班牙已成家常便饭，并几乎无一例外地毁掉了民主；第三，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地方自治或独立的呼声尾随着国家的民主方案，始终如影随形。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的内容——尽管未被列入年表——塑造了西班牙的民主化，即自 19 世纪以来，西班牙的农业和产业工人在组织化和政治化上所达到的惊人高度；就整体而言，有组织的工人被整合到西班牙的国家政治生活之中，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民主化的阶段——就如同他们被集体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去民主化。例如，1925 年，随着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的结束，大批工人组织迅速崭露头角，并伴随着 1931 年的和平革命(peaceful revolution)而迅猛增长(Soto Carmona 1988:303—305)。权力陡然发生翻转，1931 年 4 月 12 日，共和派在市级选举中赢得了绝大多数西班牙城市选民的支持，国王(日益冷淡的总参谋部不再给予其支持)被迫黯然去国。

爱德华多·冈萨雷斯·卡勒乔(Eduardo González Callejo)认为，上述转变呈现出了“不可否认的革命面孔”，理由是——

政权坍塌导致法律急速崩溃，从最高君主制内阁直抵国家革命委员会(Nation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的法律传输机制遭到了损毁。当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到来时，没有人代表旧政权要求实现统治权力有秩序的、合乎法律的转让。(González Callejo 1999: 627)

然而，革命基础十分狭窄。民众对教会的攻击、天主教会与政权分离，以及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迅速地疏离了天主教会高层和乡村地主(Malefakis 1970, Chapter 6)。

尽管大幅度削减了现役军官的规模，但是新政权依然延续着旧政权

排斥与控制的老伎俩(Payne 1967:268—276)。1931年4月14日成立的临时政府继续贯彻排斥路线，否认君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拥有公共集会的权利(Ballbé 1985:318)。资产阶级共和派掌权后，政府频繁动用军队镇压左翼人士和罢工工人，并因此将被镇压者排斥在新政权之外(Ballbé 1985, Chapter 11)。对于弱小的西班牙共产党来说，他们也不失时机地试图将1931年的革命转变为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据此迫使资产阶级统治者——希望延缓即将到来的革命——与之合作(Cruz 1987:127—128)。

就整体而言，工人是坚决主张共和的，以社会主义政党为代表的工人更是如此。不过，在1935年和1936年，一个人数不多而能量颇大的工人组织——天主教工人联盟(Catholic Workers' Union)——却率先背叛共和联盟、站到了军队一边(Soto Carmona 1988:313)。至于农民和农业工人，他们得益于1931年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对政权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但是，随后发生的占据荒地和罢工反抗低薪地主的斗争，迅速将农民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截至1936年，农村的罢工和占地运动已对尚不稳定的共和政权造成了威胁，而此时这个政权所面临的，还有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及其同党的军事威胁(Malefakis 1970, Chapter 14)。在阿拉贡*——

即便在复辟和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统治时期，耕地斗争仍被——以传统的方式——视为公共秩序中的一个小问题；而共和国法律保护机制对乡村部门的骤然干预，却深刻地改变了这一切。为了更加贴近欧洲的农业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新兴的劳工政权对地主寡头集团曾经享有的绝对自由和无限权力进行了限制，同时，允许民众实施大规模的联合。但是，为伸张诉求而举行示威和罢工的权利，却并未为民众们真正领

* 阿拉贡(Aragon): 现为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自治区。——译者注

会,他们尚不习惯根据法律调整自己的立场,所知所想的只是土地改革的活生生的威胁。(Casanova, Cenarro, Cifuentes, Maluenda & Salomón 1992:86—87)

仅在阿拉贡一地,反革命分子就杀害了 8 628 名被怀疑支持共和的人(Casanova, Cenarro, Cifuentes, Maluenda & Salomón 1992:213)。佛朗哥政权的暴力镇压扑灭了阿拉贡地区生机勃勃的民主动员活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班牙政治史大致呈现出如下序列:(1)1931 年至 1933 年,随着工会和政治组织的中介作用不断增强,也随着军队被部分地排斥于公共政治之外,工人和农民的信任网络被真正地整合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2)1933 年至 1935 年,以实现部分整合的工人、农民和地方主义者为一方,以全国性政府为另一方,两者形成了对峙;(3)1936 年,工人、农民和地方主义者开展新的动员活动,军队进行反动员活动;(4)1936 年至 1939 年,工人、农民和地方主义者的信任网络,日益被国家的政治生活排斥在外(并伴随着暴力活动)。

基于以上描述,我们看到 1939 年至 1975 年间的发展趋向,呈现出向 20 世纪 20 年代一度流行的庇护体制、专属型纽带和规避型遵从的回归,而此次与之相伴的是佛朗哥统治体系对军队和天主教会的威权主义整合。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进而可以见证一系列与墨西哥同一时期的加速发展相似的过程:旧的地方信任网络为经济发展所瓦解、政府的镇压活动日渐松弛,以及信任网络在工人组织中迅速扩张。1976 年至 1978 年的快速民主化既立足于国家政治对大众信任网络的整合,又推动了这种整合,同时还将具有教会和军队背景的信任网络部分地逐出政权体系之外。大致如此,或许如此,但都未经证实。在 20 世纪爱尔兰、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历史中,我们无法找到确定之物,所能找到的唯有颇有希望的研究方案。有关民主化的下一步研究,将着力于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隔绝与整合。在隔绝与整合是如何运作的问题上,即便我的分析包含着严重错误,毕竟还是阐明了这种联系的趣味性和重要

性。个人之间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联系，深深地影响着民主制度的生存能力，这一点已确定无疑；只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强、究竟如何运作，仍待考证。

不过，假使我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将有两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接踵而至：第一，即便是富裕而强大的国家，民主仍有可能面临信任网络从公共政治中撤出的危险，特别是当信任网络的撤出让富裕而有能力的人单纯自保时更是如此。譬如私立学校和私塾教育(home schooling)、排他性的俱乐部和宗教团体、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ies)，以及政府机构或官员对私利的追逐，所有这些都为精英人士提供了确保自身利益、而无需承担公共政治之成本与束缚的手段。

第二，对相对非民主的国家来说，只要那儿的信任网络成员依然有办法让政府从属于网络，或是依然置身于公共政治之外以免遭整合，民主的前景就依然暗淡，国家的未来就更有可能陷于极权、神权或庇护—代理体制，而绝非民主政治。

注释：

[1] Broecker 1970, Bryan 2000, Clark and Donnelly 1983, Conley 1999a, 1999b, Farrell 2000, Jarman 1997, Jupp and Magennis 2000, O'Neill 2001, Palmer 1988.

第七章

未来的信任网络

他们是这样说的。2001年4月30日，美国国务院2000年年度报告《全球恐怖主义的模式》(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对基地组织作了如下描绘：

20世纪80年代后期，乌萨玛·本·拉登创建基地组织，将在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的阿拉伯人聚合起来。它为阿富汗抵抗运动中的伊斯兰逊尼派极端分子提供资金、招募成员、协助运输和进行训练，其近期目标是将西方人和非穆斯林逐出伊斯兰国家，从而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泛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政权。1998年2月，在“世界反犹反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的旗帜下，基地组织发表声明：宣称杀死美国人——无论军人还是平民——及其各地的盟友，是天下所有穆斯林的职责所在。(State 2001:2450)

这份报告接下来说，基地组织策划并实施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爆炸案(1998年)，策划了美国科尔号驱逐舰的炸弹攻击事件(2000年)，并频频密谋对世界各地的西方人进行袭击。报告认为，南亚已成为针对美国利益的暴力报复性行动的策源地，应当对阿富汗塔利班为本·拉登及其网络提供的庇护给予特别的关注。

就在政府发布这份恐怖袭击年度报告之际，19名男子——包括4名飞行员和15名“徒手劫机者”(muscle hijackers)——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潜

入美国境内，这些人随后在9月11日劫持了满载燃料和乘客的美国客机撞击了世贸中心、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地点(实际上，基地组织为了此次行动还多招募了9名至10名男子，出于多种原因他们并未参与行动，参见Commission 2004:235)。这19枚人体炸弹在不了解具体的袭击地点、时间和对象的情况下，为了砰然的瞬间而各自演练——譬如经常出入美国的健身场馆以训练体能(Commission 2004:215—253)。尽管在1999年以前这些人大多不曾谋面，但是，到2001年春天时他们已组成了一个致人死地的信任网络，即为执行重大的集体性行动而将自己的生命置于网络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

“9·11”恐怖袭击九天之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对国会的演说中称：“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以基地组织开始，但并不以基地组织而结束；只要世界上仍有恐怖组织一息尚存，这场战争就不会终止。”(State 2002:i)2002年5月，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也作出了回应：

在这场反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役中，没有哪个国家有幸置身事外。根本就没有事外，因为恐怖分子是无所顾忌、不分区域和不讲道德的。在这场战役中，前线无所不在、得失性命攸关。恐怖主义不仅杀人，而且还威胁民主制度、腐蚀经济基础、动摇地区稳定。(State 2002:iii)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官方声明和媒体众口一词地将矛头指向基地组织。他们将本·拉登描绘为世界恐怖主义的总设计师，是这个时代美国的头号公敌。与此同时，追捕本·拉登也为饱受争议的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迅速地找到了理由。

“基地”(al-Qaida)在阿拉伯语中有“营地”或“根据地”之义，最初是指本·拉登为实现其伊斯兰教主张而苦心经营的一套犹如计算机数据库式的关系网络(Gregory 2004:36—38)。1996年5月，本·拉登从苏

丹回到阿富汗并开始重建他的各种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重新夯实了他与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该组织致力于使埃及成为纯粹的伊斯兰教国家——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Ayman Zawahiri)的关系。本·拉登与扎瓦赫里的联盟，无异于将前者所获得的中东地区的支持者，与后者所拥有的范围广泛的伊斯兰组织关系衔接在了一起。1998年，这个联盟被正式命名为“世界反犹反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并宣称其宗旨是对美国及其在世界各地的盟友进行打击。

西方媒体很快就将扎瓦赫里称为本·拉登的“代理人”，但实际上，扎瓦赫里独自承担着一项重要功能——在中东地区狂热的宗教分子和潜在的新成员之间穿针引线(Commission 2004:67, Stern 2003:261—267)。就本·拉登与扎瓦赫里在2001年所合成的关系而言，它在整体上尚不足以被视为——按照本书的标准所定义的——信任网络，因为并非所有当事人都将自己重大而长期的事业置于网络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不过，在世界伊斯兰阵线的权力中心——一个协商委员会(Shura)——的内部，却矗立着一小撮以个人名义宣誓效忠于本·拉登的人(Commission 2004:56,67)，他们构成了强有力的、致人死地的信任网络。

早在21世纪以前，就已存在这种为打击政治上的敌人而组织的、以意识形态为后盾的阴谋网络。1793年，“恐怖”一词被赋予了政治内涵：法国的革命者试图借助自上而下的镇压推行美德(Greer 1935, Guenniffey 2000, Mayer 2000)。自上而下的恐怖最终催生了自下而上的恐怖，恐怖的双方都是以阴谋网络——无论支持现政权还是反对现政权——的方式组织自身的。不同于军队与军队交战，也不同于示威者与警察交锋，恐怖的双方均秘密行事且行为极不对称。他们以暴力手段或是以暴力手段相威胁，对其敌人的人身、财产或象征物进行有选择的同时也是引人注目的打击。19世纪大移民时代，由移民信任网络所凝结的各种关系，使得自下而上的恐怖主义再度沉渣泛起(Hanagan 1998, 2002)。恐怖的两端——自上而下的恐怖和自下而上的恐怖——一直延

续到 20 世纪，^[1]希特勒和斯大林延续的是自上而下的恐怖，而众多的民族主义组织网络则采用了自下而上的恐怖。

随着反殖民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冷战的爆发，美国当局开始担心恐怖活动可能对其本土和海外的利益构成威胁。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国会授权国务院对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事件进行年度编目，该编目网罗的是美国政府所界定的恐怖活动——即境外非国家性质的行动者针对国家权力或国际权力的行使者、拥有物和象征物所采取的秘密武力行为(Tilly 2002b, 2004d)。至于国家恐怖行为(state-sponsored terror)和国内恐怖分子——譬如美国的民兵运动和针对堕胎医生的暗杀行动等，尚不在官方的编目范围之内。

作为一种由拥有网络联系的共谋者所操控的政治策略，恐怖活动已伴随了我们相当长的历史。不过，纵观 1998 年至 2004 年的恐怖活动，它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迥然不同于既往：

- 日益紧密地与诸如毒品、军火、稀有矿物等国际非法物品的交易联系在一起；
- 与国家政权的冲突依然不断——譬如在哥伦比亚、斯里兰卡、高加索、西班牙、北爱尔兰等地，但恐怖活动显然已转向针对跨国的机构和目标；
- 与国家操控和组织的恐怖活动相比，由非国家或反国家的恐怖分子所操控的恐怖活动趋于增多；
- 要求在伊斯兰国家强制推行伊斯兰法*，并试图建立超国界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的宗教极端组织，这一点在恐怖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 “9·11”恐怖袭击之后，极端恐怖主义将主要矛头对准了

* 伊斯兰法(Islamic Law): 又称穆罕默德法，源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任法官时所作的判决，主要渊源有《古兰经》、《圣训》、《依默书说(公议)》和《吉雅论(类比)》等，是极具代表性意义的宗教法。——译者注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财产、军队和利益，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请注意上述转变。在本书追溯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关系的漫长历史中，无论信任网络还是政府都是在地方、区域或国家的层面运作的。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信任网络相对于国家政权所发生的分化或整合。然而，考察 1998 年至 2004 年的恐怖活动，我们看到了上述双方均呈现出了国际化的趋向：即恐怖分子网络的国际化，以及恐怖袭击目标的国际化。那么，全球化、美国的霸权主义或伊斯兰教的重新定向，是否正在催生一个全球化的政治空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信任网络在国家层面的整合或分化就可能与数千年间与之如影随形的公共政治渐行渐远。

恕我作出一个武断的推断。恐怖组织网络的当下发展标志着信任网络可能呈现出这样一幅奇特的前景：信任网络向跨国的层面拓展，它们超越特定的国家、转向国际政治、获取自治性的政治权力，并有可能接管政府。如果全球范围内都发生了上述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将连同其他的因素一同对民主造成威胁——无论民主在当下何等吃香。如果这些变化代表了一种更加普遍的政治趋势，那么，信任网络转而呈现出的恐怖性质，将开创一部崭新而怪诞的信任网络的历史。

稀释、替代与退出

就信任网络的政治前景而言，还有可能呈现出一幅不同于上节所述、但仍不乏其可能性的未来景象。这是由近年来跨国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 尽管专项性的联合、权威性的组织以及诸如教会等

* 有关社会运动的国际化发展，可参阅查尔斯·蒂利著：《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5—166 页。——译者注

既有的机构，已将社会运动培育得与 18 世纪起源时的模样大相径庭，但是，实实在在的运动还是需要依赖信任网络以获取根基和资源。^[2]信任网络锚定地方性的政治和人际事务，并以此实现至少是暂时的动员。除了运用电话和大众传媒之外，社会运动中的群组(clusters)还借助于日常联系和私人接触保持关系。社会运动的诉求指向的是地方、区域和全国层面的目标，这就让业已存在的、地理上相对集中的信任网络更加方便地为社会运动所利用。

如今，变化已露端倪。至少在富裕的国家，国家政治层面的行动者和组成国际联盟的行动者对电子通讯技术——尤其是近来对互联网和便携式通讯设备——的依赖日益增加。与此同时，诸如跨国公司、世贸组织、欧盟等跨国机构亦前所未有地频频成为社会运动的诉求目标。就此而言，上述两点——即行动者对电子通讯技术的广泛利用以及社会运动的诉求焦点向跨国目标的转移——相互交织，是否可能导致先前业已整合的信任网络与国家公共政治再度分离，而以地理上相互分离的行动者之间更加松散和短暂的关系代行信任网络的动员功能呢？

许多观察家对近期世界范围内社会运动的变化趋势作出了判断：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说，有人两样都说。例如，崇尚技术分析的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认为，他所说的“机灵的乌合之众”(smart mobs)是指“互不了解而竭力一致的一群人”(Rheingold 2003:xii)。在谈及 2001 年马尼拉及其邻近地区驱逐总统埃斯特拉达的动员活动时*，莱因戈尔德着力强调菲律宾人对始于 1995 年的手机短信(SMS)的巨大热情。至少在表面上，这类通讯系统因其不太容易受到政府控制而颇具民粹主义吸引力。

不过，莱因戈尔德谈得过了一些。他认为，通过手机短信联系起来的“机灵的乌合之众”已全面接管了社会运动，并使社会运动摆脱了

* 相关事件可参阅查尔斯·蒂利著：《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1—136, 147—155 页。——译者注

20 世纪的常规路径。为此，他列举了四起例证：

1999 年 11 月 30 日，一伙彼此独立的示威者借助于因特网的联系，举行了针对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抗议活动；他们采用“蜂拥”战术、移动电话、网站、膝上电脑和手提电脑，赢得了“西雅图战役”的胜利。2000 年 9 月，出于对突然暴涨的汽油价格的义愤，英国数千居民在一场莽撞的政治抗议中利用移动电话，短信、膝上电脑发送的电子邮件，以及出租车上的民用无线电波段，对彼此分散的各个抗议群体进行协调，从而有选择地堵塞了各个加油站的油路。2000 年春，一伙流动的新闻记者和研究者以制作编年史的方式，在多伦多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政治示威活动，他们将所见所闻制成录像并在网上播放。自 1992 年以来，由数千名自行车行动者组成的“临界物质”移动示威活动，以迂回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方式每月在旧金山举行一次示威。它通过松散的网络联系进行运作，通过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组进行调整，若有需要，也可分解为彼此保持电子合作的、更小的小组。(Rheingold 2003:158)

毫无疑问，在 21 世纪的这几年来里，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已将许多新的技术整合到了组织行为和诉求伸张的活动中(Deibert 2000, Koopmans 2004, Rafael 2003, Rucht 2003)。在此期间，社会运动的技术是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多大的变化呢？兰斯·贝内特(Lance Bennett)对国际行动主义进行了回顾(Bennett 2003, 2004)。他认为电子传媒正在通过以下若干重要途径改变国际行动主义：(1)构建对行动者的沟通和合作至关重要的结构松散的组织网络，而非早期社会运动所构建的相对密集的组织网络；(2)将地方性的议题引入更大范围的运动议程中，借此削弱地方行动者对运动的地方性认同；(3)降低意识形态对被卷入社会运动中的个体的影响；

(4)削弱——作为社会运动行动主义基础的——有边界的、持久的、资源丰富的地方和国家组织的相对重要性；(5)增加社会运动中资源匮乏的组织的策略优势(strategic advantages)；(6)推动创建长期和持久的运动(如反全球化或保护环境)，并伴之以即时目标的及时调整；(7)将古老的面对面的社会运动表演与虚拟的表演相结合。贝内特的结论是，这些变化反过来使社会运动愈来愈难以应对合作、控制、委托等方面的问题。

互联网是否改变了一切呢？在近期有关互联网使用状况的一份细致而全面的调查中，卡罗琳·海桑思韦特(Caroline Haythornthwaite)和巴里·韦尔曼(Barry Wellman)对互联网产生的普遍社会影响进行了概括。

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着从全面缠绕(all-encompassing)的控制型社会，向个体碎片化的个人型社会的转移。我们与大多数朋友和亲戚相互维系的社会亲密关系，并不具有身体上的亲密性。这些关系不仅延伸于大城市，也扩散到国家或海洋的另一边。维持着这种关系的，是信件、电话、汽车、飞机，以及眼下的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大多数人不是固定地居住在一个社区，相反，他们根据特殊的偏好在多种多样的社区间游居，以便尽可能少地承担对他人的义务。他们的生活是“全球化的”——是远程关系(long-distance ties)与一如既往地家庭、邻居和工作单位所裹挟的结合。(Haythornthwaite & Wellman 2002:32)

当然，这份观察对富裕的西方国家更为贴切，而并非普适于整个世界。不过，它倒是阐明了一个道理：将传媒技术的革新与现有的社会联系和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展了人们正在从事着的各项事业，而且还特别强化了人们之间丰富多彩但难以维系的联系。基于海桑思韦特和韦尔曼的有节制的观点，信任网络并未消解，反而在重构。

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慎重对待通讯技术决定论。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电话、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为社会运动的组

织者和行动者所使用。总体说来，这些技术扩大了社会运动沟通覆盖的地理范围，同时降低了社会运动的沟通成本；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与使用相同技术的其他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将那些无从使用这些技术的参与者隔离在外。就这一点而言，技术发挥着重大的筛选功能。

同样，城际火车、电气街车、喷气式飞机等运输技术上的突破，在当时也是既便利了远距离的社会运动联系，又实际阻碍了居住在主要交通线以外的具有相似意向的人们间的联系。不过，无论通讯技术的革新还是运输技术的革新，都不对社会运动组织、策略和实践方面的变革构成决定性的影响。政治背景和组织背景的变迁，比技术革新更能直接和迅捷地影响社会运动的运作方式。

社会运动的政治与组织脉络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这种转变又对社会运动与信任网络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从逻辑上看，这种转变将导致一定程度的国际化。与20世纪相比，国际化的行动者组织网络、国际化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化最直接的目标——如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在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表现；而在世界上富裕程度较高、联系程度较好的地区，情况就更是如此。^[3]杰姬·史密斯(Jackie Smith)及其合作者对1973年至2003年间活跃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社会运动组织”——这些组织涉及人权、环境、和平等国际议题，其成员至少分布在三个国家——进行了统计，这些跨国组织在数量上呈现出了如下变化：1973年183个，1983年348个，1993年711个，2000年959个，该数量还在增长(Smith and Bandy 2004:6)。行动者组织正在走向全球化(Anheier and Themudo 2002)。

除了正式组织之外，行动者所组成的国际网络也正趋于成形。在21世纪的这些年里，和平主题的社会运动与反全球化主题的社会运动开始合流，共同致力于反对美国的军事霸权及其经济强势。对此，一位名为汤姆·默特斯(Tom Mertes)的行动者作了如下陈述：

面对阿富汗的炮火以及——更有甚于此的——英美联军对伊拉克的侵略，“运动的运动”(movement of movements)若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弄清楚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是如何不仅畅行于伊拉克、而且在整个中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畅行无阻的；就必须弄清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边屏风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超级权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超级权力；就必须构建一个有能力彻底击溃华盛顿新殖民主义野心、彻底粉碎华盛顿新自由主义企图的全球性的反对力量。(Mertes 2004:x—xi)

从这番饱含深情的论断中不难看出，就连反美动员都采用了跨国的形式。与20世纪的同类运动相比，诸如菲律宾的反埃斯特拉达运动这类专注于国内事务的运动，也更多地受到了来自国际——包括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关注和干预。与汤姆·默特斯不同，乔伊·班迪(Joy Bandy)和杰姬·史密斯以更加审慎的学术语言，表明了社会运动的全球化正在愈演愈烈：

自由化及其引发的社会转型浪潮催生了世界范围的大众抗争运动(popular resistance movements)，后者因此成为社会危机的源头、成为社会再选择(social alternatives)的目标。这些运动特别是在以下方面超越既往，即它们正在寻求跨越疆界的交往、寻求酝酿共同的诉愿、寻求以另一种国际化取向——“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组织自身。面对跨国资本所施加的自由化压力，任何有效的抵抗都必须是全球的、广泛的、非局部的和有利的集体行动。(Bandy & Smith 2004:231)

从组织的角度看，这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组织成本相当高昂。除非

行动者可提供的时间、精力和其他资源能够在总量上大幅提升，否则，默特斯、班迪和史密斯所描绘的社会运动的国际化转向，都只是更多地从地方、区域和国家的公共政治中抽离出时间、精力和资源，以使用之于国际层面的社会运动，从而削弱了行动者的信任网络与基层公共政治(smaller-scale sites of public politics)之间的联系，甚至进而削弱信任网络在维系社会运动的行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此外，正如本书第六章在论述去民主化时所说的，还有可能出现一种前景——与上述前景并行不悖并同样令人不安，即信任网络可能脱离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公共政治领域。其中颇难权衡的是，究竟是大众的信任网络更让人担心，还是精英的信任网络更让人担心。当信任网络的成员对公共政治的参与日益减少、不再通过公共政治获取利益而是转而寻求利益机制的私人供给时，信任网络便开始脱离公共政治。就大众的信任网络而言，这种脱离是随着网络成员对于政治参与日益冷漠、倦怠或恐惧，随着网络成员日益认为私人事务绝对优先，随着相关社会服务的日益专业化而实现的。

就精英的信任网络而言，这种脱离是通过将政府的相关行为直接争取到公共政治之外，或是通过利益机制的私人供给而实现的。所谓直接争取，包括向官僚和政客购买好处、破坏选举程序和任命手续以确保公共部门服从于私人利益，以及形成完全致力于特定集团之福祉的政府机构。所谓利益机制的私人供给，包括成立私人安全部队、私人学校和家庭学校，卷入秘密派系，形成私人俱乐部，以及建立限人门槛很高的社区。无论何种形式，上述变化都将推动精英的信任网络脱离公共政治。

就大众一方而言，罗伯特·帕特南一部被广泛阅读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 Putnam 2000:255)——凭书名即可断定作者是最后一代“参与的美国人”，就表达了作者对参与与信任的衰退及其对美国民主所造成的双重威胁，所持有的一种萦绕于心而挥之不去的忧虑。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起初不同意帕特南的观点，但是，她随

后在使美国的市民生活得以运转的组织中，发现了不断增强的组织专业化对美国民主所造成的威胁(Skocpol & Fiorina 1999, Skocpol 2003)。斯考切波认为，这种转向——即转而经由人际网络进入市民生活、转而趋向于中上阶级的主流观点——正在动摇公共政治的品质，同时也威胁着美国的民主。她说：

为中产阶级主流观点的兴起欢呼雀跃的乐观者们，他们没有看到当前所收获的某种社会平等的果实，是与超越阶级的伙伴关系日益瓦解、彼此包容的市民动员渐遭侵蚀相伴生的。对我们的民主来说，后者同样不祥。

尽管可以存在多种声音，但是，美国的新市民领域显然是寡头主义的。这在志愿者协会——即托克维尔所谓之民主活力的“结合点”——的领域内如此，在国家政治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领域内——已与各式各样的协会活动密不可分——就更是如此。(Skocpol 2003:222—223)

与有关大众冷漠或无常的论述相反，南希·伯梅奥(Nancy Bermeo)认为，在民主衰退的历史变故中精英的退出显得尤为重要(Bermeo 2003)。伯梅奥的观点是：

通讯的进步让今天的政治精英拥有更好的能力去理解和塑造普通民众的偏好，同时，历史给予这些精英从已死的既往错误中汲取教训的能力。至于精英们是否将这些能力用之于追求民主，则取决于他们对民主的执著程度——犹如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程度或任何其他测量指标。就乐观的一面而言，独裁统治的经验事实强化了精英们对民主优越性的信念。但是，只要独裁政治仍然一息尚存，只要体制内精英(elected elites)仍然不能划清自己

与反民主分子的界线，普通民众就有可能再度陷入民主崩溃的悲剧中。(Bermeo 2003:256)

当然，这些研究者并未使用信任网络这一术语，他们也可能并不接受本书的相关分析。但是，当我阅读这些研究者的论述时，我发现书中所警示的种种威胁不仅可能轻易地源于态度的简单转变，也可能由信任网络——大众的或精英的——与公共政治之间关系的能动型转变而触发。

伴随着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大量衍生，信任网络可能被稀释、被国际化、被从国家层面的公共政治中分离出来。如果国际恐怖网络的衍生与信任网络的分离就是未来的主要趋势，那么，这种趋势将对来之不易的信任网络与国家政权的整合造成极大的威胁，并进而威胁整个世界的民主。

更多相同的过程

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两个耸人听闻的变化(也可能是暂时的)趋势主导未来之前，对导致信任网络发生变化的诸多要素作出更加一般性的思考。就内在方面而言，我们必须思考何种因素将对信任网络的范围、联系、维持和内部控制产生影响；就外在方面而言，我们必须思考是什么可能导致一部分信任网络消失、一部分信任网络被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一部分信任网络被作为公共政治的副产品而予以重构，以及一部分信任网络从公共政治——至少是国家层面的公共政治——的整合中逃逸出来。我们业已考察的漫长历史表明，只要拥有高度权能的国家依然依赖资本和信义以维系参与，信任网络就仍有可能附条件地被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

未来政治的主要问题清晰如是：全球化是否正在消解国家的既有权

能？美国的经济和军事霸权是否对所有其他的政权的自主性构成威胁、是否因此对所有其他政权服务或监控其国民的权能构成威胁？穆斯林世界是否最终会重新联成一体并对抗非穆斯林的西方世界？全世界自由主义的牺牲品们会响应诸如汤姆·默特斯等人的号召吗？或者，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否将不可动摇地在全球大行其道？本书有关信任网络的历史考察并未对这些令人压抑的问题作出回答，但是，如果我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论述所预示的是：未来政治的任何一种走向，都将给人际之间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带来显著变化——无论哪儿、概莫能外。

在短时期内，我们还将更多地目睹这样一个过程：即无产阶级化、政府权能扩大化、不完全民主化以及政府扶持的社会供给扩大化等因素，这些因素在 20 世纪相互结合所引发的信任网络被部分地整合于国家的公共政治之中，这个整合的过程仍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继续发生。略为悲观地看，更多地目睹这一过程，或许意味着这个世界的的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仍将延续；而略微乐观地看，更多地目睹这一过程，或许意味着日益繁盛的民主化将逐渐销蚀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尽管无法完全根除。我们要创造的，正是这样的未来。

注释：

[1] Caddick-Adams and Holmes 2001, Crenshaw 1983,1995, Derluigian 1999, Ellis 2000, Enders and Sandler 2002, Farah 2004, Futrell and Brents 2003, González Callejo 2002a, 2002b, Kalyvas 1999, Kushner 2001, Mason and Krane 1989, Mazower 2002, Mommsen and Hirschfeld 1982, Naimark 2001, Oliverio 1998, della Porta and Pasquino 1983, Rapoport 1999, Ruby 2002, Schmid 2001, Schmid and de Graaf 1982, Senechal de la Roche 2004, Smelser and Mitchell 2002a, 2002b, Stanley 1996, Stern 2003, Taylor 1999, Tilly 2002b, 2004d, Turk 2004, Waldmann 1993, Walter 1969.

[2] Diani 1995, 2003, Fernandez and McAdam 1988, Ohlemacher 1993, Passy 1998, 2001, Polletta 2002, Riles 2000.

[3] Boli and Thomas 1997; Chandhoke 2002; Imig and Tarrow 2001; Keck and Sikkink 1998, 2000; O'Neill 2004; Riles 2000; Jackie Smith 1997,2002,2004; Tarrow 2002; Tilly 2004c; Trif and Imig 2003; Wood 2004.

参考文献

- Adams, Julia (1994): "The Familial State: Elite Family Practices and State-Making in the Early Modern Netherlands," *Theory and Society* 23: 505—540.
- Adams, William M. , Dan Brockington, Jane Dyson, and Bhaskar Vira(2003): "Managing Tragedies: Understanding Conflict over Common Pool Resources," *Science* 302: 1915—1916.
- Agulhon, Maurice(1996): *La sociabilité méridionale (Confréries et Associations dans la vie collective en Provence orientale à la fin du 18e siècle)*. Aix-en-Provence: Publications des Annale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2 vols.
- Agulhon, Maurice(1970): *La vie sociale en Provence intérieure au lendemain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Société des Etudes Robespierristes.
- Alapuro, Risto and Markku Lonkila(2004): "Russians' and Estonians' Networks in a Tallinn Factory" in Risto Alapuro, Ilkka Liikanen, and Markku Lonkila, eds. , *Beyond Post-Soviet Transition . Micro Perspectives on Challenge and Survival in Russia and Estonia*. Saarijärvi: Kikimora Publications, pp.101—127.
- Allcock, John B. (2000): *Explaining Yugoslav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Grace M. (1974): *Networks of Contact ; The Portuguese and Toronto*. Waterloo, Ontari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 Anderson, Richard D. , Jr. , M. Steven Fish, Stephen E. Hanson, and Philip G. Roeder(2001): *Postcommunism and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nheier, Helmut and Nuno Themudo(2002): "Organisational Forms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Implications of Going Global" in Marlies Glasius, Mary Kaldor, and Helmut Anheier, eds. ,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2. Oxford: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pp.191—216.
- Anthony, Denise and Christine Horne (2003): "Gender and Cooperation: Explaining Loan Repayment in Micro-Credit Group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6:293—302.
- Armitage, David(1994): "The Projecting Age': William Paterson and the Bank of England," *History Today* 44: 5—10.
- Audisio, Gabriel (1999): *The Waldensian Dissent. Persecution and Survival, c. 1170 -c. 15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uyero, Javier(2000): *Poor People's Politics: Peronist Survival Networks and the Legacy of Evit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vritzer, Leonardo(2002):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ace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iley, David C. (1974): *Viva Cristo Rey! The Cristero Rebellion and the Church-State Conflict in Mexico*.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llbé, Manuel(1985): *Orden público y militarismo en la España constitucional (1812—1983)*. Madrid: Alianza. 2nd edn.
- Bandelj, Nina(2002): "Embedded Economies: Social Relations as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cial Forces* 81: 411—444.
- Bandy, Joe and Jackie Smith (2004): "Factors Affecting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ransnational Movement Networks" in Joe Bandy and Jackie Smith, eds., *Coalitions Across Borders: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the Neoliberal Ord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Barbalet, J. M. (2001):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Macro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ber, Bernard(1983):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Bates, Robert H., Avnet Greif, Jean-Laurent Rosenthal, Margaret Lev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8): *Analytical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x, Mart (1976): *Harpstrings and Confessions: Machine-Style Politics in the Irish Republic*. Amsterdam: Van Gorcum.
- Bayart, Jean-François, Stephen Ellis, and Béatrice Hibou (1999): *The Criminalization of the State in Africa*. Oxford: James Currey.
- Bayat, Asef (1997): *Street Politics: Poor People's Movements in Ir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ayon, Denis (1999): *Les S. E. L., "Systèmes d'échanges locaux": Pour un vrai débat*. Levallois-Perret: Yves Michel.
- Bearman, Peter S. (1991): "Desertion as Localism: Army Unit Solidarity and Group Norms in the U. S. Civil War," *Social Forces* 70:321—342.
- Bearman, Peter S. (1993): *Relations into Rhetorics: Local Elite Social Structure in Norfolk, England, 1540—164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Beaubernard, R. (1981): *Montceau-les-Mines: Un "laboratoire social" au XIXe siècle*. Clamecy: Éditions de Civry.
- Benedict, Philip (2002): *Christ's Churches Purely Reformed: A Social History of Calvin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W. Lance (2003): "Communicating Global Activism,"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6: 143—168.
- Bennett, W. Lance (2004): "Social Movements beyond Borders: Understanding Two Eras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Sidney Tarrow, eds.,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Global Activ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p. 203—226.
- Bermeo, Nancy (2000): "Civil Society after Democracy: Some Conclusions" in Nancy Bermeo and Philip Nord, eds., *Civil Society before Democracy: Lessons from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Bermeo, Nancy (2003): *Ordinary Peopl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Citizenry and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sley, Timothy (1995): "Nonmarket Institutions for Credit and Risk Sharing in Low-Income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169—188.

- Biggart, Nicole Woolsey(2001):“ Banking on Each Other: The Situational Logic of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Advances in Qualitative Organization Research* 3:129—53.
- Biggart, Nicole Woolsey and Thomas D. Beamish (2003): “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onventions: Habit, Custom, Practice, and Routine in Market Orde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443—464.
- Biggart, Nicole Woolsey and Richard P. Castanias(2001):“ Collateralized Social Relations: The Social in Economic Calc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0:471—500.
- Black, Christopher F. (2000):“ The Development of Confraternity Studies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in Nicholas Terpstra, ed., *The Politics of Ritual Kinship: Confraternities and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9—29.
- Blok, Anton(2001): *Honour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 Bodnar, John (1985): *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oehm, Christopher(1987): *Blood Revenge: The Enactment and Management of Conflict in Montenegro and Other Tribal Societ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First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4.
- Boehm, Christopher (1996): “ Emergency Decisions, Cultural-Selection Mechanisms, and Group Selec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37:763—793.
- Boli, John and George Thomas(1997):“ World Culture in the World Polity: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171—190.
- Borges, Marcelo J. (2003): “ Network Migration, Marriage Patterns, and Adaptation in Rural Portugal and Among Portuguese Immigrants in Argentina, 1870—1980,” *History of the Family* 8:445—479.
- Braddick, Michael(2000):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 1550—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dley, Joseph (2002): “ Subjects into Citizens: Societies, Civil Society, and

- Autocracy in Tsarist Russi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1094—1123.
- Brass, Paul R. , ed. (1996): *Riots and Pogro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Brewer, John D. , Adrian Gualke, Ian Hume, Edward Moxon-Browne, and Rick Wilford (1988): *The Police, Public Order and the State: Policing in Great Britain, Northern Ireland, the Irish Republic, the USA, Israel, South Africa and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 Broadbent, Jeffrey (1998):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Japan: Networks of Power and Prot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eker, Galen (1970): *Rural Disorder and Police Reform in Ireland, 1812—183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Brubaker, Rogers and David D. Laitin (1998): “ Ethnic and Nationalist Viole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423—452.
- Bryan, Dominic (2000): *Orange Parades: The Politics of Ritual, Tradition and Control*. London: Pluto Press.
- Buchan, Nancy R. , Rachel T. A. Croson, and Robyn M. Dawes (2002): “ Swift Neighbors and Persistent Strangers: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 Social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168—206.
- Buck, Andrew D. (1999): “ Networks of Governance and Privatization: A View From Provincial Russia,”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3:81—108.
- Burt, Ronald S. and Marc Knez (1995): “ Kinds of Third-Party Effects on Trus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7:255—292.
- Caddick-Adams, Peter and Richard Holmes (2001): “ Terrorism” in Richard Holmes, ed. ,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906—907.
- Caramani, Daniele (2000): *The Societies of Europe. Elections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815: Electoral Results by Constituencies*. New York: Grove’s Dictionaries.
- Caramani, Daniele (2004): *The 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 The Formation of*

- National Electorates and Party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sanova, Julián, Ángela Cenarro, Julita Cifuentes, Pilar Maluenda, and Pilar Salomón(1992): *El pasado oculto: Fascismo y violencia en Aragón (1936—1939)*. Madrid: Siglo Veintiuno de España.
- Castrén, Anna-Maija and Markku Lonkila (2004): “Friendship in Finland and Russia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in Anna-Maija Castrén, Markku Lonkila, and Matti Peltonen, eds.,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Essays on Microhistory, Collective Action, and Nation-Building*. Helsinki: SKS/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 Chaliand, Gérard and Jean-Pierre Rageau(1997): *Penguin Atlas of Diasporas*. New York: Penguin.
- Chalom, Maurice and Luce Léonard(2001): *Insécurité, Police de proximité et Gouvernance locale*. Paris: l’Harmattan.
- Chambers, John Whiteclay II (1987): *To Raise an Army. The Draft Comes to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 Chandhoke, Neera (2002): “The Limits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Marlies Glasius, Mary Kaldor, and Helmut Anheier,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5—54.
- Chevigny, Paul(1999): “Police Brutality,” in Lester Kurtz, ed., *Encyclopedia of Violence, Peace, and Conflict*.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pp. III, 1—10.
- Clark, Janine A. (2004a): *Islam, Charity, and Activism. Middle-Class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Welfare in Egypt, Jordan, and Ye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Janine A. (2004b): “Islamist Women in Yemen: Informal Nodes of Activism” in Quintan Wiktorowicz, ed., *Islamic Activism. A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pproa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Samuel and James S. Donnelly, Jr., eds. (1983): *Irish Peasants: Violence and Political Unrest, 1780—191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Conley, Carolyn A. (1999a): *Melancholy Accidents: The Meaning of Violence in Post-Famine Ireland*.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Conley, Carolyn A. (1999b): "The Agreeable Recreation of Fighting,"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3:58—72.
- Cook, Karen S., ed. (2001): *Trust in Socie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ordero-Guzmán, Héctor R., Robert C. Smith, and Ramón Grosfoguel, eds. (2001): *Migration, Transnationalization, and Race in a Changing New York*.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Cordingly, David (1995): *Under the Black Flag: The Romance and the Reality of Life Among the Pirate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Cornelius, Wayne (2001): "Huecos en la democratización: la política subnacional como un obstáculo en la transición mexicana" in Reynaldo Yunque Ortega Ortiz, ed., *Caminos a la democracia*. Mexico City: El Colegio de México, pp. 241—266.
- Crenshaw, Martha, ed. (1983): *Terrorism, Legitimacy, and Power: The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Violence*.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Crenshaw, Martha, ed. (1995): *Terrorism in Context*.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répin, Annie and Philippe Boulanger (2001): *Le Soldat-citoyen. Une histoire de la conscription*. Pari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Documentation Photographique 8019.
- Cruz, Rafael (1987): *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en la II República*. Madrid: Alianza.
- Cunningham, David (2003): "Understanding State Responses to Left-versus Right-Wing Threats: The FBI's Repression of the New Left and the Ku Klux Kla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7:327—370.
- Curtin, Philip D. (1984):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rr, Asaf (2003): "Gifting Practices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Constructing Obligation Networks in the Electronics Sector," *Sociological*

- Forum* 18:31—51.
- Davids, Karel and Jan Lucassen, eds. (1995): *A Miracle Mirrored: The Dutch Republic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Diane E. and Anthony W. Pereira, eds. (2003): *Irregular Armed Forces and Their Role in Politics and State 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flem, Mathieu (2002): *Policing World Society: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ce Coope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foe, Daniel (1999):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 Mineola, NY: Dover.
- Deibert, Ronald J. (2000): "International Plug 'n Play? Citizen Activism,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 255—272.
- Derlugian, Georgi (1999): "Che Guevaras in Turbans," *New Left Review* 237: 3—27.
- de Tocqueville, Alexis (1991): André Jardin, ed., *Oeuvres I*. Paris: Gallimard.
- Diamond, Larr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iani, Mario (1995): *Green Networks: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Itali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Diani, Mario (2003): "Introduction: Social Movements, Contentious Ac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From Metaphor to Substance'?" in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0.
- Diani, Mario and Doug McAdam, eds. (2003):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etz, Thomas, Elinor Ostrom, and Paul C. Stern (2003): "The Struggle to Govern the Commons," *Science* 302:1907—1912.
- DiMaggio, Paul, ed. (2001):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irm. Changing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Maggio, Paul, Eszter Hargittai, W. Russell Neuman, and John P. Robinson (2001):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307—336.
- DiMaggio, Paul and Hugh Louch (1998): "Socially Embedded Consumer Transactions: For What Kinds of Purchases Do People Most Often Use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619—637.
- Dolšak, Nives and Elinor Ostrom, eds. (2003): *The Commons in the New Millennium: Challenges and Adapt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 Dryzek, John S. (1996): "Political Inclusion and 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475—487.
- Dubin, Lois C. (1999): *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 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ffy, Eamon (2001): *The Voices of Morebath: Reformation & Rebellion in an English Vill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baugh, Helen Rose Fuchs (1988): *Becoming an EX: The Process of Role Ex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dwards, Bob, Michael W. Foley, and Mario Diani, eds. (2001): *Beyond Tocqueville: Civil Society and the Social Capital Deb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 Eisenbichler, Konrad (2000): "The Suppression of Confraternities in Enlightenment Florence" in Nicholas Terpstra, ed., *The Politics of Ritual Kinship: Confraternities and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iasoph, Nina (1998): *Avoiding Politics: How Americans Produce Apathy in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lis, Stephen (2000): *The Mask of Anarchy: The Destruction of Liberia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an Af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1989):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1999): *Alchemists of the Mind: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Claus Offe, and Ulrich K. Preuss (1998):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Rebuilding the Ship at S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ders, Walter and Todd Sandler (2002): "Patterns of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1970—1999: Alternative Time-Series Estim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6:145—165.
- Engelstad, Fredrik and Øyvind Østerud (2004): "Democracy and Power" in Fredrik Engelstad and Øyvind Østerud, eds., *Power and Democracy: Critical Interventions*. Aldershot: Ashgate, pp.1—10.
- Evans, Sara M. and Harry C. Boyte (1986): *Free Spaces: The Sources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 Farah, Douglas (2004): *Blood from Stones: The Secret Financial Network of Terror*;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 Farrell, Sean (2000): *Rituals and Riots: Sectarian Viole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Ulster, 1784—1886*.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Feige, Edgar (1997): "Underground Activi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ductive, Protective, and Predatory Behavior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n Joan Nelson, Charles Tilly, and Lee Walker, eds., *Transforming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Economies*.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pp. 21--34.
- Fernandez, Roberto and Doug McAdam (1988):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Recruitment to Mississippi Freedom Summer," *Sociological Forum* 3:357—382.
- Fishman, Robert M. (2004): *Democracy's Voices: Social Ties and the Quality of Public Life in Spa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orment, Carlos A. (2003):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1760—1900. Volume I: Civic Selfhood and Public Life in Mexico and Per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x, Jonathan (1992): *The Politics of Food in Mexico: State Power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ox, Jonathan (1994):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Clientelism to Citizenship: Lessons from Mexico," *World Politics* 46:151—184.
- Fox, Jonathan (1996): "How Does Civil Society Thicke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Mexico," *World Development* 24: 1089—1103.
- Fussell, Elizabeth and Douglas S. Massey (2004): "The Limits to Cumulative Caus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Mexican Urban Areas," *Demography* 41:151—171.
- Futrell, Robert and Barbara G. Brents (2003): "Protest as Terrorism: The Potential for Violent Anti-Nuclear Activ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6:745—765.
- Gambetta, Diego (1993): *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lasius, Marlies, Mary Kaldor, and Helmut Anheier, eds. (2002):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ete, Jan (2002): *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pain, the Dutch Republic, and Sweden as Fiscal-Military States, 1500—1660*. London: Routledge.
- González Callejo, Eduardo (1999): *El Máuser y el sufragio: Orden público, subversion y violencia política en la crisis de la Restauración (1917—1931)*.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 González Callejo, Eduardo (2002a): *El terrorismo en Europa*. Madrid: Arco/Libros.
- González Callejo, Eduardo, ed. (2002b): *Políticas del miedo. Un balance del terrorismo en Europa*. Madrid: Biblioteca Nueva.
- Gould, Roger V. (1995):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uld, Roger V. (1999):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Group Solidarity: Evidence

- from a Feuding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356—380.
- Gould, Roger V. (2003): *Collision of Wills: How Ambiguity about Social Rank Breeds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95):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Firms and Entrepreneurs” in Alejandro Portes, 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128—165.
- Green, Nancy L. (2002): *Repenser les migration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Greer, Donald (1935): *The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egory, Derek (2004): *The Colonial Present: Afghanistan—Palestine—Iraq*. Oxford: Blackwell.
- Greif, Avner (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912—950.
- Grimson, Alejandro (1999): *Relatos de la diferencia y la igualdad: Los bolivianos en Buenos Aire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de Buenos Aires.
- Guenniffey, Patrice (2000): *La Politique de la Terreur: Essai sur la Violence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4*. Paris: Fayard.
- Guiso, Luigi, Paola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 (2004):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526—556.
- Haber, Stephen, Armando Razo, and Noel Maurer (2003): *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Rights: Political Instability, Credible Commit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 1876—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gan, Jacqueline and Helen Rose Ebaugh (2003): “Calling upon the Sacred; Migrants’ Use of Religion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1145—1162.
- Hanagan, Michael (1998): “Irish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Deterritorialized Migrants, and the State System: The Last One Hundred and Forty Years," *Mobilization* 13:107—126.

Hanagan, Michael (2002); "Irish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Migrants, and the State System" in Jackie Smith and Hank Johnst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p. 53—74.

Hardin, Russell (2002):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t Hart, Marjolein (1993): *The Making of a Bourgeois State: War, Politics and Finance during the Dutch Revol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art, Peter (1998): *The I. R. A. & its Enemies: Violence and Community in Cork, 1916 —192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vik, Philip J. (1998):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Gender, Kinship and Trade in the Guinea Bissau Region" in Carla Risseuw and Kamala Ganesh, eds., *Negotiation and Social Space: A Gendered Analysis of Changing Kin and Security Networks in South Asia and Sub-Saharan Africa*.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Haythornthwaite, Caroline and Barry Wellman (2002):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An Introduction" in Barry Wellman and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 eds.,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Malden, MA: Blackwell.

Hechter, Michael (1987): *Principles of Group Solidar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imer, Carol A. (1985): *Reactive Risk and Rational Action: Managing Moral Hazard in Insurance Contra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lleiner, Eric (2003): *The Making of National Money: Territorial Currenc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chschild, Adam(1998):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Hoerder, Dirk and Leslie Page Moch, eds. (1996): *European Migrants: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 Philip T., Gilles Postel-Vinay, and Jean-Laurent Rosenthal (2000): *Priceless Marke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edit in Par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ffmann, Stefan-Ludwig (2003): "Democracy and Associations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Toward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5:269—299.
- Horden, Peregrine and Nicholas Purcell(2000):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 Horowitz, Donald L. (2001): *The Deadly Ethnic Rio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ggins, Martha Knisely (1998): *Polic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umphrey, Caroline(1999): "Traders, 'Disorder' and Citizenship Regimes in Provincial Russia" in Michael Burawoy and Katherine Verdery, eds., *Uncertain Tradition: Ethnographies of Change in the Postsocialist World*.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Humphrey, Caroline(2001): "Inequality and Exclusion: A Russian Case Study of Emotion in Politic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331—353.
- Ibarra, Pedro, ed. (2003):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 Ikegami, Eiko(1995): *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Imig, Doug and Sidney Tarrow (2001) : "Mapping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ontention: Evidence from a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Doug Imig and Sidney Tarrow, eds., *Contentious Europeans: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an Emerging Pol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Ingram, Paul and Peter W. Roberts(2000): "Friendships among Competitors in the Sydney Hotel Indu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387—423.
- Jarman, Neil(1997): *Material Conflicts: Parades and Visual Displays in Northern Ireland*. Oxford: Berg.
- Jasso, Guillermina(1999): "How Much Injustice is There in the World? Two New Justice Index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133—168.
- Jung, Courtney(2003): "Breaking the Cycle: Producing Trust Out of Thin Air and Resent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147—176.
- Jupp, Peter and Eoin Magennis, eds. (2000): *Crowds in Ireland c. 1720—1920*. London: Macmillan.
- Kaelber, Lutz (1998): *Schools of Asceticism: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Medieval Religious Communitie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Kakar, Sudhir(1996): *The Colors of Violence: Cultural Identities, Religion, and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lmanowiecki, Laura(2000):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of Political Policing in Argentin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7:36—56.
- Kalyvas, Stathis N. (1999): "Wanton and Senseless? The Logic of Massacres in Algeria,"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1:243—285.
- Kamphoefner, Walter D. (1987): *The Westfalians: From Germany to Missour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mphoefner, Walter D., Wolfgang Helbich, and Ulrike Sommer, eds. (1991): *News From the Land of Freedom: German Immigrants Write Hom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nter, Rosabeth Moss (1972): *Commitment and Community: Communes and Utopia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ck, Margaret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ck, Margaret and Kathryn Sikkink (2000): "Historical Precursors to Modern

-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in John A. Guidry, Michael D. Kennedy, and Mayer N. Zald, eds., *Globaliza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ulture, Power, and the 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35—53.
- Keogh, Dermot(2001): “Ire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1994—2001” in T. W. Moody and F. X. Martin, eds., *The Course of Irish History*. Lanham, MD: Roberts Rinehart. 4th edn.
- Kepel, Gilles(2002): *Jihad: 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rshaw, Sarah and Monica Davey(2004): “Plagued by Drugs, Tribes Revive Ancient Penalty,” *New York Times*, electronic edition, January 18.
- Knight, Jack(2001): “Social Norms and the Rule of Law: Fostering Trust in a Socially Diverse Society” in Karen S. Cook, ed., *Trust in Socie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354—373.
- Knoke, David (1990): *Political Networks: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norr-Cetina, Karin and Urs Bruegger(2002): “Global Microstructures: The Virtual Societies of Financial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 905—950.
- Konstam, Angus (2002): *The History of Pirates*. Guilford, CT: The Lyons Press.
- Koopmans, Ruud (2004): “Movements and Media: Selection Processes and Evolutionary Dynamics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ory and Society* 33: 367—391.
- Kraska, Peter B. and Victor E. Kappeler (1997) : “Militarizing American Police: The Rise and Normalization of Paramilitary Units,” *Social Problems* 44:1—18.
- Krauze, Enrique (2004): “Past Wrongs, Future Right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A21.
- Krebs, Ronald R. (2004): “A School for the Nation? How Military Service Does

- Not Build Nations, and How it Migh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85—124.
- Kushner, Harvey W., ed. (2001): “Terrorism in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4, no. 6, entire issue.
- Lagrange, Hugues (1989): “Strikes and the War” in Leopold Haimson and Charles Tilly, eds., *Strikes, Wars, and Revolutions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473—499.
- Landa, Janet Tai (1994): *Trust, Ethnicity, and Identity: Beyo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Ethnic Trading Networks, Contract Law, and Gift-Exchang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ane, Frederic C. (1973):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ane, Frederic C. (1975) :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conomic Growth in Early Modern Tim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8—17.
- Laumann, Edward O. and David Knoke (1987): *The Organizational State: Social Choice in National Policy Domain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Ledeneva, Alena(1998): *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deneva, Alena (2000): “Russian Hackers and Virtual Crime” in A. V. Ledeneva and M. Kurchiyan, eds., *Economic Crime in Russia*.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p.163—175.
- Ledeneva, Alena (2004): “Genealogy of *krugovaya poruka*: Forced Trust as a Feature of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23: 85—108.
- van Leeuwen, Marco H. D. (2000): *The Logic of Charity: Amsterdam, 1800—1850*. London: Macmillan.
- Lehmann, David (199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s,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Post-war Perio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evi, Margaret (1997): *Consent, Dissent, and Patriot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i, Margaret (2003): "An Analytic Narrative Approach to Puzzles and Problems," Working Paper 2003/192, Juan March Institute, Madrid.
- Levi, Margaret and Laura Stoker(2000): "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475—508.
- Levine, David(1984):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the Proletarian Family in England, 1500—1851" in David Levine, ed., *Proletarianiz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pp.87—128.
- Light, Ivan and Edna Bonacich(1988):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Koreans in Los Angeles, 1965—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dert, Peter H. (2004): *Growing Public. Social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vols.
- Lis, Catharina and Hugo Soly(1979): *Poverty and Capitalism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 Lis, Catharina and Hugo Soly(1984): "Policing the Early Modern Proletariat, 1450—1850" in David Levine, ed., *Proletarianiz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Lonkila, Markku (1999a): *Social Networks in Post-Soviet Russia*. Helsinki: Kikumora Publications.
- Lonkila, Markku (1999b): "Post-Soviet Russia: A Society of Networks?" in Markku Kangaspuro, ed., *Russia: More Different than Most*. Helsinki: Kikumora Publications, pp.99—112.
- López-Alves, Fernando (2000): *State Formation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1810—190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ye, Diane N. (1996):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79—102.
- Lynch, Patrick (2001): "The Irish Free State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1921—1966" in T. W. Moody and F. X. Martin, eds., *The Course of Irish History*. Lanham, MD: Roberts Rinehart. 4th edn.

- Lynn, John(1984):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Motivation and Tactics in the Arm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91—179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Lynn, John(2003): *Battle. A History of Combat and Culture*. Boulder, CO: Westview.
- MacCulloch, Diarmaid (2003): *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1700*. London: Allen Lane.
- MacLean, Lauren Morris(2004): "Empire of the Young: The Legacies of State Agricultural Policy on Local Capitalism and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n Ghana and Côte d'Ivoi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6:469—496.
- Malafakis, Edward E. (1970): *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Spai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lcolm, Noel (1996): *Bosni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Rev. edn. ; first published in 1994.
- Marques, M. Margarida, Rui Santos, and Fernanda Araújo(2001): "Ariadne's Thread: Cape Verdean Women in Transnational Webs," *Global Networks* 1: 283—306.
- Marsh, Christopher (1998): *Popular Religion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 Mason, T. David and Dale A. Krane(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ath Squads: Toward a Theory of the Impact of State-Sanctioned Terr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 175—198.
- Massey, Douglas S., Joaquí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1998):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uro, Frédéric (1990): "Merchant Communities, 1350—1750" in James D. Tracy, e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yer, Arno J. (2002): *The Furies: Violence and Terror in the French and*

- Russian Revolu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zower, Mark (2002): "Violence and the Sta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1158—1178.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racken, J. L. (2001): "Northern Ireland: 1921—1966" in T. W. Moody and F. X. Martin, eds., *The Course of Irish History*. Lanham, MD: Roberts Rinehart. 4th edn.
- McGowen, Randall (1999): "From Pillory to Gallows: The Punishment of Forgery in the Age of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Past & Present* 165: 107—140.
- Meisch, Lynn A. (2002): *Andean Entrepreneurs: Otavalo Merchants and Musicians in the Global Aren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Mertes, Tom, ed. (2004):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Is Another World Really Possible?* London: Verso.
- Miskimin, Patricia Behre (2002): *One King, One Law, Three Faiths: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Metz*. Westport, CT: Greenwood.
- Mjøset, Lars and Stephen Van Holde (2002): "Killing for the State, Dying for the Nation: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Life Cycle of Conscription into Europe's Armed Forces,"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20:3—94.
- Moch, Leslie Page (2003): *Moving Europeans: 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65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nd edn.
- Mommsen, Wolfgang J. and Gerhard Hirschfeld, eds. (1982): *Social Protest, Violence and Terror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 Monjardet, Dominique (1996): *Ce que fait la police: Sociologie de la force publ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 Moore, Barrington, Jr. (1979):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 Morawska, Ewa (1985): *For Bread with Butter: Life-Worlds of East Central Europeans in Johnstown, Pennsylvania, 1890—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awska, Ewa (1996): *Insecure Prosperity: Small-Town Jews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90—194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orawska, Ewa (2003): “Disciplinary Agendas and Analytic Strategies of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Challenges of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 611—640.
- Morrill, Calvin (1991): “Conflict Management, Honor,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585—621.
- Muir, Edward (1997): *Ritua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ldrew, Craig (1993): “Interpreting the Market: The Ethics of Credit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ocial History* 18: 163—183.
- Muldrew, Craig (1998): *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London: Macmillan.
- Muldrew, Craig (2001): “‘Hard Food for Midas’: Cash and its Social Valu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170: 78—120.
- Nada Patrone, Anna Maria, and Gabrielle Airaldi (1986): *Comuni e signorie nell’Italia settentrionale: il Piemonte e la Liguria*. Turin: UTET.
- Naimark, Norman M. (2001):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ajemy, John M. (1982): *Corporatism and Consensus in Florentine Electoral Politics, 1280—140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Narotzky, Susana and Paz Moreno (2002): “Reciprocity’s Dark Side. Negative Reciprocity, Moralit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 281—305.
-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2004): *Final Report*. New York: Norton.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ouglass C. (1997): "Understanding Economic Change" in Joan Nelson, Charles Tilly, and Lee Walker, eds., *Transforming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Economies*.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pp. 13—18.
- Ohlemacher, Thomas (1993): *Brücken der Mobilisierung: Soziale Relais und persönliche Netzwerke in Bürgerinitiativen gegen militärischen Tiefflug*.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 Verlag.
- Oliverio, Annamarie (1998): *The State of Terro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O'Neill, Joseph (2001): *Blood-Dark Track. A Family History*. London: Granta.
- O'Neill, Kate (2004): "Transnational Protest: States, Circuses, and Conflict at the Frontline of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6: 233—251.
- Opp, Karl-Dieter and Christiane Gern (1993): "Dissident Groups, Personal Networks, and Spontaneous Cooperation: The East German Revolution of 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659—680.
- Ortega Ortiz, Reynaldo Yunuen (2000): "Comparing Types of Transitions: Spain and Mexico," *Democratization* 7: 65—92.
- Ortega Ortiz, Reynaldo Yunuen, ed. (2001): *Caminos a la Democracia*. Mexico City: El Colegio de México.
- Ostergren, Robert C. (1988): *A Community Transplanted: The Trans-Atlantic Experience of a Swedish Immigrant Settlement in the Upper Middle West, 1835—1915*. Uppsala: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
-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strom, Elinor (1998):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1—22.
- Ostrom, Elinor, Thomas Dietz, Nives Dolšak, Paul C. Stern, Susan Stonich, and Elke Weber, eds. (2002): *The Drama of the Commons*.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Otterbein, Keith F. (1999): "Clan and Tribal Conflict" in *Encyclopedia of Violence, Peace, and Conflict*.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vol. 1, pp.

289—295.

Palmer, Stanley H. (1988): *Police and Protest in England and Ireland 178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pe, Robert A. (2003):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343—361.

Paravy, Pierrette(1993): *De la Chrétienté Romaine à la Réforme en Dauphiné. Évêques, Fidèles et Déviants (vers 1340—vers 1530)*.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 vols.

Parsa, Misagh (2000): *States,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ran, Nicaragua and the Philipp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ssy, Florence (1998): *L'Action altruiste: Contraintes et opportunités de l'engagement dans les mouvements sociaux*. Geneva: Droz.

Passy, Florence(2001): “Socialization, Connection, and the Structure Agency Gap: A Specification of the Impact of Networks on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Mobilization* 6: 173—192.

Pastor, Reyna, Esther Pascua, Ana Rodríguez-López, and Pablo Sánchez-León (2002): *Beyond the Market: Transactions, Proper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Monastic Galicia 1200—1300*. Leiden: Brill.

Paxton, Pamela (1999):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88—127.

Paxton, Pamela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7: 254—277.

Piipponen, Minna(2004): “Work-Related Ties in the Everyday Life of a Russian Karelian Mill Community” in Risto Alapuro, Ilkka Liikanen, and Markku Lonkila, eds., *Beyond Post-Soviet Transition: Micro Perspectives on Challenge and Survival in Russia and Estonia*. Saarijärvi: Kikumora Publications, pp.64—83.

Podolny, Joel M. and Karen L. Page(1998):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57—76.

Polletta, Francesca(1999): “‘Free Spaces’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 Society* 28: 1—38.
- Polletta, Francesca (2002): *Freedom is an Endless Meeting: Democracy 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ros, Maritsa(2001):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inking Local Labour Markets: The Case of Asian Indian Migration to New York and London,” *Global Networks* 1: 234—259.
-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Gianfranco Pasquino, eds. (1983): *Terrorismo e violenza politica*. Bologna: Il Mulino.
- Portes, Alejandro, ed. (1995):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Portes, Alejandro, ed. (1996):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Portes, Alejandro and Rubén Rumbaut(1990):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rtes, Alejandro and Rubén Rumbaut (2001):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stel-Vinay, Gilles(1998): *La terre et l'argent: L'agriculture et le crédit en France du XVII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Paris: Albin Michel.
- Postgate, J. N. (1992): *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Powell, Walter W. (1990):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in Barry Staw and Lawrence L. Cummings,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Greenwich, CT: JAI Press, pp.295—336.
- Powell, Walter W. and Laurel Smith-Doerr (1994): “Networks and Economic Life”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368—402.
- Pretty, Jules (2003):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Science* 302: 1912—1914.

- Proudhon, Pierre -Joseph (2003):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Antony: Editions TOPS/H. Trinquier.
- Prunier, Gérard(1995):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runier, Gérard(2001): "Genocide in Rwanda" in Daniel Chirot and Martin E. P. Seligman, eds., *Ethnopolitical Warfar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p.109—116.
- Przeworski, Adam, Michael Alvarez, José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1997): "What Makes Democracies Endure?"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Yun-han Chu, and Hung-mao Tien,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afael, Vicente(2003): "The Cell Phone and the Crowd: Messianic Poli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Philippines," *Public Culture* 15: 399—425.
- Raggio, Olsvaldo (1990): *Faide e Parentele: Lo Stato Genovese visto dalla Fontanabuona*. Turin: Einaudi.
- Rapoport, David C. (1999): "Terrorism" in Lester Kurtz, ed., *Encyclopedia of Violence, Peace, and Conflict*.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vol. 3. pp. 497—510.
- Reitz, Jeffrey G. and Sherrilyn M. Sklar (1997): "Culture, Race, and the Economic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Sociological Forum* 12: 233—278.
- Rheingold, Howard(2003):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erseus Publishing.
- Riles, Annelise (2000): *The Network Inside Ou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Roaf, Michael (1990):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 Roberts, Kenneth and Michael D. Morris (2003): "Fortune, Risk, and Remittances: An Application of Option Theory to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Based Migration Network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 1252—1281.
- Romero, Mauricio(2003): *Paramilitares y autodefensas, 1982—2003*. Bogotá: Institut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 Rotberg, Robert, ed. (1999): "Patterns of Social Capital: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9: nos. 3 and 4, Winter and Spring 1999, two entire issues.
- Rotberg, Robert, ed. (2004): *When States Fai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thstein, Bo(2004): "Social Capital in a Working Democracy" in Fredrik Engelstad and Øyvind Østerud, eds., *Power and Democracy: Critical Interventions*. Aldershot: Ashgate, pp.101—130.
- Rubin, Jeffrey W. (1997): *Decentering the Regime: Ethnicity, Radicalism, and Democracy in Juchitán, Mexic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uby, Charles L. (2002): "The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2: 9—14.
- Rucht, Dieter(2003): "Media Strategies and Media Resonance in Transnational Protest Campaigns,"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n Transnational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Bellagio, Italy.
- Sanders, Jimmy (2002): "Ethnic Boundaries and Identity in Plural Socie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327—357.
- Sanderson, Susan R. Walsh (1984): *Land Reform in Mexico, 1910—1980*.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Sassen, Saskia (2002): "Towards a Sociolog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ent Sociology* 50: 29—52.
- Saxenian, AnnaLee(1994):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mid, Alex P., ed. (2001): *Countering Terrorism Through International*

- Cooperation*. Mil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Programme.
- Schmid, Alex P. and Janny de Graaf (1982): *Violence as Communication: Insurgent Terrorism and the Western News Media*.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chumpeter, Joseph A. (1947):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2nd edn. First published in 1942.
-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ohn (1991):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London: Sage.
- Seligman, Adam (1997): *The Problem of Tru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enechal de la Roche, Roberta, ed. (2004): "Theories of Terrorism: A Symposium," *Sociological Theory* 22: 1—105.
- Shapiro, Susan P. (1987): "The Social Control of Impersonal Tru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623—658.
- Sheller, Mimi (2000): *Democracy After Slavery: Black Publics and Peasant Radicalism in Haiti and Jamaica*. London: Macmillan (Warwick University Caribbean Studies).
- Shklar, Judith N. (1990): *The Faces of Injusti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ngerman, Diane (1995): *Avenues of Participation: Family, Politics, and Networks in Urban Quarters of Cair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ingerman, Diane (2004): "The Networked World of Islamist Social Movements" in Quintan Wiktorowicz, ed., *Islamic Activism: A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pproa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143—163.
- Skocpol, Theda (1998): "Did the Civil War Further American Democracy? A Reflection on the Expansion of Benefits for Union Veterans" in Theda Skocpol, ed., *Democracy, Revolution, and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 University Press, pp.73—101.
- Skocpol, Theda (2003): *Diminished Democracy: 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Skocpol, Theda and Morris P. Fiorina, eds. (1999):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kocpol, Theda and Jennifer Lynn Oser (2004): "Organization Despite Adversit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Fraternal Association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8: 367—437.
- Smelser, Neil J. and Faith Mitchell, eds., (2002a): *Terrorism, Perspectives from 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 Smelser, Neil J. and Faith Mitchell, eds., (2002b): *Discouraging Terrorism: Some Implications of 9/11*.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 Smith, Adam (2000):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First published in 1759.
- Smith, Jackie (1997):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Sector" in Jackie Smith, Charles Chatfield, and Ron Pagnucco,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Jackie (2002): "Globalizing Resistance: The Battle of Seattle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 Movements" in Jackie Smith and Hank Johnst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Smith, Jackie (2004):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10: 255—286.
- Smith, Jackie and Joe Bandy (2004): "Introduc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ransnational Protest" in Joe Bandy and Jackie Smith, eds., *Coalitions Across Borders: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the Neoliberal Ord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Smith, Robert Courtney(2000): "How Durable and New is Transnational Life? Historical Retrieval through Local Comparison," *Diaspora* 9: 203—232.
- Smith, Robert Courtney(2005): *Mexica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Worlds of New Immigra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olnick, Steven L. (1998): *Stealing the State: Control and Collapse in Soviet Institu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oto Carmona, Álvaro(1988): *El trabajo industrial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1874—1936)*. Barcelona: Anthropos.
- Stanley, William(1996): *The Protection Racket State: Elite Politics, Military Extortion, and Civil War in El Salvado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tark, Oded(1995): *Altruism and Beyond: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ransfers and Exchanges within Families and Group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in, Gil J. (1999): *Rethinking World-Systems: Diasporas, Colonies, and Interaction in Uruk Mesopotamia*.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Stern, Jessica(2003): *Terror in the Name of God: Why Religious Militants Kil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Tarrow, Sidney (2002): "From Lumping to Splitting: Specifying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in Jackie Smith and Hank Johnst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Tarrow, Sidney(2003): "The New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s in Complex Internationalism," Working Paper 2003. 1,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Project, Cornell University.
- Taylor, Christopher C. (1999): *Sacrifice as Terror: The Rwandan Genocide of 1994*. Oxford: Berg.
- Terpstra, Nicholas(2000): "The Politics of Ritual Kinship" in Nicholas Terpstra, ed., *The Politics of Ritual Kinship: Confraternities and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E. P. (1991):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Merlin Press.
- Thompson, Ginger (2004): "Mexico's Leader to Pursue Genocide Cas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 A10.
- Thomson, Janice E. (1994): *Mercenaries, Pirates, and Sovereigns: State-Building and Extraterritorial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75):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84): "Demographic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Proletariat" in David Levine, ed., *Proletarianiz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Tilly, Charles (1985):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0): "Transplanted Networks," in Virginia Yans-McLaughlin, ed.,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History, Soci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2a): "Conclusions" in Leopold Haimson and Giulio Sapelli, eds., *Strikes,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Milan: Feltrinelli.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Annali* 1990/1991.
- Tilly, Charles (1992b):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Oxford: Blackwell. Revised edition.
- Tilly, Charles (1993): *European Revolutions, 1492—1992*. Oxford: Blackwell.
- Tilly, Charles, ed. (1995):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9a): "Conclusion: Why Worry about Citizenship?" in Michael

- Hanagan and Charles Tilly, eds., *Extending Citizenship, Reconfiguring Stat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247—260.
- Tilly, Charles(1999b):“Power-Top Down and Bottom Up,”*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7: 330—352.
- Tilly, Charles(2000a):“Spaces of Contention,”*Mobilization* 5:135—160.
- Tilly, Charles(2000b):“Chain Migration and Opportunity Hoarding” in Janina W. Dacyl and Charles Westin, eds., *Governance of Cultural Diversity*. Stockholm: CEIFO [Centre for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 Tilly, Charles(2001):“Do Unto Others” in Marco Giugni and Florence Passy, eds., *Political Altruism? Solidarity Mo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p.27—50.
- Tilly, Charles (2002a): *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Tilly, Charles(2002b):“Violence, Terror, and Politics as Usual,”*Boston Review* 27, nos. 3—4: 21—24.
- Tilly, Charles(2003a):“Political Identities in Changing Polities,”*Social Research* 70:1301—1315.
- Tilly, Charles (2003b):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2004a):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2004b):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CO: Paradigm Press.
- Tilly, Charles(2004c):“Social Boundary Mechanisms,”*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4: 211—236.
- Tilly, Charles(2004d):“Terror, Terrorism, Terrorists,”*Sociological Theory* 22: 5—13.
- Tilly, Charles(2004e):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CO: Paradigm Press.

- Tilly, Charles(2005): *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 Boulder, CO: Paradigm Press.
- Tilly, Chris and Charles Tilly(1998): *Work Under Capitalism*. Boulder, CO: Westview.
- Tishkov, Valery(1997):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and After the Soviet Union: The Mind Aflame*. London: Sage.
- Tishkov, Valery (2004): *Chechnya: Life in a War-Torn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rexler, Richard C. (1981): *Public Lif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rif, Maria and Doug Imiq(2003): "Demanding to be Heard: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European Public Sphere," Ithaca, NY: Working Paper 2003—2006, Cornell University Workshop on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 Tsai, Kellee S. (2002):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urk, Austin T. (2004): "Sociology of Terror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271—286.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200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Deepening Democracy in a Fragmented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S. State Department (2001):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2000," www.usis.usemb.se/terror/rpt2000/index.html.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
- U.S. State Department(2002):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2001," www.usis.usemb.se/terror/rpt2001/index.html.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
- Uslaner, Eric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zzi, Brian(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35—67.

- Vanhanen, Tatu (2002): "A New Dataset for Measuring Democracy, 1810--1998,"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7: 251—265.
- Van Wey, Leah (2004): "Altruistic and Contractual Remittanc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Migrants and Households in Rural Thailand," *Demography* 41: 739—756.
- Varese, Federico (2001): *The Russian Mafia: Private Protection in a New Market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rdery, Katherine (2003): *The Vanishing Hectare: Property and Value in Postsocialist Transylvan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Vermunt, Riël and Herman Steensma, eds. (1991): *Social Justice in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Plenum. 2 vols.
- Vertovec, Steven (2003): "Migration and Other Modes of Transnationalism: Towards Conceptual Cross-Fertiliz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 641—665.
- Volkov, Vadim (2002): *The Monopoly of Force: Violent Entrepreneurs in Russia's Emerging Marke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dinger, Roger D. (1996): *Still the Promised City? African-Americans and New Immigrants in New York, 1940—199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ldinger, Roger and Mehdi Bozorgmehr, eds. (1996): *Ethnic Los Angel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Waldman, Peter, ed. (1993): *Beruf: Terrorist Lebensläufe im Untergrund*. Munich: Beck.
- Walter, Eugene V. (1969): *Terror and Resistance: A Study of Political Viol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rren, Mark E., ed. (1999): *Democracy and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sserman, Stanley and Katherine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tts, Duncan (2003): *Six Degrees: The Science of a Connected Age*. New York: Norton.

- Watts, Duncan(2004): "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243—270.
- Weber, Linda R. and Allison I. Carter(2003):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rust*. New York: Kluwer/Plenum.
- White, Harrison C. (2002): *Markets From Networks: Socioeconomic Models of Produ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Richard(1991):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Robert W. (1993): "On Measuring Political Violence: Northern Ireland, 1969 to 198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575—585.
- Wiktorowicz, Quintan(2001): *The Management of Islamic Activism: Salafi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State Power in Jord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Willerton, John P. (1992): *Patronage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obin(2003): *The Wars Within: Peoples and States in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E. (1996):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loch, Isser(1970): *Jacobin Legac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the Direc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loch, Isser(1994): *The New Regim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c Order, 1789—1820s*. New York: Norton.
- Wood, Andrew Grant(2001): *Revolution in the Street: Women, Workers, and Urban Protest in Veracruz, 1870—1927*.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 Wood, Elisabeth Jean (2000): *Forging Democracy from Below: Insurgent Transitions in South Africa and El Salvad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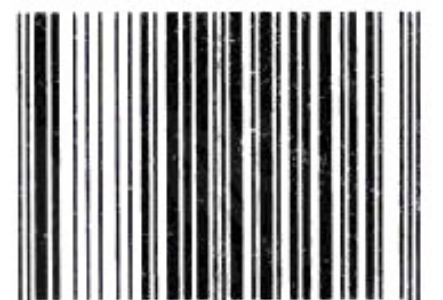
- Wood, Lesley J. (2004): "Breaking the Bank and Taking to the Streets: How Protesters Target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10: 69—89.
- Woolcock, Michael(1998):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 151—208.
- Wrightson, Keith and David Levine(1979): *Poverty and Piety in an English Village: Terling, 1525—170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rightson, Keith and David Levine(1991): *The Making of an Industrial Society: Whickham 1560—176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uthnow, Robert(2004): "Trust as an Aspect of Social Structure" in Jeffrey C. Alexander, Gary T. Marx, and Christine L. Williams, eds., *Self, Social Structure, and Beliefs: Explorations in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45—167.
- Yamagishi, Toshio and Midori Yamagishi (1994):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8: 129—166.
- Yashar, Deborah J. (1997): *Demanding Democracy: Reform and Reaction in Costa Rica and Guatemala, 1870s—1950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inger, J. Milton (1985):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 151—180.
- Ylikangas, Heikki, Petri Karonen, and Martti Lehti(2001): *Five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Finland and the Baltic Area*.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Iris Marion(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ablocki, Benjamin D. (1971): *The Joyful Community: An Account of the Bruderhof, A Communal Movement Now in its Third Generation*. New York: Penguin.
- Zablocki, Benjamin D. (1980): *Alienation and Charisma: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Communes*. New York: Free Press.

- Zelizer, Viviana A. (2000):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Law & Social Inquiry* 25: 817—848.
- Zelizer, Viviana A. (2002): "La construction des circuits de commerce: notes sur l'importance des circuits personnels et impersonnels" in Jean Michel-Servet and Isabelle Guérin, eds., *Exclusion et Liens Financiers: Rapport du Centre Walras*. Paris: Economica, pp.425—429.
- Zelizer, Viviana A. (2005):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in 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revise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331—354.
- Zink, Anne (1997): *Clochers et Troupeaux: Les Communautés rurales des Landes et du Sud-Ouest avant la Révolution*. Bordeau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208-09201-3



9 787208 092013 >

定价：3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